

主编　周宪 许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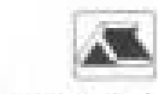
20世纪的两位

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

萨特与阿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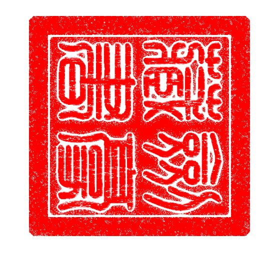
[法]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 著
陈伟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知识分子译丛

主编　周宪　许钧





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

萨特与阿隆

[法]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　著
陈伟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法)西里奈利著;陈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ISBN 7-214-02972-3

Ⅰ.2... Ⅱ.①西...②陈... Ⅲ.①萨特,J.P.(1905—)—生平事迹②阿隆,R.C.F.(1905—)—生平事迹 Ⅳ.K835.6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28071号

书　　名	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
著　　者	(法)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
译　　者	陈　伟
责任编辑	戴亦梁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南通韬奋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2.5　插页2
字　　数	288千字
版　　次	200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972—3/G·978
定　　价	21.00元

知识分子译从总序

1968年“五月风暴”过后，浪漫的激情渐渐隐去。法国哲学家福柯悲哀地说，“知识分子”从此销声匿迹，只剩下在各专业领域里忙碌的“专门家”。与福柯的悲观主义不同，大约十年后，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社会学家艾尔文·古德纳则欢呼雀跃知识分子“新阶级”的诞生，他历数“新阶级”的种种特征，尤以拥有文化资本而迥异于传统的财富资本拥有者。然而，乐观主义的好景不长，几年后另一位老派美国知识分子拉塞尔·雅各比抛出一本轰动知识界的书，其标题极富象征意味——《最后的知识分子》，福柯的悲哀好像又卷土重来。只要对西方学界文献稍加翻检，便会发现知识分子乃是一个令人关注的主题。当然，谈论知识分子并不轻松，说起来这话题还真有点儿沉重。

新千年伊始，一个知识爆炸性增长的时代图景日趋明晰。“知识经济时代”、“高技术时代”、“信息社会”、“专业社会”林林总总的描述，似乎都在确证一个共识：知识的急剧增长在深刻地改变我们的世界。于是，专事于知识生产、传播乃至消费的社会角色的讨论，也就合乎逻辑地多了起来，热闹起来。

回到了福柯的命题：如今专家有的是，但知识分子却历史性地消失了。

福柯的话是什么意思？他眼中的知识分子是啥模样？也许，每人心中都有自己关于知识分子想像性的建构，都在反思自己该如何履行这个称谓的角色行为。换言之，何为知识分子的

提问，决非抽象概念的厘定，更是一个实践理性问题，关乎当代社会中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的认同和行为问题。

追问何为知识分子，这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因为当代社会的确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困境：专业社会中职业分工越加细密，学院体制越来越制度化，知识与常识的距离越来越远，技术的工具理性已深入到日常生活和思想的各个层面。一言以蔽之，种种难题凸显面前：知识分子与权威的关系如何？知识分子在当代与民众及其社会运动有何联系？知识生产的制度化、学院化是否正在改变知识分子的功能？怎样在"专门家"与公共知识分子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关联？如何在大众媒介霸权盛行的社会中践履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全球化和发展不平等的格局中，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应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什么是知识的政治？何为批判性话语？……无数新的难题构造了我们这个时代关于知识分子话题的特殊语境。于是，从个人身份到群体作用，从制度安排到理论话语，从国家利益到世界公民，从专业知识到民众教育，勿庸置疑，善于反思的人总是面临着更多的困惑。

反观中国，近代以降，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艰难转变中，知识分子承担了重要的历史角色：从识字扫盲到远涉重洋寻找真理，从兴办学堂、书局到国民性批判，从宣传马克思主义到介入伟大的社会革命。摆脱了传统文人仕与隐两难困境的现代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卷入了宏大的历史变革实践。鲁迅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准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此话真矣！今天，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在社会面临急剧变革的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无疑遭遇到更多的挑战和困境。

据此，我们选编了这套译丛，旨在透过西方知识分子问题的

讨论，寻找一些有价值有启发性的思考路径，诚然，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与中国相去甚远，我们也未必赞同诸种理论观点，不过，他山之石，毕竟可以攻玉。

周　宪　　许　钧

2001 年 6 月于古城南京

目　　录

本书内容及作者简介

两位哲学家都出生于1905年，1924—1928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时，他们是形影不离的“小朋友”。年轻的萨特当时不问政治，后来却成了政治参与义务的大理论家。而雷蒙·阿隆则已经开始关注政治，并且倾向于社会主义和和平主义。

两人都曾旅居德国，这段经历给了他们不同的收获，不过，真正使他们走上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阿隆去了伦敦，在那里他为《自由法兰西报》撰稿。萨特的抵抗活动虽然不如他的信徒们所说的那么辉煌，但他也遭受过被俘和战败的打击，并且在几次知识分子的抵抗活动中获得了参与抵抗的经历。1945年，在他所创办的《现代》杂志（阿隆曾有一段时间和该杂志合作过）第1期上，萨特提出了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理论。他的观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媒体很快把“存在主义”和圣－日尔曼－德－普雷区的活跃思

想联系起来;萨特的著作被大量印刷,他的剧作也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不久,冷战将世界一分为二,法国知识界也受到了影响。起初,萨特遭到共产党的猛烈抨击,可他和后者逐渐接近,甚至在1952—1956年间成了该党的"同路人"。而在雷蒙·阿隆最为著名的评论著作之一《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里、在他对专制现象的思考中,他所揭露的恰恰是共产党知识分子和该党的"同路人"。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萨特和阿隆是一对敌对的兄弟,他们代表和象征着知识界两大对立的派别,这种情况不仅体现在行将结束的殖民战争和越南冲突上,同样也反映在1968年的五月危机中:萨特支持学生运动,而在极左派的眼里,阿隆是"资产阶级"教育界和被羞辱的自由主义政治的代表。

不过后来,正是这种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身份给了雷蒙·阿隆声誉和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法国知识界经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危机,极左派的思想楷模和大师都遭到了贬斥,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也迅速削弱。1980年萨特去世,此后他经常被攻击。长期以来,他一直是左派知识分子优势地位的体现,可现在,他在某种意义上却成了左派错误和失败的罪魁和象征。与此同时,雷蒙·阿隆在他1983年去世以前甚至以后,得到了他的同胞们的广泛承认,被看成是自由主义浪潮的一分子。

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 法国里尔第三大学教授,先后通过法亚尔出版社出版了《一代知识分子——两次大战之间高等师范的预备生和正式生》(1988年)、《知识分子与法兰西激情——20世纪的声明和请愿书》(1990年)等著作,并领导编写了《法国右派史》(伽利玛出版社,1992年)和《20世纪法国政治生活历史词典》(法国教育出版社,1995年)等著作。

引子
此一时彼一时

我们的故事理所当然地从一张71年前拍摄的、已经泛黄的照片开始。照片上，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24级文科班的全体学生摆好姿势，合影留念，以示后人。在第一排，肩并肩地坐着两位选择了哲学专业的年轻人：让－保尔·萨特和雷蒙·阿隆。前者手持烟斗，头戴宽边帽，衣着中流露着一个狂放不羁的学生对世界的怀疑。与他相反，后者西装的口袋里插着用做装饰的小手绢，腿上还套着护腿套。两人的穿着已显不同风格，而他们与刚考进的学校之间的关系也截然不同。与此同时，这张照片还可能使人们形成一种危险的偏见，因为这两位师范生的对比显然不仅仅限于他们的衣着。

与其以一张照片,我们还不如以一则与照片同时代的诺言为出发点。在乌耳姆路[1],萨特和阿隆曾以开玩笑的方式相互约定:两人谁活得更久,谁就要为先去世的另一位撰写传略,刊登在高等师范校友的《年报》上。然而,几十年过后,当1980年4月,两人中的一位与世长辞时,另一位却在一篇诚挚而悲伤的文章中写道:"诺言已不复存在了。"[2] 与其说作者的笔墨反映了他的敏感和伤痛,不如说是证明了历史在他们两人之间挖就的鸿沟。我们不得不看到,在与他们那个时代[3] 的关系方面,萨特和阿隆这一代人生活得非常艰苦。此外,根据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所写的最著名的两篇回忆文章,我们可以推断出他们与历史接触的这种严酷性。保尔·尼赞[4] 和罗贝尔·布拉齐亚克[5] 分别在《亚丁·阿拉伯》和《我们的战前年代》中指出,20世纪20年代的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远不像瓦拉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封闭的世界,面是锤炼学生们人生路线的熔炉。这些学生们的人生路线是对立的,后来又是悲剧性的: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尼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死于德军的枪弹;而布拉齐亚克则是莫拉[6] 的追随者,他逐渐被莱茵河彼岸[7] 的意识形态所诱惑,最终在同一次大战中死于法国人的枪下。

当然,如果我们把那一代师范生全都看成是潜在的共产主义者或莫拉的追随者,那我们就错了。大家将会看到,政治重心并不在这里。不过,我们对那一代人悲剧历史[8] 的印象依然是正确的,他们同20世纪一起诞生,却异常幸运地逃脱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劫难,若他们年长几岁,情况可能就大不相同。他们的历史完全不像风暴前后的那种平静。20世纪30年代,战争的威胁与日俱增,接着,法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德军占领的考验,这一切都构成了知识分子们所要面临的第一群暗礁,在高等师范学校的预备班和正式班中,萨特和阿隆有许多同学都

触了礁,他们的命运因此而被击碎。就这样,在某种程度上,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内部发生了一次大换班,一群四十多岁的人在法国解放后接替了他们的前人,迅速站到了前台,萨特也很快成为这群人的象征。但是,历史这时很快又开始了它的进程,先是东西方关系破裂,接着是殖民地的独立战争,这些事件在知识分子中间划定了一条新的分界线。萨特和阿隆的友谊,就是破裂在这第二群暗礁上的。不仅如此,两人后来分别成了相互对立的知识分子新阵营的领袖。

让-保尔·萨特和雷蒙·阿隆的名字以后逐渐成为1905年左右出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代名词,这些知识分子之间曾经接连发生过好几次决裂。在这一系列决裂的过程中,留给友情的机会最终微乎其微。正如年过半百的雷蒙·阿隆在1956年指出的那样,"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任何友谊都没能战胜政治观点的分歧,为了避免分道扬镳,一些朋友不得不同时改变政治立场,这种情况既情有可原,又值得悲哀。"[9]

在这里,上述关于一代知识分子含义的插叙,对于解释萨特和阿隆的政治选择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知识分子的历史充满了许多其他的决斗,尤其是在冷战时期。只不过萨特和阿隆刚好同岁,他们曾是朋友,而且毕业于同一所学校　他们各自穿越了这个世纪,因此,对他们这段历史的比较并不局限于他俩破碎的友谊——这种现象无论在知识界和还是在其他场合,毕竟都十分常见——它同样也为震撼知识界的惊涛骇浪定了位。除此之外,自从这两位昔日的朋友爆发论战之后——这场论战持续了30年——他们就从未在同一时刻、在同样广泛的范围里产生过影响。我们将会看到,两个人在影响力上的这种差异,是20世纪法国占主导地位的各种思想体系在不同阶段的反映。

所以,我们必须注意,不能仅仅把他们两人说成是政治风浪

或个人影响力大小的体现。他俩的历史客观存在着,这既是因为他们本身的人格,也是因为他们很快就成了各自阵营的代表人物。而且,这使我们感到,面对一个蕴涵如此丰富的主题,有必要指出四个在研究中应注意的地方。首先必须提醒大家的是,尽管本书涉及的历史在时间上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它已属于另一个时代,一个"图片影响"(雷吉·德布雷[10]语)尚未到来的时代。那时,知识分子们通过辩论,在涉及整个国家的大规模论战中寻找成功的机遇。我们必须努力追溯过去,更何况那时,知识分子的一部分道德信誉和影响力,早已随着一些主要综合性思想体系的瓦解而分崩离析了。

这种情况不仅仅扰乱了历史的背景。当时,萨特和阿隆的角色也发生了名副其实的互换:萨特逐渐退入幕后,而晚年的阿隆则被推上前台。他俩的地位也有所变化:很久以前,萨特就被推崇为权威人物,但是此后,当人们回过头来看他的时候,他却成了他的对手们所说的不识时务的算命先生、总是作出不合时宜的判断和预测。于是,这种迟到的角色互换引发了一场关于两人形象的真正的争吵,只是形象破坏者们的身份和年龄已起了变化。这构成了这项研究的第二大困难,也是我们从事这项研究的原因之一。仔细想来,让-保尔·萨特的命运其实非常奇特:经过从法国解放到70年代中期三十多个光芒四射的年头即"萨特时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尸骨未寒的萨特的孤立。这种名誉谋杀早已为知识分子们所习惯,然而,除此之外,五十多年来的确存在着一个"萨特问题":一颗曾经照耀人们思想的太阳,沦落为暂时或永远熄灭了的恒星,这一转变是知识界星转斗移及其判断标准改变的最为实在的标志,换言之,它表明,在知识界内部也存在着名副其实的哥白尼式的天体运行规律。当然,还有其他的标志,那就是雷蒙·阿隆

晚年及身后所得到的荣誉，因此，他的命运也同样奇特。我们在前文中一直强调，两人各自不同的形象，是多次震撼法国社会和主导思想的辩论的体现，这些主导思想曾一次又一次为许多人的共同疑问提供了答案。

既然如此，拘泥于对他们两人作照镜子式的对比分析，将会是一种带有很大局限性的方法。他俩为自己而存在，各自走过了自己的旅程，并在深思熟虑之后对社会政治问题负责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因此，我们需要研究的，还应该是他们穿越历史的政治旅程。也就是说，他们各自对那个时代历史的思索，以及他们通过关注社会问题而直接同历史结下的关系。此外，阿隆公开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在他的一生中，与历史的接触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都知道在他《回忆录——50年的政治思考》(以下简称《回忆录》)的后记中，有一句被经常引用的话："假设明天会有人不辞劳苦读我的文章，他所看到的将是我的分析、憧憬和疑虑，它们充斥着一个沉浸在历史当中的人的意识。"[11]另外，历史对阿隆的影响同样也体现在他的哲学著作中。最近有一篇博士论文明确指出，"雷蒙·阿隆是根据1930年以后他所经历的历史事件，来确定他评论历史知识的哲学依据的"，而"同样是这些历史事件，决定了他对道德和政治两者间关系的认识"。[12]1965年1月15日，雷蒙·阿隆在归还道德与政治研究院院士的佩剑时，另外提到了1930年初他"在莱茵河边"度过的日子，他是这样说的："在我狂热地阅读黑格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13]的作品时，我为自己定下了一个计划：思考正在发生的历史。"[14]

研究萨特与历史的关系，乍看起来要复杂得多，因为这种关系处在一个有争议的背景中。雅克·奥迪贝尔蒂[15]曾用以下漂亮词句来形容萨特：他是一名"出现在所有思想战线上的守夜人"[16]。毫无疑问，对这句话，哲学家萨特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可

以各有各的理解。前者强调的,是"守夜人"始终不渝的警惕性,以及他在多次辩论中全身心投人的严肃态度。后者则指出,如果守夜人不顾现实,或者游离于现实之外,睁着双眼做梦;或者更糟糕一点,如果他是一个梦游者的话,那么只要他稍有闪失,就会产生危险。阿隆思考历史,萨特则梦想历史。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人们近来对萨特的指责是很重的,何况如我们所言,几十年来他一直是法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所以,列奥尼德·普里乌奇[17]在谴责法国知识分子在苏联问题上搞"自我催眠"的同时,发表了以下评论:"在我看来,萨特象征着这种精神的堕落,对真实的拒绝,以及在政治的梦想、背离现实的辞藻堆砌和华丽的演讲中对现实的逃避:这一切都是在演戏,因为现实被掩盖了。"普里乌奇补充说,相反,"对于我和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来说,加缪[18]的思想是悲剧性的,但是是勇敢的。加缪是真实,萨特是谎言"[19]。

萨特去世15年后,他的情况仍然具有强烈的感情蕴涵,对他的分析时常在赞美和抨击之间摇摆不定。但无论如何,在同历史的关系这个问题上,这种不公开的辩论对于年轻时代的萨特是毫无意义的:无论他是一个在压迫面前清醒而认真的守卫,还是一名不负责任的梦游者,这个问题只是在他成了一名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以后,才被提出来。不过,在开始关注政治之前,他在国民意识方面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睡期。此外,这种长时间不问政治的现象本身,也是历史所要研究的对象。要么是因为萨特还年轻,要么是因为历史对他没有吸引力。

萨特、阿隆、加缪,还有许多其他人,本书将提及一大批著名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所受到的尊敬和诋毁。不过,历史学象更为平淡的工作,是挖掘历史的片段并赋予其意义,而无权对某人脱帽致敬,或相反像法官那样对他严加审判。马克·布洛克[20]曾

以强烈的言辞要求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专家们:"支持和反对罗伯斯庇尔的人们,我们大声请求你们的恩赐,行行好,你们只要告诉我们:罗伯斯庇尔是谁?"我们是否也有可能静下心来,心平气和地就让-保尔·萨特和雷蒙·阿隆提同样的问题——这里仅仅是因为他们对社会和政治的关注——而不使一些人绝望、另一些人高兴呢?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学家都希望凭良心工作,不愿从一开始就被怀疑打算为某些人歌功颂德,或相反对他们诽谤诋毁。不管怎样,这也是我们第三个最初的愿望。何况,事实上知识分子的历史包含着很多意识形态的因素。此外,这部历史的字里行间还流露着对巨大的法兰西激情[21]的描述。所以,如果笔者在研究中稍有不慎,就会有把自己的位子拱手让给道学家的危险。

然而,撰写一部客观的历史而不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历史,并非易事,尤其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是让-保尔·萨特和雷蒙·阿隆,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被他俩浓重的身影笼罩着,尽管两人都已去世,但有时,他们仍然继续代表着新近知识分子历史的两大对立面。两位被研究的对象生活的年代距我们很近,这会使历史学家对他们产生亲近感。当然,辞源意义上的亲近感是必要的,它甚至是历史学家职业的本质。不过,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在研究过程中和一些对象接触时间过长,一连几年不断地通过间接的资料和这些对象打交道,历史学家就会——这是他们的通病——对研究对象产生好感,或者(尽管这种情况较为少见,但更为严重)反感。历史学家不能否认这种危险的存在,而应该正视它,努力消除它。历史学家不是作最后决断的傅基埃-丹维尔[22],更不是对历史行刑的刽子手。从某些意义上来说,他的任务更像是预审法官。作为一名全体国民记忆的保管者,他把档案里的材料转交给他的同代人,由后者——如果他们

愿意——对这份经过预审的档案作出判决。

但是,这种判决必然取决于意识形态环境和某一时代的历史背景。长期以来,雷蒙·阿隆受到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排斥,这和目前让-保尔·萨特所经常遭到的严厉谴责一样,是一种极端。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意味着采取某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和事佬态度。像萨特和阿隆那样具有很强号召力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有影响的,因此,尽管他们犹豫,也应负起责任,因为他们在公众面前的立场,会影响他们同胞的观点甚至是行动。所以,历史学家不应该责问知识分子,他既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义务。不过,在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有什么权力给予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以某种不可侵犯的地位呢?这些知识分子是历史舞台上的演员,他们应该受到的不是历史法庭的审判——这个法庭并不存在——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对其著作及行为造成的结果所进行的理智分析。

大家将会明白,我们这里要写的不是一本知识分子必须向他们同胞汇报的流水账,而是一部穿越世纪的游记。因为萨特和阿隆是双重意义的世纪文人[23]:他们没有选择远离尘世,以酝酿和雕琢他们的作品,相反,两人都融入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历史,尽管这一选择是在不同时间作出的;于是,他们通过表明立场和参加辩论,接受了汹涌热烈的20世纪。对于知识分子的历史来说,分析他们穿越世纪的经历有双重珍贵的意义。一方面,这部历史尤其应该注意知识分子的参与过程:他们的思想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与其说可以在过于笼统的、试验性的思考中去寻找,不如说应该通过对某些例子的细致研究来求得解决,此外,这种例子可能会有很多,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应当承认,萨特和阿隆的情况是远远不容忽视的!

当然,我们选择了这样的研究方法,就要承担这种选择带来

的后果。的确,我们不准备在分析的过程中把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同其思想家、作家的身份区分开,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说明,只有当萨特和阿隆各自的思想体系对于阐述他们的政治态度有所帮助时,我们才对其进行分析。不过这种分析从来就不是就事论事的。如果说阿隆特别是萨特的行为有其哲学基础的话,那么这里我们只准备分析他们付诸行动的思想。因为思想的发展和历史的背景是不可分割的,不然它就会显得贫瘠。我们还必须补充一点,萨特和阿隆各自思想和作品的发展历史,包含着丰富的、高层次的科学创作,在这方面,本书的以后几章几乎没有给读者带来什么新的东西。

此外,现在是说明第四个必须注意之处的时候了。有必要提醒读者,关于萨特和阿隆的出色并且珍贵的研究数不胜数,[24]因此我们必须防止可能出现的误解。就萨特来说,他的文学和哲学创作,是高等学府和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一个研究活动领域,[25]这个领域在法国和在其他国家都是同样的光芒四射。对他的文章和手稿进行定位和解释,就是这种研究活动的一种。同样,阿隆的作品也受到了细致的分析,[26]不过规模稍小一些。本书的基调与上述研究活动完全不同,笔者清楚地认识到:作家和作品是紧密相连的,我们没有把两者完全割裂,这里我们希望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因为其他一些学科也可以对萨特和阿隆的生活进行对照研究[27]——来分析穿越本世纪的两条不同的政治轨迹。

分析这两条不同的轨迹,对于知识分子的历史来说,同样是珍贵的,因为这使我们可以在比较当中观察毕业于同一所学校的萨特和阿隆所走过的路程。"路程"的概念经过如此的构想,就成了一件产出丰富的工具,我们可以借助它绘制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大概走势,在政治上对他们进行某种衡量。因为说到

底,知识分子的历史总是摇摆于两个不同的极端之间:一个极端是窥探知识分子沉重政治倾向的社会学,另一个极端是带有更多经验主义色彩的、某种“微观历史”的方法,后者指的是几年前意大利历史文献学家在另一个领域即社会历史学领域所赋予这个词的含义。读者将会看到,本书所采取的是第二种研究方法。我们认为这种方法是有道理的,更何况正如萨特所言:“生命的历史充满偶然和巧遇。未来是莫测的,我们的威胁是我们自己,而我们的危险来自于世界。”[28]世界,还有历史,无论如何,对一切作最后判决的只有历史。目前,历史正使人们的态度发生着深刻变化。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看到,当萨特开始逐渐走下地狱的时候,加缪正重新赢得人们的尊敬。而雷蒙·阿隆则在他去世后直接步入了思想家的天堂。对于萨特和阿隆这两位昔日的“小朋友”来说,有一件事是确实的,那就是在知识界看来,他们两人的风水总是在轮流转着,今天你此一时,明天他彼一时。

注:

1 乌耳姆路(Rue d'Ulm),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位于这条路上。——译者注。

2 雷蒙·阿隆,《我的小朋友》(*Mon petit camarade*),摘自《快报》(*L'Express*),1980年4月19日,第138页。

3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把那个时代称为历史。因为正是两位知识分子与历史的关系,构成了本书的主线之一。读者将会看到,选择这一关系为主线并非是一种任意的行为,我们觉得,它对于解释两位“小朋友”在本世纪所走过的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4 保尔·尼赞(Paul Nizan),1905—1940,法国文学家、评论家,曾长期是法国共产党的同路人,1940年战死沙场。——译者注。

5 罗贝尔·布拉齐亚克(Robert Brasillach),1909—1945,法国小说家、诗人、文学批评家、评论家,曾参加德国纽伦堡的纳粹党代表大会,1945年被法国作为叛徒处死。——译者注。

6 莫拉(Charles Maurras),1868—1952,法国诗人、散文家、论战家,"二战"期间充当维希政府的卫士,法国光复后被判无期徒刑。——译者注。

7 指当时的纳粹德国。——译者注。

8 关于这点,请参阅《一代知识分子——两次大战之间高等师范的预备生和正式生》(*Génération intellectuelle. Khâgneux et normaliens de l'entre-deux-guerres*),法亚尔出版社(Fayard),1988年,法国教育出版社(PUF)《战车》丛书(coll. Quadrige),1994年再版。除有特别说明,否则本书所提及的著作均在巴黎出版。

9 雷蒙·阿隆,《辩证法的幸与不幸》(*Aventures et mésaventures de la dialectique*),选自《论据》(*Preuves*),1956年1月,第15页。

10 雷吉·德布雷(Régis Debray),1941— ,当代法国政治作家,参加过拉丁美洲的游击战争,曾在玻利维亚被捕并被判30年监禁,后被释放。——译者注。

11 《回忆录——50年的政治思考》(*Mémoires. Cinquante ans de réflexion politique*),朱里亚出版社(Julliard),1983年,第736页。

12 阿丽安娜·谢贝尔·德·阿波罗尼亚(Ariane Chebel d'Appollonia),《雷蒙·阿隆的道德和政治》(*Morale et politique chez Raymond Aron*),政治学博士论文,导师:阿尔弗雷德·格罗塞(Alfred Grosser),巴黎政治研究院,1993年,共2卷,第16页。另参见斯蒂芬·罗奈(Stephen Launay),《雷蒙·阿隆的政治思想》(*La Pensée politique de Raymond Aron*),法国教育出版社(PUF),1995年,特别是第一、第二章。

13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近代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译者注。

14 雷蒙·阿隆的个人档案,引用者尼古拉·巴弗莱兹(Nicolas Baverez),见《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弗拉玛里翁出版社(Flammarion),1993年,第338页。

15 雅克·奥迪贝尔蒂(Jacques Audiberti),1899—1965,当代法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译者注。

16 安妮·科昂-索拉尔(Annie Cohen-Solar),《萨特》(*Sartre*),伽利玛出版社(Gallimard),1985年,第381页。

17 列奥尼德·普里乌奇(Leonid Plioutchtch),1939— ,苏联数学家,持不同政见者,曾在精神病院被关押了三年,后被允许离开祖国,流亡国外,1976年起定居法国。——译者注。

18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小说家、剧作家、评论作者,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译者注。

19 此话说于1993年7月8日,后被桑德琳娜·于博(Sandrine Hubaut)引用于她

的DEA论文《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对法国政治生活及知识分子的影响》(*L'Impact de la dissidence soviétique sur la vie politique et intellectuelle française*),巴黎政治研究院,导师:塞日·贝尔斯坦(Serge Berstein)和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Jean-François Sirinelli),1994年,第180—181页。

20 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1886—1944,法国历史学家,对20世纪法国史学界有深刻的影响,杂志《经济和社会历史年鉴》的创办者之一,"二战"期间参加抵抗运动,为德国占领军枪杀。——译者注。

21 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Jean-François Sirinelli),《知识分子与法兰西激情——20世纪的声明和请愿书》(*Intellectuels et passions françaises. Manifestes et pétitions au XXe siècle*),法亚尔出版社(Fayard),1990年。

22 傅基埃-丹维尔(Antoine Quentin Fouquier-Tinville),1745—1795,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家,曾被任命为革命法庭公诉人,以冷酷无情、说一不二著称。——译者注。

23 米歇尔·维诺克(Michel Winock),《本世纪的知识分子》(*Les intellectuels dans le siècle*),摘自《20世纪——历史杂志》(*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第2期,1984年4月号,第3—14页;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Jean-François Sirinelli),《本世纪没有知识分子吗?》(*Pas de clercs dans le siècle?*),同上,第13期,1987年1—3月号,第127—134页。

24 正因如此,本书的结尾没有参考书目。因为参考书太少显得可笑,而太多则可能令人畏惧。对于对萨特和阿隆感兴趣的读者以及这方面的专家来说,我们要说明的是,本书所拥有的资料和引用的作品,都将在注释里有所提及。

25 与此同时,关于萨特的优秀评论文章一直没有停止出版过,其中,有两篇在时间上相隔13年、在结论上截然不同的文章:米歇尔-安托万·布尔尼耶(Michel-Antoine Burnier)的《萨特的遗嘱》(*Le Testament de Sartre*)[奥尔邦出版社(Orban),1982年]和让-雅克·布洛歇(Jean-Jacques Brochier)的《为了萨特》(*Pour Sartre*)[拉黛斯出版社(Lattès),1995年]。

26 他的传记也已定稿。除了已经提及的尼古拉·巴弗莱兹(Nicolas Baverez)的著作外,另可参阅罗伯特·考尔昆(Robert Colquhoun)的《雷蒙·阿隆(1955—1983):社会中的社会学家》(*Raymond Around 1955-1983: the sociologist in society*),伦敦,智慧出版社(Sage Publications),1986年,共2卷。

27 关于这点,如果在一个更倾向于哲学的层面上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参阅埃蒂安·巴里立耶(Étienne Barilier)那篇非常优美的评论,《小朋友们——评让-保尔·

萨特和雷蒙·阿隆》(*Les Petits Camarades. Essai sur Jean-Paul Sartre et Raymond Aron*),朱里亚—人类时代出版社(Julliard – L'Âge d'homme),1987年。鉴于上文提及的原因,我们将不分析让-保尔·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也不分析雷蒙·阿隆的《暴力的历史和辩证法》(*Histoire et dialectique de la violence*),后一本书出版于1973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同萨特著作的"对话"——阿隆在该书中使用了这个词——的继续。

28　让-保尔·萨特,《圣-热内——喜剧演员和殉道者》(*Saint-Genet, comédien et martyr*),伽利玛出版社,1952年,第347页。

第一部分
火山口底部的历史

回想起来，前有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渐露端倪的20世纪30年代，现在看来，20世纪20年代犹如是沙漠中的一块绿洲。这种回忆并非没有根据。的确，20年代之初是苦涩而艰难的，它带着一丝冷酷的、几乎是黄昏的色彩，是人们所经受的痛苦和忧虑的真实写照。然而，天很快就亮了起来，那个时代也被赋予了新的色彩，这种色彩留在了所有人的记忆之中。事实上，一道新的光芒，用希望之火的光环装点了20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起初曾因战后赔偿问题而遭到破坏的国际关系环境，就是这种短暂晴朗天气的最佳显示。1925年的洛迦诺会议促成并象征了德法两国的接近，

次年，德国加入了国际联盟，法国外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1]还致辞表示了欢迎。在两国的敌对状态结束八年之后，白里安的声音从瑞士的会议厅传来，他宣布："滚开吧，长枪、机关枪、大炮！你们应该让位于和解、公断和和平了！"

20年代中叶，萨特和阿隆20岁，当时有一句话也许最能概括欧洲各国人民的心愿，那就是希望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最后一次战争"——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话来说，是"The last war we fight"[2]——换言之，人们希望集体安全和公断的原则从此能裁决和平息人类社会所固有的冲突。此外，1928年在华盛顿签署的《白里安—凯洛格公约》[3]甚至规定战争为"非法"。当然，历史学家们都知道后事，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有利地位向人们指出，11年后，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为浩大的杀戮将要开始！但是，人总是倒退着走人历史，他们的眼光盯着过去，他们对1928年进行评价的依据，是已开始逐渐收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而不是从1939年起即将出现的新的伤口。20年代的历史如同处在火山口的底部，暂时还没有岩浆重新喷发倾流的致命危险。

萨特和阿隆就是在这时候觉醒的。不过，他们觉醒的地点，也许同样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知识界是由许多错综复杂的"网"和感情因素构成的，这些"网"和感情因素的起因，经常要到知识分子的出身、年龄或所受教育的相互关系之中去寻找。在这三个变量当中，最后一个尤为重要，我们在考证知识分子的出身时，必须追溯到他们的学生时代，在那个年龄，他们所受到的影响很容易对他们产生作用。追溯知识分子在思想和政治上觉醒的源头，有时能使我们在思想的地图上，找到未来的思想大师们曾经停留过的十字路口，发现未来的启蒙者们曾经工作过的幕后舞台。在这里，我们所要追溯的源头，就是高等师范学校的文科预备班，这是一个难得的观察所，因为它同样能使我们了

解在知识分子的觉醒过程中起过作用的小环境。在那些发黄的照片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地方,而我们的故事,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注:

1 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1862—1932,法国政治家,法国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曾23次担任政府部长、11次担任总理。他是192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译者注。

2 英语:我们进行的最后一次战争。——译者注。

3 亦称《非战公约》和《巴黎公约》,1927年12月由法国外长白里安和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发起,于1928年8月27日由法、美、英、比、德、波、意、捷、日等国在巴黎(而非如作者所言在华盛顿)签订,1929年7月25日生效,到1933年,加入国达63个。公约规定:禁止缔约国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手段,要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译者注。

序言
故事在预备班开始

在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中，有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机构，它就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文科预备班。的确，这个为乌耳姆路高等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而开设的预备班[1]，在培养20世纪接连几代知识分子的过程中，曾经起过特殊的作用。

中学会考及格者的榜样

的确，当时，这扇入学考试的闸门每年只让三十多名幸运的入选者通过，但却有三百多名应试者在各个预备班里为此扑腾，在那里，对人文科学的崇拜被大加颂扬。而这些人文科学的圣殿在外表上却叫人实在不敢恭维，它们只不过是散布在12所学校里的几间昏暗教室而已。这么说，难道预备班是一片沉睡的森林吗？这种说法可是大错特错了，因为在第三共和国时代，这些预备班是法国教育制度的精华，是得到强化了的中等教育。巴

黎和外省最优秀的中学文科生,在当时被视做最为高贵的学科上相互较劲。于是,乌耳姆路的入学考试就成了一次可怕的竞争,在由获优异奖的学生和优等生会考的优胜者所组成的尖子库里,它每年只挑出三十多个入选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通过会考的中学毕业生的榜样。

那时,巴黎地区只有四个高等师范文科预备班。最负盛名的是路易大帝中学的预备班,由于实行住宿制,所以它荟萃了来自全法国的优秀中学毕业生,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每年要包揽巴黎高师文学班40%的入选名额。在稍北一点的圣-热纳维也夫高地[2],哲学家阿兰[3]也开办了一个预备班,他在亨利四世中学一直执教到1933年。除了这两个位于拉丁区的预备班之外,索城[4]的拉卡纳尔中学举办的那个班更像是乡村预备班,它每年都要造就几名高等师范生。它的学生人数大致和贡多塞中学预备班的学生人数相等,后者是惟一地处塞纳河右岸的预备班。

除了最后提到的那个预备班,巴黎和外省的其他预备班构成了一个阶层,它们在中产阶级子弟中广招学生。事实上,这个阶层可以用三个主要特点来定义:学生中公务员子弟占多数——超过总数的一半;在这些公务员子弟中,教师子弟比例较大——占总数三分之一强;而在教师子弟中,小学教师的孩子占据了不容忽视的地位——占总数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就这一点而言,雷蒙·阿隆和让-保尔·萨特和他们的同学相比,肯定是非常另类的。阿隆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了他们家的生活方式——"一个女厨,一个女仆"——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以他父亲的祖产和母亲的陪嫁为基础的,他母亲名叫苏珊·莱维,是北方一位纺织工业家的女儿。[5]阿隆家的收入一部分来源于有价证券的投资,但这些收入被逐渐用于维持这个家庭的生活方式和三

个孩子的教育，到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就已消耗殆尽了。至于让-保尔·萨特，他的母亲再嫁给了一名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毕业生。读者将会从他的高等师范入学考试报名材料中看到，他来自一个比大部分同届同学都宽裕得多的社会阶层。就这一点来说，萨特和阿隆无疑是非常相似的。

然而，他们各自和这个社会阶层的关系却截然不同。雷蒙·阿隆在他的《回忆录》中讲述了他在凡尔赛大宅里快乐的年轻时代。他的父亲出生于阿尔萨斯一个犹太人家庭，[6]后来选择了知识分子的职业。作为南锡地区一名纺织企业老板的儿子，尽管他没有通过法学史教师资格的考试，却仍然在技术教育师范学校教授法律。[7]"这是一个特别热情、充满活力的家庭"[8]，三个孩子受到了母亲无微不至的呵护：阿德里安出生于1902年4月；罗贝尔比他小20个月；小弟弟雷蒙则于1905年3月降临人世。可以说，这样的家庭同萨特在《词语》里所描绘的那个相去甚远。

不过，两位年轻人的家庭环境仍有共同点，用社会阶层学的术语来说，他俩的家庭环境，比他们的同学们明显高一个等级。更何况，典型的预备班学生都是奖学金获得者，肩负着全家的希望，此外，他们常常是为了准备高等师范的入学考试而"进京"的外省人，因此都是住宿生。许多预备班学生都是在9月底的某个星期天初次结识巴黎。当然，在准备考试的几年中，这些不同性格的外省学生与首都结下的关系可能大相径庭：有的人穿街走巷，发现了这座城市的文化财富；有的人则对这座城市漠不关心，把自己囚禁在住宿学校和自习教室里。但眼下，当他们走下火车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仅仅是外省中学里的精英，带着乡音，从未到过巴黎。

和他们的同学相比，雷蒙·阿隆和让-保尔·萨特在各自的

学习履历方面没有任何不相称的地方。在一个经过精心筛选的学习环境里,他俩所获得的奖励都是高贵的荣誉。在这方面,雷蒙·阿隆的中学经历毫无瑕疵,几乎可称典范:在凡尔赛的奥什中学,他每年都是全班第一;在中学优等生的哲学会考中,他得了第二;在第二次中学毕业会考中,他得到的评语是"很好"[9]。哲学班在1921—1922学年是由阿耶教授执教的,这一年是雷蒙·阿隆学习知识最重要的阶段。

萨特同样也是一位出色的学生:他曾获亨利四世中学一年级AB科的优异奖,尤其是法语和拉丁语译法语考试的第一名,他还曾在哲学班的B组获哲学小论文一等奖,他的朋友保尔·尼赞则获二等奖。[10]他们两人在转学到路易大帝中学之后,没费多大力气,就适应了这所位于圣-雅克路上的知识暖棚的气氛。1924年春天,在预备班学生让-保尔·萨特报考高等师范学校的考生材料上,路易大帝中学的校长写下了如下评语:"该生才智卓越,他力杰出,定会有所成功。品德极为优秀。"[11]果然,同年9月,让-保尔·萨特一试中的,以第七名的成绩被高等师范学校录取。

不过,萨特和尼赞——他以第22名的成绩被高等师范录取——本来肯定可以作为他们原来中学的预备班当中一流的学生进入高等师范的。因此,研究萨特和尼赞的专家们都曾经思考过他俩转学的原因。根据尼赞后来所写的一些关于当代哲学家的文章,一些持传统观点的人认为,两人之所以改换门庭,是因为他们对当时在亨利四世中学预备班执教的阿兰怀有敌意。这种解释不太可信,大家将会看到,事实上,两年后,在乌耳姆路,萨特远非阿兰及其弟子的反对者。近来出版的萨特的《奇怪的战争手记(1939年11月—1940年3月)》第1卷[12]证明他对阿兰有的是好感,而不是疑虑。[13]另外一种解释说,两位年轻的哲学

班学生之所以离开亨利四世中学,是因为他们和该中学的校长多先生之间发生了一起小小的纠葛,两人在庆祝自己的学习成绩时喝了过量的酒,当着校长的面呕吐了一地。其实,这种解释同样值得怀疑,因为这起发生在多校长身上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靠的。[14]毕竟,萨特并不记得转学的理由有如此迫切:"我在亨利四世中学通过了毕业会考,这所学校有一个很好的文科预备班,哲学老师是阿兰,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让我离开了那儿;他们把我转到路易大帝中学,这所中学的预备班气氛严肃而沉闷,我留了下来,在那儿考取了离师。"[15]转学的真正理由可能更加平淡,我们可以对萨特前面说的那段话作以下理解:两位出色的中学生,或者更有可能是他们的父母,出于升学成功率的考虑,在1922年秋天选择了路易大帝中学。在那一年夏天的人学考试之后,路易大帝中学的预备班有13名学生考取了乌耳姆路,亨利四世中学只有2名。前一年的差距更大:在被高师录取的考生中,来自路易大帝中学和先贤祠广场的学生之比是14比2。此外,1922学年开学时,并非只有萨特和尼赞对亨利四世中学表示了不满:同前一学年相比,这所中学高师预备班的学生人数减少了34%,而路易大帝中学的预备班学生人数则有所增加。[16]在1923年的人学考试中,这两所位于拉丁区的中学的差距再次突显:路易大帝中学16名学生被录取,而亨利四世中学一个都没有。

根据雷蒙·阿隆的学习履历,他完全具备进路易大帝中学、加人那群优等生行列的素质。如果这样,他就会在进人高等师范学校之前两年,就成为让-保尔·萨特的同学。然而,贡多塞中学离圣-拉扎尔火车站较近,[17]可能阿隆也希望在一个比较有人情味的地方,而不是在圣-雅克路和先贤祠广场这两座生产师范生的大工厂里,准备人学考试,所有这些原因使得这位来

自凡尔赛的学生去了贡多塞中学。在那里,他和其他几位未来的师范生:波尔什、厄尔贡、拉孔伯[18]、拉加希[19]——后来他转学去了路易大帝中学——和施沃勃,一起主宰着整个预备班。[20]

阿隆是在1922年8月2日进入贡多塞中学的。[21]他在预备班尤其是在第二学年获得了惊人的成绩:在三次期中考中,他的哲学得了18分、20分[22](!)和18分,法语得了17分、18分和19分,希腊语和历史得了16分、17分和18分。其他科目的成绩也与此相似。他的老师们在他报考高等师范的报名材料上作了十分说明问题的评语。哲学老师安德雷·克勒松写道:"一流的学生:理解力强,知识面广";历史老师雷翁·加昂则这样指出:"出色的学生;知识面广,成熟,有朝气蓬勃的性格";而校长的总结如下:"才华横溢,思路清晰而果断,具备优秀学生的知识和成熟,各方面均很出色。"[23]惟一一个小小的保留意见,来自于法语老师伊波克里特·帕里戈,他在1923—1924学年第三季度祝贺阿隆所取得的优异成绩时,附带表示了他的遗憾:"文学天赋略为欠缺。"[24]

萨特:远离城市的喧嚣

我们应该避免以一个如此微不足道的迹象为根据来进行推断。此外,除了人们认为这两位预备班学生所具有的必定是有限的才智之外,有一个事实甚至反映在他们的学习成绩中:从那时候起,两人中的一个,即萨特,就表现出对文学更为坚定的爱好。在一本发行量只有几百份、一共只出过四期的小刊物《无名杂志》上,他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名叫《病人的天使》,此外,他还用笔名发表了一部题为《猫头鹰耶稣,外省教师》的长篇小说的前两章。[25]前一部作品讲述了牟罗兹[26]中学一个"平庸"的六年级教师路易·加亚尔和一个年轻的结核病女患者之间的恋情。

后一部则把另一个外省教师罗布雷先生搬上了小说，萨特在书中着力刻画了罗布雷滑稽而低级的趣味。该小说可能创作于1922年夏他中学毕业会考之后，“誉清”[27]于他就读预备班一年级的那一年。《病人的天使》诞生于同一个时期，然而，尽管它稍晚于《猫头鹰耶稣，外省教师》完成，却先被发表。除了在《无名杂志》上发表的小说之外，还应该补充一篇萨特写于1924年的作品——《种子和潜水衣》，它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自传体小说的痕迹，是一篇具有双重珍贵意义的作品：一方面，它描述了萨特和尼赞——书中被分别命名为塔耶尔和卢塞尔——那“动荡不安大于相互倾慕”的友谊；另一方面，关于《无名杂志》时期的描述也在字里行间得到了体现。

与《无名杂志》刊登的其他文章相比，萨特的文章篇幅更长。从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在他以后的作品里得到展开的主题，以及他希望成为作家兼哲学家的明确愿望。关于萨特作品的主题，这里我们仅以《病人的天使》中路易·加亚尔这个人物为例，“他把自己年轻时代所有的激情都投向了结核病人，这不仅是因为他要附庸风雅，也是因为他的精神只不过是一件被扭曲了的可怜玩意儿，是手表中一个被损坏了的、倒走的齿轮。”他在上莱茵省的一座村庄度假时，计划勾引邻近疗养院的一位女病人。可惜，正当这位结核病人的唐·璜要把计划付诸行动时，那位女孩突然染上了一种剧烈得惊人的咳嗽，我们的求爱者因此不得不落荒而逃。尾声是：“他让一位肺科医生为他作了检查，后者说他没有被传染，他和原先所有的朋友断绝了来往，娶了一名红皮肤、金头发、笨头笨脑但身体健康的阿尔萨斯女孩为妻。从此他再也没有写过东西，55岁那年被授予荣誉骑士团勋章，这枚勋章无可争议地是‘有产阶级’的证明……”现在看来，萨特这部年轻时代的作品谈不上重要，但我们不得不看到，它所包含的一

系列主题日后多次出现在他的剧本和长、短篇小说里。同萨特笔下的“下流胚”们相比,路易·加亚尔更是那些酸溜溜的、令人恶心的知识分子的雏形,这类知识分子在这位前路易大帝中学文科预备班学生的作品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根据这种观点,路易·加亚尔是《恶心》中罗康坦和《自由之路》中马蒂厄·德拉吕的长兄。

萨特年轻时代的创作,不仅勾勒出他未来作品的人物形象,更使得他本人开始崭露头角,反映了他与文学创作之间早熟的关系。从那时候起,这位年轻的哲学班学生同时也在学习创作长、短篇小说,因此,萨特日后作品的两重性,在当时就开始有所反映了。关于萨特作品的两重性,我们将在下一章里提及,因为仅仅几年之后,身为高等师范生的年轻萨特宣布,他要同时做“斯宾诺莎和斯汤达”。后来,作家萨特成了文学界的雅努斯[28],而他的两张面孔早在那时就已经在孕育之中了。

在预备班的那些年里,萨特的其他一些特点也开始逐渐显露。当然,这些特点在当时肯定是模糊不清的,而萨特的思想轮廓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一份草稿。尽管如此,人们一下子就能观察到:如果说萨特的校外活动带有文学创作觉醒期的特征,那么相反,这位年轻的哲学家对有关国家大事的辩论却毫不关心。的确,如果我们以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的文科预备班或1968年以后那沸腾与动荡的文科预备班为某种参照,把20世纪20年代的预备班想像成通向政治参与的道路上充满嘈杂与喧闹的客栈的话,那我们就错了。相反,对于当时大约半数的预备班学生来说,预备班就像是一块绿洲,紧张的政治辩论蔓延到那里时,声音早就大大减弱了。[29]这也是让－保尔·萨特和《现代》杂志的另一位创办者莫里斯·梅洛－庞蒂[30]的看法。后者在预备班和高等师范学习时,既没像阿隆那样走上政治参与的道路,也没像

萨特那样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在路易大帝中学，有一个名为"左翼集团"的团体，它由乔治·勒弗朗和几个同学主持，当时聚集了许多未来的高等师范生，因此，萨特的班级里有一个社会党人和激进党人的重要核心。的确，萨特只是一名在学校吃午饭的走读生，他并不具备加入这个团体的条件，因为后者的成员主要是住宿生。不过他的朋友保尔·尼赞是住宿生，也是"左翼集团"的积极分子，他可能在萨特和左派同学之间起了桥梁的作用，方便了两者的接触。更何况——如果我们相信乔治·勒弗朗的回忆——尼赞只要一有机会，就带萨特参加住宿生的聚会："在一年级预备班半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我们决定组织一次同桌八人（指食堂的饭桌）的小聚会。平时吃饭时，我们通过抽签，把剩余的食物发给中签者，后者则必须付一笔小小数目的钱。这次聚会的目的，就是要把大家通过这个方式积攒下来的钱花掉。我们打算在圣－日尔曼－德－普雷[31]的一家小旅馆里吃些'点心'。米歇尔·福尼奥尔通知我们说他不来了，因为考试太紧张。尼赞就说：'要是你们同意，我带萨特来。'没有人反对。葡萄酒，糕点，音乐。聚会临结束时，尼赞提议：'好吧，现在我们将要奉献给大家本次晚会最精彩的节目。'他爬到桌上，萨特则钻到桌下。尼赞和着萨特的歌声做着动作，这歌带着鼻音，仿佛是从一架破败的旧留声机里传来的。这就是我们19岁时的娱乐！"

不过，从表面上看，尼赞在萨特和一年级预备班住宿生之间建立起来的这种联系，并没有使未来"政治参与"的颂扬者对"左翼集团"感兴趣："萨特不是住宿生，只是在学校吃午饭的走读生。"乔治·勒弗朗又补充说。"他住在他妈妈家，靠近克里尼昂古广场。我在路易大帝中学的那些年里，相对来说不太了解萨特。但有一点我可以证明，在那个年代，左翼联盟势头上升，后

来又取得1924年5月11日的选举胜利,可我和他从来不曾有过任何政治范畴内的谈话。那时,他和他的朋友尼赞不同,政治世界对他来说似乎不存在。"[32]这种看法不光是乔治·勒弗朗一个人的。让-保尔·萨特在预备班的其他同学也向我们证实,他至少在表面上对政治辩论缺乏兴趣。

萨特和《无名杂志》的合作,是否能使人们改变他对政治几乎毫无兴趣的印象呢?事实上,这本短命的杂志——从1923年1—3月,它只存活了两个月,出了四期,同年秋天试图复刊,但也只出了一期——并非政治性刊物。它有一个副标题:《保卫年轻作家和艺术家的喉舌》,并在创刊宣言中声明:"知识分子暴发户使我们窒息,国家权力机构对我们又不予理睬。所有的门都对我们关着,我们既没有关系,也没有金钱。"另外,在第2期的封面上,可以看到以下的定义:"文学的共和国不应当是同学的共和国。《无名杂志》的门对所有人都是敞开的。"我们最多只能辨别出一些亲左的倾向。例如在第4期,主编夏尔·弗拉瓦尔发表了一篇题为《新时代》的署名社论,社论的开头是这样的:"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当代青年的亲左倾向。"社论还提及了"在不公正的社会秩序面前""对新社会秩序的需要"、"游荡在我们这一代人脑海里的革新愿望"以及导致民族集团[33]获胜的"1919年的那次拙劣选举"。夏尔·弗拉瓦尔写道:"欧洲满怀希望地看到,在巴莱士先生[34]所代表的那一代人余火尚存的灰烬上,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站起来了。"[35]不过,我们特别应当从这些词句中注意这样一种迹象:上升之中的新一代是在反抗中成长起来的。这正是当时一位在路易大帝中学哲学班就读的学生所意识到的,这位年仅16岁的年轻读者给《无名杂志》写了一封信,信被刊登在杂志的第2期上:"我不同意你们的文学观点,我不如你们那么进步,我只能为你们的创新举动鼓掌。保护新一代和所

有不得不忍受被你们称为小说巨头的人,这是一个宏大的目标。但你们必须达到这个目标,因为你们得到所有年轻人的支持。"这个年轻人名叫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36]。当时他还不是共和党及社会党大学行动团的领导人。这个团体只是在第二年才成立,而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加入该团的入团证号码是第十号。"所有年轻人"这几个词在这里很能说明问题。

和许多左派青年一样,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为左翼联盟在 1924 年春取得的胜利欣喜若狂。在路易大帝中学高师预备班里,"左翼集团"的成员当然也为激进党和社会党的大合唱而感到激动,这两大政党在它们获胜的选举中紧密团结,虽然后来在政府中它们没有这样做。这里,斯有有关这方面的回忆又是一致的:让-保尔·萨特同学对政治讨论关心得既不多,也不少,而当时一部分高师预备班的学生对此却非常热衷。和萨特截然相反,那时候雷蒙·阿隆感觉自己完全"倾向左派":不管怎样,大约六十年后,他就是用这句话来定义自己作为年轻的高师预备班学生时的心情的。他还明确地说,在 1924 年选举期间,他常读《国民进步》杂志。[37]选举结束后,左翼联盟的胜利把他给"乐坏了"[38]。此外,他的这种政治倾向,早在进入高师预备班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他在《回忆录》中把自己"皈依左派"的时间定在 1921—1922 年,即他在中学哲学班就读的时候。

两位年轻人之间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区别。我们一定看到,尽管他们都毕业于高师预备班,但事实上他俩从来不曾形影相随,更不是一对双胞胎。相反,现在看来,两年的高师预备班生活显示出他们一开始就有所不同。在贡多塞中学,雷蒙·阿隆学习刻苦,毫不费力地在班里名列榜首,他有条不紊地准备着入学考试,而且已经开始着手深化他的哲学修养。而在路易大帝中学,萨特从开始就被归入可能"考取"乌耳姆路的那部分学生,

他已经踏上了与学业平行的文学创作的小路。今天我们并不打算不合时宜地赋予萨特这种微弱的写作愿望以某种重要性,但至少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种预兆和象征。《病人的天使》中那海蓝色的气氛,以及它和《猫头鹰耶稣,外省教师》中两位教师"主人公"的可鄙形象,这些都预示着一个人物肖像画长廊的出现。此外,有些哲学家把小说和戏剧看做是普及自己理论著作的一种手段,在这样的知识界环境和国家里,高师预备班学生萨特对哲学和文学两方面的爱好,预示着他日后作品的两面性,其文学的一面将帮助人们理解其哲学的一面。相反,在30年代,雷蒙·阿隆的哲学著作则显得比较平淡,至少在最初,他的博士论文是这样。

同时,萨特和阿隆有一个共同点,这与前文并不矛盾。作为高师预备班的学生,从社会学角度来说,他们是特例,而在智力上,他们则属于标准范畴,这使他们后来成了原预备班学生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们所自愿接受的训练、他们在文学和哲学两方面的实践以及在他们看来比任何其他事物都能说明问题的井井有条的方法,所有这些特点都概括了高师预备班对法国文学的影响:在一种流畅而有节制的文笔中循规蹈矩地表达思想,不管文章的主题如何,读者都可以通过明晰的逻辑、段落的组织和清楚的衔接辨认出它的风格。萨特和阿隆是法国文学园地的重要成员,这块园地几乎完全由高师预备班的学生们占领着,他们的精神令人想起百科全书派[39]的成员。[40]

注:

1 关于雷蒙·阿隆和让-保尔·萨特那个时代的高师文科预备班,请参阅拙作《一代知识分子——两次大战之间高等师范的预备生和正式生》,出处见前文。

2 圣-热纳维也夫高地(Sainte-Geneviève),位于今天巴黎的先贤祠广场,亨利

四世中学的所在地。——译者注。

3　阿兰（Alain），原名埃米尔·奥古斯特·夏尔蒂埃（Émile Auguste Chartier），1868—1951，法国哲学家、评论家。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通过了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先后在法国不同的城市教课，最后在巴黎亨利四世中学结束教师生涯。他教过的学生后来有许多成为法国极具影响的知识分子，他本人也被尊为现代人文主义者的楷模。——译者注。

4　索城（Sceaux），位于巴黎南郊的上塞纳省。——译者注

5　《回忆录》，第14页。

6　在高等师范入学考试的报名材料中，贡多塞中学提供的表格包含有"宗教信仰"这个栏目。报名者的回答是"犹太教徒"（国家档案馆61AJ251）。

7　同上。

8　马塞尔·鲁夫（Marcel Ruff），《非常久远的回忆》（*Souvenirs très anciens*），摘自《雷蒙·阿隆（1905—1983）——历史与政治》[*Raymond Aron（1905—1983）. Histoire et politique*]，《评论》杂志（*Commentaire*），第28—29期，1985年2月，第12页。

9　我们可以在雷蒙·阿隆有关高等师范学校的材料中，找到他在中学毕业会考时得到的这个"很好"的评语，国家档案馆，61AJ251。至于他在巴黎中学优等生会考中得到的哲学第二名，请参阅《大学杂志》（*Revue universitaire*），1922年2月，第232页。

10　《亨利四世中学学生光荣榜》，1920—1921年和1921—1922年（亨利四世中学档案）。

11　国家档案馆，61AJ251。

12　《奇怪的战争手记（1939年11月—1940年3月）》，新版本，伽利玛出版社，1995年，第84页。

13　至于保尔·尼赞，他在1926年称自己为"阿兰的门徒"[见1926年4月尼赞致亨莉叶特·阿尔芬——未来的尼赞夫人——的信，引用者：帕斯卡尔·奥利（Pascal Ory），《尼赞——一个反叛者的命运》（*Nizan. Destin d'un révolté*），拉姆赛出版社（Ramsay），1980年，第31页]。

14　这件事是帕斯卡尔·奥利叙述的（同前书，第31页），后者的根据是亨莉叶特·尼赞的话（两人在1981年11月曾谈过一次话）。但是，亨莉叶特只是在事情发生后四年才走进尼赞的生活。此外，她对另一个学者作了另外一个版本的解释，说他们和校长发生了"争吵"[见雅克琳娜·雷奈（Jacqueline Leiner），《保尔·尼赞的文学命运及其连续阶段》（*Le Destin littérairaire de Paul Nizan et ses étapes successives*），克兰科谢克出版社（Klincksieck），1970年，第25页]。

15 让-保尔·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于1974年8—9月间的谈话,发表于1981年[西蒙娜·德·波伏娃,《永别仪式》(*La Cérémonie des adieux*),后接《与让-保尔·萨特的谈话》(*Entretiens avec Jean-Paul Sartre*),伽利玛出版社,第375页]。

16 亨利四世和路易大帝两所中学的档案。

17 当时从巴黎去凡尔赛必须到圣-拉扎尔火车站坐车。——译者注。

18 奥利维埃·拉孔伯(Olivier Lacombe),1904— ,法国哲学家,法国道德与政治科学院院士。——译者注。

19 达尼埃尔·拉加希(Daniel Lagache),法国作家,他为《我知道什么》丛书(*Que sais-je?*)撰写的著作《心理分析》(*la Psychanalyse*)曾是法国一大畅销书。——译者注。

20 参阅让·莫居埃(Jean Mauguë),《被激怒的牙齿》(*Les Dents agacées*),布歇-夏斯代尔出版社(Buchet-Chastel),1982年,第40—41页。

21 贡多塞中学的档案。

22 在法国,20分为满分。——译者注。

23 国家档案馆,61AJ 251。

24 贡多塞中学的档案。

25 关于所有这些萨特年轻时代的作品,我们参考了米歇尔·贡塔(Michel Contat)和米歇尔·里巴尔卡(Michel Rybalka)对这些作品所做的研究、确认和解释工作,这些工作非常出色而耐心,其结果是《年轻时代的作品》(*Écrits de jeunesse*)的出版,伽利玛出版社,1990年。

26 牟罗兹(Mulhouse),法国城市,位于上莱茵省。——译者注。

27 《年轻时代的作品》,第53页。

28 雅努斯(Janus),一译坚纽斯,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译者注。

29 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一代知识分子——两次大战之间高等师范的预备生和正式生》,出处见前文多处。

30 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法国哲学家、评论家,曾任法兰西公学哲学教授,《现代》杂志的创办人和撰稿人之一。他先比萨特更接近共产主义,后又比萨特更快地脱离了共产主义。——译者注。

31 圣-日尔曼-德-普雷(Saint-Germain-des-Prés),位于巴黎第四区的一个街区,因区内的圣-日尔曼-德-普雷教堂而得名。从20世纪初开始,特别是四五十年代存在主义盛行的时期,那里是知识分子经常出没的地方。——译者注。

32　乔治·勒弗朗(Geroges Lefranc),《社会主义研究大学办公室手册》(*Cahier de l'OURS*),第116期,1981年1月,第29—30页。乔治·勒弗朗在注释中补充道:"下面的话就算是对当时学生道德状况研究的贡献:没有人提议邀请女孩子。"那时让-保尔·萨特确实住在克里尼昂古广场2号(根据高等师范学校的材料,国家档案馆,61AJ251)。

33　民族集团(Bloc national),法国中间及右翼政党的联盟,该联盟在1919年的议会选举中赢得了三分之二的议席,一直执政到1924年左翼联盟上台。——译者注。

34　莫里斯·巴莱士(Maurice Barrès),1862—1923,法国小说家、评论家、政治家,强烈的民族主义者。——译者注。

35　关于《无名杂志》,让-保尔·萨特的一位预备班同学让·高尔米埃(Jean Gaulmier)的回忆非常珍贵:《当萨特18岁时》(*Quand Sartre avait dix-huit ans*),《费加罗报》文学版(*Le Figaro littéraire*),第637期,1958年7月5日,第5页(以及他与笔者的通信,1980年5月和1981年12月)。

36　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 France),1907—1982,法国政治家,曾任人民阵线政府部长,"二战"期间参加抵抗运动,战后曾出任第四共和国总理,并在日内瓦和平协定上签字,结束了印度支那战争。——译者注。

37　与笔者的谈话,1981年1月23日。

38　《回忆录》,出处见前文,第22—23页。早在两年前,他就曾用这个词来形容联盟胜利时他的心情(见1981年8月5日雷蒙·阿隆在法国电视二台的"我们不会永远20岁"节目中对安娜·辛克莱尔说的话)。

39　百科全书派,18世纪法国一部分启蒙思想家所形成的派别。他们在《百科全书》的编撰过程中紧密团结在一起,坚决反对天主教会、经院哲学以及封建等级制度,因而被称为百科全书派。其代表人物有狄德罗、伏尔泰、卢梭等。——译者注。

40　我曾有机会在《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La Khâgne*)一文的结尾对此分析作详细阐述,该文是《记忆之地》(*Lieux de mémoire*)一书中我所撰写的那一部分,发表在该书第2卷第3册,主编彼埃尔·诺拉(Pierre Nora),伽利玛出版社,1986年。

第一章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或纯真年代

四年的幸福时光[1]。

1924年初夏，萨特和阿隆第一次参加入学考试，就被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录取。那年，在28名被录取的新生中，来自路易大帝中学预备班的考生占了14名，其中有8人排名前十。我们已经知道，萨特是第七名。贡多塞中学只考取了2名学生，作为该校的第一名，雷蒙·阿隆在入学考试中仅名列第十四：这位后来乌耳姆路的传奇人物告诉我们说，是关于贝尔加姆[2]的古代历史口试，使他的排名往后跌了不少。从此，这两位年仅19岁的年轻人成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这所学校在当时和巴黎综合工科学校一起，被并称为法兰西共和国最负盛名的两所学校。

两位与众不同的师范生

法国的文学作品为我们留下了三幅不同的高等师范生画像。1904—1912年，罗曼·罗兰[3]在《半月手册》上发表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在这部长达17卷的巨著中，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好友奥利维埃·雅南是一名高等师范生，他有着伟大的灵魂和自我牺牲的忠诚精神，是一个感人的人物。他那堪称楷模的死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一次劳动节的集会上，他为保护孩子冲入混战的人群，最后死于一名骑兵的刀下。1923年秋，正当萨特和阿隆在准备高等师范的入学考试的时候，罗歇·马丹·杜加尔[4]的小说《蒂博一家》的第3卷《美丽季节》出版了，它传播了另一类高等师范生的形象。雅克·蒂博通过入学考试，被高等师范学校录取，他青少年时代的反叛精神似乎早已平息。然而，这仅仅是表面现象，9月份开学的时候，他没有走进乌耳姆路的校门，为了前进，他选择了逃亡：在突尼斯、意大利和德国度过了一段游荡生涯之后，他来到日内瓦，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国际的斗争。他身上反叛的火焰并未完全熄灭，而高等师范学校也没能使他忘掉少年时代的儿童教养院。

从1932年起，于勒·罗曼[5]发表了《善良的人们》，不过那时候，萨特和阿隆早已从高师毕业。在该书的第1卷里出现了让·热法尼翁这个人物，他是小学教师的儿子、农民的孙子，1908年秋天刚刚考入高师。从这所学校毕业时，他已经取得了文学教师的资格证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步入政坛。1924年左翼联盟获胜时，他37岁，被选为上卢瓦尔省议员，九年后又成为外交部长。继1902年和1897—1902年间，保尔·布尔热[6]和莫里斯·巴莱士分别在《阶段》和《民族精神的小说》中对高等师范学校进行攻击之后，上述三部著作为我们展示了三幅高师学生的

"正面"肖像,不过这三幅肖像的笔调各有不同:奥利维埃·雅南有伟大的灵魂,他的命运却宛若流星;雅克·蒂博从反叛者成长为革命者;而让·热法尼翁则由一名靠奖学金生活的像傻学生成长为教师队伍的一员。

事实上,无论是萨特还是阿隆,他们和这些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都没有共同点。的确,正如好几张照片所反映的那样,萨特也遵循了高师学生在屋顶上散步的传统。但是,这种散步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那时候这种传统早已根深蒂固。如果说是于勒·罗曼的作品使这一传统广为人知,那么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有人证实了这一传统,比如1895年4月20日的《图片报》曾刊登过一张五位高等师范学生爬在屋顶上的照片,其中就有爱德华·赫里欧[7]。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一类照片,和《善良的人们》一样,后来成了文学描写的俗套。

不过对于我们来说,这不是主要的。撇开两位年轻的师范生是否融入乌耳姆路的传奇传统不谈——这毕竟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更主要的问题在于他们是否符合师范生的典型形象。因为这种典型形象的确存在着,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让·热法尼翁就是一个代表。于勒·罗曼在刻画这个1906级文科班学生的时候,从他那个时代的巴黎高师获取了灵感:当时在乌耳姆路的各届学生中,14.2%——确切地说是七分之一——的文科班学生是小学教师的子弟。所以,小学教师和中学教师(其子弟占学生总数的13.4%)家庭,是哺育高师学生的主要家庭环境,中小学教师子弟的人数达到了高师文科班学生总数的近30%。[8]

20年后,在20年代,这种情况依然如故:13%的学生是小学教师子弟,14%的学生是大、中学教师子弟,6%的学生是"其他教育人士"(主要是小学督学和校长)子弟。因此,33%,即三分

之一的学生来自公立学校教师的家庭。而在当时，这些公立学校——从小学到大学——的教师总数只有13万到14万名，也就是说，还不到法国劳动力人口的1%。所以，出身教师家庭的孩子在乌耳姆路随处可见。一所学校的学生主要由大、中、小学教师的子弟构成，这毫无疑问是一种神奇的现象。然而，有一个事实是无可争辩的，他们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中人数最多、家庭环境最为相似的学生团体。

从更广的范围来看，类似的研究[9]还告诉我们，在乌耳姆路占突出地位的是公务员——特别是中小公务员——子弟。如果理所当然地把教师子弟包括在内，那么他们占到我们所研究的学生总数的49.5%，即每两个师范生中就有一个是公务员子弟。而在1926年的人口普查中，法国统计总局共计有105.9万名劳动者在“国家机构”工作，其中包括军队，也就是说公务员的人数占劳动力人口的4.9%。如果我们加上来自其他普通工薪阶层——比如在国家机关以外的行业里工作的雇员或独立工作者，特别是小商人——家庭的年轻师范生，那么中产阶级便构成了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的主要家庭环境。对于天资聪颖、社会地位节节上升的年轻学生们来说，这所学校是一张名副其实的过滤网。

我们注意到，有一条鸿沟把让-保尔·萨特和雷蒙·阿隆同那些高傲的、靠奖学金生活的学生们区分开来，这条鸿沟早在高师预备班时代就已经依稀可见了。这些预备班学生经过可怕的入学考试的精心筛选，荟萃到高等师范学校的文科班里，人数还不到三十来个。在他们中间，两位年轻人和他们大部分同学的对比显得更为突出，甚至表现在档案馆的行政统计中。事实上，确切地说，当时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都是巴黎科学院奖学金的获得者。而在他们所填写的报考乌耳姆路的入学考试报名

表上,萨特和阿隆都没有申请奖学金。[10]此外,在1924级的文科班中,只有四人未申请奖学金:雷蒙·阿隆;阿尔芒·贝拉尔,他是汝拉省著名希腊学专家、参议员维克多·贝拉尔的儿子,也是阿尔芒·科兰书店的创始人阿尔芒·科兰的后代;夏尔·勒·克尔,他是建筑师的儿子;还有让-保尔·萨特。

在这一届其他24名申请奖学金的学生中,保尔·尼赞家的年收入明显高出别人,他父亲的年薪是3.2万法郎,外加5 000法郎的年金。[11]那时候保尔·尼赞的父亲是"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铁路工程师"。因此,我们刚才提到的四个师范生的家庭条件要好于他。此外,半个多世纪后,雷蒙·阿隆间接地表明了他和尼赞之间的距离,他把当时自己所接近的尼赞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子弟"[12]。

然而,比起1924级的年轻师范生们,尼赞的家庭条件要好得多。档案资料显示,当时小学教师的年收入是9 000法郎,巴黎上诉法院的律师是1.8万法郎,里昂的大学教授是2.5万法郎。后两种情况在1924级师范生的家庭条件分类中,还算是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举个例子,在更低一点的水平上有乔治·冈吉莱姆[13]的家庭。后者的父母确实在西南地区拥有一块十几公顷的土地,可是对于这个收入低微的家庭来说,要维持这块祖传的地产相当困难,这迫使他当裁缝的父亲每天要做12个小时的针线活儿,然而,全家的年收入才勉强达到9 000法郎。

杰出的哲学家

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异,在高等师范学校1924级文科班选择以哲学为专业的学生小团体中,是否继续存在着呢?没有任何事实能使我们肯定这一点。不过,这一选择倒是引出了萨特和阿隆的第二个与众不同之处:1924级的师范生有许多选择了以

文学教师资格为学习方向，而选择了哲学的仅有五人，除了萨特和阿隆，他们是拉加希、尼赞和冈吉莱姆。由于位于乌耳姆路的高等师范学校通常有连续三届的在校学生，因此说到底，哲学专业并非人丁兴旺，学生人数大约只有12名。所以，与其说是相似的社会背景把萨特和阿隆这两名年轻的师范生联系在一起，不如说是他们在选择专业时所表现出的意气相投，以及后来他们在一个人数不多的团体中所度过的共同生活。

举个例子，1927年12月24日，在高等师范学校1924级哲学专业的五名学生中，有三名来到巴黎第五区的区政府。原来那一天，萨特和阿隆是保尔和亨莉叶特·尼赞的证婚人。这种关系是否会就此发展为名副其实的友谊呢？谁要是作肯定的回答，那他就可能是看错了。这两位哲学专业学生的关系，更多的是依靠两个能力极强的年轻知识分子彼此的相互倾慕以及他们在选择专业时的相似举动来维系的。后来有人曾经问雷蒙·阿隆："你们过去的关系是否非常密切？"在回答这个问题几年之前，雷蒙·阿隆在1964年10月29日的《费加罗报》文学版上这样写道："在高等师范学校，猜到他是天才的就我们几个人。"[14]他还指出，萨特是人们"首选的谈话者"，后者在结识西蒙娜·德·波伏娃之前，很喜欢"和（阿隆）交谈"。因此，在高等师范学校的那几年，我们可以说他俩的关系很密切，换言之，"当两名师范生就世界上所有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时，他们就可能结下了亲密的关系"[15]。的确，阿隆的这些话，是在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也是在萨特的抨击刺伤这位昔日的"小朋友"之后讲的，这种伤痛在几年之后他的《回忆录》中还能被体会到。不过，也许我们不能认为阿隆在1976年讲的这些话口是心非。相反，它们似乎的确反映了这两个以前互不相识的年轻人在进入高等师范学校以后相互之间关系的性质。在高等师范，亨利·勒加姆从1926年

起就同萨特和阿隆交往,他写道,“小朋友”这种说法是萨特首创的,后者说这个词的时候,“语气就像是一位颇有教养的家庭主妇,在对她的小男孩讲:‘去和你的小朋友玩。’”[16]

同一时期,萨特模仿科克托[17]的小说《波托马克》的笔调,以他在高等师范的一些同学为原型,创作了一部神话故事。其中尼赞是大公爵,马厄[18]是喇嘛,勒加姆是欧仁。阿隆则是莫尔蒂梅,他属于那种“大资产阶级,很有绅士风度,到处旅游,富有却有些守旧”[19]。当然,这些神话人物其实和现实没有任何关系,但他们显示了这些人的性格倾向,证明了在萨特眼里,阿隆从来就不曾是他的双胞胎兄弟。他们相互承认对方的才华,并由此感觉到自己是一群精英的一分子,但与此同时,有许多东西把他们分开。虽然萨特和阿隆不是宙斯和莱达所生的孪生子加斯托和波吕克斯[20],但他们仍感觉自己是高等师范学校这座奥林匹斯圣山的成员。

的确,表面上,他们两人在大学里毫不费力地获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功和一张又一张文凭。比如,雷蒙·阿隆一如既往地在乌耳姆路完成着他那出色的、无任何瑕疵的学业。在前两年的时间里,他获得了学士学位文凭所必需的各种证书:心理学证书(1925年3月)、普通哲学和逻辑哲学证书(1925年7月)以及哲学史证书(1925年7月)的评语是“好”;只有1926年3月获得的第四张证书,即道德和社会学证书的评语是“较好”。[21]同时,萨特也在努力获取他的学士学位文凭:1925年3月获得了心理学证书(评语是“好”),同年7月获得了哲学史证书(评语是“较好”),1926年3月获得了普通哲学和逻辑哲学证书(“好”),7月获得了道德和社会学证书(“较好”)。

除了他们相同的大学经历——总之,这种经历对于高师学生们来说是相当经典的——那时,这两位哲学专业的学生和他

们所选科目之间的关系似乎已经有了不同。雷蒙·阿隆更加传统，他利用在高等师范学校的第三年阅读了康德的著作，他的高等教育文凭论文就是关于康德的，确切地说，论文的主题是“康德哲学中永恒的概念”，在20分制的评分标准中，莱昂·布伦什维克老师给它打了17分。这篇论文已经让我们看到了阿隆系统的百科全书派观点，以及他长期从事某项研究的能力，这一切都预示着他在30年代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相反，萨特的兴趣更加广泛。他和阿隆同一年完成了高等教育文凭论文，主题是“心理生活中的影像、作用和性质”，在20分中，亨利·德拉克鲁瓦老师给了他17分。他和尼赞一起参加翻译了卡尔·雅斯贝尔斯[22]的《普通精神病理学》，而且似乎已经开始对自由问题作哲学上的思考。在《文学消息》杂志举办的“当代大学生调查”中，他的回答已经包含有《存在与虚无》中某些主题的萌芽；正如他在1929年2月2日的那一期杂志中所声明的那样，“这种奇怪的、试图将存在与本质综合起来的决定论，也是一种有益的想法”[23]。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和在高师预备班的时候一样，萨特多样化的表达方式又一次得到体现，这把他推向了小说的创作。米歇尔·贡塔和米歇尔·里巴尔卡曾经寻找过萨特在1928年左右撰写的《恩培多克勒》[24]的手稿，它是小说《失败》的雏形，西蒙娜·德·波伏娃曾在《一位循规蹈矩的少女的回忆录》中提及这部小说，当时它被伽利玛出版社拒绝了。

我们不想过分借助于事实，也不想对这些年轻时代的作品——它们只不过是一部处在酝酿时期的巨著的皮毛——和它们的多样性作不合时宜的评论，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它们预示着萨特以后作品的两面性。我们曾经指出，在萨特的作品中，文学的一面充实和普及了哲学的一面。1974年，西蒙娜·德·波伏娃对萨特回忆道：“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对我说要同时做斯宾诺莎和

司汤达。"[25]阿尔贝·加缪更多地是通过他的剧作和小说而不是哲学评论在文化生活中留下深刻印记的,而他在阿尔及利亚的哲学老师让·格勒尼埃的著作,除了一小部分圈内人士之外,却完全不为人所知。就是在那个时代,让-保尔·萨特以自己的方式,成功地同时充当了一回加缪和格勒尼埃。现在看来,我们在当时就已经能够看出这位文学双面神的雏形了。[26]此外,这一特点也许是萨特这个人物的关键之一,当他在很久以后开始参与政治的时候,我们仍然必须牢记这一点。不管这种政治参与有多么频繁,不管它使萨特的生命发生了什么变化,他还是渴望同时成为斯宾诺莎和司汤达,怀着这种憧憬,他的生命协和如故。正如萨特在去世前16年写的那样:"我的生命开始在书本中间,那里也许也是它结束的地方。"[27]

另外,仔细想来,这也是我们所发现的萨特和阿隆自学生时代起就形成的对立的关键。通过他们和书本的不同关系,两位年轻人和世界也建立了不同的关系。对于萨特来说,图书馆是一座神奇的宝藏,它有一种十足的魔力。因为它是"反映在镜中的世界"[28],但这面镜子也可能是歪曲现实的棱镜。相反,当阿隆在谈到文化觉醒的问题时,他所说的魔力是指1921—1922学年他在哲学班里所遇到的"思辨的魔力世界"[29]。两人和现实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同,阿隆认为,吸引知识分子的魅力不是通过创造来对世界进行可能的改变和纯化,而是对这个世界的思索。也就是说,与其超越现实,不如贴近现实。正如我们观察到的那样,雷蒙·阿隆从来不曾通过想像来求得过理想的实现。[30]

当时,在高等师范学校的这几年里,萨特尽管兴趣广泛、外表超然,但他仍被视为乌耳姆路哲学专业的希望之一。对萨特的这种评价不仅来自于他的同届同学,同样也来自于高师校方。在1928年哲学教师的资格考试中,这位年轻人连笔试都没有及

格,令所有人感到惊讶。高等师范学校的副校长在一封信中统计了师范生们教师资格考试的成绩,他为萨特的“意外”深感惋惜,他说:“原来我们对萨特是寄予厚望的。”至于校长,他也写道:“萨特是哲学专业最杰出的学生之一。”[31]人们之所以如此惊讶,另一个原因是在前一年的哲学教师资格考试中,高师的学生和往年一样,名次都处在第一集团:保尔·维尼奥和乔治·冈吉莱姆分获一、二名,让·卡瓦叶斯[32]获第四名。只有一个名叫让·拉克鲁瓦的学生挤进了这个由师范生组成的集团里。同样,在1928年,尽管萨特发挥失常,但师范生们还是由雷蒙·阿隆和达尼埃尔·拉加希摘取了第一和第三名,来自巴黎大学的埃玛纽埃尔·穆尼埃[33]插在了第二名的位置。[34]

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1929年,轮到让-保尔·萨特考第一名了。萨特在1928年的教师资格考试失败后不久,遇见了同学达尼埃尔·拉加希,他半真半假地对后者说:“谁要是向他父母玩假装被教师资格考试难倒的把戏,那么他以后要做的只有一件事:第二年考第一名。”[35]于是,萨特的诺言在1929年得到了实现,那年有四位师范生排在了前五名,让-保尔·萨特名列榜首;闯入这个由师范生组成的小集团的,是一个名叫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女生,她排在第二名。[36]由安德烈·拉朗德担任主席的评委在报告中指出,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笔试中名列第四,但在考试结束时,她的成绩已“遥遥领先于后面两位并列的应试者了(85.5分对78分)”[37]。笔试中有一道题是关于“偶然和自由的概念”的。在考试报告中,阅卷人帕洛蒂和瓦尔[38]指出,“一位女生和一位男生并列第一”,成绩是20分中得了16分。鉴于考试的最终排名,这两位学生无疑就是让-保尔·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

与此相反,前一年萨特在笔试中遭到了失败,而阿隆则主宰

了那次考试——埃玛纽埃尔·穆尼埃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阿隆比后面一名"领先很多……在总分110分中领先十几分",那一年笔试的试题是"理智与社会"[39]。这里我们并不想根据如此细微的迹象作预测。但我们注意到,历史爱开玩笑,甚至开到了教师资格考试的笔试试题这样一个严肃而刻板的领域。从两个年轻人为完成他们学生时代的必修课而竭尽全力的一开始起,阿隆就在对理智与社会的思索中出类拔萃,这一主题却使萨特暂时在教师资格考试的笔试中排名垫底,然而第二年,自由的主题又重新将他推上了榜首。

幸免于战争的一代

15年前,也就是1914年夏天,前一辈师范生们是在一个截然不同的历史环境下通过教师资格考试的。比如,历史学家、后来成为巴黎大学教授的莫里斯·波蒙很久以后在回忆他教师资格考试的口试时,这样说道:"我是在发布动员令的那个星期六走上历史教师资格考试的讲台的。从下午2点起,我在评委面前讲了一个小时的'阿尔比异教'[40]。这是1914年教师资格考试的最后一堂课。下午3点,白色的动员令就张贴出来了。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天的晚上,我去我的连队报到,我遇到了两个同样是少尉的同学,一个是文学班的,另一个是自然科学班的。1914年8月7日,我们在洛林首次接受了战火的洗礼,两个同学战死了,我也负伤被俘。"[41]

1914年8月,像莫里斯·波蒙那样在乌耳姆路学习的高等师范生共有211名。到了1918年11月11日停战的号角吹响时,其中的107人在为期51个月的战争中被打死。这使人不禁想起另一个看上去年龄和莫里斯·波蒙相差无几的师范生乔治·杜梅齐尔[42]的话,后者晚年时说:"直到现在,大约七十年过后,

我还是坚信:我活着是个运气。"[43]的确,这一代活着的人都是幸存者,在1914年夏拍摄的乌耳姆路各届在校师范生的集体照上,大部分人都将因为战争而被抹去。

当然,类似的事情没有发生在我们所熟知的1924级文科班的集体照上。但是,人们的脑子里会立刻产生一个问题:这一届在1928年夏被战争迹象笼罩着的师范生,后来会不会有同样多的人在战争中死去?如果是这样,那么萨特、阿隆和尼赞的三人小团体又会怎样?然而,1928年夏天是《白里安—凯洛格公约》签署的季节,该公约宣布战争为"非法"。这年夏天萨特和阿隆平静地度过了教师资格考试,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惟一令人震惊的,是萨特在笔试中遭失败的消息。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代幸免于战争的师范生正处在缓刑期中。因为《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没能阻止这个世界在11年后重燃战火。而1928年夏由三名年轻师范生组成的小团体,也在1940年,即他们35岁的时候,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春天,就像莫里斯·波蒙和他的"两个同学"所经历的1914年夏天一样:5月份尼赞在战斗中牺牲,6月份萨特被俘,同时阿隆来到了伦敦。就这样,历史在他们几乎步人中年的时候赶上了他们,这时他们已经年过三十,和历史的真正较量开始得稍晚了些。

不过,他们二十多岁的时候,前途似乎还是一片光明。这里我们要借用一位不太知名的1924级师范生——让·巴尤——的话。从乌耳姆路毕业很久以后,他在一次讲演会上提到了那个年代,并特别强调了一点,这一点在其他师范生的叙述中也曾出现过:"在高等师范学校,我和我后面的几届同学都是幸运的。我们在胜利中诞生;我们知道在湖的那边,国家元首们正在解决世界的难题。高等师范学校有一大批人都信奉吉拉尔杜。"[44]的确,似乎有许多女神在俯身关注着萨特和阿隆这一代人的摇篮,

后者晚了几年诞生,便逃脱了1914—1918年的那场大屠杀,他们在洛迦诺会议(1925年)的影响中完成了政治上的觉醒,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欧洲似乎摆脱了死亡妖魔的纠缠。如果我们不比较1914年和1928年的这两次教师资格考试,而是比较1924年萨特和阿隆所参加的高等师范入学考试和十年前那次的话,那么萨特和阿隆这一代人和在战争中惨遭杀戮的前一代师范生之间的比较,同样也非常说明问题。1924年,两位年轻的高师预备班学生有机会在一个法德关系趋于改善的欧洲品尝成功的喜悦,而1914年的高等师范入学考试却是在战争的阴影中进行的。和教师资格考试不同的是,高等师范入学考试的口试得以在宣战前举行,那一届学生在1914年7月底被录取,但几天后他们就应征入伍了。当然,由于事先缺乏军事训练,这一届学生只是在几个月以后才被送上前线,因此他们没有参加1914年夏秋两季的死亡之战。尽管如此,这一届学生——包括自然科学班——还是有三分之一,或者说近三分之一(29.72%)倒在了战场上。[45]因此,这一届有许多死于战争的学生只进过一次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大门,那是为了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入学考试的口试。

那些幸存的学生只是在后来才真正进入高等师范学校。比如马塞尔·代阿[46],他1894年出生,1914年被高等师范学校录取,不久便应征入伍,1915年1月开赴前线,1917年1月晋升为中尉,次年4月晋升为上尉,他只是在1914年夏天过后的第55个月才回到乌耳姆路。事实上,1919年3月,当他复员后重新开始在高等师范学校的学业时,已是一名荣誉骑士团的军人骑士和五枚勋章的获得者了。此后的三年里,他获得了哲学教师资格。三年后,《法兰西杂志》(1922年3月26日)就“年轻一代往何处去?”这一主题展开调查,又是他在该期杂志上宣布:“我

会区别对待参加过战争的人和没有参加过战争而生活在今天的人。我甚至害怕在这两代人之间有一条无法填平的鸿沟。”

的确，出生于本世纪头十年的那代人——我们称之为1905年的一代，萨特和阿隆恰巧属于这一代——有一个共同点，从人口学的角度来说，他们逃脱了这场战争。有时，只要相差一点，这代人当中那些与本世纪同时诞生的年长者就会置身于战火之中。正如生于1901年的作家让·普雷沃[47]在1933年所写的那样：“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体会到鸿沟的存在：那是在战争刚结束的时候。当时法国人感觉自己被分成了三类：年纪太大或身体太弱不能参加战争的人；参加过战争的人；还有我们——所有这些在动员令要求人们准备去死的时候刚刚意识到自我的人。在应征的1918级最年轻的学生和1919级最年长的学生之间，存在着一道深渊，他们所处的两个时代只是被一天，甚至是被一个时辰划分开的，而新的一代恰恰开始于1919级最年长的学生。”[48]我们知道，让·普雷沃是另一场战争的英雄：1944年夏，他倒在了维尔高尔山区。他的命运悲剧性地反映了好几位1905年前后出生的高等师范生的命运。他们都属于同样的年龄层次，由于出生晚了几年，他们侥幸逃脱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当他们年近四十、已经安居乐业的时候，历史却抓住了他们。

尽管他们并未直接接触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他们同战争的关系却要复杂得多。因为，这一代人当时已经有一定年纪，他们在母亲的忧虑和父兄的离别中感觉到了战争的阴影。正如贝尔特朗·德·儒弗奈尔[49]晚年在《世纪旅行者》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我这一代人受到了最为明确的限制：我们恰巧不到上战场的年龄，但这年龄足以使我们感受战争的曲折，理解战争的恐怖，承受战争带来的丧失亲人的痛苦。”他说：“我生于1903年，我把‘我的一代’看做是介于阿尔弗雷德·法布勒－吕斯[50]（1899年

生)和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1907年生)之间的一代。”[51]

我们重提这种感觉并非为了追溯过去。年轻的哲学教师资格获得者莫里斯·萨万出生于1905年,他和萨特一样,曾是住在大学城里的学生。他在1928年11月24日的《文学消息》杂志上写道,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他那一代人的心中将铭记着几幅“永存的画面”:“外省一座小火车站的月台,哥哥即将奔赴前线;邮差一星期没来,母亲在哭泣。”[52]

我们必须认识到,1905年的那一代人不是历史学家后来捏造出来的。确实有那么一个年龄层次的人,他们出生于本世纪的头十年,介于另外两代人之间。比他们年长的一代参加了战争,在战壕里度过了20岁;比他们年轻的一代则出生于1915年左右,西班牙内战和德奥合并时他们才20岁,直到成年,他们都不曾有过前十年人们的希望和幻想,因此他们对和平几乎不怎么向往。相反,由于刚才曾经提及的原因,1905年的那一代人对和平却特别敏感,尤其是雷蒙·阿隆。

“我是个狂热的和平主义者”(雷蒙·阿隆)

1925年初春,《法兰西行动报》[53]在拉丁区掀起了一场持续而猛烈的风潮,原因是该报反对任命乔治·塞尔教授到巴黎法学院任教,他们认为,乔治·塞尔之所以被任命,是因为他和当时掌权的左翼联盟极为接近。由此引发的争吵非常频繁,然而,在巴黎法学院这所很右倾的学校,只有一小群以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为首的“共和党和社会党大学行动团”成员,才有能力让别人稍微听一听他们的意见。那时,该行动团才成立几个月。三年后,行动团的创始人、自然科学专业的大学生保尔·奥斯塔雅回忆这些事件说:“《法兰西行动报》的报贩们抢占了法学院,我们的总书记戴着一顶漂亮的弗里吉亚帽[54],我们集合在他身后,

穿过整个拉丁区，游行了好几个小时，每到一条路的拐角，都会有恼怒的报贩攻击我们。”[55]几天后，基本上由保王党人控制的全体大学生联合会号召总罢课。法学院的学生们充当了这个倡议的尖兵，而1925年4月2日的《工作报》则报道说，“在高等师范学校，几小时内有102名学生签名，号召男女学生们像往常一样去学校上课，以此表明自己的自由。”和1914年以前发生的书写了拉丁区历史的其他一些事件——首先就是德雷福斯案[56]在大学生当中产生的影响——一样，这一次，高等师范学校和法学院又相互敌对，乌耳姆路和先贤祠广场至少在象征意义上代表着两大对立的阵营。

在罢课的那些天里，师范生们为了凑数，从这个课堂赶到那个课堂，他们还组织了几次声援乔治·塞尔的游行。4月4日的《工作报》生动地描述了那些日子，那时乌耳姆路成了对抗《法兰西行动报》的中心：“另一群反动青年朝高等师范学校走去，他们企图诱使学生们参加罢课。此外，他们急于证明自己的行动有多么高尚。然而，大约一百五十名反对罢课的人也来到乌耳姆路，他们声明支持上课的学生。5点钟，反法西斯的大学生们在圣-米歇尔大街上排成一字长队，其中有许多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一会儿工夫，他们就聚集了一千多名示威者，来到公共教育部和劳动部的窗下，为弗朗索瓦-阿尔贝和乔治·塞尔[57]两位先生喝彩。队伍经圣-日尔曼大街返回，在圣-日尔曼-德-普雷教堂前解散。”

那些日子，在乌耳姆路，社会主义和亲社会主义的师范生们，特别是在他们的领袖乔治·勒弗朗的带动下，对这起事件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58]正如我们后来知道的那样，雷蒙·阿隆是接近社会主义思想的，56年后，他回忆当时自己为了支持乔治·塞尔，也参加了“示威”[59]。同样，虽说萨特没有参加游行，但出

于团结,他似乎至少参加了抵制罢课的尝试。不管怎样,1968年,他在一篇题为《雷蒙·阿隆的巴士底狱》的文章中讲道:"我一年中只去了一次巴黎大学,那时右派学生们决定抵制一位老师的课,因为他们不喜欢这位老师的思想。那些天里,所有师范生都去了巴黎大学,尽管他们以前从来不去那儿。"[60]

对于本书的主题来说,这段历史非常有意思,因为这是两位"小朋友"第一次被证实共同参加一个对国家大事发表见解的活动。然而,如果我们想赋予这段历史更深的含义,那么就有可能发生观点的错误,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方面,从20年代中期拉丁区石板路上看似协同的脚步,到1979年6月萨特和阿隆晚年在爱丽舍宫台阶上的会晤,其间的道路并非是一条直线,而确切地说,本书的主题恰恰就是研究两人在各自穿越20世纪的过程中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另一方面,他们在国民责任感方面而共同迈出的第一步只是表面的现象。即使和他们成熟以后参与政治的态度相比,两人当时还处于一个角色反串的阶段,但两位师范生已经处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了:阿隆是一名和平主义者和亲社会主义者,萨特则不仅不问政治,而且完全游离于当时一些有关国家大事的重大问题之外。

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半个多世纪后,雷蒙·阿隆在关于《参与政治的观众》一书的谈话中宣称,他在学生时代是一名"模糊的社会主义者"和"狂热的和平主义者"[61]。当时,社会主义和亲社会主义是乌耳姆路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倾向。这些年轻的师范生在第三国际法国分部巴黎第五支部中积极活动,并且在高师的校园内形成了一个重要而活跃的团体。在一个由乔治·勒弗朗——他无疑是当时高等师范社会主义力量的领导人——以及让·勒·巴伊、皮埃尔·布瓦万和莫里斯·代克索纳组成的核心的领导下,这个高等师范的政治团体通过校园内的社会主义研究

小组，不仅在乌耳姆路，同样也在圣－克鲁、塞弗勒和封特奈的学校，以及巴黎的高师预备班当中招收新成员。这个社会主义研究小组是1924年秋由路易大帝中学的几个年轻人创立的，他们中有几位刚被高等师范学校录取，和萨特及阿隆同届。还是这个乔治·勒弗朗——他是这一届高等师范的入学考试的榜眼，即第二名——成了该小组的灵魂。尽管其他创立者都取得了入学考试的成功，小组依然对师范预备班的学生敞开大门。事实上，每周四下午小组举行会议时，那些比小组创立者年龄稍小一些的师范预备班的学生们也赶来参加讨论。特别是贡多塞中学师范预备班的好几个学生，比如1925—1926年的阿尔贝·罗曼，他后来在1926年的入学考试中被高等师范录取，还有他的同学克洛德·莱维－施特劳斯[62]，后者在1926年4月22日提出要"组建比利时工人党"[63]。

克洛德·莱维－施特劳斯只在贡多塞中学读了一年的预备班。[64]在哲学老师安德雷·克勒松的建议下，他在法学院注了册，同时继续攻读哲学学士。[65]如果说他早在读师范预备班之前就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话，那么他的这种信念，是在读师范预备班的那些年里，通过与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和乔治·勒弗朗的接触，才进一步加强的。尽管他不是师范生，但在1927年大学开学时，他接替了乔治·勒弗朗成为小组的领导人，因为那时，后者不得不集中精力准备教师资格的考试。第二年4月，他成了全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合会的总书记。[66]正是因为有了研究小组这块社会主义师范生的园地，全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合会才得以在图尔大会开过之后的几年里重新建立起来。此外，这块园地在30年代初还曾有过继承者：好几个小组成员都为创建和推动第三国际法国分部的"建设革命思潮"作出过贡献。[67]

1924—1928年，雷蒙·阿隆在高等师范学校的时候，是否以

某种方式参加过这个社会主义团体呢?1952年9月,他在《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了《向阿兰致敬》一文,并在文中写道:“那时,我和大部分不信仰天主教的师范生一样,倾向于左派,我自称是社会主义者。”而在1983年,他在《回忆录》里的说法,则和两年前他在《参与政治的观众》一书中曾经提到的那种说法非常相似,他谈到“社会主义的定义不很清楚”,并在书的另一段里写道,为了献身于“拯救穷苦阶级的事业”,自己在1925年或1926年曾参加过第三国际法国分部巴黎第五支部。[68]这样就产生了两个问题:当时雷蒙·阿隆是否亲社会主义?如果是,他是否按照规定手续加入了第三国际法国分部?

关于第一个问题,有一篇文章很能说明问题,它非常珍贵,因为它可能是雷蒙·阿隆发表的第一第文章。[69]它被刊登在1926年12月的《日内瓦杂志》上,当时该杂志组织了一次关于欧洲青年大学生的调查。[70]它向德国、英国、意大利和法国的大学生们提出了一些有关艺术和文化的问题,我们无法确定这些问题是通过何种途径到达学生们手中的。大学生们的回答被刊登在1926年9—12月的杂志上。在12月的那一期上,发表了三位年轻高等师范生的文章,他们是雷蒙·阿隆、乔治·冈吉莱姆和达尼埃尔·拉加希。[71]我们可以更加精确地推算出这篇文章撰写的时间。雷蒙·阿隆的落款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哲学学士”。我们知道,他是在1926年3月获得他的第四张、也是最后一张学士文凭证书即道德和社会学证书的。加上印刷所需要的时间,这篇文章应该写于1926年4月到夏末之间。鉴于另外两位师范生中的一位——乔治·冈吉莱姆的落款是“朗格多克[72]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正在准备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其他时间在农村种地”(原文如此),并且他是在1926学年末通过高等教育文凭答辩后开始准备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的,因此这些文章

可能写于1926年夏天。

在这篇文章中，雷蒙·阿隆提到了"更可能引起他好感的政党——社会党"。就此，他的政治倾向得到了公开的表达。另有一句话的政治倾向也十分明显：反对战争，它是"绝对的罪恶"——这一点我们以后还将提到——同它"斗争"的主要"方法"是"全世界工人阶级之间的相互谅解"，"说实话"，雷蒙·阿隆补充道，"我首先信任的人，是这些粗犷的同伴。"此外，阿隆说话时的委婉语气，似乎排除了他通过领取党员证在形式上直接加入社会党的可能性，至少在当时是这样。更何况这句话的前后文还对社会党进行了批评，其语气同社会党积极分子的大相径庭：社会党"经常拘泥于对一些权威术语的乏味崇拜，似乎这些概念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反映的是一个永不变更的事实，其实，这些概念在某一历史阶段是天才的观点，但由于现实的复杂与多变，它们往往是片面的……我尤其不喜欢社会主义教理式的讲授。"

五十多年后，雷蒙·阿隆在回忆往事时，确实把自己说成是"1925年或1926年"第三国际法国分部巴黎第五支部的成员。但我们必须清楚，他在1926年夏似乎还远没有加入这一组织。正因如此，也许我们应该相信他的同届同学乔治·勒弗朗的话，回想过去，他对阿隆加入社会党的说法提出了异议。阿隆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说道："乔治·勒弗朗向我保证，说我从来没有在第三国际法国分部注册，只是在社会主义大学生联合会登记过。"确实，乔治·勒弗朗记得，自己曾在1926年向他的同学出售过社会主义大学生联合会的会员卡，他认为，雷蒙·阿隆之所以记错，是因为联合会和第三国际法国分部第五支部的开会地点同在戈布兰[73]的一个啤酒馆。[74]我们看到，问题主要不在于阿隆究竟参加了哪一个组织——是全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合会，还

是第三国际法国分部——而在于以下说法既得到了当事人也得到了他在乌耳姆路的同学的证实。当时,雷蒙·阿隆在社会主义的气氛中接受了他的第一堂政治课,当然,这种社会主义是"模糊"的或"定义不清"的,但这使他后来通过社会主义大学生的介绍,加入了第三国际法国分部,或者说——这种假设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加入了亲社会主义的团体。

此外,其他迹象也表明了阿隆的政治倾向。比如,同样是在1926年12月的那篇文章里,雷蒙·阿隆提到了弗朗西斯·德莱齐:"正如德莱齐先生指出的那样,经济、政治或社会问题的范围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的内部;片面地寻找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徒劳的,因为在国家内部,这些方法相互矛盾,并且孕育着新的困难。"弗朗西斯·德莱齐于1926年2月4日来过高等师范学校,为社会主义研究小组的成员讲"现代社会的矛盾"。因此,我们推测,那天雷蒙·阿隆参加了小组的活动。我们知道,这个小组是一个社交性的组织,在那里,许多人的社会主义情感都得到了升华,比如莱维-施特劳斯就是如此。此外,后者也参加了1926年2月的那次报告会,他思考的是,"弗朗西斯·德莱齐所希望看到的政治与经济两大领域的完全分裂是否是一件坏事,而试图逆如此强大的现实潮流而行是否是一种科学的方法。"[75]

当时,阿隆和莱维-施特劳斯都是和平主义者和亲社会主义的年轻哲学家,他们都被弗朗西斯·德莱齐的演讲所打动,这既令人感兴趣,又非常说明问题。弗朗西斯·德莱齐还是一个经济学家,一年前他曾为年轻的预备班学生和师范生讲过"石油问题",不过,现在面对这些听众讲话的,却是一名虔诚的白里安主义者和坚定的欧洲主义者(此外,15年后,弗朗西斯·德莱齐的和平主义发展成了与敌人的"合作主义")。我们看到,年轻的阿隆对弗朗西斯·德莱齐的论点的引用,间接地显示出他既赞同这

种可能的政治情感,又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倾向。此外,在《回忆录》中,他再次间接地证实了自己和社会主义研究小组的关系。在回忆"来师范学校做讲座"的"政治家"和"作家"时,他提到了莱昂·勃鲁姆[76]。后者的这次讲座时间同样也是可以确定的。1925年12月6日,星期天,莱昂·勃鲁姆来学校对年轻的师范生们做了演讲。这次演讲是在高等师范学校社会主义研究小组的倡议下,为该小组的成员举行的。[77]

除了准确地推算日期和确定阿隆所参加的党派,还有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这位未来"参与政治的观众",是在左翼的政治环境下开始他的人生旅途的,不管他的衣袋里是否揣着第三国际法国分部的党证,他早年所受的政治教育都带着社会主义的烙印。与此同时,这位未来写作《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的理论家,起先曾是一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也是在阿兰的《战神或受审判的战争》的阴影下,完成了自己的政治觉醒的。雷蒙·阿隆最初的这种和平主义是毋庸置疑的。此外,我们看到,他本人在《参与政治的观众》一书中谈到了自己在高等师范求学的年代,并宣称:"我是狂热的和平主义者。"的确,两年后,阿隆在他的《回忆录》中重新提到了阿兰对他的影响,他明确指出,自己从未真正被这位亨利四世中学的哲学老师说服过。[78]但是,他的话可能带有——至少是一部分——撒谎的成分。因为,如果说阿兰对他的影响在时间上和程度上都难以确定的话,那么至少,它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是决定性的。它塑造了一个早期的雷蒙·阿隆,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初,阿隆自己被迫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反省,确切地说,这是为了摆脱阿兰对他的影响,因为从那时起,他觉得这种影响是有害的。

此后许多有关阿隆的研究,都告诉了我们他和阿兰决裂的过程。1933年2月,阿隆在后者的学生们创办的刊物《自由谈》

上,开始了他"对'完全和平主义'的思考",并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阿兰的"真理"是"漂浮不定"的。八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高潮,而上述结论也成了不可辩驳的指责。流亡伦敦的雷蒙·阿隆在《自由法兰西报》上写道:阿兰"对国家平白无故地敌视,对威胁民族的危险几乎故意置若罔闻,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培养了几代年轻法国人";因为,他"在随大流和执拗地思考反对历史发展的同时",助长了"一种有意识的盲目"。[79]当然,战争结束后,阿隆的语气平静了一些,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从法国沦陷时期起,就一直折磨着许多曾是阿兰学生的人:"为什么在深刻而高尚的指导思想和简单至极的实用主义要求之间,会有这样的反差?"同样,为什么从 1933 年到 1939 年,人们要绞尽脑汁"避免类似 1914 年的战争"? 这些问题分别在《关于阿兰政治思想的意见》和《阿兰与政治》这两篇文章[80]中被提出来,如果人们知道阿隆在师范生时代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就很接近埃米尔·夏尔蒂埃——人称阿兰——的"政治思想"的话,那么这些问题就更加突出了。

1929 年初,在可能是他第三篇正式发表的文章[81]中,雷蒙·阿隆就这个问题作了十分明确的阐述。这篇短小的文章题为《阿兰的影响》,其内容和语气都很清楚:"在高等师范学校,有一群年轻人的灵与肉在疯狂地骚动着,他们健康强壮,在运动场上,在公立大学里,在农业劳动中,他们都很愿意通过政治请愿来贯彻导师的提议。人们称他们为'阿兰的弟子',校方和一些学生提到他们时惊恐万状,而其他人对他们则充满友情,甚至是尊敬。……至于我,我既要感谢他几个学生的友谊,又要感谢他本人的著作。或者应该说,我从他的弟子对他的敬佩之中,推测出他的生活和人品,这更增添了他作品的力量。因此,人们甚至在认识他以前,就开始尊敬他、敬佩他、爱戴他了。"[82]

当然，这是一篇阿隆年轻时代的文章，还带着年轻人的激情。同时，文章也为一种虔诚的感情鼓舞着，我们可以注意到，这种虔诚和阿隆以后的作品风格并不协调。[83]因此，这篇文章显示了阿兰的影响对他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那么，在高等师范学校的那些年里，雷蒙·阿隆是否经常和阿兰见面呢？作为前贡多塞中学预备班的学生，他从未听过这位亨利四世中学的老师的课。然而，在进人乌耳姆路之后，他似乎和阿兰有了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自由法兰西报》上发表了一篇反对阿兰的文章，其中就提到了他在乌耳姆路时代和阿兰的交往。[84]后来，在1981年的《参与政治的观众》中，他写道："有时，我到亨利四世中学去找他，一直陪他回到雷恩路的家。"[85]但是，两年后，在《回忆录》[86]中，"有时"变成了仅仅"几次"。实际上，他们见面的次数并不重要。因为——关于这一点，所有的证言都趋于一致——在大多数时候，老师和"弟子"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这种关系只是依靠阿兰的影响力维系着。

对于阿隆来说，究竟是阿兰的哪位"弟子"在他和阿兰之间充当了特别中间人呢？"可能"是雷蒙·阿隆的同届同学乔治·冈吉莱姆。阿隆在《回忆录》中指出："也许是阿兰的一些学生们做了我们的中间人。"接着，他在四页之后补充说："可能是乔治·冈吉莱姆在我和阿兰之间斡旋。"[87]尽管如此，我们看到，在对"阿兰的弟子们"作了一番热情洋溢的描述之后，雷蒙·阿隆在他1929年1月的文章里写道："至于我，我既要感谢他几个学生的友谊，又要感谢他本人的著作。"毫无疑问，阿兰对这位年轻哲学家产生了影响，至少是间接地。从1928年到1930年，作家朱利安·格拉克[88]曾在亨利四世中学的师范预备班里听过阿兰的课，后者自1909年起就在这个班教哲学。后来，格拉克在回忆自己过去的老师时，说他是一个"令人钦佩的启发者"[89]。的确，"启

发者"这个词用得很恰当,它概括了一些人的特征,他们不一定为广大公众所熟悉,或者生前不曾获得同他们的深刻影响相匹配的声望,但是,他们在法国精神生活的不同领域里,曾经启发了后几代人。有几位教师就属于这种人,因为,可以被称为"启发者"的人,他们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一门课程的教授,而是达到了一个更广阔的精神范畴,有时会引起政治上的后果,这种影响还涉及到那些后来自己也成为知识分子的年轻人。[90]

阿兰就属于这一类"启发者",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哲学甚至是文化的范畴,我们看到,对于他的某些学生来说,这种影响无可辩驳地带有一种政治色彩。[91]除此之外,如果说某些"启发者"坚定地留在了幕后,就像高等师范学校的图书管理员吕西安·埃尔或者伽利玛出版社的贝尔纳·格罗埃杜伊桑那样,那么,尽管当时阿兰的著作和《自由谈》杂志的发行量很小,[92]而且从统计结果来看听他课的学生也为数不多,但他还是属于这样一类"启发者",其观点在生前得到了一大批人的接受,而这些人主要是那些受到他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的弟子们。比较起来,阿兰的角色后来令人想到尚未在媒体上出名的路易·阿尔杜塞[93]和雅克·拉康[94]。起初,他俩的影响同样也只是局限在一个有限的、人员相对单一的圈子里。对于阿尔杜塞来说,随着一届又一届高等师范学校年轻知识分子的大量流动,这个圈子在不断更新着,这些知识分子后来在思想上成为他们老师的接班人。就此,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了阿兰在知识分子舞台上的地位。他既不在幕后,也不在台前,我们可以把他看成是一个频繁出没于政治集会的人物,他参与国家大事的辩论,并且直接或间接地留下他的痕迹,他不躲在暗处,也不抛头露面,他是一群认真而狂热的信徒的"启发者"。

此外,这群弟子之所以能紧密结合在一起,是因为他们对阿

兰个人的钦佩，他们中的某些人极为严肃地称他为“人物”。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许多弟子在课堂之外从未有机会和“人物”单独谈话。只不过出于对后者的钦佩，他们才成了《自由谈》的读者，加入了“弟子”的队伍，并听从米歇尔和让娜·亚历山大的组织和指挥。其实，他们是一个社会真正的缩影，他们的活动和斗争都是集体进行的。那时，阿兰年轻的追随者们建立了一种公共大学——社会教育团体；此外，他们还渗透到人权协会里，同时也在“和平意愿”组织内积极活动；特别有一点我们以后还会谈到，每当发生各种“事件”的时候，他们就会行动起来，而这些事件又总是带着和平主义甚至反对军国主义的色彩。因此，我们可以说，阿兰的这些弟子们相互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围绕着《自由谈》杂志被确立，并由于弟子们对阿兰的钦佩而变得牢不可破，它深受和平主义共同情感的影响，尤其表现在弟子们的集体斗争中。

那时，雷蒙·阿隆似乎也受到了阿兰的这种影响，他沐浴在和平主义的情感之中，至少间接地参加了几次斗争。一些性质相同的事件证实了阿隆对阿兰的这种接近。比如，1927 年 3 月，一部由社会党人约瑟夫·保尔－邦古[95]提出的军事法案被投票通过，法案的第四条特别规定，必须“把国家在知识界的资源运用到国防上去”。高等师范信仰和平的学生们立刻行动起来，有 54 人在一份请愿书上签了字，认为这部法律“首次”废除了“知识分子在战时的一切精神独立和观点自由”[96]。在这些签名的学生当中，有萨特和阿隆。

我们注意到，这份请愿书的象征意义在于，它是第一篇以集体名义发表的，并且有两位哲学家共同签名的文章，这样的文章最后一次出现在 1980 年 1 月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的几个星期，也就是让－保尔·萨特去世前的三个月，那是一份抵制莫斯科奥

运会的倡议。在此期间,我们看到,他们两人同在一篇文章上签名的机会确实越来越少。不过,撇开这段小插曲不谈,阿隆在请愿书上的签名表明,当时他的和平主义情感胜过了亲社会主义的倾向。事实上,对这项法律提案投赞成票的是社会党议员。塞纳省社会党议员、海军少将路易·饶勒斯在对阿尔比的中学生们演讲时,引用了他兄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希望你们的活力成倍增长,以便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国外的敌人,有充分的爱心去对待国内的兄弟。法国的国土应该既是森严的军营,又是美丽的花园。"甚至连人权协会也在1927年7月的大会上,以绝大多数——1 356票比240票——通过了对该法案的赞成,维克多·巴什[97]声明说:"法案重视对民主的所有保证。"协会中只有少数极端和平主义者采取了敌视的态度。就他们这方面面言,3月20日,《自由谈》攻击这项法案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具军国主义色彩的法案";4月15日,阿兰在《欧洲》杂志上称法案是"疯狂的念头"。一个月后,罗曼·罗兰在同一份杂志上说,通过这项法案,他看到了"欧洲任何一个帝国主义或法西斯专制政府都不曾敢做的事情:对整个民族进行奴役。这种奴役从一个人的摇篮时代开始,直到他走进坟墓"。他还宣誓说:"我事先宣誓,永不服从这条暴君的法律。"请愿者们反对法案的主要论据是无可辩驳的:"我们认为,法案是对信仰自由史无前例的、最为严重的损害,此外,它也不符合一个武装起来的民族的思想,这种思想允许公民有选择的自由。"

几个月后,1928年2月20日,76名高等师范生集体在《自由谈》上发表了一篇新的文章,抗议"德玛夏尔先生因他的著作而受到被逐出荣誉勋位团的威胁",萨特和阿隆也在上面签了名。这份请愿书并没有起作用,作家乔治·德玛夏尔由于被指控对法国版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提出疑问,因而被逐出荣誉

勋位团五年。[98]但是，请愿书聚集了所有的和平主义力量，其中，阿兰的学生们占据了决定性的地位。[99]《自由谈》友好地戏称德玛夏尔为“异端分子”，拿他的情况和德雷福斯案作比较，说明“新青年”们希望以请愿来表明“在战争起源的问题上，他们同样不容许‘伪爱国主义者’，而真理依然高于一切”。

如果还需要第三个例子来证明雷蒙·阿隆属于这一代受阿兰思想塑造的“新青年”的话，那么这个例子可以到高级军事训练事件的余波中去寻找。1928年11月26日，83名乌耳姆路的学生在《民众报》上发表了一份请愿书，抗议强制学生参加高级军事训练。这封请愿书由阿兰的一名学生撰写，在报界引起了一场广泛的论战，有许多文章对高等师范的学生持敌视的态度。由于阿隆在7月份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因此那年秋天他已经不在高等师范学校了。尽管他没有在请愿书上签名，但他以高等师范学校校友的身份，参加了反对高师校友会会长埃章尔·皮卡尔[100]的运动。高级军事训练事件发生后几星期，后者在校友会的全体大会上声明，说他“最近非常忧伤地读了一封从形式到内容都欠妥当的信”，这封信“所体现出的对军官作用的无知令人感到奇怪，而与此同时，我们有那么多同胞为保卫祖国，穿着军官服献出了生命”。《自由谈》对此作出了反应，12名高等师范学校校友写了一份请愿书，抗议这项声明。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罗曼·罗兰和阿兰。另外还有几位已获得教师资格的年轻人，20世纪20年代初期和中期，他们在高等师范学校曾是阿兰思想的传播者，直到当时，他们还继续在《自由谈》上发挥着作用，他们是让·罗比埃和乔治·冈吉莱姆。雷蒙·阿隆的名字，也出现在这12位具有强烈阿兰思想的人当中。

关于阿隆和阿兰主义者之间的关系，这里有很多推测，但无论如何，这种关系比后来阿隆自己在回忆中所提到的要密切得

多。如果需要在这方面的补充证据,我们也许可以举这位年轻的师范生未能获得高级军事训练合格证书这个例子。阿隆未能通过这次军事训练,这已经是广为人知的事实。[101]不过没有通过的原因并非他的身体素质欠佳,事实上,正如雷蒙·阿隆在《参与政治的观众》和《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当时他是一位出色的网球运动员。他的失败,似乎应该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来分析,阿隆未能通过军事训练是1927年的事,而那一年正是反对高级军事训练运动的开始,这次运动随着1928年秋83名高等师范生的请愿而达到顶峰。1926年,只有四名高等师范生没能获得高级军事训练合格证书,而到了1927年,这一人数上升到了七名,其中包括雷蒙·阿隆,另有四名学生甚至连考试都没来参加。[102]由于缺乏确切的资料,我们很难断定这次失数是否是雷蒙·阿隆有所预谋的,不过在我们看来,这种推测的可能性很大。更何况雷蒙·阿隆在《回忆录》中承认了阿兰在这方面对他的影响:"如果我不赞同这种做法的话,也许就会通过军事训练的期末考试。"这种"做法",指的是阿兰对"军衔"的拒绝。此外,他还在八页之后明确指出:"我没有被阿兰说服,但我受到了他的影响,决定在考试中既不要成功,也不要失败。我在阅读参谋部地图时所犯的错误,以及在指挥一个小分队时所表现出的笨拙,也是导致我失数的其他原因。"[103]

不管怎样,这是一种平庸的和平主义。它是法国沉重的和平主义倾向——经济学家们称之为"趋势"——的组成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种完整的和平主义倾向在法国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比如,安托万·普罗斯特通过研究,指出了在老战士们的圈子里——也就是说在大部分成年的、男性的、有劳动能力和有选举权的民众中——人们适应和平主义情感的可贵性和普遍性。[104]还有其他一些对众多舆论圈子的研究,同样也证实

了这种情感的普遍性。除了广大民众的这种情感上的和平主义之外,还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和平主义,后者产生于对战争本身和对“政权”的双重内疚感。因为,一方面,许多知识分子都积极参加了战争,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把自己看做是大肆屠杀欧洲人民的同谋,这造就了他们的极端和平主义思想,也他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在战争危险来临的时候,根本没有能力去思考战争。另一方面,这种内疚感从此折磨着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有时也使他们对“政权”产生某种本能的怀疑。正因如此,我们能够在他们中的某些人身上,听到阿兰对战争猛烈抨击的回声。也正因为这一点,当独裁时代到来的时候,他们无法就极权统治作出思考。

我们看到,雷蒙·阿隆所接受的这种和平主义有着上述两大根源,当这两大根源所意味的忠诚产生矛盾时,它们就会孕育出痛苦的情况。因此,我们即使不提后事,也能更好地体会到阿隆自我反省的困难,更确切地感受出他在30年代是多么的早熟和相对的孤立。因为,撇开它的平庸性不谈,阿隆的和平主义很快就在思想上形成了体系,尽管缺乏首创性,但它至少已经摆脱了阿兰的影响。事实上,这种影响使阿隆产生了一种感情排斥——这解释了他在早期的文章中所采用的语气——不久也促使他对外交形势作出了审慎的分析。他在旅居德国的初期认为,法德两国的接近,应该是优先实现的目标,其他的一切都必须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服务。这就是阿隆和阿兰的大部分“弟子”在态度上的巨大区别。这位年轻的师范生在旅居德国期间,对自己进行了一次反省,即便是在此之前,阿兰对他的影响,也不同于这位预言家对远近不一的信徒们的影响,后者是在一期又一期的《自由谈》里等候预言家的神谕,而阿兰对阿隆的影响,看上去则是阿隆在思考之后作出选择的结果。因为从那时候开

始,阿隆对自己的选择所蕴涵的内容进行了理性的分析,这种分析使他身上年轻人的激情得到了抑制。比如,我们可以在这位年轻的师范生所正式发表的第二篇文章里,看到他的这种两重性。原来,阿隆在1928年4月20日的《自由谈》上,撰写了一篇关于朱利安·本达[105]的短文,后者在不久前发表了《知识分子的背叛》。短文语气生硬,但论证却已经非常严密。

短文之所以采用这种生硬的语气,可能是因为年轻的作者被朱利安·本达对法国和平主义的攻击激怒了。《知识分子的背叛》谴责了"以唯科学主义自诩的和平主义"和"其他有害的和平主义":"十年来",这种政治情感"也许仅仅只来源于一种思想,没有什么能比它更好地说明,'精神王子'们的思想格调今天已堕落到一个何等脆弱的程度了"[106]。面对这些话,已经获得哲学教师资格的年轻人反驳道:"我们就采纳这本书指出的标准:'我们事先可以说,那些为凡夫俗子们所颂扬的知识分子背叛了他们的职责。'这是荣誉勋位团作出的决断。"这些话出现在短文的结尾,显得十分犀利。此外,55年后,雷蒙·阿隆在《回忆录》中写道:"每次我读到自己在文章结尾处向他射出的那支利箭,就感到羞愧,我这是在影射他新近成为荣誉勋位团成员的事。也许羞愧这个词太重,确切地说,我应该嘲笑我自己。"[107]两个月前,阿兰也亲自在《自由谈》上写道:"那个被招人荣誉勋位团的人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以为受到了奖赏,实际上他把自己的灵魂抵押给了军队,而且是一辈子。"[108]和阿兰所说的原因一样,当时的历史背景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荣誉勋位团身上。当时,朱利安·本达刚被授予荣誉勋位团勋章,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阿兰的学生们所支持的乔治·德玛夏尔,则因为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作了被认为是不符合正统的解释,而被逐出了荣誉勋位团。

如果说短文另外还有一个段落与雷蒙·阿隆以后的文风不相协调的话（“我们期待着一个人。我们只剩下一位文学家了”），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同样令人感兴趣，那就是它所展开的论据。因为，这些论据远远不是杂志上反对军国主义的“假新闻”。我们以后可以看到，当萨特因踩不准步伐的节奏而使负责操练的士官大光其火的时候，阿隆似乎已经在思考知识分子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了。他对《知识分子的背叛》的评论，就是这种思考的结果，事实的确如此。朱利安·本达在他的书里特别强调，知识分子应该捍卫内在的价值——比如人们在德雷福斯案中所捍卫的正义和真理——但是，如果他们同样也参与那些单调平常的论战，那么他们就背叛了自己的职责：“本达先生认为，知识分子的思考主要应该是苦思冥想……因此，他（最后）表达了自己对某些知识分子的蔑视，他们自称在思考我们的世界，并在其中加入了一些明晰的关系，换言之，他们值天空降到了地面。人们难道不能既不背叛自己的职责，又孕育出一种爱好真实、倾向宽容并且付诸行动的思想吗？”[109]

所以，从那个时代起，雷蒙·阿隆就提出了真理和宽容的关系问题，这也是他有关公民责任感思考的中心。此外，我们已经感觉到，在理智的约束和心灵的激情之间，在分析和行动之间，在旁观与参与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状态，阿隆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种紧张状态的背后，是知识分子所肩负的使命：“思考我们的世界，并在其中加入一些明晰的关系。”不过那时候，阿隆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使用的措辞是否和他 27 年后一样呢？ 27 年后，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文中，他站到了那些在他看来是受到马克思主义迷惑和愚弄的知识分子的对立面。的确，过早地下结论和赋予这篇短文其内容之外的含义，这些都是在走极端。因为事实上，阿隆以后的文章都包含着尖锐的思想，但是很少咄

咄逼人,和那些文章相比,这篇短文的风格很不协调。1928年,阿隆的思想还属于一种揭露性的风格,而不是陈述性的风格。总之,在当时的雷蒙·阿隆和后来的雷蒙·阿隆之间,存在着三重的角色反差。他是年轻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未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是和平主义者,而不是《连锁战争》的分析者;他是论证简短、表达生硬的好斗分子,而不是旁征博引的政论家。

萨特或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年代

当时的萨特同样也扮演着和以后相反的角色。因为,虽说这位未来对政治参与大加吹捧的人,当时对政治问题并非毫不关注——否则,他就会故意采取远离政治、逃避政治的态度——但是,对关于国家大事的辩论,他却完全不闻不问。他对此根本没有兴趣,即使偶尔涉足,似乎也是因为疏忽,而从来不是出于他的本意。因此,在感情上,当时他和全国范围内的辩论没有任何联系,对正在发生的历史也毫不关心。

尽管如此,要想重现师范生时代的萨特并非易事,因为历史学家必须打破许多固有的偏见,更广泛地说,他还必须弄清一些尚不明了的问题。这种偏见是由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一位循规蹈矩的少女的回忆录》造成的,该书对萨特及其朋友的"团伙"和"帮派"作了著名的描述,说他们是故意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并且非常吵闹。[110]关于这个主题的各种说法,逐渐勾勒出一幅图画,图画的主人公是一个天资极为聪颖的学生,他正向其他高等师范生扔水弹[111],因为他怀疑他们在追求那些达官贵人的女儿。但是,人们所习惯读到的这些文字仅仅表明,关于萨特在高等师范时代的原始资料非常缺乏。《词语》一书从萨特的少年时代一直讲到了他的成年前夕,萨特称这一时期为"人生的开始"[112]。至于西蒙娜·德·波伏娃在《一位循规蹈矩的少女的回忆录》中对

年轻哲学家的描述,只是从1929年春末、萨特24岁的时候开始的。不过,在对各种说法进行对照印证之后,我们还是可以描绘出萨特在高等师范时期的大致情况。其实,他仍然和在高师预备班的时候一样,完全不问政治,在这方面,他几乎接近麻木;而与此同时,他很早就开始了写作的尝试,他的作品涉及到哲学和文学两个领域。

目前,人们对萨特在文化领域里迈出的第一步已经有了比较确定的认识,这应该归功于米歇尔·贡塔和米歇尔·里巴尔卡的研究,这一点我们以后还会提及。但是,这位年轻的高等师范生当时是如何关注纷繁芜杂并且贯穿20世纪20年代始终的政治生活的,这个问题人们还不很清楚。萨特后来这样说道:"社会主义吸引了我在乌耳姆路的很多同学,但我却无动于衷。"[113]他不仅对社会主义,而且对所有形式的政治参与都无动于衷,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从1958年的《一位循规蹈矩的少女的回忆录》开始,特别是在1960年的《年富力强的时代》一书中,西蒙娜·德·波伏娃描绘了一个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整个30年代对政治漠不关心的萨特的形象。然而,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由于她只是在1928—1929学年才认识年轻的师范生萨特,因此她的话并不能证明后者在乌耳姆路度过的那些时光。不过,萨特本人倒是多次谈到过这个问题,他从未试图用现在人的眼光来歪曲人们对当时的看法。在"奇怪的战争"[114]期间,萨特随所在的部队驻扎在下莱茵省,他在当时的日记中,提到了自己在两次大战之间"对政治的淡漠"。的确,他是拐弯抹角地承认这一点的,而且对此没有多加评论。[115]但是,他简明的表达方式本身,就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20年后,让-保尔·萨特在1960年重新谈到了自己对政治的冷漠,这种态度和保尔·尼赞的政治参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在《亚丁·阿拉伯》的著名前

言里,提到了20世纪20年代,并明确指出:"我讨厌他从事政治,因为我没必要这样做。"[116]14年后,我们看到,他在同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谈话中,又一次证实了他对政治的漠不关心,萨特去世以后,这些谈话于1981年被发表。

萨特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态度并非是后人说出来的,它得到了当时许多资料的肯定。一方面,这些资料来源于当事人本身:即他写给"西蒙娜·若莉韦"的信。那时候,萨特和这位图卢兹姑娘保持着联系,在写给她的三十多页信中,萨特冗长而清晰地描述了自己在高等师范的生活,却没有提到他的任何政治倾向。[117]另一方面,和他在高师预备班的时候一样,萨特在乌耳姆路的同学们所作的证明,使我们得出了同样的结论。[118]和某些同学的政治参与相比,让-保尔·萨特的态度明显地落后了,尽管如此,这种态度并没有影响他在校期间多次参加发生在高等师范学校里的反战活动。我们知道,为了反对社会党人保尔-邦古在议会提出的新军事法案,1927年,54名高等师范生联合签名发表了一份请愿书,萨特和雷蒙·阿隆一样,也是这54名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学生之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萨特还是同年发生的讽刺剧事件的主角之一。要想了解他在这一事件中的态度,就必须重新提一下他在乌耳姆路时性格的另一面,也就是对恶作剧的爱好。在师范生用语中,恶作剧是开玩笑和捉弄人的意思。萨特的小说《恩培多克勒》可能写于1927年,其手稿是米歇尔·贡塔和米歇尔·里巴尔卡发现的,小说的主人公弗雷德里克是"教授年轻人文学的最大一所学校"的学生,也是一名"凶恶的"恶作剧组织者。[119]

至少在这一点上,《恩培多克勒》可能带有自传的性质。在乌耳姆路,萨特即使不是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说的"团伙"成员,至少也是"一个极端自由主义帮派"的一分子。[120]在这个帮派中,

除了萨特，还有尼赞、马厄——他后来担任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以及皮埃尔·吉耶。关于这方面，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证言仍然是不能被直接接受的，因为，除了她经常在国立图书馆碰见的勒内·马厄之外，她只是在1929年春天才真正认识了萨特和他的朋友。不过，萨特本人后来承认："不错，在高等师范学校，我们几个成了从事暴力的人。"（1972年）[121]"对我来说，向那些晚上穿着礼服返校的男生们投掷水弹，是一件很正常的事。"（1974年）[122]由此引出的后果也是理所当然的：年轻的哲学家亲口承认，他"在高等师范学校有时会遭到别人的痛打"[123]。甚至在半个世纪以后，还有一名1927级的高等师范生说，他对这位乌耳姆路的同学怀有"难以言状的厌恶"[124]。[125]

年轻的萨特甚至决定把他的低级趣味和挑衅行为体现在日常的环境中，以此激起人们的反感。比如，很久以后，亨莉叶特·尼赞讲述了这样一件轶事："那时候，他爱着一个外省姑娘，我想那姑娘住在里昂或圣太田。至少大家都这样说。他时常会去看她。和几乎所有师范生一样，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放了一件很刺激人的小东西。那是一件用粉红中略带褐色的棉纱做成的女人内衣，可能是他女朋友送给他的，他把这件内衣当做灯罩，盖在他的灯上。"[126]不过，使这位年轻哲学家好几次成为攻击目标的，还是他的"恶作剧"。其中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可能是他所写的一封信[127]，这封信于11月27日发表在一份极端保守的报纸《巴黎回声报》上，那时候，高等师范生反对高级军事训练的斗争正风起云涌：

主编先生：

您今天可能收到了一份83名高等师范生致公共教育部的请愿书。我认为有必要让您知道，也有必要

让别人知道,在高等师范学校,对这次至少是不合时宜的示威,许多年轻人持完全反对的态度。我们知道,我们的"同学"中有不少人装出一副支持时下流行的人道思想和和平思想的样子。如果他们的行动仅仅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示威活动,比如在学校里唱唱《国际歌》什么的,我们不会有任何话说;但是,如果他们在公共场合下,以所谓高等师范学校的名义,攻击我们的国家机关甚至是法律,那么我们就觉得必须告诉公众,高等师范学校里不只有他们。他们曾经让人们以为,他们有足够的权威,能在外面代表所有高等师范生的观点,这种情况持续得太久了。

在本信上签名的学生不敢自称是高等师范的多数派,但他们希望大家了解,还有那么一些师范生准备服从国家的法律,他们懂得最起码的秩序的必要性,同时又感到惊讶,因为在我国最大的教育机构之一,竟然有人听任一门最为基本的课程逐渐消失,他们也感到遗憾,因为像穿军装或参加军事训练这样如此自然的传统正在遭到抛弃,或者说有这种危险。

波尔什、布瓦万、尼赞、于泰、加卢瓦、布尔热瓦、罗朗、马丹、鲁博、P·德·冈迪雅克、梅洛-庞蒂、罗贝尔、卢波、乌尔卡德、拉帕吕斯、巴迪、里巴耶、拉封、西波利特、布律阿、杜普拉。

那些出现在这封信上的经过挑选的名字,也许使乌耳姆路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因为签名者中,既有信仰共产主义的学生,也有倾向法兰西行动团的学生!

这篇文章还额外横生出一个妙趣,因为一方面,我们注意

到,让-保尔·萨特在签名者当中塞进了高等师范学校哲学专业一些年轻学生的名字,如莫里斯·帕特罗尼埃·德·冈迪雅克、莫里斯·梅洛-庞蒂和保尔·尼赞;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忘记,在当时,《巴黎回声报》是谴责高等师范学生所拥戴的和平主义的急先锋。该报同样在11月27日的这一期上指出:"乌耳姆路这所培养我国高等学府未来教师的学校,受到了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神秘学说的侵扰,这一点我们都了解,但我们以为,这些神秘学说在那里造成的破坏并不大……坏疽从初等教育一直蔓延到了高等教育。"让-保尔·萨特的文章使《巴黎回声报》的编辑们欣喜无比,他们这样介绍这篇文章:"作为(高等师范学校反对军事训练的)这份既可笑又可憎的请愿书的回应,20名高等师范生给我们写了以下这封请愿书。"然而第二天,那些编辑们可能意识到自己被"愚弄"了,于是可怜兮兮地在头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假造。更正》。

不管怎样,这段插曲表明,虽然让-保尔·萨特的确不关心政治,但他受到了反战环境的深刻影响。由于对恶作剧的爱好,他参与了1927年的讽刺剧"丑闻"。原来,每年开春的时候,乌耳姆路的学生都要组织一台介于"愚弄"和讥讽之间的演出,这是他们在毕业生面前轻轻地挖苦一下高等师范学校的老师和行政人员的机会。让-保尔·萨特连续几年在这一演出中起重要作用:"萨特积极参与讽刺剧的创作。我还记得,为了在旧货商那儿淘到别出心裁的演出服装,我们在勒马莱区[128]长途跋涉。萨特和尼赞负责写讽刺剧的剧本,剧本里音节游戏、文字游戏和有趣的歌曲随处可见。萨特在这方面有着惊人的才华。他同样也参加音乐部分的创作。他很有轻音乐的天赋,能出色地利用或改编一些著名的曲子。"[129]

就这样,1925年,《朗松的灾难》上演了,剧中,高等师范的

在任校长居斯塔夫·朗松出征巴西,这个国家处在暴君蒂梅奥·达纳奥斯和他的妻子多尼亚·费朗代丝的压迫之下。达尼埃尔·拉加希扮演多尼亚·费朗代丝,埃梅·佩皮尤扮演蒂梅奥·达纳奥斯,而居斯塔夫·朗松则由让-保尔·萨特扮演。[130]左翼联盟中那些毕业于高等师范的部长们看得开怀大笑,"非常乐意地"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简报》上留了言。

第二年上演的是《在簪花旧票的影子下》。让-保尔·萨特又一次扮演了居斯塔夫·朗松的角色,并赢得了《工作报》的赞赏,该报在1926年3月21日的那一期上评论说:"尤其应该提到萨特同学,他出色地扮演了朗松这一角色,还有冈吉莱姆同学,他扮演的是高等师范学校的军事指挥官佩罗代斯司令。"第二天,这份报纸还在第二版刊登了一张该剧的剧照:《朗松先生接受采访》。

丑闻发生在1927年,当年6月,一篇发表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简报》上的评论证明了这一点:"3月底,学生们上演了一年一度的讽刺剧,校友们一致认为该剧有点粗俗和下流;高等师范学校的精神是否正在衰退呢?"

其实,引起轩然大波的,主要是讽刺剧中的两首歌,歌里有几段反对军队的歌词。第一首歌名为《关于战争时期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它公开攻击了新的军事法案,这项由保尔-邦古提出的法案于3月7日即几个星期之前刚被投票通过。我们知道,法案在第四条中特别规定,"把国家在知识界的资源运用到国防上去"。歌曲的影射是非常明显的:

(一)

当保卫法国的时刻来临,

当老人和孩子先后开赴沙场，
你们必须为我们毫无怨言地行军，
不然屁股会被保尔－邦古踢伤！

（二）

莱维·布律尔[131]将丈量颅骨，
证明波莫瑞人[132]是衰退的民族，
母狼的崽子们长着毛驴的双颌，
在莫斯科它们的神经已经萎枯。

（三）

为了表明惟有我们法国才培育精神，
贝迪埃[133]公开了泰纳[134]和朗松的画像，
他们俩容光焕发的嘴脸让人们
一眼就看穿了纯粹的法兰西天性。

然而，特别激起反感的还是第二首歌——《康比扎上尉的悲歌》，它显而易见地挖苦了乌耳姆路的两位军事教官——康比扎上尉和比扎尔中校。[135]一位师范生装扮成军事教官，在表演反战歌曲的过程中，用《马赛曲》的曲调唱道：

我开始军人生涯时
这个职业还有利可图！
我们可以期待战争
获得机会踏上仕途！

当你陶醉在荣誉之中
有谁敢把棺材来数?
优秀的军官不问此事,
重要的是得把命保住。[136]

这两首歌在演出时引起了抗议和异议,舆论也介入了这一事件。1927 年 4 月 9 日的《胜利报》在一篇题为《发生在高等师范学校的丑闻》的短文中,要求居斯塔夫·朗松辞职。后者把讽刺剧的主角们一一招到他的办公室盘问,结果有好几名学生受到了校长“严厉的训斥”,其中包括乔治·冈吉莱姆。

让-保尔·萨特不在受到点名批评的学生之列,但他在此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事实上,第一首歌曲的作者可能是乔治·冈吉莱姆,这一点我们还不能最终确定,[137]但《康比扎上尉的悲歌》确是由勒·巴伊、布鲁索迪埃、佩隆、冈吉莱姆和萨特共同创作的,另外,萨特还是执笔者。[138]虽然他逃过了校长的盘问,但他亲笔写了一封请愿书,谴责居斯塔夫·朗松不顾事实地指控那些受到处罚的师范生们“卑鄙而不诚实”[139],在请愿书上签名的除了他,还有保尔·尼赞、乔治·勒弗朗、莫里斯·拉鲁蒂和让·巴尤。不过为了不使事态扩大,这封请愿书最后并没有被寄出。

萨特对权力和军队的敌视,不仅仅局限于一些“恶作剧”和挑衅的行为,还表现在其他一些形式上。由于萨特这种对原则的敌视,加上他在某种程度上笨拙的天资,于是在王室港大街的兵营里——当时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们就是在那里接受强制的军事训练课的——发生了一个又一个饶有趣味的场面,唱主角的是萨特和尼赞:“那些被分配负责我们操练的军官,很快就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小队里,萨特和尼赞不会按口令踏步,他们很用功,但无意中却在小队里引起了混乱。……一天,有人想出

个主意，让他们两人出列，在同学们取笑的眼光（这个年龄的学生是冷酷无情的）和教官们迟疑的眼光下单独操练，面对两人天生的无能，也许教官们从心底里想笑。这种治病的药物比疾病本身更有害。"[140]

萨特通过和平情愿和反战"讽刺剧"，同军事当局发生了一些轻微的冲突。我们是否能因此而认为萨特参与了政治呢？不管怎样，萨特年轻时所谓的"政治倾向"，更多地表现在他无法按节拍踏步，而不是表现在某种典型的、明显的参与行为上。即使当他后来开始参与政治时，知识分子萨特仍然保留着他性格的这一面。此外，这里所涉及的可能不仅是他性格的一个方面，也是他性格的一个关键。现在，我们似乎应该把萨特在20世纪20年代的和平主义思想，同一种普遍的行为联系起来，后者也许可以被称为无政府主义的行为，如果"无政府主义"这个词并不明确意味着在政治上有所觉悟的话。萨特的极端自由主义倾向，表现在他对体制特别是对军队的攻击上，实际上，他反对军队的态度，使他重新和阿兰的弟子们站到了一起；萨特的上述倾向，还表现在他和许多同学交往时所运用的激烈言辞上，他后来好几次公开承认了自己言辞的激烈。所以，萨特的不关心政治，和莫里斯·梅洛－庞蒂的不关心政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确，梅洛－庞蒂自己承认，无论是在预备班还是在高等师范，他都"超脱于任何斗争之外，尤其是政治斗争之外"[141]。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的《一位循规蹈矩的少女的回忆录》中，用让·普拉代尔的假名，描写了这位年轻的"塔拉"——在师范生的口里，"塔拉"是天主教徒的意思——他出身低微，早年丧父，隐居在索莱斯姆。[142]萨特热衷于凶恶的恶作剧，年轻的"塔拉"则倾向于宗教思考，他俩各自有着不同的态度，其共同点在于他们对有关国家大事的辩论都不感兴趣。另外，据萨特回忆说，他们两个年轻人

之间的“关系十分糟糕”。梅洛－庞蒂对萨特及其朋友的“猥亵歌曲”十分反感,他曾想介入,但惹恼了唱歌的学生。萨特宽宏大量地出来打圆场:“好了,别揍他,放他一码,让他走吧。”[143]

因此,这三位后来《现代》杂志的创办人,在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相互之间的关系很复杂。萨特和阿隆关系不错,和梅洛－庞蒂关系不好,而梅洛－庞蒂和阿隆之间则根本没有关系。50年后,阿隆回忆说:“在高等师范,我几乎不认识梅洛－庞蒂。”[144]特别要提的是,当时,这三位年轻的知识分子中有两位不问政治。

成长中的知识分子

其实,萨特的不问政治和阿隆的社会主义思想,反映了他们在乌耳姆路的许多同学对政治的态度。当时,文科预备班和高等师范学校是一个相当封闭的世界,那里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温室环境,知识界时尚的微风和政治前卫的暴雨都一概被阻挡在这座温室之外。由于某些影响是在封闭条件下起作用的,因此这座温室使那些尚未成熟的知识分子成长了起来,换句话说,它使他们完成了精神和政治的自我觉醒。这些知识分子有两种倾向:一方面,大约有一半人“不问政治”,和20世纪20年代的其他一些年轻人群体包括大学生群体相比,这一比例并不高。[145]当然,造成“不问政治者”——萨特就是其中之一——比例相对较低的原因,是上述的温室环境。同样,这种温室环境也解释了为什么当时那些对政治较为敏感的预备班和高等师范学生,在政治观点上有巨大的同一性:预备班和高等师范的学生群体事实上都倾向于左派,与之相比,拉丁区的大学生在政治上的分歧则更大一些。温室环境还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因循守旧的恶习,这不仅表现在政治方面——的确,那时候,在预备班很少有极端的

政治倾向，预备班本身几乎也不是共产主义或莫拉思想滋生的沃土——同样也表现在文化方面，比如，超现实主义对学生们的影响很小。作为一个学习语言的场所，高等师范学校的文科预备班同时也保存了相同的政治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20世纪20年代的预备班学生以及后来的高等师范生，在文化上和政治上都和他们的老师保持了一致，而这些老师在德雷福斯案发生的时候只有二十来岁。因此，在预备班和高等师范学校，学生们的守旧多于反叛，承袭多于抛弃。

撇开几代人的连贯性不谈，我们是否可以说，预备班和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的政治觉醒，是通过简单的"克隆"方式完成的呢？当然不可以，因为只要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就能发现其中的偏差：这些学生的父母和老师通常在政治上是激进分子；在代代相传现象和"极端阴险"的法国政治生活的共同作用下，孩子们长成了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承袭的社会主义"。承袭并不意味着不变，温室环境从来不是一个简单保存政治传统的地方。相反，每一代年轻人——至少是那些有政治倾向的年轻人——都会比他们的前人更左一点。的确，1924年左翼联盟的胜利，标志着激进派至少在表面上取得了政治成功。然而，这种几代人之间政治态度的偏差，使得更年轻的学生喊出了以下口号："宁要勃鲁姆，不要赫里欧。"雷蒙·阿隆就是这样，他为左翼联盟的胜利而欢欣鼓舞，而这时的他，已经站在了社会主义的立场上。

因此，如果说我们不应该误解"承袭的社会主义"这种说法，那么不管怎样，在20世纪20年代，许多预备班学生和高等师范生的社会主义或亲社会主义观点，都是宽厚大于反叛。后来，雷蒙·阿隆在他的《回忆录》或其他文章里，对自己当时参与政治的描述——当然，这种描述带有回忆的性质——似乎是和这种倾

向相符的。其实,这更是一种和平主义的政治参与,这种参与的形式更加内在化,更加与传统决裂。在这一点上,他最初的三篇文章很能说明问题:第一篇发表在《日内瓦杂志》上,用审慎的言辞提到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好感;第二篇关于荣誉勋位团,它和阿隆以后的文风大不相同,但是——这一点可以解释前面的现象——它承袭了阿兰严格的正统思想,公开表达了他对"政权"的蔑视;第三篇的措辞不如前一篇那么激烈,它近乎虔诚的语气同样也不是阿隆所惯用的:当然,文章的主题是阿兰的弟子。

联系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再重新看待这种貌似荒谬的现象,我们就能对它有更好的理解。雷蒙·阿隆后来花了很长时间来摆脱社会主义的影响,这种摆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看上去并不痛苦;相反,他同和平主义思想的决裂则要快得多,但是,为了摆脱阿兰的影响,阿隆将被迫进行一次痛苦而艰难的反省。就前一种情况而言,尽管社会主义对阿隆的影响千真万确,但这种影响仍然是靠时代的环境才得以传播;它只是表面上的一层薄膜,似乎并未触及阿隆的心灵深处。面就后一种情况来说,阿隆和许多阿兰前弟子一样,和平主义成了他名副其实的包袱,想摆膜这个包袱要困难得多。

注:

1 让-保尔·萨特,《亚丁·阿拉伯》(*Aden Arabie*)的《前言》,玛斯贝罗出版社(Maspero),1960年,第26页。

2 贝尔加姆(Pergame),古代中亚城市,位于今天土耳其的伊兹密尔省境内。贝尔加姆在公元前3—2世纪曾是古希腊的城市,以发达的贸易著称。——译者注。

3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法国作家,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译者注。

4 罗歇·马丹·杜加尔(Roger Martin du Gard),1881—1958,法国小说家、剧作家,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译者注。

5　于勒·罗曼(Jules Romains),1885—1972,法国作家、诗人,一致主义文学流派的创始者,法兰西学院院士。——译者注。

6　保尔·布尔热(Paul Bourget),1852—1935,法国作家、宗教小说家,被誉为心理小说大师。1894年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译者注。

7　爱德华·赫里欧(Édouard Herriot),1872—1957,法国著名政治家、评论家、传记作家、回忆录作家。——译者注。

8　参阅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Jean-François Sirinelli),《小说〈善良的人们〉中高师学生的形象:神话还是现实?》(*L'image du normalien dans Les Hommes de bonne volonté: mythe ou réalité?*),《于勒·罗曼手册》(*Cahiers Jules Romains*)第8期,弗拉马里翁出版社(Flammarion),1990年,第93—104页。

9　为了方便起见——特别是为了使其他来源的资料能够更方便地映证我们的分析——我们所研究的学生在年级上与萨特和阿隆的那一届稍有差距(1927—1933级);但是,我们对1924级前后几级学生的分析,证实了上述数据的稳定性。

10　国家档案馆,61AJ 251。

11　同上。四个没有申请奖学金的家庭未被要求说明收入情况。

12　此话由安妮·科昂-索拉尔(Annie Cohen Solar)引用,《保尔·尼赞——不现实的共产主义者》(*Paul Nizan, communiste impossible*),格拉塞出版社(Grasset),1980年版,第44页。

13　乔治·冈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1904—1995,法国哲学家,当代哲学认识论的创立者之一。——译者注。

14　阿隆在《从一个神圣的家庭到另一个神圣的家庭》一书中再次提到这些话。《从一个神圣的家庭到另一个神圣的家庭》(*D'une sainte famille à l'autre*),伽利玛出版社,1969年,第65页。

15　《新观察家》杂志(*Le Nouvel Observateur*),第592期,1976年3月15日,第86页。

16　亨利·勒加姆于1983—1984年写下此文。这些关于高等师范学校时期让-保尔·萨特的回忆,是应米歇尔·贡塔的要求撰写的,当时后者正准备出版《年轻时代的作品》(*Écrits de jeunesse*)。我要特别感谢雅克·勒加姆为我提供这篇珍贵的文章,并允许我引用。

17　让·科克托(Jean Cocteau),1889—1963,法国著名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于1955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译者注。

18　勒内·马厄(René Maheu),1905—1975,从1962年起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总干事。——译者注。

19 同注16。

20 加斯托和波吕刻斯(Castor et Pollux),希腊神话中宙斯(Zeus)和莱达(Léda)所生的双胞胎。两人形影不离,共同征战。后加斯托战死沙场,波吕刻斯和他分享永恒。他们分别代表双子星座中的两颗星。——译者注。

21 国家档案馆,61AJ 251。

22 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早年从事精神病治疗工作,后来转而研究哲学。——译者注。

23 《文学消息》,1929年2月2日,第10页。

24 恩培多克勒(Empédocle),前490—约前43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据称是古希腊第一个研究修辞学的人,也是著名的医生。——译者注。

25 西蒙娜·德·波伏娃,《永别仪式》,后接《与让-保尔·萨特的谈话》,出处见前文,第166页。

26 我在《一代知识分子——两次大战之间高等师范的预备生和正式生》中已作过这种分析,出处见前文,第271页。

27 《词语》(*Les Mots*),出处见前文,第29页。

28 同上,第37页。

29 《回忆录》,出处见前文,第190页。

30 阿丽安娜·谢贝尔·德·阿波罗尼亚(Ariane Chebel d'Appollonia),《雷蒙·阿隆的道德和政治》(*Morale et politique chez Raymond Aron*),出处见前文,第21页。

31 巴黎科学院档案,国家档案馆,61AJ 2895,以及校长写于1928年8月7日的信(国家档案馆,61AJ 192)。

32 让·卡瓦叶斯(Jean Cavaillès),1903—1944,法国数学哲学家、逻辑学家,"二战"期间因参加抵抗运动而遭德寇枪杀。——译者注。

33 埃玛纽埃尔·穆尼埃(Emmanuel Mounier),1905—1950,法国哲学家、评论家,《精神》杂志的创办者,宣扬"人格主义"。——译者注。

34 《大学杂志》(*Revue universitaire*),1928年第2期,第460页。那年有78名应试者报名考试,其中22人通过初试,8人被录取。

35 达尼埃尔·拉加希的证言,《艺术》(*Arts*)杂志,1961年1月11—17日,第14页。

36 《大学杂志》(*Revue universitaire*),1929年,第2期,第362页。布瓦万和希波利特并列第三,尼赞列第四。

37　同上。

38　让·瓦尔(Jean Wahl),1888—1974,法国哲学家。——译者注。

39　《大学杂志》(*Revue universitaire*),1928年第2期,第291—299页。

40　阿尔比(Albi),法国城市,塔尔纳省(Tarn)省会。12—13世纪曾是异端教派纯洁派的活动中心。——译者注。

41　莫里斯·波蒙(Maurice Baumont),《1914年战争癖？回忆》(*Psychose de guerre en 1914？Un témoignage*),选自《1914年——战争的癖好？》(1914. *Les psychoses de guerre*？),鲁昂地区教学法资料中心、鲁昂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03—204页(1979年9月学术报告会汇编)。

42　乔治·杜梅齐尔(Georges Dumézil),1898—1986,法国宗教历史学家,法兰西公学教授,1978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译者注。

43　《我的1914年战争》(*Ma guerre de 1914*),选自《历史》杂志(*L'Histoire*),第94期,第98页。

44　让·巴尤(Jean Baillou)在不定期举行的国际法语研究协会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摘自《向让·巴尤致敬(1905—1990)》(*Hommage à Jean Baillou, 1905－1990*),非商业性手册,1993年,共119页,第22页。

吉拉尔杜(Giraldus),约1146—约1213,威尔士布雷克诺克副主教、历史学家。出身贵族,曾在巴黎受过教育。先后效力于英王亨利二世及其儿子,并随后者征讨爱尔兰。著有《爱尔兰征服史》等著作。——译者注。

45　居斯塔夫·朗松(Gustave Lanson)的报告,1927年1月27日,国家档案馆,AJ16 2895。

46　马塞尔·代阿(Marcel Déat),1894—1955,法国政治家,曾任社会党领袖和政府部长,"二战"期间是亲德分子,并参加了维希政府,战后受缺席审判,被判死刑。——译者注。

47　让·普雷沃(Jean Prévost),1901—1944,法国小说家、评论家,早年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二战"中在与德军作战时英勇牺牲。——译者注。

48　《我们的时代》(*Notre Temps*),第七年,第三套,第201—202期,1933年7月2—9日。

49　贝尔特朗·德·儒弗奈尔(Bertrand de Jouvenel),1903—1987,法国经济学家、评论作者。——译者注。

50　阿尔弗雷德·法布勒－吕斯(Alfred Fabre-Luce),1899—1983,法国政论作家。——译者注。

51 贝尔特朗·德·儒弗奈尔,《世纪的旅行者》(*Un voyageur dans le siècle*),拉封出版社(Laffon),1979年,第76页。

52 《文学消息》(*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1928年11月24日,第319期,第8页。萨特在教师资格考试失败后,曾于1928—1929学年住在大学城(国家档案馆,61AJ251)。

53 《法兰西行动报》(*l' Action française*),极右派报纸,1908年由夏尔·莫拉(Charles Maurras)等人创办,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和保王思想,"二战"期间支持维希政府,"二战"后被禁。兜售该报的小贩均为坚定的保王分子,成员主要来自莫拉的学生,这些保王分子后来组成一个政治团体,名为"法兰西行动团"。——译者注。

54 弗里吉亚,小亚细亚古地区名;弗里吉亚帽,一种红色锥形高帽,帽尖向前倾折,流行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译者注。

55 《共和大学》(*L' Université républicaine*),新版本系列,第7期,1928年4月15日,第2页。

56 德雷福斯案,1894年,法国军事当局以"出卖国防机密给德国"为罪名,判处犹太血统的军官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终身苦役,并借此掀起反犹运动,鼓吹对德战争。后来事实证明该罪名实为诬告,但当局却拒绝重审,这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导致民主力量(德雷福斯派)和反动势力(反德雷福斯派)之间的尖锐政治斗争。在舆论的压力下,1899年德雷福斯被宣告无罪,1906年复职。——译者注。

57 乔治·塞尔(Geroges Scelle),当时是左翼联盟劳动部长于斯坦·戈达尔(Justin Godard)的办公室主任。弗朗索瓦-阿尔贝(François - Albert)则是公共教育部长。

58 与作者的通信,1980年7月。

59 与作者的谈话,1981年1月23日。

60 《新观察家》杂志,1968年6月19日,后转载于《境地》(*Situations*)第8卷,伽利玛出版社,1972年,第175—192页,引文见第185页。

61 同前书,第25、26页。

62 克洛德·莱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 - Strauss),1908年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法国社会学家、人种志学家、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译者注。

63 高等师范学校社会主义研究小组的通报,1926年4月和9月(乔治·勒弗朗的档案:这两个通报各有一份被存放在国家图书馆,8°R.83425)。

64 贡多塞中学档案。

65 克洛德·莱维-施特劳斯,《忧郁的热带地区》(*Tristes Tropiques*),普隆出版社(Plon),1955年,第45页。

66　克洛德·莱维-施特劳斯第一批被正式发表的文章始于他当选为全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合会领袖的时期，他向《社会主义大学生》(*L'Étudiant socialiste*)投稿的文章除了《大会之后》(*Après le congrès*)(第三年，第8期，1928年5月)，还有他和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就"无产阶级文学"这一概念——他对此概念有异议——展开的论战(第10—11期，1928年7—8月，和第四年，第1期，1928年10月)，以及他关于"社会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思考(第五年，第1期，1929年10月)。

67　参阅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一代知识分子——两次大战之间高等师范的预备生和正式生》，出处见前文，第393—396页。

68　《回忆录》，第81和48页。

69　关于这点，这里我必须对我十多年前得出的一项研究结果进行修正。当时我发现了雷蒙·阿隆于1928年发表在《自由谈》(*Libres Propos*)上的一篇短文(《关于知识分子的背叛》，新版本系列，第二年，第4期，1928年4月20日，第176—178页)，由此我假设它是阿隆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世界报》，1982年1月17日，第12—13版)。这一假设似乎得到了雷蒙·阿隆本人的证实：在被授予以色列魏兹曼学院的名誉博士之后，他在该学院作了一个有关"知识分子和政治"的报告，就这篇文章谈了很长时间，"它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这是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帮助我回忆起来的，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我们这一代高等师范生。"(《评论》，第22期，1983年夏，第259—262页，引文见第260页。而在《回忆录》中，他的语气就没那么肯定了。同前书，第47页)此后，统计阿隆著作的学者们常常把发表在《自由谈》上的这篇文章当做雷蒙·阿隆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我在本书中提到的这篇文章，可以把雷蒙·阿隆第一次正式发表作品的时间往前推一年半。

70　是阿兰·马尼埃先生向我提供了这次调查和这篇文章的线索。为此，我在这里对他表示感谢。

71　同前书，第789—804页。雷蒙·阿隆的文章在第789—794页。

72　朗格多克(Languedoc)，法国旧省名，位于法国南部。——译者注。

73　戈布兰(Gobelins)，巴黎一地铁站名，位于十三区。——译者注。

74　与作者的谈话(1980年11月和1981年2月)以及通信(1981年8月)。这一说法得到了师范生彼埃尔·尚蓬(Pierre Chambon)的证实，后者在1927—1928年担任社会主义大学生联合会巴黎小组的财务，他记得曾经在该联合会的名单上见到过他同校同学的名字(与作者的谈话，1980年10月)。

75　高等师范学校社会主义研究小组联系手册，1926年4月，出处见前文。

76　莱昂·勃鲁姆(Léon Blum)，1872—1950，曾在1936—1937年、1938年和

1946—1947年出任法国总理,社会党右翼领袖。——译者注

77　雷蒙·阿隆,同前书,第46—47页。关于这次讲座,参阅《一代知识分子——两次大战之间高等师范的预备生和正式生》,出处见前文,第371页。

78　同前书,特别是第41—45页、第50页、第58页、第67页和第149页。

79　《反对当局的公民的幻想与错觉》(*Prestige et illusion du citoyen contre les pouvoirs*),摘自《自由法兰西报》(*La France libre*),1941年9月,后收入《反对暴君的人》(*L'Homme contre les tyrans*),伽利玛出版社,1946年,第98—112页。

80　雷蒙·阿隆,《关于阿兰政治思想的意见》(*Remarques sur la pensée politique d'Alain*),摘自《形而上学和道德杂志》(*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第57期,1952年,第199页;《新法兰西杂志》(*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向阿兰致敬"特刊,1952年9月,第164页。

81　我们已经提到过雷蒙·阿隆前两篇正式发表的文章。第三篇正式发表的文章不比第一篇更著名(1986年,雷蒙·阿隆好友协会通过朱里亚出版社出版了雷蒙·阿隆的《著作目录》,上述两篇文章均未被该目录提及)。我曾于1988年在《一代知识分子——两次大战之间高等师范的预备生和正式生》中提到过这篇文章。

82　雷蒙·阿隆,《阿兰的影响》(*L'influence d'Alain*),《心理和生活——应用心理学杂志》(*La Psychologie et la vie. Revue de psychologie appliquée*),第三年,第1期,1929年1月,第10—11页。

83　事实上,阿隆的虔诚不如阿兰的弟子们那样强烈。比如当时,莫里斯·萨万,这位未来高师预备班的著名教师,也谈到了"永远正确的阿兰",他是这样描写他的老师的:"阿兰像一位园丁,站在一个草木茂盛的花园里;他朝快乐每天结出的果实伸出双手,讲授着幸福……"(《文学消息》,1928年11月24日,第319期,第8页)

84　《反对当局的公民的幻想与错觉》(*Prestige et illusion du citoyen contre les pouvoirs*),出处见前文。

85　见前书,第25页。

86　见前书,第41页。

87　见前书,第41和45页。

88　朱利安·格拉克(Julien Gracq),1910—　,法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评论家。——译者注。

89　朱利安·格拉克,《读的时候,写的时候》(*En lisant, en écrivant*),若塞·高尔蒂出版社(José Cortiéditeur),1980年,第187页。

90　我曾在以下两本书中给"启发者"一词下过这样的定义:《知识分子的传记

和历史:"启发者"的情况和安德烈·贝勒索尔的例子》(*Biographie et histoire des intellectuels: le cas des ' éveilleurs' et l' exemple d' André Bellesort*),摘自《原始资料——历史研究》(*Sources. Travaux historiques*),1985年第3—4期,第61—73页;《在高等教育的边缘:1925年左右的师范预备班教师》(*Aux lisières de l' enseignement supérieur: les professeurs de khâgne vers 1925*),摘自克里斯多夫·夏尔(Christophe Charle)和雷吉娜·费雷(Régine Ferré),《19和20世纪法国的高等教育工作人员》(*Le Personnel de l' enseignement supérieur en France aux XIXe et XXe siècles*),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出版社(Éditions du CNRS),1985年,第111—129页。

91　以下研究在《一代知识分子——两次大战之间高等师范的预备生和正式生》的第八章中得到了大量阐述和论证,出处见前文;我同样有机会在《阿兰和他的自己人——知识界的社交性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Alain et les siens. Sociabilité du milieu intellectuel et responsabilité du clerc*)一文中简要地提到了阿兰的社会环境。该文刊登于《法国政治科学杂志》(*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1988年4月,第272—283页。

92　比如《战神或受审判的战争》,1921年发行了3 300本,1926年底只卖出了1 769本,直到1936年才第一次重印,印数为2 200本(资料来源:伽利玛出版社)。至于《自由谈》,即使在最好的时候,它的发行量也只是介于500—1 200份之间(参阅《一代知识分子——两次大战之间高等师范的预备生和正式生》,出处见前文,第432页)。

93　路易·阿尔杜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法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译者注。

94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法国医生和心理分析家。——译者注。

95　约瑟夫·保尔-邦古(Joseph Paul-Boncour),1873—1972,法国政治家,"二战"前曾历任国联常任代表、政府总理和部长等职。——译者注。

96　《欧洲》(*Europe*),1927年4月20日。继第一批签名者之后,5月和6月,又有新的师范生和预备班学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特别是克洛德·莱维-施特劳斯。

97　维克多·巴什(Victor Basch),1863—1944,曾任法国人权协会主席。——译者注。

98　因此,几个月后,萨特和阿隆在一份致公共教育部长的请愿书上签了名,要求"法国教育界对大战所引起的问题作出真正科学的澄清"(《自由谈》,1928年7月20日)。

99　参阅《一代知识分子——两次大战之间高等师范的预备生和正式生》,出处见前文,第447—452页。

100　埃米尔·皮卡尔(Émile Picard),1856—1941,法国著名学者。——译者注。

101　国家档案馆,61AJ251。

102　国家档案馆,61AJ198。

103　同前书,第42和50页。

104　安托万·普罗斯特(Antoine Prost),《老战士和法国社会》(*Les Anciens Combattants et la société française*),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出版社(Press de la Fondation des sciences politiques),1977年,共3卷。

105　朱利安·本达(Julien Benda),1867—1956,法国小说家、评论家。——译者注。

106　朱利安·本达,《知识分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格拉塞出版社(Grasset),1927年,第225、226和230页。

107　见前书,第47页。

108　《自由谈》,1928年2月20日,第92—96页。

109　雷蒙·阿隆,《关于〈知识分子的背叛〉》(*À propos de "La Trahison des clercs"*),《自由谈》,新版本系列,第二年,第4期,1928年4月20日,第176—178页。

110　西蒙娜·德·波伏娃,《一位循规蹈矩的少女的回忆录》(*Mémoires d'une jeune fille rangée*),伽利玛出版社,1958年,第310页。

111　一种流行在学生中间的恶作剧,在容器里装满水,然后像扔炸弹一样地将它掷向别人。——译者注。

112　让-保尔·萨特,《词语》(*Les Mots*),伽利玛出版社,1964年,第207页。

113　作者同让-保尔·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谈话,1974年8—9月,1981年发表(《永别仪式》,后接《与让-保尔·萨特的谈话》,出处见前文,第476页)。

114　1939年纳粹德国人侵波兰,英法等国对德宣战,却在西线按兵不动。人们把这段历史称为"奇怪的战争"或"静坐的战争"。——译者注。

115　让-保尔·萨特,《奇怪的战争手记(1939年11月—1940年3月)》(*Les Carnets de la drôle de guerre. Novembre 1939 – mars 1940*),伽利玛出版社,1983年,第11册,1940年2月,第216页。不过,手记的第1册,即记录1939年9—10月所发生的事件的那本,出版于1995年初。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三章看到,这册手记为我们提供了萨特本人更为广泛的评论。尽管如此,手记的内容充分证明了我们的上述分析,这些分析是在手记第1册出版之前完成的,因此在分析过程中,我们还没有阅读过该手

记。

116　《亚丁·阿拉伯》的《前言》，出处见前文，第24页。

117　参阅《致加斯托和其他人的信》(*Lettres à Castor et à quelques autres*)，第1卷，(1926—1939)，伽利玛出版社，1983年，第9—39页。

118　参阅《一代知识分子——两次大战之间高等师范的预备生和正式生》，出处见前文，该书好几处都提到了萨特同学的一些证言，总的来说它们是一致的。

119　《年轻时代的作品》，出处见前文，第207和215页。

120　艾蒂安·博尔纳(Étienne Borne)对作者所作的证言，1976年2月。

121　参阅《萨特：一部由亚历山大·阿斯特律克和米歇尔·贡塔执导的影片，未删节版》(*Sartre: un film réalisé par A. Astruc et M. Contat, texte intégral*)，伽利玛出版社，1977年，第33页(该影片拍摄于1972年)。

122　西蒙娜·德·波伏娃，《永别仪式》，出处见前文，第194页。

123　同上。

124　和作者的通信，1976年2月。

125　至于阿隆，他没有加入萨特的这个圈子(比如，读者可以参阅师范生亨利·勒加姆未发表的证言，这些证言我们曾经提到过，同样也曾被引用在《年轻时代的作品》中，出处见前文，第411页，注释1)。

126　《艺术》杂志(*Arts*)，第804期，1961年1月11—17日，《出乎意料：萨特会成为"萨特"》(*Rien ne laissait prévoir que Sartre deviendrait "Sartre"*)，第14页。

127　关于恶作剧的罪魁祸首，参阅乔治·冈吉莱姆的证言，同上。

128　勒马莱区(le Marais)，巴黎的一个街区名，位于第三和第四区之间，紧靠塞纳河，有众多17和18世纪的古建筑，现为巴黎的手工业区。——译者注。

129　达尼埃尔·拉加希的证言，摘自《艺术》杂志，出处见前文。

130　乔治·冈吉莱姆的个人档案，冈吉莱姆在该讽刺剧的创作过程中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

131　莱维·布律尔(Lucien Lévy - Bruhl)，1857—1939，法国社会学家。——译者注。

132　波莫瑞(Poméranie)，波兰西北部地区名。——译者注。

133　贝迪埃(Joseph Bédier)，1864—1938，法国中世纪历史文化专家。——译者注。

134　泰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法国评论家、哲学家、历史学家。——译者注

135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档案中并没有这些文章的资料来源。关于这一点,请参阅《一代知识分子——两次大战之间高等师范的预备生和正式生》,出处见前文,第326页。

136 《康比扎上尉的悲歌》的全部歌词见《一代知识分子——两次大战之间高等师范的预备生和正式生》,出处见前文,第327—328页。

137 同上,第330页。

138 同上,第330页。

139 乔治·勒弗朗的档案。

140 乔治·勒弗朗的证言,《南郊》杂志(*Banlieue Sud*),第18期,1980年5月9日。

141 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符号》(*Signes*),伽利玛出版社,1960年,第34页。

142 《一位循规蹈矩的少女的回忆录》,第244、264和273页。梅洛-庞蒂的母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失去了在殖民地当炮兵军官的丈夫,当时她是一名护士,申报的年收入为9 900法郎,在高等师范学校1926级的学生当中,除了一位家庭年收入3 500法郎的农民儿子之外,梅洛-庞蒂的家庭年收入是最低的(国家档案馆61AJ253)。

索莱斯姆(Solesmes),位于法国萨尔特省的一个小镇。——译者注。

143 西蒙娜·德·波伏娃,《与让-保尔·萨特的谈话》,出处见前文,第329页。的确,莫里斯·梅洛-庞蒂尤其对某些"戏弄"新生的歌曲感到愤怒(他的一个同届同学彼埃尔·尚蓬的证言,和作者的谈话,1980年12月)。

144 雷蒙·阿隆,《新观察家》杂志,第592期,1976年3月15日,第86页。

145 关于这一比例的资料来源,参阅《一代知识分子——两次大战之间高等师范的预备生和正式生》,出处见前文,第264—265页。关于20世纪20年代拉丁区的情况,参阅同上,第八章。

第一部分结论
倒退着走进历史

作为知道后事的历史学家，我们无权轻易对过去说三道四，并告诉大家仅仅十年之后，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屠杀即将开始！因为，知识分子和贫民百姓一样，都是倒退着走进历史的。

因此，根据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事件来谈论萨特的无忧无虑和阿隆的和平主义，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当时，20年代行将结束，华尔街股市尚未崩溃，由此在各国引起的程度不一的经济危机也未爆发，在这种形势下，严肃的态度显得不合时宜。到处弥漫着乐观的气氛，因为在1918年以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一切都恢复到了正常状态。战争的火山似乎已经熄灭，前一次大战的熔岩好像也已彻底冷却。

然而，萨特和阿隆这一代人的悲剧恰恰在此，他们是在一个表面平静的环境中完成对政治的最初认识的。但是，历史只

是在火山口底部打了一个盹儿,以便恢复元气。它很快就会醒来,而且会因此变得更加凶暴。

第二部分
风暴中的一代

要超越历史，首先必须了解历史。

雷蒙·阿隆，《关于阿兰政治思想的意见》，
选自《形而上学和道德杂志》，第 57 期，
1952 年，第 199 页。

大约 8 点钟。我在法兰西学院，我刚刚读完侦探小说，吃完一份鲜美的四季豆煎牛排和一块奶油水果馅饼。

让-保尔·萨特，《致加斯托的信》，第 1 卷，
出处见前文，第 177 页(1938 年夏)。

萨特和阿隆出生的那一年,阿兰不无玩笑地写道:“人有两种,一种是智者,一种是历史学家。”[1] 他补充说,历史学家“总是放马后炮,这种行为于事无补,而且过于容易”。那么,难道我们应该把人类群体的变化,仅仅看成是一种毫无规则的运动吗?阿兰是肯定不会这样看待历史的。当然,我们不能把当时年轻知识分子们的和平主义思想归咎于阿兰的影响,让他承担责任。不过,那些具有阿兰思想的年轻知识分子是一代人的某种缩影,他们是在和平主义的影响下开始接触政治的。而后来,当历史的风暴来临时,和平主义的手段,有时却显得难以与某些汹涌激烈的历史时期相适应。

在这群年轻人当中,有些人和阿兰一样,他们用以对抗历史风暴的惟一法宝,就是公开游离于对历史的思索之外。只要历史继续处于沉睡——哪怕是表面上的沉睡——状态,上述这种态度就不会产生多大后果。但是,历史在这十年中觉醒了,它使这群知识分子中的某些人,变得如同被突然抛到水面的奇怪的两栖动物,因此,他们无法调节自己的视觉,看清周围正在发生的历史。因为,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历史只是打了个盹,稍事休息了一下。阿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早早完成了他的觉醒,这种觉醒可以用他20年后所写的一句话来概括:“要超越历史,首先必须了解历史。”

阿隆的这种变化将在20世纪30年代初很快地完成。至于萨特,他和历史的关系仍然不清楚。

注:

1　阿兰,《洛里昂手记》(Cahiers de Lorient),第2卷,伽利玛出版社,1964年,第176页。

洛里昂(Lorient),法国城市,位于布列塔尼的莫尔比昂省。——译者注。

第二章
历史的觉醒

20世纪20年代行将结束，高等师范学校时代那绿色的天堂也随之远去。1929年秋，萨特在他的"小朋友"的劝告下，去气象部队服役。而他在圣－西尔军校[1]的教官正是雷蒙·阿隆，后者已当了一年的兵。那时，萨特更感兴趣的不是如何使用风速表，而是在"上课时朝教官投掷用纸折成的短箭"[2]，以此来戏弄他。

亲社会主义的年轻知识分子

当时，那位被萨特的短箭当做靶子的人仍然倾向于社会主义。关于这一点，《回忆录》里并无明确的阐述。雷蒙·阿隆只是在书中说，他从德国回来后，一直把自己看成是"左派分子"[3]。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年富力强的时代》里间接但更明确地证实了这一点，她把30年代初的阿隆描写成社会主义者。[4]有一篇文章也许能

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这个问题。在1931年1月的《自由谈》上,雷蒙·阿隆发表了一篇关于亨利·德·曼[5]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的读书报告。当时,这位获得了哲学教师资格的年轻人正在科隆工作,他认为,社会主义应该"重新成为一种精神现实","它的最高职责是把价值标准和人类本身从灾难之中拯救出来",同时,它还应该"通过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工人协会,阻止新的战争爆发"。[6]这份读书报告非常珍贵,何况它也许是阿隆第一篇公开发表并且提到他未来作品两个中心主题的文章之一,这两个中心主题分别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工业文明。

因此,这篇文章是阿隆对马克思主义最早的反驳,他同后者的对话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不过,当时他的用词肯定要比后来平和得多。的确,"已经枯竭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伪严密,并不比小资产阶级或美学的、业余爱好或激进民主的改良主义的呆板乏味好多少",但是,"像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哲学或社会学体系,即使有朝一日它过时了,也不会仅仅是一种历史的现象。作为一种卓有成效的思维方式、一个'未知领域'或崭新价值的决定性发现,它将仍然是正确的。"[7]

阿隆在文章里谈到了马克思主义,同样也对工业文明作了初步的反思,这种反思和他后来的《工业社会18讲》相差甚远。他当时写道,社会主义应当以"反对'未来生活的舞台'"为己任,"换言之,它应当阻止'工业文明'摧毁所有真正的文明"。在结论部分,雷蒙·阿隆重新提到了伯特兰·罗素[8]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也曾被亨利·德·曼引用过:"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使命,与其说是劳动者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不如说是人类反对工业文明的斗争。"[9]

我们不能因为雷蒙·阿隆对上面这句话表面上的赞同,从而

得出过于悲观的判断：这位年轻的哲学家并不满足于抄袭别人，还时不时地写出一些和他以后的作品在思想上相互矛盾的、浮夸而庸俗的词句，就像这次一样。说得更直白一些，从他的话当中，我们一方面将会看到阿隆对工业社会早熟的兴趣，即使这种兴趣非常模糊；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我们还将看到他的一种企图，这种企图当时广泛存在于其他具有左派思想的年轻知识分子身上，它既不是要绕过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要超越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运用范围，而是要把自己的思考推向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正因如此，比利时人亨利·德·曼的著作才会吸引他。

此外，我们注意到，这篇读书报告在内容上对亨利·德·曼的著作颇有好感。在这种为把社会主义重新变为"一种精神现实"而进行的"独创思考的努力"中，亨利·德·曼的著作是"最大的综合性努力"。从这一点上说，尽管雷蒙·阿隆在 1931 年对亨利·德·曼所作的上述正面评论，和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就泽夫·斯丹海尔的著作所发表的保留意见之间，存在有 52 年的时间间隔，但两者仍有着明显的连续性。泽夫·斯丹海尔的这本著作题为《不左不右，法国的法西斯思想》，这位以色列历史学家在书中认为，亨利·德·曼的观点起到了一种决定性的引导作用，使人们的思想危险地偏向于法西斯主义。雷蒙·阿隆指出："那些被称为'计划经济鼓吹者'的团体，受到了亨利·德·曼的启发，他们既不自称也不自认为是法西斯主义者或国家社会主义者；他们试图找到一个解决世界危机和议会软弱无能的办法。"对我们来说，这一评论有两个方面很能说明问题。一方面，雷蒙·阿隆用不着替自己在 30 年代反对议会的愿望正名，他在这里为反驳泽夫·斯丹海尔的人们带来了有力的论据，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左派在思想上的确有过一种"不守旧主义"[10]，这种"不守旧

主义"希望超越马克思主义，但并不想因此而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温床。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注意到，雷蒙·阿隆和马克思主义的对话起初是善意的，但已经带有批判的成分，这种批判出自于他左派的立场，形式上属于左派的"不守旧主义"。三十多年前，让·图夏尔曾彻底揭露了这种"不守旧主义"右倾的一面，其实这一面要广泛得多。[11]

另一方面，1983年10月，贝尔特朗·德·儒弗奈尔和泽夫·斯丹海尔之间发生了一起诉讼纠纷，其间，雷蒙·阿隆曾有一次出庭作证，在法庭上，他赞扬了贝尔特朗·德·儒弗奈尔对政治的参与。雷蒙·阿隆半个世纪后对亨利·德·曼重新作出的评价表明，这种赞扬并不是他和泽夫·斯丹海尔惟一的意见分歧。他俩辩论的实质主题，其实是如何理解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泽夫·斯丹海尔认为这种批判的模式是法西斯主义的。这场发生在两位高层次知识分子之间的辩论，阐述了一种思想的连贯性，但它的结束却是悲剧性的，也是无法预料的：雷蒙·阿隆在做完证人、走出巴黎法院的时候，突然去世。那天他的出庭有着双重的意义：这首先是对贝尔特朗·德·儒弗奈尔在某种形式上的支持，尽管后者在30年代的政治参与和阿隆截然相反，但阿隆认为贝尔特朗·德·儒弗奈尔在泽夫·斯丹海尔的著作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此外，阿隆出庭的另一个意义，是他坚持和承认了自己所作的分析，并以此公开表明它们已经陈旧。因此，阿隆的出庭，不仅表明他自认为是正确的，同时也反映出他思想的严密。那一天，雷蒙·阿隆既是在众人面前也是在历史面前作证，他要求历史对自己的证言作出评判。

这里，我们又回到了阿隆的社会主义思想上。我们看到，1931年1月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的读书报告，证实了阿隆坚定的政治倾向。关于这一点，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回忆是有

根据的:30年代初,这位年轻的哲学家是一名社会主义者或亲社会主义者。他在尔后的几个月里写了一些其他的文章,这些文章的语调无可争议地证实了他的这种政治倾向。在写于1932年1月29日、发表在1932年2月的《自由谈》上的《德国书信》中,他这样总结道:"我们什么时候能重新称暴力为暴力,称法律为法律,称神圣的权利为金钱呢?用马克思主义来奴役人们的意识是令人不快的,而资产阶级政治的永恒虚伪或天真则更令人生厌。"

事实上,当时雷蒙·阿隆的确发生了一种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在另一个层面——和平主义层面——上的。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1930年—1933年他在德国度过的日子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德国:"历史又在动荡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于某些学科的高等师范生来说,去德国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学习德语的学生在乌耳姆路就学期间经常到莱茵河彼岸去,而许多哲学学生在获得教师资格之后也要去那里。从某种意义上说,自19世纪初以来,德国在欧洲一直占据着"思想法官"[12]的地位。

因此,从1893年到1894年,雷蒙·阿隆的老师之一塞勒斯坦·布格莱[13]也曾在莱茵河彼岸居住过。两年后,他把这一段经历记录在他的《一个法国学生在德国的笔记》中,并以让·布雷东的笔名发表。他在书中评论道:"我必须听许多音乐,喝许多啤酒,总之,尽一个法国人的一切可能过德国式的生活,这是我学习计划的一部分。我来这儿并非仅仅为了寻找抽象的东西。我要接触现实,顺应习惯的潮流,追随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枝末节;毕竟,这里可能是学习哲学或社会学最好的学校。"[14]但是,

这所学校在战争刚结束的一段时间里,却是法国学生可望而不可即的。比如,由于法德两国之间持续紧张的关系,以及弥漫在德国大学里对法国人的仇视,高等师范生们旅居德国的传统只是在停战十多年后才得以恢复。

半个世纪后,德语语言研究者、高等师范文科班1926届的学生皮埃尔·贝尔托写道,他1927年去柏林的时候,是"战后柏林的第一个法国学生"[15]。诚然,我们很难验证他的回忆在统计上的准确性——尽管贝尔托声明他是以自己当时的日记摘录为依据的——但这一回忆的意义却很能说明问题:法国学生赴德旅行还处在一个低潮。这种情况不止在德国首都有,在德国所有的大学里,法国学生似乎都不受欢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在1927年10月11日写给巴黎科学院院长的信中抱怨道:"情况严重,生活艰难,尤其对于那些学习德语的学生来说,他们在那里特别是在大学里,极少能赢得人们的好感。"[16]尽管如此,这封信也指出,变化正在开始。事实上,从1927年到1928年,有两位高等师范生在德国长期居留,其中之一便是皮埃尔·贝尔托,而在第二年,跨过莱茵河的学生则达到了七名。[17]

赴德留学活动直到以后的几年才重新开始。1930年,柏林法兰西学院成立。事实上,1930年6月14日的《大学信息》宣布,一个"法国大学基金会"将于8月在柏林开张,该基金会位于兰特豪期大街,可能接纳八到十名寄宿者。它的第一任会长是奥斯瓦尔德·埃斯纳,这仇教育人士在整个20年代的法德关系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幕后角色。[18]由于在外交部的档案里似乎找不到有关这个"基金会"的资料,[19]因此很难了解这所尚未成型的法兰西学院是以何种方式招收第一届学生的。法兰西学院曾隶属于巴黎科学院,后者归院长夏尔莱蒂领导。就这样,这条消息可能传遍了首都的高等教育机构,特别是高等学校。比如

我们已经看到,《大学信息》早在6月份就传出法兰西学院建立的消息,并且宣布了该学院可能设置的职位。这份报纸还明确地说:"法兰西学院的任务,首先是帮助那些可以从德国科学界获取资料(如有关德国和中欧国家历史,有关上述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教育,有关艺术和文化史的资料)或可以直接参与该国在自然科学、精确科学及其应用领域里所作努力的学者。"

1932年秋,亨利·儒尔当接替奥斯瓦尔德·埃斯纳担任法兰西学院院长,前者是高等师范学校1921级文科班的学生,因此他只比萨特和阿隆年长几岁,和他们一样,他也通过了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当时学院的官方名称是法国科学馆,亨利·儒尔当担任领导直至1939年。[20]当时,那里每年一般都有五六名学生寄宿。在到过柏林的人当中,特别有历史学家亨利·布伦斯维克和马塞尔·西蒙、德语语言学家皮埃尔·格拉庞和让·索瓦尼亚居[21]。而其他一些获奖学金的法国学生,也成天在法兰西学院的周围转悠,如洛克菲勒基金获得者勒内·加比唐[22]和弗朗索瓦·佩鲁[23]。

雷蒙·阿隆在1928年7月以优异成绩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此后他许下一个愿望,高等师范学校有关他的材料也提到了这一愿望:"去国外(般好是德国或奥地利)或梯也尔基金会工作。"[24]因此,1930年春,他刚服完兵役,就以法语辅助教师的身份去了科般大学。他在科隆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1931学年开始时,他来到柏林法兰西学院,并在那里呆了两年。

在柏林,年轻的哲学家进行了一次自我反省,这次反省影响了他以后的整个生命。以至于40年后,在法兰西公学的落成典礼课上,他还提到了这次转折:"在希特勒前时代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政治所展现出的恶魔本质,这一切都迫使我对自己、对内心的喜好作出反省。"[25]

雷蒙·阿隆和自己年轻时代"内心的喜好",特别是和被阿兰培养起来的和平主义思想的决裂,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从德国寄给《自由谈》和《欧洲》的文章,可以使我们看清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并了解引起这一过程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早在国家纳粹主义出现之前,阿隆就亲眼目睹了纳粹的崛起;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亲眼目睹了这一现象,他感到从此以后,自己进入了一个纷乱的历史时期。半个多世纪后,雷蒙·阿隆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1930年春,当我来到科隆时,我感到了汤因比[26]所说的'历史又在动荡之中'这句话的震撼力。"[27]阿隆预见到历史即将再次启动,这种预见并非是事后他自己编造出来的,也不是历史学家杜撰出来的。雷蒙·阿隆在他写于当时的文章中表达并阐明了他的这种预见,面那些文章也为他本人的书信所证实。在这位年轻的哲学家进行自我反省的过程中,他的德国之旅是决定性的,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第一封寄给《自由谈》的"德国来信"很短:"一位在国外修学旅居的年轻教师"给1930年12月的《自由谈》写了一篇17行的文章。在阿隆早期的"书信"中,一直存在着阿兰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基础是阿隆后来在《回忆录》中所称的"情感抗拒"[28]。26个月之后,阿隆仍在柏林,但他似乎已经完成了思想转变。事实上,他在《自由谈》上的最后一篇文章发表于1933年2月,在这篇文章中,他作出了不容商榷的断言:阿兰的"真理""在天与地之间飘荡"。我们有必要关注这篇文章,原因至少有三条。第一,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阿隆完成了他和"伟人"的决裂——至少是在同和平主义有关的方面——而且这种决裂公开地反映在阿兰主义者自己创办的杂志上。第二,和对阿兰主义的简单抛弃相比,这种思想转变更为深刻:就阿隆而言,这意味着从此他"要对现实,哪怕是令人厌恶的现实,作严密的思考"。阿

隆的第一个思想阶段结束了。在这里,他已经绘制了一幅成熟阿隆的全身自画像。在阿隆的全部作品中,有些话可以概述他自己的思想,而我们前面所引用的那一句恰恰属于此类。此外,那时候阿隆还不满28岁。

文章还明白无误地向我们提供了最后一个证据,以证明阿隆与阿兰主义的决裂,这也是它第三处值得注意的地方。因为雷蒙·阿隆在文章中抨击了"夏莱—冈吉莱姆论断"。1931年,贡多塞中学的哲学老师、"彻底和平主义"的支持者费里西安·夏莱发表了《毫无保留的和平》。他在书中权衡了"战争引起的罪恶"和"放弃一切战争可能引起的罪恶",并且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绝对罪恶须用绝对手段来对付;这就是彻底的和平主义,没有任何保留的和平。"作为另一种和平主义思潮——"合法和平"——的代表人物,泰奥多尔·吕依桑则鼓吹"有所保留的和平","在法律和尊严范围内的和平",以此来回击夏莱的观点。于是,《自由谈》首先在它的《文献》栏目中,重新发表了费里西安·夏莱和泰奥多尔·吕依桑的论断,以及好几篇其他人的文章,其中就有乔治·冈吉莱姆的两篇,后者非常倾向于夏莱,因为他的两篇文章中有一篇呼吁"拒绝所有国与国之间的战争"[29]。所以,雷蒙·阿隆在1933年2月表明立场,[30]也是他和阿兰主义决裂的又一次公开表达。我们知道,十几年前,乔治·冈吉莱姆也许就是那位促使阿隆接近阿兰主义的师范生。至于费里西安·夏莱,他很久以来就在和平主义的斗争中接受了阿兰主义。

因此,1933年2月,阿隆和阿兰主义的关系到此结束。此外,使和《自由谈》的合作也在那时宣告停止。[31]这有一种象征意义。阿隆宣布必须"对现实,哪怕是令人厌恶的现实,作严密的思考"的时候,正是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成为总理的时刻。历史重新开始启动,"思考"历史要求人们作出痛苦的自我反省。

此外,雷蒙·阿隆和《欧洲》杂志的合作几乎经历了同样的过程。那时候,《欧洲》的主编是让·盖埃诺[32]。在这份杂志中,整整两代人注入了他们的和平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深深地印刻在大多数编辑的心中:先是罗曼·罗兰那一代,后者在1923年负责了杂志的创刊工作;后来是盖埃诺那一代,后者从1929年1月起逐渐掌握了杂志的领导权。让·盖埃诺善于让一些尚未出名的年轻知识分子为杂志写作:保尔·尼赞的《亚丁·阿拉伯》就是首先以连载的形式,陆续发表在1930年9月至11月的杂志上的;一些高等师范生,如乔治·冈吉莱姆、乔治·弗里耶德曼[33]或艾蒂昂布勒[34]也为该杂志撰稿;玛格丽特·尤斯纳尔[35]则在该杂志上发表了《黄金兑换商》。[36]1931年2月,雷蒙·阿隆在《欧洲》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还带有阿兰和平主义的深深烙印。22个月之后,在1932年12月的那一期上,他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自己在德国度过了30年代的头几年后所作出的判断:"可惜,普遍的和平主义程式已经不合时宜了"。[37]几个月后,在1933年9月15日的那一期上,他研究了"德国的国家革命"。阿隆的另一个思想阶段开始了,从此他开始了"严密的思考"[38]。

很多迹象表明,这个阶段早在一年前也就是说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关于这点,有一份从未发表的材料十分珍贵。1932年8月,雷蒙·阿隆是蓬蒂尼[39]十天讨论会的演讲者之一。从1910年起——除了1914年至1922年期间中断过之外——每年夏天,保尔·德雅尔丹教授都要把一些来自法国国内外的知识分子聚集到他几年前买下的一座原西都修道院里。每一次为期十天的讨论会都有三个主题:文学、哲学和政治。早在1928年,也就是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几个星期以后,雷蒙·阿隆就已经和弗拉基米尔·扬凯莱维奇[40]一起,参加了主题为"时间与永恒"的讨论会。[41]1932年,讨论会预定的主题是"价值的转移"。

8月30日，雷蒙·阿隆作了一个有关法德两国比较的报告。[42]他指出，德国的"民族意识正在重新抬头"，它尤其处在一个"需要领袖"的阶段。德国人在谴责法国，"这种谴责和自由主义的谴责混为一谈"。他的结论是："必须勇敢地去接受这个世界。"

另外一个迹象表明，1932年至1933年冬天，雷蒙·阿隆已经下决心面对客观的而非理想中的世界。他在《精神》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公开声明了这一观点，指出政治要求人们"以诚实的方式去努力接受现实"[43]。因此，那时雷蒙·阿隆有好几个星期对当时的判断标准产生怀疑并加以拒绝。事实上，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写道："我既不再是左派，也不再是右派，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民族主义者，既不是激进主义者，也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不知道是否还找得到和我志同道合的人。"

当然，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些话所包含的夸张成分，这种夸张的起因是一种处在焦虑之中并且正在寻找新的基准点的思想。此外，阿隆当时仍然是一名左派。因此，他的这种焦虑是某种思想变化的反映，我们必须对这种变化作出估量，尤其要强调它可能会带来的痛苦，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方面，雷蒙·阿隆似乎受到了德国现实的直接打击，正如他在给让·盖埃诺的信中所表示的那样。我们知道，后者当时是《欧洲》杂志的主编。1931年2月15日，雷蒙·阿隆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此后他就和盖埃诺保持着书信往来。这些书信被发现后，比他的文章更有力地证明了这位年轻的哲学家从1931年春天起所感受到的深深的迷茫。[44]比如，在一封寄自科隆、未标明日期的信中——这封信可能写于1931年春天——阿隆表达了他对德国形势已经感受到的深深忧虑："当我看到法国对处在悬崖边缘的德国所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心不在焉的时候，我痛苦地感到这种建议是多么没有意义，也惊恐地觉得听天由命的思想是多么强

大:现在是不是到了停止从斜坡上下滑的时候了? 或者我们只有作绝望的尝试?"他还谴责了"那些在大白天睡觉的人"。

另一方面,要想正确估量雷蒙·阿隆在德国期间所作的自我反省有多么困难,还必须记住此前阿兰对他的影响。作为这种影响的基础,阿兰的思想正在逐渐和一个全新的、危险的现实即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相脱节。1928—1930年,朱利安·格拉克在高等师范预备班学习时,曾是阿兰的学生。也许就是他——至少从现在的角度、以回顾的眼光来看——最最清楚地指出,在一种影响力很强的思想和一个理应得到这种思想解释的世界之间,存在着这样一条很深的鸿沟。"1930年,当我们从他的班级毕业时,一个突如其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他的思想处在了尴尬的境地,一个世界开始被建立起来,它没有节制,充满暴力,拒绝阿兰所有温和的人道主义思想。也许我有点怨恨他,因为他使我把一种产生于某个特定时间和空间的思想,当做是对精神生活的永恒启迪。"[45]

的确,面对这十年的纷乱历史所带来的新的机遇和挑战,阿兰的政治观点无疑是一种产生于某个特定"时间和空间"的思想,它不足以成为人们的精神食粮。尤其是因为——就像雷蒙·阿隆在阿兰去世时所指出的那样——从1933年至1939年间,这种思想还在千方百计地试图"避免1914年那样的战争"[46],这就注定它几乎没有能力直面新的时代。朱利安·格拉克还谈到了阿兰的"反历史主义",他指出:"殖民主义、共产主义、希特勒主义、欧洲的命运、技术爆炸、世界新的平衡,这些问题都超出了他略嫌狭窄的智力范围。"[47]

不过,阿兰的影响依然十分深刻。许多阿兰的追随者都把和平主义视为一个伦理的主题,确认它有着不容置疑的绝对必要性,在这种情况下,对阿兰理论进行修正的可能性实际上微乎

其微，而操作的空间也十分狭小。惟一的变化是以终止对阿兰主义的信仰为代价的。因为阿兰在他年轻弟子们的百宝箱中，只放进了一套国家间战争与和平的理论——即使他并非有意这样做——以面对30年代与日俱增的危险，而这套理论的依据，则是他对前一次世界大战的观察。诚然，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类比来进行政治推理，这种方法超出了简单的阿兰主义的范畴，是所有人类社会的一大特征。但是，在这个具体情况下，这种政治推理被强行地灌输给了那些处于变化中的年轻知识分子，而后者的任务，有时恰恰是逆情感或集体盲从的潮流而动。

此外，阿兰自称对历史抱有一种迟疑的态度，并且把这种态度传染给了他年轻的学生们，这使他们很难形成一种阿兰主义的世界观：从1914年——或1918年，如果关于“受审判的战争”的话——以前起，大师的政治思想就是一个轮廓已被最终确定的体系，它被一成不变地传输给一些年轻人，而后者在这个思想体系形成的时候才刚刚出生。

总之，阿兰的影响可能使雷蒙·阿隆对历史产生了一种持久的轻视，或者至少是一种深刻的无知。我们看到，阿兰在1905年对“智者”和“历史学家”作出区分的时候，阿隆正好出生。这个日期游戏很有象征意义。因为阿兰在20年代中期把他对历史的迟疑态度传染给了他那些二十来岁的学生，这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无法把他的思想与现实相结合，因此，30年代阿兰的思想在两方面显得过时了。这种思想在老师的头脑里已经有20或30年的历史；然而它却被一成不变地传授给年轻人，后者在这种思想形成的时候才刚刚出生。

从此，雷蒙·阿隆在摆脱阿兰思想的同时，不单单和和平主义分道扬镳，他同样也注意到了历史在人类社会中所占的分量。这种变化是本质上的：它既给阿隆当时处于萌芽状态的哲学著

作烙上变化的印记,也从根本上扰乱了他和有关国民意识的辩论之间的关系。

让-保尔·萨特和雷蒙·阿隆在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后康德理想主义还在大学的哲学思想中占主导地位。事实上,占据着文学院哲学讲台的教师们几十年前就是在这种思想中成长起来的,特别是在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在1978年,雷蒙·阿隆是这样描写50年前盛行的情况的:"上个世纪末,埃利·阿莱维[48]和他的同代人一起起来反抗泰纳或勒南[49],他是高等师范学校的第一代学生之一,这一代学生认为哲学的历史始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依靠笛卡尔及其追随者(斯宾诺莎、马勒伯朗士[50]、莱布尼茨[51])得到更新,在康德的著作中达到顶峰,得到黑格尔的延续或——在他们看来——歪曲。作为半个世纪以后的高等师范学生,我重新看到了与此完全相同的观点;新康德主义和柏格森主义统治着教育。"[52]

从这样的环境出发,对于毕业于乌耳姆路、获得了哲学教师资格的年轻人们来说,方便的道路可以有三条:第一条,在诸如马塞尔·莫斯[53]或保尔·里韦[54]等人的影响下,向雅克·苏斯泰尔[55]学习,后者为了"远离认识论的顶峰和新康德主义平流层的稀薄空气"[56],转而从泰人种学研究;第二条,步塞勒斯坦·布格莱等大师的后尘,将科学研究的道路转向社会学;最后,像雷蒙·阿隆那样,找到一个独立的思索领域,哪怕是——正如我们以后将会看到的那样——因此而招致一部分博士论文评委的怒斥。

雷蒙·阿隆后来选择了关于历史哲学的领域。不管怎样,这表明他已经克服了阿兰对历史的迟疑态度。他在选择这一哲学方向的同时,也完成了名副其实的"信仰改变"。事实上,阿隆后来在《回忆录》中用"信仰改变"这个词,概括了1930—1933年这个在德国度过的阶段。他明确指出,自己在莱茵河彼岸的日子,

是一段“遭受打击的经历”,这段经历肯定了他的一种“直觉”:历史又重新开始了它的进程。

从此,促使这位年轻的哲学家在30年代初和阿兰老师分道扬镳的,不仅是和平主义的问题,更广泛地说,也是他和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此外,20年后,阿隆在分析“阿兰的政治思想”时,强调了这一点:“在深邃而重要的指导思想和极为简单的实践启发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我们特别应当把这种现象归咎于阿兰的方法,归咎于他不经过历史研究就把一个具体的事例直接上升为永恒或所谓永恒的思想。人们有权像阿兰那样,认为社会在本质上不比人的本性更容易变化。但是,要想表现社会的稳定性,就不能对它的多样性一无所知。要超越历史,首先必须了解历史。”[57]

了解历史。1930—1931年在科隆,特别是1931—1933年在柏林,雷蒙·阿隆又一次成为历史重新启动的最佳见证。他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历史的纷乱区域,看到了纳粹主义的崛起,这使他在人们意识到希特勒1933年后所作的无礼要求和挑衅之前,就很快地同和平主义决裂了:“30年代初,我第一次走出法国,正是这个时候,我发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也发现了政治的可悲和自由的脆弱。”[58]从1934年起,他已经彻底完成了抛弃和平主义的转变。因为那时,雷蒙·阿隆写道:“现在,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战争的国家,将不再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59]在这个动荡已经初露端倪的时代,了解历史,意味着思考战争。从此,雷蒙·阿隆决心把战争看做一种手段。

对于阿隆来说,与和平主义的决裂,以及随之而来的可能是痛苦的自我反省,并不仅仅表现在他对国际形势所作的分析的变化上。更广泛地说,它们还表现在他的政治态度的转变上,而这种转变正是由上述决裂和反省引起的。因为从本质上说,和

平主义是一种舆论现象,它更多地是口号而不是行动,因此,它并不一定会对某一事件产生影响。而正是由于阿隆意识到和平主义无法影响历史的进程,他现在才会认为,知识分子的分析只有从伟大神圣事业的云端上重新走下、扎根于历史进程的土壤之中,他对政治的参与才会成为行动。

30年代初,雷蒙·阿隆找到了他脱胎换骨的道路,这既不是他自己晚年时的杜撰,也不是他的思想转变的历史再现,这种转变也许是十分缓慢和模糊的,而且可能延续了好多年。正是阿隆在德国的所见所闻以及历史通过这些所见所闻给予他的震撼,使他达到了他所追求的"参与政治的观众"的境界,这一境界只是在表面上显得自相矛盾。的确,雷蒙·阿隆的哲学思想在那个时期开始发展,这种发展和马克斯·韦伯将要在其中所占据的地位有着相同的方向:"参与政治的观众"其实是"具有责任感的公民"的形象说法。然而,阿隆在此之前就感受到了历史的震撼,我们甚至可以问,如果他的自我反省不是在那个时期进行的话,那么韦伯对他的影响是否还会那么深刻。阿隆的思想远非产生于虚无,它是扎根于历史的。然而,这并不意味他的思想有明确的产生时间,因为确切地说,一个人的态度和原则来自于他个人的经验,这些态度和原则仅仅超越了它们的萌芽时期。在德国的那些年里,雷蒙·阿隆不再天真。一方面,他意识到历史常常是悲剧性的,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对它过于轻信。所以,这种观点所暗含的意思,就是选择行动。阿隆的第一批文章经常反映出和空喊决裂的思想。我们应该从这个观点来理解"参与政治的观众"这种说法,因为这种说法经常被错误地理解为是对象牙塔的称颂。观众是指那些有意识地关注周围世界的人,而不是那些用自己漠不关心的眼光随随便便地俯瞰世界或那些只满足于对世界冷嘲热讽的人。因此,出于这个目的而关注和思

考世界，这就是对政治的参与。在公众面前发表经过论证的言论，这就叫行动。从那时起，雷蒙·阿隆以他自己的方式，成为一名积极参与政治的人物，并且在一些他所信得过的杂志上评论当时的历史。

另一方面，阿隆浸没在历史之中，这也使他意识到了社会关系。的确，预备班和高等师范学校是两个受到保护的地方，那里可能会有城市喧嚣的回声，也可能使人参与政治，但它们仍然是两个世外桃源。在30年代，让-保尔·萨特以自己的方式，继续着这种不受历史旋涡侵袭的生活，直到他被历史的脚步赶上。

柏林"假期"

当时，让-保尔·萨特在1931年春天服完了兵役，这位哲学教师资格获得者必须在一所中学任职。事实上，我们要驳斥一些人毫无根据的说法，他们称在两次大战之间，许多乌耳姆路的毕业生都被他们心目中更为显赫的命运所吸引，因此他们都想逃离法国的各类中学。事实恰恰相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学生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都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中等教育机构。以1934年——即阿隆和萨特考取乌耳姆路后十年、萨特获教师资格后五年——的高等师范学校《年鉴》为例，在登记在册的1 680个名字中，82%的人是在职或退休的国家教育机构公务员，其中有43.8%的人是高级中学教师。在高等学府任职的只占21.3%，确切地说是359人。

不管怎样，除梯也尔基金会和几个赴国外教书的职位以外，当时高等师范的毕业生都是以到中等学校任教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的。后来，到大学担任助教成了师范生们在高等学府起步的依靠，但这些助教的职位只是在十几年以后根据1942年5月13日颁布的法令设立的。[60]在1934年，只有两位高等师范学校

1924级的文科毕业生在文学院里担任教授或讲师,另有三位毕业生获奖学金在大学深造,四位毕业生去国外任职。但是这种出国教书的职位极少。让-保尔·萨特在勒阿弗尔度过了两年,继他的朋友阿隆之后,他也申请去柏林的法兰西学院。他所提交的研究计划的主题是:"精神和心理的一般关系"[61]。

两位小朋友的人生轨迹又一次交织在了一起,因为萨特的申请获得了批准,而代替他到勒阿弗尔中学担任1933—1934学年教师的,正是结束了在柏林的旅居生活的阿隆。不过,两人的对比仅此而已。因为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中,德国之行所起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看到,两人中的一个回国时,与政治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另一个看上去则几乎没有受到这一段旅居生活的影响。但是,和阿隆在柏林度过的前两年一样,萨特在柏林的这一年时间里,发生了许多历史事件:1933年1月30日,当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时,阿隆正好在德国的首都;一个月后,2月27日的国会纵火案,使纳粹头领得以颁布《人民和国家保护法》,从而获得了铲除异己的手段。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去世,从此希特勒集总统和总理大权于一身。从1933年初春到兴登堡去世的这18个月,是德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决定性时期,从时间上来说,萨特在柏林度过的1933—1934学年,正处于这一时期的中心。因此,穿行于柏林大街小巷之间的萨特,即使不是这段历史的明证,也和它发生过直接的接触。

1933—1934学年之初,萨特来到柏林的时候,的确处于"哲学上进退两难的境地"[62]。正是雷蒙·阿隆建议这位几年来一直在寻求空想的年轻思想家[63]去一次柏林,并阅读胡塞尔[64]的著作。

雷蒙·阿隆在前几年的时间里把自己淹没在魏玛共和国的文化中,[65]与他相反,让-保尔·萨特好像对使得20年代德国文

化的繁荣景象得以延续的大量作品并不感兴趣。从这一点来说，萨特和阿隆的表现似乎又一次同他们将来的作品发生了错位。萨特后来涉足的不仅是戏剧创作，还有他那个时代的文学研究，他还表现出和电影合作的一丝愿望。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德国时的活动"仅仅局限于他的学业"[66]，德国文学既不吸引他，也没有对他产生影响。尽管《恶心》的一部分是在他旅居柏林的时候写成的，但从中几乎看不到德国表现主义的痕迹。[67]至于阿隆，尽管他后来的著作和文章从不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但在当时，他却大量汲取着艺术的感觉和情感。

的确，萨特曾经憧憬过其他的感觉，他"决定体验一下德国女郎的爱情"，不管怎样，他几年后在《奇怪的战争手记（1939 年 11 月—1940 年 3 月）》里是这样承认的。[68]但是，在这方面，他的"风流梦"[69]似乎仍然没有实现，他又写道：他不得不"转而追求法国姑娘"。

除了这些平庸而间歇的风流念头之外，萨特之所以申请去柏林，是因为他希望以传统的方式接受一次思想启蒙。这种启蒙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当时并没有在国民意识方面对萨特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关于这一点，人们的回忆是一致的。比如，那时候也在德国首都的德语语言学家欧仁·絮齐尼临终时，仍然记得当时的萨特对政治毫不关心，以至于有一次在和法国驻德国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共进晚餐时，坐在大使左边的萨特自始至终一言未发。后来，同样是高等师范学校出身的弗朗索瓦－蓬塞问絮齐尼："你安排坐在我身边的人是谁？"[70]很久以后，在 1972 年拍摄的电影《萨特》中，萨特又一次坦言，他当时对政治事件几乎不闻不问。[71]

那一时期，在德国发生的事件构成了重新启动的历史的中心，同样是在德国，发生了最初的动荡。然而，虽然萨特当时身

处现场,但他的脚下既没有感到波动,也没有感到震荡。当然,这并不是一件可耻或值得抨击的事。不过,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仍然有必要对此发表自己的观点,因为11年后,萨特发表了他第一批关于政治参与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影响了好几代知识分子,也在法国的思想领域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此外,历史学家在发表观点时,还应该提醒大家萨特在柏林期间对政治麻木态度的非典型性。因为,其他一些获得哲学教师资格的年轻人也在30年代来到柏林,在那里他们却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雷蒙·阿隆当然是一个例子,但还有莫里斯·德·冈迪雅克。后者比萨特晚一年到法兰西学院,他密切而忧虑地关注着德国的形势,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正是这种持久的关注,使他明确表示了自己和平主义的立场。于是,他在1935年3月17日写了一封信给《精神》杂志:当希特勒违背《凡尔赛和约》有关限制德国军备的条款、宣布恢复义务兵役制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哲学家宣扬采取温和的态度,从内心呼唤"出现一个新的圣路易[72],他既能公开相信上帝的公正,又敢于相信和平,他会用惟一有效的武器,即彻底而无私的裁军,来回击重新武装的德国"[73]。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即使这封信的作者说这些话时对形势并没有清醒的意识,但这些话仍能帮助我们了解30年代中期柏林之行对那些年近三十的年轻知识分子们的震撼。此外,这种震撼十分强烈,以至于在柏林的所见所闻,有时会在年轻的知识分子们之间引起深刻而持久的角色互换。确切地说,阿隆和冈迪雅克就是这样。我们知道,前者20年代在乌耳姆路深受和平主义的熏陶,但他很早就转向了现实主义,在亲眼目睹了魏玛共和国的沉沦之后,他深信,从此日内瓦和洛迦诺精神所带来的短暂和平将会结束。而后者最初则充满了民族主义思想——具体说,是法兰西行动团的民族主义思想——但在接触了德国的

现实之后，他却采取了一种非常和平主义的分析态度，正因如此，他在1938年会支持慕尼黑协定。[74]

德国之行对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例子还有很多。和莫里斯·德·冈迪雅克一样，后来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勒内·马厄也是高等师范学校1925级的学生，他的例子十分说明问题，更何况，和冈迪雅克不同的是，马厄在乌耳姆路是萨特的好友，[75]是他接替了雷蒙·阿隆在科隆大学的职位，后者在1931年去了柏林。后来，马厄在1973年按其所任的职务接受了一个德国基金会授予的很高的荣誉——蒙田[76]奖，他在领奖时所作的演说中回忆道："从1931年10月到1933年6月，在科隆大学，我26—28岁。我来的时候，是正在走向没落的'白里安主义'的追随者，心中怀着所谓的洛迦诺精神，但我突然发觉它再也不能适应任何现实了。"这里，在德国度过的日子又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我来这里，是因为在乌耳姆路的高等师范学校，也就是我思想形成的地方，我和大部分同学一样，是狂热的国际主义者，因为我觉得应该支持国联，我相信和平的先决条件是法德两国的和解。我希望为这种和解贡献力量，因此我努力向我的学生们解释阿兰的《战神或受审判的战争》一书，不过在那时，这样做当然还不是时候。我在国会纵火案的那天离开了科隆大学。"[77]

纵火案发生几个月后，让-保尔·萨特来到德国。当时，纳粹制度的建立工作即将完成。因此，在柏林发生的一切，本来不仅可以使萨特感到震惊，就像缓和的国际关系——这种缓和局势是从1925年的洛迦诺会议后开始出现的——结束后，突然重新启动的历史使那些在他之前来到德国的人感到震惊一样，而且尤其可以使他对法西斯特别是对反法西斯的问题产生敏感，这个问题将成为法国知识分子们政治参与的中心问题。

事实上,在1934年2月6日以后的几个星期,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惕委员会——起初被称为反法西斯行动和警惕委员会——宣告成立,该委员会的成立宣言发表于1934年3月5日。[78]同年5月,已有2 300名知识分子在该宣言上签名,到1934年底,据委员会会刊《警惕》杂志报道,该委员会已拥有"约"6 000名成员。[79]的确,此后法国的史料表明,在法国,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比现在人们所想像的要小得多,[80]但这些史料也明确指出,这种危险意识在当时是极为重要的。当人们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存在时,反法西斯主义在一段时间里就成了左派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主要动力,并且成为他们政治观点的中心。当时,《警惕》杂志连续刊登了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惕委员会的成员名单,那些出现在名单上的名字反映出人们已经动员起来,不可否认,这种现象在左派知识分子中间相当普遍。

萨特于1934年夏回到法国,但他没有加入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惕委员会。关于这点,历史学家并无绝对把握,因为最初委员会成员名单是公开发表的,但后来,我们看到,请愿的阶段即1934年3月5日的那一阶段,逐渐向组织的阶段即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惕委员会的阶段转变。从那时起,《警惕》杂志越来越多地刊登委员会成员的人数,而不再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因此,我们不可能对参加委员会的人作彻底调查。但不管怎样,萨特的名字从未在杂志最初所刊登的成员名单上出现过,特别是后来,无论是萨特还是他的亲朋好友,都没有在任何时候提起过他曾加入该委员会,而据一些左派知识分子的回忆,能够成为该委员会的成员是一种荣誉。

因为这位年轻的哲学家可能没有参加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惕委员会而对他横加指责,这种行为是不恰当的。我们只能说萨特的这种态度额外反映了两个事实,一是柏林之行对他来说

没有任何结果，当然，这里的结果仅限于政治参与这一范畴；二是在回国后的一年里，他对涉及全体左派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斗争毫不关心，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从那以后，这种斗争不仅成了左派知识分子回忆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几乎成了他们传奇的一个组成部分。以至于1983年7月，当皮埃尔·莫鲁瓦[81]政府的发言人马克斯·加洛就左派知识分子想像中的"沉默"发起一场夏季辩论时，他在文章里提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问题作为论据："当代的纪德[82]、马尔罗、阿兰、郎之万在哪里？"[83]的确，这句话是对狭义的人民阵线时代的影射，当时，莱昂·勃鲁姆政府和左派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和频繁；同时，这句话也是对酝酿时期的人民阵线的影射，因为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来说，人民阵线正是在反法西斯斗争的环境中成立的。此外，在马克斯·加洛提到的四个人当中，有两人——即阿兰和郎之万——是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惕委员会的三位创始人中的两个。

为了更好地了解让-保尔·萨特没有加入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惕委员会的意义，我们要补充一点：和萨特一样，当时许多和他同龄的师范毕业生都在外省的中学里教书，他们参与了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惕委员会地方组织的建立工作。比如拉罗舍尔[84]中学教师、哲学家勒内·夏托，就在他所在的城市建立了这样一个组织，次年他还担任了人民联盟的省委员会主席。再如，1934年6月，已获文学教师资格、在布尔日[85]中学执教的克罗德·雅梅和他在中学、师范以及高级小学的同事们一起，致力于在该城建立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惕委员会的地方支部，同年11月，他成为该支部的总书记。不久以后，他又成为歇尔省反法西斯团结行动委员会的书记。[86]

法国有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吗?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尽管雷蒙·阿隆也去过德国,但他却同样没有加入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惕委员会。这是否意味着萨特不参加该委员会的举动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呢?不,因为确切地说,雷蒙·阿隆曾经打算加入该委员会,但由于思想观点方面的原因,他放弃了这一打算。不管怎样,他在1983年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解释的[87]:当时他拒绝“参加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惕委员会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方面,他觉得“法国不存在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另一方面,他知道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惕委员会的领导人是共产主义者和阿兰的学生,而他和上述两种人都有着深刻的分歧。当然,作为一名从事回忆工作的历史学家,我们或许应该考虑到,人的回忆是有所筛选的,而且到了晚年,他会用后人的观点看待过去。但是,我们是否能够因为这种方法论上的疑虑,而怀疑所有对历史的回忆呢?无论如何,在这个具体事件里,有两件事是肯定的:雷蒙·阿隆对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惕委员会的问题并非漠不关心;[88]而由于他和共产主义者所保持的距离,以及此后他对阿兰及其弟子的立场所持的怀疑,因此上述第二个原因似乎是可信的。[89]至于阿隆提到的第一条理由,即他觉得法国不存在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我们今天很难验证当时他这种想法的思想深度。不过,我们注意到,1934年和1935年这两年的确是阿隆开始以社会学家的眼光思索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时期。在1934—1935年间,他参加了高等师范学校一系列关于“社会危机和民族思想”的报告会。他本人论述的是德国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国家社会主义是“欧洲的灾难”,是“德国特有的产物”。[90]

的确,我们将会看到,在以后的几年里,他详细阐述了他的

思想，并使其带上了与众不同的差别，他还把对纳粹的研究纳入了“现代暴政”这一更为广泛的观点之中。但从那时候起，尽管他付出了推论遭到断章取义的代价，却还是认为有一种现象和法国的情况格格不入，并在外交和军事上对法国和欧洲构成了威胁，而不是政治模拟论和内部适应论所说的危险。因此，阿隆对他当时的感受和分析所作的回顾看来是可以接受的，这一点对于我们的分析有双重的重要意义。由此我们可以证实，这位从德国归来的年轻知识分子确实完成了他的转变。从此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超越动员的口号，甚至应该超越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他必须永远坚持一种自由的观察态度，以修正自己的信念，并在必要时改变对信念的分析。此外，我们必须注意到，在这方面，雷蒙·阿隆又一次表现出强烈而有意识的反潮流倾向。对于当时的许多左派知识分子来说，参与政治与其说是意味着继承德雷福斯派的思想以及出自于这一思想的价值，还不如说是意味着为了反对法西斯而斗争。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有一种思想分歧：许多知识分子认为，“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已经不再适应 20 世纪的巨变”，用现在的眼光看，“法国的民主传统开始出现断层”，而雷蒙·阿隆“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对此作了分析”。[91] 对于一名年轻的左派知识分子来说，要预感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何况当时反法西斯斗争几乎成了一种身份的标志，而且在知识界扩散得很快，说得更广泛一点，它充斥着当时的政治辩论。在那个全民动员反法西斯的年代，安德烈·德尔马担任了全国小学教师工会总书记，他在战后发表的“工会编年史”《街垒左边》一书中，就反法西斯问题谈到了“1934 年拥护共和的人的极大恐惧”[92]。这句话完全表达了历史学家的观点。事实上，人们相信法国国内存在着法西斯的巨大危险，这种想法逐渐在全体人民中间扩

散开来,犹如是来自同一圆心的冲击波,从此成为老百姓辩论的主题。如果我们不把历史的相似之处过分夸大的话,这种情况使人们不禁想到1789年夏天“大恐怖”的扩散,当然,两者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已不尽相同。

在阿隆的转变所引起的结果中,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此后,他的许多观点在整个一生中都不再发生变化。正如那时,他在分析法西斯在法国的变体时,似乎没有考虑群众运动和人民的愤慨一样,20年后,1983年10月的一个星期一,同样的分析方法促使他参与了以色列历史学家泽夫·斯丹海尔和贝尔特朗·德·儒弗奈尔之间的诉讼,这场诉讼我们在上文已经有所提及。他之所以这样做,并非想要挽回儒弗奈尔的名誉——后者在30年代及法国沦陷时期对政治的参与和阿隆相去甚远,阿隆是一名反法西斯主义者,后来他选择了流亡和战斗——而是为了表明,他不同意斯丹海尔对3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法国的规模及影响所作的结论。

更加通俗地说,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不管阿隆作出什么样的假设,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两位“小朋友”不加人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惕委员会的动机是截然不同的。说到底,是相反的:萨特这样做,是因为他对政治漠不关心,相反,阿隆则是在反复权衡了利弊得失之后才作出了这个决定。此外,这是一个开端,这种例子以后还会出现: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在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上,尽管两人的出发点完全对立,而且是站在相互敌对的思想立场上考虑问题的,但他们却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1934年夏,在勒阿弗尔中学度过一年之后,雷蒙·阿隆回到了巴黎。他在8月8日写信给马塞尔·莫斯:“我刚在巴黎安顿下来,布格莱聘我为资料中心的助理,这样我可以有更多时间学习。我的孩子将于下个月出生。”[93]事实上,雷蒙·阿隆担任的是

社会资料中心的秘书长[94]，该中心当时被师范生称为“资料室”。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四年，这段时间对他有着政治和思想两方面的意义。

在政治上，这所成立于1920年11月的中心，在它诞生的头十年里，是高等师范学校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之一。马塞尔·代阿曾于1920—1922年和1925—1926年两次主持该中心秘书处的工作，当时他是第三国际法国分部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资料室”成立之初，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这种倾向贯穿于以后的十年之中。1939年6月3日的《费加罗报》对此作了公开的批评：“此外，我们知道，高等师范学校是绝对自由的思想王国，然而有人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社会资料中心，在该中心，受到正式推崇的社会准则即使不是红色的，至少也是粉红色的。”《费加罗报》还补充道：“作为一名出色的哲学家，高等师范的校长既博学又正直，也许他不想有意识地去‘影响’任何人，但是，有些机构却被建立了起来……”[95]

这篇文章的矛头是指向社会学家塞勒斯坦·布格莱的。当时他是巴黎大学的教授，是他在1920年成立了“资料室”。1927年他担任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副校长，1935年起成为校长，直到他1940年去世。他曾是一名支持德雷福斯的年轻教师，一辈子都非常接近激进党，还定期为《邮报》撰写文章。问题的本质可能不在于这位亲激进党分子在“资料室”孵出了一群社会主义的小鸟，而在于他开辟了这块思想的沃土。建立“资料室”的设想是在阿尔贝·卡恩[96]的慷慨资助下得以实现的，其初衷是使年轻的高等师范生们有机会读到一些与社会问题或外国政治有关的重要著作和主要期刊，以补充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的藏书，因为这些藏书所涉及的大多是一些传统学科。起初，“资料室”的主要作用，是为师范生们日后可能进入国际劳工局或国联工作作

准备。从1926年起,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居斯塔夫·朗松认为,“资料室”是“某种类型的研讨会或实验室,在这里,哲学和历史专业的学生们学习如何搜集、归类和理解发生在当代社会和经济领域里的事件,并运用批判法的规则来掌握这门向来是十分艰难的学科”[97]。尽管“资料室”受到条件限制——它只占据高等师范学校二楼的两间房间——但它的藏书在30年代继续得到充实。正如让·斯托埃泽尔——他是一名师范毕业生,获哲学教师资格,那时在“资料室”工作——后来所写的那样,它是当时“法国最好的社会学图书馆”[98]。

雷蒙·阿隆不久就成了“资料室”的“秘书长”。[99]在那里,他不仅完成了有关历史哲学的博士论文,还进行了其他一些活动,这些活动体现了他对那些有助于分析当代世界的学科的兴趣。他开设了一门政治经济学课程,[100]并且从事社会学研究。1935年,他通过阿尔康出版社出版了《当代德国社会学》,该书的很大部分是关于马克斯·韦伯的。他还在资料中心的集体调查活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该中心利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进行一些比较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研究成果共分三卷,总题目为《财产清单》,三卷的主题分别是《社会危机和民族思想》、《经济和政治》、《中产阶级》。1937年,雷蒙·阿隆在由保尔·哈特曼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社会科学》的概论中论述“社会学”时,据到了“资料室”所进行的这一集体研究活动。[101]

除了“资料室”所占的政治重心地位——我们还是不要把这种地位普遍化为好,因为塞勒斯坦·布格莱在物色其负责人时没有排斥过任何人——之外,在那里还经常举行一些高层次的辩论,所以它也许还是阿隆深入思考纳粹德国的理想场所。其实,塞勒斯坦·布格莱非常关心那些遭纳粹驱逐、在法国避难的知识分子;因此,他的中心楼受了不少这些知识分子的著作。此外,

中心还举行一些以时事为主题的报告会,所以,1939 年 1 月,同是"资料室"成员的师范毕业生雷蒙·波兰曾就其捷克斯洛伐克之行作过一次珍贵而明确的报告。[102]

同样,雷蒙·阿隆似乎还开始了对苏联问题的思考,不过这种思考是在极不透明的环境下进行的,而且,他还必须面对那些投身于反法西斯斗争的师范生们的傲慢观点。在一次"资料室"的讲座上,发生了一件事。雷蒙·阿隆在谈到中产阶级时,顺着他的思路,指出苏联"粗暴地"践踏了"农民的财产"。和后来的实际情况相比,阿隆的这些话简直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一部分听众立刻作出了反应:阿隆遭到了他们的斥骂,报告会的主持人不得不要求反对者们遵守秩序。[103]

一位参加了选举,另一位则没有

阿隆在试着思考身边的世界,这有时也是件痛苦的事。与此同时,萨特于 1934 年回到了法国,他似乎和以前一样,对发生在眼皮底下的历史漠不关心。的确,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写道:"我们欢欣鼓舞地看到人民阵线的胜利",但她马上又说明:"萨特没有参加投票。"[104]针对萨特的弃权行为,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就事论事作分析的人,另一种是在当事人与普选之间的长远关系这一层面上作分析的人。就事论事地说,萨特的弃权,进一步证明了他当时对国家大事毫不关心。透过这个反复出现过多次的论断,我们必须指出,萨特所放弃的这次选举,在左派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给人民阵线套上了一个思想的光环,这个光环是和众多知识分子对人民阵线的支持以及后者所实行的文化政策分不开的。正如雅克·苏斯泰尔在 1936 年 6 月底强调的那样,"在我们国家里,进行着一场广泛的文化运动,它和人民阵线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同时发

生,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仅仅是这次运动的一个方面"[105]。

即使知识界和莱昂·勃鲁姆政府之间的这种相互支持被后人的回忆改变了原貌,而且被赋予了怀旧的色彩,但它毕竟是一个历史现实,至少在有关西班牙问题的争执开始前头几个月是这样。因此,我们看到,这种相互支持成了人们的一个参照点。当然,这里我们要注意避免夸大地再现这段历史,比如把知识分子说成是人民联盟惟一的基础和卫士;反之,也要避免对它作断然的否定,比如称这段历史是充满诗意的幻觉和在火山口上的舞蹈,对来自莱茵河彼岸的乌云不闻不问。但有一个事实是存在的,那时候是法国知识分子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而31岁的萨特却不在其中。十几年后,他号召人们参与政治,把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从历史的角度看,尽管当时萨特没有参与政治,但这种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早在30年代就已经普遍存在了。

此外,我们可以说,30年代中期是知识分子的时代,他们被要求对政治斗争作出新的说明,而这些政治斗争则越来越多地围绕着反共产主义和反法西斯这两大意识形态含量很高的主题展开。当时,知识分子既是发生在持不同政见的法国人之间的冷战的使者,[106]又是在两大阵营里寻求意识形态统一的思想大师,他们处于国家大事的辩论中心,既出现在前台,也躲藏在幕后。为了从历史的角度来重新定位萨特在人民阵线获胜的选举中的弃权行为,我们需要补充一点:大家在仔细观察之后就会发现,在20世纪法国左派的历史上,像1936年那样政府和知识界因思想和情感上的一致而相互支持的情况非常罕见。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左派在政治上的胜利,总是发生在其思想陷入某种低潮的时候,所以他们的胜利经常是逆思想潮流而获得的。这种情况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在左派集团内部,某一派别

的思想陷入低潮，从而使另一个与之竞争的派别从中得益并获胜；二是整个左派思想陷入低潮，从而使敌对阵营得益。比如，同第一种表现形式相对应的，是 1924 年的左翼联盟时期，那时候激进的"教师共和国"在政治上获得了胜利，然而，在年轻一代的眼里，它在思想上已经落后于更左的社会主义潮流了，比如，年轻的师范生们认为，勃鲁姆比赫里欧更有吸引力。他们特别要提醒读者，雷蒙·阿隆就是持这种观点的。第二种表现形式发生在 1981 年春天，在左派政府上台的同时，左派知识分子却陷入了一个混乱和退却的时期，他们把自己的阵地拱手让给了重新崛起的自由主义右派，而后者的领袖和保卫者正是雷蒙·阿隆。确切地说，左派政府和知识界之间这种不协调的情况，解释了人们为何如此怀念 1936 年他们相互支持的时代，也在 1983 年夏引发了一场有关知识分子和左派政府的辩论。

1936 年，萨特肯定是和一个有利于左派知识分子的历史环境擦肩而过了。然而，他的弃权行为不能仅仅用"错过机会"这种简单的话来解释，也不能用当时的环境来分析，相反，当时的环境对激情迸发和政治参与都是很有利的。我们应该从萨特的整个一生出发，考虑他和选举制度之间向来复杂的关系。关于这点，我们似乎应该说，萨特采取的是一种完全封闭的态度，这种态度持续了几十年，直到 1973 年 1 月他发表了著名文章《选举——扯蛋的陷阱》之后才告结束。不过，透过这种表面上的封闭态度，这段历史有着双重的意义。那时候，萨特似乎和民主文化及其载体"共和模式"格格不入。而这种文化和模式从本世纪初开始就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心中，构成了一种既是政治制度又是价值体系[107]的"社会生态系统"[108]，它的基础是美国历史学家斯坦利·霍夫曼所说的"共和综合体"。

因此，不能把萨特拒绝参加选举的态度归咎于"不因循守

旧”的思潮,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这种思潮主要从反自由主义的思想中汲取养料,试图在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那时,萨特的思想远远没有成为一种体系,因此它不可能和上述思潮有什么关系。他拒绝参加选举的原因很普通,因为他对资产阶级有一种本能的敌视,这种敌视的产生完全是由于19世纪的社会状况,由于像巴尔扎克或福楼拜那样风格迥异的作家的描写,当萨特和马列主义直接对话的时刻到来时,这种敌视又使他失去了平衡思想冲动的力量——即共和文化。总之,那时候,萨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唾弃,使他更接近于共产主义学说,至少在这一学说使人民联盟发生转折之前是这样!1934年6月23—25日,法国共产党全国大会在伊弗里召开,这次大会标志着上述转折的开始。会议之初,莫里斯·多列士[109]还在声明:“我们共产党人和所有资产阶级的独裁形式作斗争,即使这种独裁披着资产阶级民主的外衣。”[110]也许这句话根本没有让29岁的萨特感到震惊,也没有使萨特因此而放弃自己的矜持。

因为,我们必须再次指出,萨转的这种矜持,毋庸置疑地反映出他对1936年发生在法国的重大辩论和冒险行为没有任何好感,这也是他1936年放弃参加选举的第二个意义。不管怎样,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去推测,这至少能使大家相对地去理解西蒙娜·德·波伏娃所用的“激情”一词。此外,两年之后,面对人民阵线的垂死挣扎,萨特所表现出的某种无动于衷的态度,也反映了同样的问题。比如,1938年7月14日,让-保尔·萨特在蒙巴那斯的多姆咖啡馆,在给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信中写道:“天阴沉沉的,弥漫着可怕的共和气氛。”这里他谈到的,是他和高等师范学校的同级同学、研究英国语言文化的阿尔弗雷德·佩隆的会面,后者“刚参加完人民阵线的游行回来,衣服的扣眼上还别

着一张小红标签,上面写着'遵守誓言,执行纲领,共和的西班牙万岁'"[111]。任何一位亲眼目睹这一场面的人,肯定都会牢记1935年7月14日的熊熊烈火,以及那一天游行者所作的庄严宣誓,这一幕既是人民联盟的组成部分,也是该联盟的象征。他也许还会感到,与其说1938年7月14日那"可怕的共和"气氛是一种力量和喜悦的表现,还不如说是一个已经灭亡或行将灭亡的左派政府在故作姿态。萨特的态度是不认真的,更何况三年前,尽管他和西蒙娜·德·波伏娃没有直接参加1935年7月14日从巴士底狱到民族广场的示威游行,但他们那天还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去了巴士底狱广场。[112]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1960年,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的《一位循规蹈距的少女的回忆录》中提到了那次示威游行的口号,她举了一个例子,"枪毙拉·罗科"[113]。如果说这个名字是在当时的口号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名字之一,那么这个书写错误非常有力地证明,萨特和德·波伏娃夫妇在30年代所受到的法国左派"反法西斯"政治文化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和佩隆的会面同样也很有意义,因为当时,萨特和高等师范学校的老同学们极少往来,而恰恰在那个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政治表现出了强烈的关注。比如,1937年5月3日,在给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信中,萨特提到了尼赞,他问德·波伏娃:"你知道他曾是《今晚报》的主编吗?"1938年7月,他和"尼赞一家"共进午餐,并说他们"令人厌恶至极"[114]。1936年6月,另一名乌耳姆路的老同学、哲学教师资格获得者皮埃尔·布瓦万担任了让·泽[115]的办公室副主任。1937年5月,萨特把勒内·马厄讲的话告诉给西蒙娜·德·波伏娃听,他似乎对这些话并没有很多其他的感触:"走在拉盖泰路上,他高兴了好一阵子,因为我俩是如此相像,我们的命运似乎也是为我们度身订制的。'所以',他对我

说,'布瓦万会死于肛门癌。医生已经说他没指望了。他一周去一次办公室,只能站着,要是想坐下,只能坐半个屁股。让·泽的办公室主任将死于他自己的肛门:难道这不是他命该如此吗?'他还提到了其他人:比如尼赞等。最后他说:'啊,生命,我的老朋友,生命远比小说丰富得多。'"[116]皮埃尔·布瓦万于当年8月12日去世。即使人们知道这两位偶然相遇的高师校友所表现出的恬不知耻只不过是装模做样,他们也不会不注意到,这段对话出自于未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和一代知识分子"代表"之口。后来,他们两人的反对者借助这件事断言说,在1905年出生的那一代人当中,他俩并不是最为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现在,我们只能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那一代人的内部发生了一次大换班,一些人被推到了前台,而在此之前,这些人一直躲在幕后,特别是萨特和马厄。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对同龄人当中那些最早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这位游离于国家大事辩论之外的"小朋友"除了有时会讥讽几句,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

阿隆:"灾难"依稀可见

至于雷蒙·阿隆,他当时仍然是倾向于左派的高等师范毕业生之一。对纳粹主义的思考,使他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一种清醒而悲观的看法。他在1936年写道:"在我看来,国家社会主义是欧洲的灾难,因为它加剧了民族之间几乎宗教式的仇视。"[117]他不仅本人摆脱了阿兰的影响,而且还明白无误地对这种影响进行了谴责,他这样做的理由是:"阿兰对历史一无所知。"[118]不过,从政治观点方面来看,当时阿隆思想的连续性要大于它的变化性。1936年春,他在选举中投了人民阵线的票,所有一切都表明,在那一年和以后的几年里,他的思想一直是社会主义或亲社

会主义的。[119]因为两年后,即1938年3月26日,他在博士论文答辩的发言中,是以这样的话开始阐述自己的主要观点的:“我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者?拥有一种政治立场意味着什么?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同时,我向自己提出了上述问题。”[120]加斯东·费萨尔的回忆得到了《形而上学和道德杂志》的证实,该杂志以刻板的语言表达了差不多同样的意思,当然,它没有明确说明答辩者的政治倾向:“阿隆先生就政治选择的条件问题,介绍了他个人的想法,以此作为他主要论点的依据。”[121]

然而,在人民阵线时代过去四十多年后,雷蒙·阿隆在《参与政治的观众》中强调说,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正在逐渐消退:“我当时是一个模糊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随着我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我的社会主义思想越来越少了。”[122]这些话同样不是阿隆对过去的杜撰。我们甚至应该认为,它直接而明确地影射了雷蒙·阿隆的一篇评论文章,该文章刊登在严肃刻板的《形而上学和道德杂志》1937年10月号上。这些“关于法国经济问题的思索”,成了他安放在人民阵线经济政策的墓前、以表示其哀思的一束鲜花。在《回忆录》中,雷蒙·阿隆用了很多笔墨,来解释他当时思考的内容和倾向,对此,其他人也作了许多出色的注解。[123]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篇文章也很重要,因为作者在文章中明确定义了他自己的知识分子角色观。事实上,他抨击了那些“以维护神圣的价值为惟一目标、打着知识分子的旗号做事或自称在做事”的人;因为这些人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所以他们就会“以某种思想的支持者的身份来采取行动”。而“像德雷福斯案那样可以使人运用真理反对谬误的事件并不是会天天发生的”。显然,雷蒙·阿隆的矛头对准的是朱利安·本达!然而,他同样也表达了自己的惋惜:“信任他们的群众并不知道,其实在有关国家振兴的问题上,那些杰出的物理学家、著名的作家或显赫的人

种学家,他们(知道得)并不比马路上的普通行人多,面对重大事件,他们的反应无异于任何一个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这些话几乎不加掩饰地影射了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惕委员会的三驾马车——保尔·郎之万、保尔·里韦和阿兰。阿隆在两行之后又补充说:"为什么不允许某些知识分子充当中立的观察者呢?"[124]在这些话中,我们是否已经能够看出"参与政治的观众"的思想模式了呢?不管怎样,40年后,即1981年,雷蒙·阿隆将这篇文章视为他的"第一篇政治文章",他非但"不否认反而强调自己是该文的作者"。[125]

所有事实表明,对于雷蒙·阿隆来说,论文答辩通过之后的一年是紧张而痛苦的一年。早在1936年,他就洞察到"欧洲的灾难"似乎在加速逼近。这并不是历史学家自己的空想,也不是阿隆本人的杜撰,关于这一点的迹象是一致的。比如,1938年初秋,当捷克危机以慕尼黑协定的签署而告终时,雷蒙·阿隆在圣-克鲁的高等师范学校为学生们开设了一系列课程。他的第一课是从"对危机的思考"开始的。[126]很久以后,在一本来被公开发表的回忆作品里,他的一位学生提到了这些课程,雷蒙·阿隆在课上揭露了"纳粹的危险及其带来的战争威胁"。的确,他"很不愉快地"向学生们"指出战争很难避免"。[127]基于这种分析,年轻的教师无疑是慕尼黑协定的反对者,但在这一点上,他同样一如既往地在避免空喊和幼稚。一些慕尼黑协定的反对者认为,对德国采取强硬态度也许会带来和平,然而雷蒙·阿隆却觉得这种想法是很不诚实的。[128]那时,他的主要思想——必须思考的是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其他一切都只不过是一种诱惑——已经初露端倪。

当然,1939年3月捷克危机的再次爆发,只能进一步坚定雷蒙·阿隆的看法。也许,那时候他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和他在

高等师范的同学亨利－伊雷内·马鲁[129]所提出的一样，后者在1939年6月17日的《精神》杂志上，用亨利·达旺松的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130]，并在文章的结尾问自己：难道欧洲不正是处在"一个重大事变的前夜"吗？1939年6月17日，波兰危机发生前两个半月，在法国哲学协会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上，雷蒙·阿隆比较分析了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的差异，他在报告提要[131]结尾的一句话中总结道："目前的危机将是长久的、深刻的。不管即将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会从中得到好处。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所参与的冒险没有直接和神奇的出路。从今往后，我认为，作为教师，我们可以在为拯救我们所依恋的价值而作的努力中扮演一个小小的角色。"人们强调1939年6月17日的这次学术报告会是有道理的。因为在1937—1939年之间，尽管雷蒙·阿隆还是一名左派，但他刚和滋养了他的两大左派思想进行了两次大辩论。他通过刊登在《形而上学和道德杂志》上的那篇文章，表达了他对左派的怀疑。继1934年他就反法西斯总动员的主题表现出明显的怀疑态度之后，阿隆对人民阵线的批评，使他远离了30年代后半期左派思想的两大中心。此外，1939年6月17日的这次学术报告会，是"他同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的第一次大辩论"[132]。

雷蒙·阿隆的思想脱胎于阿兰的影响，我们应当重新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他的变化。因为长期以来，他一直沉浸在和平主义"再也不要战争"的思想之中，而我们看到，这种思想同时也夹杂着对"政权"的仇视。由于这种仇视，人们在这个"充满暴政的世纪"里，无法对不同的政治制度作深刻的思考。更何况，这样的差距不仅仅涉及到那些极端的和平主义者或几位像阿兰这样的思想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爱国主义"文学的过激言论，使大家忌讳谈论德国是潜在的"危险"这样的主题。正因如此，

对纳粹主义的思考一下子就变得更困难了。这种困难是由于对“政权”的危害所作的并无多大区别的分析引起的,除此之外,人们还心照不宣地受到另一个禁忌的约束。很久以来,即使是在30年代的后半期,所有关于莱茵河彼岸所发生的事件的警示性分析,都无一例外地被视为过激。更有甚者,人们对所有令他们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欺骗性宣传”的事件,不管它们是发生在身边还是他处,都有一种本能的戒心,这种戒心远非医治盲目的良药,相反,过分的戒心经常引起另一种形式的盲目。

对和平主义的狂热和对“政权”的仇视混杂在一起——加上对历史的蔑视,比如阿兰和瓦莱里[133]把历史看成是危险的炼丹术——有时使人们作出和现实完全脱节的思考。而在30年代,由于极权制度的增多和战争危险的加大,这种思考显得十分突出。

这种与现实的脱节和在思考方面的禁忌,有时会产生奇怪的结果,比如从1939年7月29日起担任新闻局长的吉罗杜[134]的例子。不过,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来看,这个职务从未博得过知识分子的好感,这一现象十分奇特。因为在现在看来,法德两国之间的交锋,实质上完全就是吉罗杜和戈培尔[135]之间的交锋,或者说,当时的人们应该可以有这种感觉。所以,尽管吉罗杜是失败者,但这场交锋是一种象征。那么,在此情况下,为什么一位知识分子反对纳粹的参与行动,反而会失去人们的信任呢?何况其他一些值得并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也加入了这场行动,比如当时在巴黎法学院担任教授的勒内·卡森[136]。

的确,当时,特别是现在回想起来,有许多因素损害了反对纳粹的行动。即使这位新闻局长在电台的讲话不像他在《全权》一文中那么过激,但也不够自然,缺乏灵感,吉罗杜的风格变得沉重了,这似乎是因为他并不喜欢新闻局长的职务。[137]此外,他

的工作效率好像也没有得到人们的一致认同。1939 年 8 月被任命去新闻局工作的苏珊·比多认为，这种局面引起的结果是："戈培尔可以高枕无忧了。"[138]再说，戈培尔至少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是胜利者，而通常失败的一方总是首先怪罪那些曾经激励人们去夺取胜利并为此而说过一些好战和让人放心的话的人，因此，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不过，我们必须重申，对反法西斯行动的不信任，或者至少是迟疑，有时甚至在行动失败之前就已经产生了。这种不信任有点像是 1927 年反对"保尔 - 邦古法案"运动的翻版，该法案要求"在战时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在 1927 年 4 月 15 日的《欧洲》杂志上，阿兰称这是一个"疯狂的念头"，而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在 5 月 15 日的后一期杂志上，罗曼·罗兰声明道："军事法案被几个胆大包天的社会党人用'以战争换和平'的空话掩盖了起来，并于今年 3 月 7 日在法国议会被敷衍了事地投票通过，这个可怕的法案声称要实现欧洲任何一个帝国主义或法西斯专制政府都不曾敢做的事情：对整个民族进行奴役，这种奴役从一个人的摇篮时代开始，直到他走进坟墓。"

许多高等师范生在反对"保尔 - 邦古法案"的请愿书上签了字。的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当中至少有两位被枪杀（卡瓦叶斯和罗曼）、一位遭流放（巴尤）、一位"流亡伦敦"（阿隆），还有一位"游击队员"（冈吉莱姆）、几名大学抵抗运动成员（梅斯、马鲁）和一位法国解放时的共和国专员（贝尔托）。但是，我们只有牢记 20 年代关于和平主义的分析，才能想像这些深受阿兰影响的年轻知识分子在自我反省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有多大，也才能估量雷蒙·阿隆的思想变化完成得有多早。其他人只是在 20 年代的以后几年里才完成了他们的思想转变。比如乔治·冈吉莱姆，他是彻底和平主义的支持者，1922 年曾经声明

“拒绝世界上的任何战争”,但他后来却成了“抵抗运动的英雄”,这样称呼他的是雷蒙·阿隆。[139]而在1932年,在和平主义的问题上,阿隆的观点恰恰与他相反。其实,冈吉莱姆的思想变化是在20年代中期开始的,这种变化促使他在法国沦陷期间参加了地下斗争。[140]事实上,从1934年3月起,在《自由谈》上就再也见不到他的文章了,由于缺乏文字资料,我们很难再现他同和平主义决裂的过程。但不管怎样,在大战前夕,也就是说在法国被占领的紧张局势开始之前,他的思想转变已经完成。1939年,他和一位同事共同发表了《论逻辑和道德》[141]一书,该书的最后一章主要涉及“国家和国际关系”以及“战争与和平”。在书的结尾,两位作者指出:“持彻底和平主义观点的人们并不缺乏可以利用的论据,来为他们拒绝参加任何战争作辩护。”他们还列举了这些论据,并在注释中指明:“请阅读阿兰的《战神或受审判的战争》,该书有关这个问题的阐述是最为深刻的。”但是,两位作者肯定不赞同——或者说不再赞同——阿兰的分析。《论逻辑和道德》的最后两页题为“现实主义和和平主义。结论”,在这一部分中,他们明确表示了和阿兰的距离:“说到底,如果对国际问题和社会问题作一个广泛的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问题是密不可分的;战争重新恢复了它原来的本质,它是人类不同制度之间的武力斗争。尽管历史问题极为错综复杂,但相互冲突的总是政治和社会的不同组织形式,这些形式符合某个普遍的观点和人类生命的价值……这里,我们必须作出选择,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一样。”

在和平主义的问题上,无论是萨特还是克洛德·莱维-施特劳斯,他们的思想变化都不如阿隆发生得那么早。莱维-施特劳斯在1980年声称:“至于政治教育,我年轻时曾是一名和平主义者,后来我目睹了法国军队的溃败。这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使

我对自己的政治判断力产生了彻底的怀疑。"[142]归根结底，这些话和让－保尔·萨特 1961 年说的那番话颇为相似，他在回忆"奇怪的战争"时，对"战前他的无政府主义"[143]表示了懊悔。事实上，在 1939 年，萨特似乎还没有完成他的思想转变。我们将会看到，在"奇怪的战争"期间，他躲在阿尔萨斯的工事里，对自己进行了一次清醒的反省，例如，他分析了 20 年代中期以来他的"反军国主义"思想，以及《战神或受审判的战争》这本"至关重要的书"对他的影响。[144]但是，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这位下莱茵省的哈姆雷特却指出了选择的复杂性："我们是为反对什么而战？反对纳粹主义吗？一年来，法国已经被一种潜在的纳粹主义控制了，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在战前就开始了。其实，我们找不到一个能与轴心国抗衡的民主国家集团。我们不是意大利的敌人。相反，我们可能会成为苏维埃俄国的敌人。此外，今天的纳粹是什么？是《我的奋斗》吗？是罗森伯格[145]吗？是里宾特洛甫[146]吗？我们取消了议会和思想自由的民主又是什么？我们为了什么而战？为了捍卫民主吗？民主已经不复存在了……不要把这次战争的起因和我们参战的动机混淆起来，也许历史学家对战争的起因十分清楚，但是，正如我在前面指出的那样，我们参战的动机却不很明了。其实，我们必须试着把战争想像成一起事件，一个意味深长的现实，或是一种价值。而人们忘记的，正是这次特殊战争的价值。"[147]

战争，在生命中间

尽管如此，历史在战前想起了让－保尔·萨特。[148]的确，我们将会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这位哲学家的人生转折点。但是，我们不能像许多研究萨特的学者一样，单凭这种现象和前面的引述，就认为萨特在 1939 年夏以前没有发生任何思想变化。和

萨特生命中的前32个年头不同,自1937年起,历史开始对他产生影响,这种影响首先反映在他的作品中,然后直接反映在这位作家的身上。

为什么说是从1937年起呢?那一年的"头几个月里"[149],他创作了短篇小说《墙》,并发表在同年夏天的《新法兰西杂志》上;1939年,小说又被收入由五个短篇组成的同名短篇小说集里。小说的背景是西班牙内战,但是,我们当然不能仅仅以它作为推断的依据,因为它还远远比不上安德烈·马尔罗的小说《希望》[150]!再者,小说中的西班牙,与其说是一部真正参与政治的作品所发生的舞台,不如说是对生命进行反思的框架,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即将被枪决的男人的等待。不过,这并不影响萨特的作品从此开始反映历史。但那时,作家没有因此而像他在同一时期的其他作品一样,表达像"明确的政治立场"[151],这种政治立场既没有出现在那个短篇小说里,也没有出现在他对公众问题的表态中,因为萨特根本就没有表过态。

不过,历史当然在发展着。正如1938年9月捷克危机发生时他的态度所表明的那样,从此,作为一名公民,萨特逐渐被卷入了历史。关于这一点的分析,应该分两个阶段进行:萨特个人对慕尼黑协定的看法,以及他对引起该协定的危机的关注。就协定本身而言,后人关于萨特当时的立场展开了辩论,换句话说,他是慕尼黑协定的反对者还是支持者?22年后,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年富力强的时代》中,努力塑造了一个反对慕尼黑协定的萨特的形象。[152]1945年,这位哲学家在小说《延缓》的最后部分里描写了达拉第[153]回到布尔热[154]的情景,[155]这段著名的描写似乎也已经证明萨特的立场是和德·波伏娃的回忆相符的。只有一点重要的说明:这段描写完成于法国沦陷期间或法国解放的时候,[156]因此,回过头来看,所有人都是慕尼黑协定的反对

者。[157]

与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说法相反，雷蒙·阿隆在他的回忆中把萨特勾勒成慕尼黑协定的支持者，他尤其强调说："我们不能支配他人的命运。"[158]由于缺乏更加确切的资料，历史学家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但如果说澄清这一点有着珍贵意义的话，那么有关这一点的辩论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萨特和他周围的人谈论慕尼黑协定，并且就协定进行了反思。1938 年，研究萨特的历史学家第一次不再看到他的沉默，相反，他们开始比较有关萨特这个人的相互矛盾的说法——这是一个传统的问题，从今往后，萨特开始对国家大事发表自己的意见。

不过，在捷克危机期间——即 1938 年 9 月，更确切的日期不得而知——萨特给"迷人的加斯托"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让-保尔·萨特对西蒙娜·德·波伏娃讲了"一些有关形势的情况"。然后他对形势作了分析，和他以前书信中的语气和内容相比，这些分析表现出惊人的博学和绝对的清醒："这里的许多人都说(俄国)会因此而倒向德国，这并非不可能。"让-保尔·萨特似乎意识到了危险，因为他的信反缺出一种严肃和紧张的态度。

关于这一点，也许我们应该考虑保尔·尼赞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对萨特产生的影响。当时，尼赞是共产党报纸《今晚报》的国际科科长。事实上，他对捷克危机非常关注，这种关注体现在他发表于 1939 年 3 月的著作《9 月编年史》中。的确，我们已经看到，那时候两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已经有所疏远，不过萨特完全可能在 9 月间阅读了尼赞发表在《今晚报》上的文章。此外，这并不一定是因为他通过危机得出了和尼赞相同的结论，后者赞成对德国持强硬态度，因此他后来是慕尼黑协定的反对者。而萨特在致"迷人的加斯托"的信的结尾，表示了他对战争的爆发得以"延缓"的满意之情。[159]

萨特对战争的延缓之所以如此满意,还因为对他的作家生涯来说,1937—1938年是一个转折。此前,在20年代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他并没有写出许多作品,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他只是在缓慢地、经常是痛苦地酝酿着《恶心》的创作。旅居柏林时,他已经在写这部小说的第二稿了。1974年,也就是小说发表后36年,萨特对西蒙娜·德·波伏娃坦言:"《恶心》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尝试。"[160]从1923年他年轻时代的文章刊登在《无名杂志》上,到1938年4月《恶心》出版,在这段时间里,这位哲学家几乎只发表了1936年的《想像》(其实,这本著作重提了作者高等教育文凭论文的主题),和一篇于次年刊登在《哲学研究》上题为《自我超越》的文章。此后,这位小说家的创作更加贫乏。他的短篇《墙》是1937年7月发表在《新法兰西杂志》上的,而另一个短篇《卧室》——它也被收进了1939年的短篇小说集《墙》中——则于1938年1月发表在《衡量》杂志上。至于文学评论,当时他还处于摸索阶段,1938年2月,《新法兰西杂志》刊登了他的篇一篇评论。此外,正如雅克·德吉指出的那样,对于萨特来说,"1930—1936年的形势"是"以灰色为基调的",除了他在步入文坛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这种困难既表现在他的创作之中,也表现在人们对他的承认上——还有他在"步入成年时的困惑,比如工作的义务、感情的反复等"。[161]

在这一点上,《恶心》毫无疑问是一个转折点,因为这本书引起了真正的反响。它第一版印了4400册,发表的当年就首次再版,印数为3300册。[162]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安德烈·布勒东[163]前一年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疯狂的爱情》印了1800册,直到1945年再版时才重印了2200册。卡夫卡[164]的《变形记》同样如此,1938年印刷了2200册,直到1946年才再版。我们可以分析得再细致一点:确切地说,《恶心》销售了4615册,《疯狂的爱情》

540册,《变形记》1 395册。1925年,安德烈·纪德这位大作家的《伪币制造者》印刷了8 800册,第二年再版时重印了6 600册。仅仅一年工夫,让-保尔·萨特就和纪德1925年的印数打了个平手,而后者已经是一位著名作家了。

当轮到年轻作家萨特看到自己的前途逐渐明朗时,历史的天空却更加阴沉了。它抓住了步入或即将步入中年的萨特。此前,萨特和历史的关系在20年代就像处在睡梦之中,而在30年代则又显得麻木迟钝。我们看到,要想给萨特的思想觉醒列出一个精确时间表是很困难的。然而,有一个事实却越来越清楚:和人们传统的习惯想法相反,萨特的思想觉醒发生在他对周围的世界逐渐适应之后。此外,我们还应该了解——尽管这不是本书的目的——是萨特哲学思想的发展逐渐增强了他洞察历史的敏锐程度,还是30年代末蕴涵丰富的历史存在才是他最初思想变化的惟一动因?不管怎样,30年代末,萨特的思想的确发生了变化。也许人们应该部分地改变对他的看法。许多人认为,萨特是一位永远沉睡的师范生,只是在三重打击——即1940年国家的崩溃、他在战俘营里首次尝到的友爱以及出狱后所看到的处于黑暗年代之中的巴黎——的作用下,他才找到了思想转变的道路。大战来临前的那几年,战云密布,历史无所不在,以至逐渐占据了整个国际环境。人们很难摆脱历史的进程,除非他隐居山野。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将以下假设付诸讨论,来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事实上,与其说萨特当时是自觉地转向历史,不如说是历史抓住了萨特。从这一点来说,在萨特成熟的过程中,被动的成分大于主动的成分。

而且,不管怎样,这是一种迟到的成熟。事实上,萨特是和他的下一代人——也就是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30年代末大约二十来岁的那一代人——同时被历史抓住的。

比如路易·阿尔杜塞就属于那一代,1965年,后者在《拥护马克思》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从人民阵线和西班牙内战开始,它(即历史)就夺走了我们的青春,使我们通过战争记住了事实可怕的教训。它在我们的诞生之处突然出现,把我们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变成了了解阶级、阶级斗争及其机遇和风险的成年人。从它强加给我们的一些事实当中,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支持工人阶级的组织——共产党。"即使和这一代比他小十几岁的人相比,萨特的政治参与也是姗姗来迟,只是在人民阵线时代之后才开始。尽管如此,比起他的同代人来,萨特更加倾向于政治参与,至少在某些方面是这样。甚至在二战结束后,共产主义思想对他的诱惑,也促使他更加参与政治。如果作仔细分析的话,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在战前还是在战后,大部分1905级的高等师范生都不愿被共产主义思想的诱惑牵着鼻子走。[165]尽管萨特和阿尔杜塞年龄相差13岁,但他们两人之间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在二战爆发前的最后几年里完成了政治觉醒,1940年又都在战俘营受到了精神上的打击,法国解放后都被共产主义思想所吸引,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都感到有必要将自己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

那时候,30年代就要结束,世纪的子夜即将到来,路易·阿尔杜塞那一代年轻人和让-保尔·萨特那一代成年人都将面临1940年的巨大灾难。

注:

1　圣-西尔(Saint-Cyr),法国城市名,位于伊夫林省,靠近凡尔赛。1808年在该城建成了一所军校,即圣-西尔军校。——译者注。

2　西蒙娜·德·波伏娃,《年富力强的时代》,出处见前文,第37页。

3　《回忆录》,第81页。

4　《年富力强的时代》,第34页。尽管如此,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回忆部分有

误，因为她明确地说雷蒙·阿隆"注册加入了社会党"。

5　亨利·德·曼(Henri de Man)，1885—1953，比利时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曾任比利时工人党副主席和政府部长。年轻时是左派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后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决裂。——译者注。

6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出处见前文，第43和47页。

7　同上，第43和46页。

8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译者注。

9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第47页。

10　参阅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评〈建设性革命〉——20年代的不守旧主义者?》(*Note sur《Révolution constructive》. Des non－conformistes des années 20?*)，见《当代法国历史中心简报》(*Bulletin du Centre d'histoir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1985年第6期。

11　参阅让·图夏尔(Jean Touchard)，《20世纪30年代的精神：更新法国政治思想的企图》(*L'esprit des années 1930 : une tentative de renouvellement de la pensée politique française*)，选自《1789年以来法国生活中的政治倾向》(*Tendances politiques de la vie française depuis 1789*)，阿歇特出版社(Hachette)，1960年。另参阅让－路易·鲁拜·戴尔·拜尔(Jean－Louis Loubet del Bayle)，《30年代的不守旧主义者》(*Les Non－Conformistes des années 30*)，勒瑟伊出版社(Le Seuil)，1969年。

12　朱利安·弗伦德(Julien Freund)，《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法国教育出版社，1964年，第14页。另见韦尔纳先生(M. Werner)和埃斯帕涅先生(M. Espagne)，《为在法国的德国文化寻根(1750—1914)》[*La construction d'une référence culturelle allemande en France (1750—1914)*]，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年鉴，1987年，第969—992页。

13　塞勒斯坦·布格莱(Célestin Bouglé)，1870—1940，法国社会学家。——译者注。

14　塞勒斯坦·布格莱，《一个法国学生在德国的笔记》，巴黎，1896年，第4页[多米尼克·布莱尔(Dominique Bourel)引用，《20世纪法德关系的文化历史标志》(*Jalons pour une histoire culturelle des rapports entre la France et l'Allemagne au XXe siècle*)，前言，第13期，1989年5—6月，第97页及以下各页]。

15　皮埃尔·贝尔托(Pierre Bertaux)，《一个法国学生在柏林(1927年冬—1928年)》[*Un étudiant français à Berlin (hiver 1927—1928)*]，《德国杂志》(*Revue d'Allemagne*)，第14卷，第2期，1982年4—6月，第338页。

16 国家档案馆,61 AJ 202。

17 《获奖学金赴外国留学的学生总名单(1927—1931)》[*Liste générale des élèves boursiers en voyage d'études à l'étranger (1927—1931)*](出处同上)。

18 参阅雅克·巴里埃蒂(Jacques Bariéty),《鲜为人知的法德关系缔造者:奥斯瓦尔德·埃斯纳教授(1877—1936)》(*Un artisan méconnu des relations franco - allemandes: le professeur Oswald Hesnard, 1877—1936*),选自《致卡尔·斐迪南·韦尔纳的文集选》(*Recueil de mélanges offert à Karl Ferdinand Werner*),埃罗出版社(Hérault Éditions),第1—18页。

19 参阅贝尔纳·奥弗莱(Bernard Auffray),《皮埃尔·德·马尔热里》(*Pierre de Margerie*),克兰科谢克出版社(Klincksieck),1976年,第490—491页。

20 与作者的通信,1980年10月,以及《一个法国人自1933年至1939年在柏林任职的回忆》(*Souvenirs d'un Français en poste à Berlin de 1933 à 1939*),摘自《里昂科学、文学及艺术学院回忆录》(*Mémoire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belles - lettres et arts de Lyon*),第3套,第29卷,里昂,1975年,第125—137页。

21 让·索瓦尼亚居(Jean Sauvagnargues),1915— ,曾任法国外交部长。——译者注。

22 勒内·加比唐(René Capitant),1901—1970,曾任法国国民教育部长、司法部长等职。——译者注

23 弗朗索瓦·佩鲁(François Perroux),1903—1987,法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译者注。

24 国家档案馆,61 AJ251。

25 雷蒙·阿隆,《从社会学家的历史地位谈起》(*De la condition historique du sociologue*),法兰西公学,1971年第一季度,第14页。

26 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52—1883,英国早期经济史学家,社会改良主义者。——译者注。

27 《回忆录》,第55页。

28 同上。

29 《毫无保留的和平,费里西安·夏莱的论断,后接泰奥多尔·吕依桑、费里西安·夏莱、乔治·冈吉莱姆和让·勒·马塔夫的辩论,以及伯特兰·罗素和阿兰有关真正和疯狂的抵抗运动的文章》(*La Paix sans aucune réserve, thèse de Félicien Challaye, suivie d'une discussion entre Théodore Ruyssen, Félicien Challaye, Georges Canguilhem et Jean Le Mataf, et des textes de Bertrand Russel et d'Alain sur la vraie et folle Résistance*),摘自《自由

谈文献》(*Documents des Libres Propos*),第一分册,1932年。关于泰奥多尔·吕依桑以及"法律和平"运动,参阅雷米·法布勒(Rémi Fabre)的文章,《法律和平主义一例:泰奥多尔·吕依桑和法律上的和平主义运动(1887—1950)》(*Un exemple de pacifisme juridique: Théodore Ruyssen et le mouvement La Paix par le droit, de 1887 à 1950*),摘自《20世纪——历史杂志》(*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第39期,1993年7—9月号。

30　阿隆表达其立场的那篇文章的确切题目是《关于"彻底的和平主义"的思考》(*Réflexions sur le "pacifisme intégral"*)(见《自由谈》,1933年2月,第96—99页)。

31　从1933年2月的这一期起,雷蒙·阿隆再也没有在《自由谈》上发表过任何文章。除了发表于1933年12月号上的一篇关于安德烈·马尔罗的《人类的命运》的简短读书报告之外。

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01—1976,法国小说家、评论家。——译者注。

32　让·盖埃诺(Marcel, dit Jean Guéhenno),1890—1978,法国大学教师,评论作者。——译者注。

33　乔治·弗里耶德曼(Georges Friedmann),1902—1977,法国社会学家。——译者注。

34　勒内·艾蒂昂布勒(René Etiemble),1909—　,法国作家,比较文学专家。——译者注。

35　玛格丽特·尤斯纳尔(Marguerite Youcenar),1903—1987,法国及美国双重国籍女作家、评论家,用法语写作,法兰西学院的第一位女院士。——译者注。

36　帕斯卡尔·奥利(Pascal Ory),《让·盖埃诺时代的〈欧洲〉杂志(1929—1936)》[*La revue "Europe" à l'époque de Jean Guéhenno (1929—1936)*],摘自《向让·盖埃诺致敬》(*Hommage à Jean Guéhenno*),1990年讨论会报告汇编,印刷材料,第128—146页;贝尔纳·杜夏特莱(Bernard Duchatelet),《让·盖埃诺、罗曼·罗兰和〈欧洲〉杂志》(*Jean Guéhenno, Romain Rolland et "Europe"*),同上,第148—166页。

37　《欧洲》,1931年2月15日,第281—286页;1932年12月15日,第625—630页(与此同时,特别参阅1932年2月15日及1932年7月15日的那两期)。1932年12月15日后,阿隆和《欧洲》的合作几乎中断:他在1933年2月15日的那一期上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读书报告,又在1933年9月15日的那一期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但这篇文章是他和《欧洲》杂志的分手之作。

38　"追求客观的努力"并不可以因此而窒息"必要的愤慨":与人们根深蒂固的想法相反,阿隆在文章中有力地揭露了业已开始的排犹举措。他指出自己相信发生

在集中营里的那些"可怕事实"的"真实性"(注释1,第130页)。

39 蓬蒂尼(Pontigny),法国城市,位于荣纳省。——译者注。

40 弗拉基米尔·扬凯莱维奇(Vladimir Jankélévitch),1903—1985,法国哲学家。——译者注。

41 至于萨特,他从1926年起就参加了这个讨论会。

42 见乔治·居伊-格朗(Geroges Guy-Grand)在雷蒙·阿隆作报告时所做的笔记,该笔记从未被发表过(弗朗索瓦·肖贝友好地告知作者该笔记的存在,他正在撰写一篇有关蓬蒂尼十天讨论会的博士论文)。

43 雷蒙·阿隆,《一个法国年轻人致德国的公开信》(*Lettre ouverte d'un jeune Français à l'Allemagne*),摘自《精神》(*Esprit*)杂志,1933年2月,第742页。

44 这些未公开发表的书信由安妮·盖埃诺夫人(Mme Annie Guéhenno)保存,后来尼古拉·拉西纳(Nicole Racine)在他的文章《〈欧洲〉杂志和德国(1929—1936)》(*La revue Europe et l'Allemagne, 1929—1936*)的附录中发表了这些信。该文章收录在《在洛迦诺和维希之间——30年代法德文化关系》(*Entre Locarno et Vichy. Les relations culturelles franco-allemandes dans les années trente*)一书中。此书由汉斯·曼弗莱德·伯克(Hans Manfred Bock)、莱茵哈特·梅耶-卡尔库斯(Reinhart Meyer-Kalkus)和米歇尔·特莱比奇(Michel Trebitsch)主编,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出版社(Éditionsdu CNRS)出版,第2卷,第652—658页。

45 朱利安·格拉克,《读的时候,写的时候》,出处见前文,第187页。

46 雷蒙·阿隆,《阿兰与政治》(*Alain et la politique*),摘自《新法兰西杂志》(*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向阿兰致敬"特刊,1952年9月,第155—167页,引语见第164页。

47 朱利安·格拉克,《读的时候,写的时候》,第188页。

48 埃利·阿莱维(Élie Halévy),1870—1937,法国政治作家、历史学家。——译者注。

49 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法国语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评论家。——译者注。

50 马勒伯朗士(Nicolas de Malebranche),1638—1705,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译者注。

51 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译者注。

52 雷蒙·阿隆,为米歇尔·波·勃拉姆森(Michèle Bo Bramsen)的著作《埃利·阿莱

维画像》(*Portrait d' Élie Halévy*)所作的序言,该书由B·R·格鲁纳出版社(B.R.Grüner éditeur)出版,阿姆斯特丹,1978年,共8+318页,第1页。

53　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1872—1950,法国社会学家和人种学家。——译者注。

54　保尔·里韦(Paul Rivet),1876—1958,法国人类学家。——译者注。

55　雅克·苏斯泰尔(Jacques Soustelle),1912—1990,法国政治家和人种学家。——译者注。

56　雅克·苏斯泰尔,《四个太阳——一个人种学家在墨西哥的回忆和思索》(*Les Quatre Soleils. Souvenirs et réflexions d' un ethnologue au Mexique*),普隆出版社(Plon),《人类的地球》丛书(coll. Terre humaine),1967年,第19页。

57　雷蒙·阿隆,《关于阿兰政治思想的意见》(*Remarques sur la pensée politique d' Alain*),选自《形而上学和道德杂志》(*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第57期,1952年,第199页。

58　雷蒙·阿隆,《人权和政治》(*Les droits de l' homme et la politique*),在伯尔尼的演讲,1981年秋,共21页,第1页。这一主题自然也出现在雷蒙·阿隆的著作中:比如他在《历史意识的重要性》(*Dimensions de la conscience historique*)一书(普隆出版社,1961年,第31页)的开头,提到了在德国度过的"悲怆的几个月"。

59　《从良心的谴责谈起》(*De l' objection de conscience*),选自《形而上学和道德杂志》(*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第41期,1934年1月,第134页。

60　《大学杂志》(*Revue Universitaire*),1943年1—2月,第18页。

61　《1933—1934年申请赴柏林法兰西学院的学生名单》,国家档案馆,61AJ202。

62　玛丽-克里斯蒂娜·格朗戎(Marie - Christine Granjon),《雷蒙·阿隆和让-保尔·萨特的德国》(*L' Allemagne de Raymond Aron et de Jean - Paul Sartre*),摘自《在洛迦诺和维希之间——30年代法德文化关系》(*Entre Locarno et Vichy. Les relations culturelles franco - allemandes dans les années* 1930),出处见前文,第2卷,第465页。

63　参阅西蒙娜·德·波伏娃,《一位循规蹈矩的少女的回忆录》,出处见前文,第341—342页,以及《年富力强的时代》,出处见前文,第1卷,第37—38页、第50—51页;雷蒙·阿隆,《回忆录》,出处见前文,第36和38页。

64　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现代现象学的创始人。——译者注。

65　《回忆录》,出处见前文,第73页。

66　安妮·科昂-索拉尔,《萨特》,出处见前文,第150页。

67 参阅玛丽－克里斯蒂娜·格朗戎,《雷蒙·阿隆和让－保尔·萨特的德国》,第466页,以及米歇尔·贡塔,摘自让－保尔·萨特的《小说作品》(*Oeuvres romanesques*),由米歇尔·贡塔、米歇尔·里巴尔卡编订,热纳维埃夫·伊特(Geneviève Idt)和乔治·H·波埃(Georges H. Bauer)协助编订,伽利玛出版社、七星出版社(La Pléiade),1981年,第1742页。

68 《奇怪的战争手记(1939年11月—1940年3月)》,第345页。

69 玛丽－克里斯蒂娜·格朗戎,《雷蒙·阿隆和让－保尔·萨特的德国》,第466页。

70 和作者的谈话,1980年11月10日。

71 参阅《萨特:一部由A·阿斯特律克和M·贡塔执导的影片》,未删节版,出处见前文。

72 圣路易,即路易九世。——译者注。

73 节选自莫里斯·德·冈迪雅克的一封信,该信发表在埃玛纽埃尔·穆尼埃的文章《奔向战争》(*La course à la guerre*)上,摘自《精神》,第31期,1935年4月1日,第142—145页。

74 《精神》杂志,第74期,1938年11月1日,第295—299页。

75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的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两位师范生:马厄是关系亲密的小团体的成员;此外,他还是介绍萨特和波伏娃相识的人。

76 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1533—1592,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思想家和散文作家。——译者注。

77 引文见勒内·马厄的悼词,摘自《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年鉴》,1978年,第89—90页。

78 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在《知识分子与法兰西激情——20世纪的声明和请愿书》一书中全文摘抄了这份题为《致劳动者们》的宣言。该书1990年由法亚尔出版社出版,见第88—89页。在宣言上签名的有阿兰、保尔·郎之万和保尔·里韦。

保尔·郎之万(Paul Langevin),1872—1946,法国物理学家,以其有关磁性、超声波及相对论的研究而著称。——译者注。

79 《警惕》(*Vigilance*),第14期,1935年1月,第2页。关于1934年5月8日的2 300名成员这一数字,参阅《警惕》,第2期,1934年5月18日,第3页。

80 关于这点,详见皮埃尔·米尔扎(Pierre Milza),《法国的法西斯主义——历史与现状》(*Fascisme français. Passé et présent*),弗拉马里翁出版社(Flammarion),1987年。

81 皮埃尔·莫鲁瓦(Pierre Mauroy),1928— ,法国政治家,社会党人,1981—

1984 年曾任政府总理,1988—1992 年曾任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译者注。

82 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1869—1951,法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剧作家。——译者注。

83 《世界报》,1983 年 7 月 26 日星期二,第 7 版。

84 拉罗舍尔(La Rochelle),法国城市,位于大西洋之滨,是夏朗德海滨省(Charente - Maritime)的省会。——译者注。

85 布尔日(Bourges),法国城市,歇尔省(Cher)省会。——译者注。

86 关于勒内·夏托和克罗德·雅梅在地方上所担任的角色,参阅让 - 弗朗索瓦·西里奈利,《一代知识分子——两次大战之间高等师范的预备生和正式生》,出处见前文,第 605—617 页。

87 雷蒙·阿隆,《回忆录》,第 132—133 页。

88 在 1981 年 1 月 23 日和作者的一次谈话中,他主动谈到了这一点;那次谈话的主题是关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对政治的参与。

89 在 1981 年 1 月的谈话中,也就是在《回忆录》出版前两年半,雷蒙·阿隆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这两条理由,并向作者确认这些理由不是他本人基于现在立场所作的杜撰。同样,在和让 - 路易·米西卡(Jean - Louis Missika)以及多米尼克·沃尔东(Dominique Wolton)的谈话中,阿隆也简短地提到了上述两条理由,那次谈话录音和前一次谈话出自同一时期,发表在 1981 年 7 月的《参与政治的观众》上。

90 《德国———次反无产阶级的革命: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现实》(*L'Allemagne. Une révolution antiprolétarienne : idéologie et réalité du national - socialisme*)[摘自埃利·阿莱维(Élie Halévy)《其他,财产清单》(*et alii, Inventaires*),第 1 卷,《社会危机和民族思想》(*La Crise sociale et les idéologies nationales*),费利克斯·阿尔康出版社(Félix Alcan),1976 年,第 24—55 页]

91 弗朗索瓦·费莱(François Furet),《幻想的过去——20 世纪共产主义思想随笔》(*Le Passé d'une illusion. Essai sur l'idée communiste au XXe siècle*),拉封 - 卡尔曼 - 莱维出版社(Laffont - Calmann - Lévy),1995 年,第 361 页。

弗朗索瓦·费莱,1927—1997,法国历史学家,法国大革命问题专家。——译者注。

92 安德烈·德尔马(André Delmas),《街垒左边》(*À gauche de la barricade*),六边形国土出版社(*éditions de l'Hexagone*),1950 年,第 9 页。

93 引自马塞尔·富尼埃(Marcel Fournier),《马塞尔·莫斯》,法亚尔出版社,1994 年,第 642 页。

94　他接替了高等师范毕业生菲利普·施沃勃(Philippe Schwob)(参阅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副校长塞勒斯坦·布格莱1934年6月6日写给巴黎科学院院长的信,国家档案馆,AJ16 2895)。

95　马塞尔·蒂埃博(Marcel Thiébaut),《争论的温室或永恒的高等师范学校》(*Une serre pour controverses ou l'École normale éternelle*),摘自《费加罗报》,1939年6月3日。

96　阿尔贝·卡恩(Albert Kahn),1859—1936,法国工业家,文学艺术事业的资助人。——译者注。

97　居斯塔夫·朗松,《巴黎高等师范学校》(*L'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摘自《两个世界的杂志》(*Revue des deux mondes*),1926年,第527页

98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简报》(*BSAENS*),第107期,1966年12月,第11页。

99　参阅《社会资料中心:关于1936—1937学年的活动报告》(*Centre de documentation sociale. Rapport sur l'activité pendant l'année scolaire 1936-1937*),这份资料由斯苔法妮·伊斯拉埃尔(Stéphane Israël)转交给作者,伊斯拉埃尔在她的深入研究文凭论文[《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L'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et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共2卷,301+103页,里尔第三大学,1993年]的最初几页里,提到了30年代末的高等师范学校。

100　同上。

101　《法国社会科学》,第42页。

102　国家档案馆,61AJ97和98。

103　选自电影《依靠师范生自己》(*Les normaliens par eux-mêmes*),该影片1937年在乌耳姆路拍摄,由勒内·居伊-格朗(René Guy-Grand)执导,并被皮埃尔·奥布里(Pierre Aubry)和让-诺埃尔·雅纳奈(Jean-Noël Jeanneney)用在记录片《六个寻找学校的师范生》(*Six normaliens en quête d'École*)中,后者于1995年3月17日在阿尔泰电视台(Arte)播放。

104　西蒙娜·德·波伏娃,《年富力强的时代》,出处见前文,第271—272页。

105　雅克·苏斯泰尔,《活着的博物馆——赞大众文化》(*Musées vivants. Pour une culture populaire*),摘自《20世纪——历史杂志》(*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第5期,1985年1—3月,第39—53页。

106　参阅塞日·贝尔斯坦,《20世纪30年代的模拟冲突》(*L'affrontement simulé des années 1930*),摘自《20世纪——历史杂志》,第5期,1985年1—3月,第39—53页。

107　参阅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种决定因素——世纪末法国的政治文化和时间性》(*Les vingt décisives. Cultures politiques et temporalités dans la France fin de siècle*),见《20世纪——历史杂志》,第44期,1994年10—12月,第121—127页。

108　塞日·贝尔斯坦和奥迪尔·吕代尔(Odile Rudelle),见他们主编的《共和模式》(*Le Modèle républicain*)一书的前言,法国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7页。

109　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1900—1964,法国政治家,长期担任共产党总书记,曾出任政府副总理和不管部长等职。——译者注。

110　由斯蒂法妮·库图瓦(Stéphane Courtois)和马克·拉扎尔(Marc Lazar)引用,见《法国共产党史》(*Histoire du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法国教育出版社,《正义女神—历史》丛书(coll. *Thémis – Histoire*),1995年,第122页。

111　《致加斯托和其他几个人的信》,出处见前文,第1卷,第183页。

112　《年富力强的时代》,第224页(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写地名时,同样也犯了书写错误,见该书的第207页)。

113　"拉·罗科"(La Roque)系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笔误,正确的写法应为"拉·罗克"(François de La Rocque)。此人生于1885年,卒于1946年,法国政治家,法西斯组织"火十字团"(Croixde – Feu)首领。——译者注。

114　《致加斯托的信》,第1卷,出处见前文,第126和205页。

115　让·泽(Jean Zay),1904—1944,法国政治家,曾任国家教育部长。——译者注。

116　《致加斯托的信》,第127页。

117　《财产清单》,第1卷,《社会危机和民族思想》,出处见前文,第55页。

118　雷蒙·阿隆,《阿兰,我的思想史》(*Alain, Histoire de mes pensées*),《社会研究杂志》(*Zeitchrift fur Sozialforschung*),第4卷,1937年,第223页。

119　总而言之,阿隆在1936年计划写一本书,作为乔治·弗里耶德曼的丛书《社会主义和文化》(*Socialisme et culture*)的一部分[参阅帕斯卡尔·奥利,《美丽的幻想》(*La Belle Illusion*),普隆出版社,1994年,第76页]。

120　加斯东·费萨尔(Gaston Fessard)神甫的回忆。加斯东·费萨尔旁听了阿隆的论文答辩,并作了好几页的笔记(见第34页及以后各页)。见《雷蒙·阿隆的历史哲学》(*La Philosophie historique de Raymond Aron*),朱里亚出版社,1980年,第42页。

121　雷蒙·阿隆博士论文答辩的报告,见《形而上学和道德杂志》1938年7月号的《增刊》,第28—31页,引文出自第29页。这篇文章和加斯东·费萨尔的文章一起,后来被西尔薇·默絮尔(Sylvie Mesure)收入了由伽利玛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历史

哲学引论》(*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l' histoire*)的修订和注释版中。

122 《参与政治的观众》,第46页。

123 比如尼古拉·巴弗莱兹,《雷蒙·阿隆》,出处见前文,第123—126页。从更广的意义上说,30年代后期的这一段历史,在尼古拉·巴弗莱兹的著作中有了很长篇幅的阐述,在《回忆录》中也有细致的分析。为了避免重复劳动,这里我们就不多赘言了。

124 《形而上学和道德杂志》,第44卷,1937年,第793页及以后各页,引文出自第793页。

125 与作者的谈话,1981年1月23日。

126 《回忆录》,出处见前文,第147页。

127 前一句话由雷蒙·阿隆本人在他的《回忆录》(出处见前文,第744—745页)中引述。后一句话摘自让-诺埃尔·吕克(Jean - Noë Luc)和阿兰·巴尔贝(Alain Barbé),《高等师范生——圣-克鲁高等师范学校历史》(*Des normaliens. Histoire de l' 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Saint - Cloud*),国家政治科学基金出版社,1982年,第125—126页(由于引用者没有说明这两句话出自哪位高等师范生之口,因此我们无法知道它们是同一个人说的还是不同的两个人说的,也无法知道如果这些话出自两个人之口,那么这两个人的回忆是否一致。

128 与作者的谈话,1981年1月23日;另参阅《参与政治的观众》和《回忆录》两书中的多处段落。

129 亨利-伊雷内·马鲁(Henri - Irénée Marrou),1904—1977,法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130 《历史学家的忧愁》(*Tristesse de l' historien*)(转载于《20世纪——历史杂志》,第45期,1995年1—3月,第109—131页),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从阿隆的《历史哲学引论》出发,对历史进行了思考,他把阿隆说成是一个"异常聪明的男孩,但有点高傲(这仅仅是他的感觉吗?)"。

131 这份报告提要直到1946年才刊登在该协会的会刊上。后来它被转载于《马基雅维里和现代暴政》(*Machiavel et les tyrannies modernes*),德·法卢瓦出版社(De Fallois),1993年,引文出自第179页。

马基雅维里(法语为Machiavel,意大利语为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作家,主张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译者注。

132 弗朗索瓦·费莱,《幻想的过去》,出处见前文,第363页。

133 保尔·瓦莱里(Paul Valéry),1871—1945,法国诗人、评论家、戏剧作

家。——译者注。

134　让·吉罗杜(Jean Giraudoux),1882—1944,法国小说家、剧作家、评论家。"二战"前不久被任命为新闻局长,并在电台讲评时事。——译者注。

135　约瑟夫·保尔·戈培尔(Joseph Paul Goebbels),1897—1945,德国纳粹元凶之一,自1933年起担任纳粹宣传和新闻部长。——译者注。

136　勒内·卡森(René Cassin),1887—1976,法国法学家,"二战"期间在伦敦担任法国流亡政府司法局长,战后曾任政府副总理、欧洲人权法庭庭长,联合国人权宣言的发起者之一,1968年获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

137　让·吉罗杜,《大陆消息——新闻局长在电台的讲话(1939—1940)》[*Messages du Continental. Allocutions radiodiffusées du commissaire général à l'Information (1939 - 1940)*],格拉塞出版社,让·吉罗杜手记,1987年。

138　苏珊·比多(Suzanne Bidault),《回忆录》(*Souvenirs*),雷恩,西部法国出版社(Ouest - France),1987年,第23页。

苏珊·比多,法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馆女参赞。——译者注。

139　《回忆录》,出处见前文,第57页。

140　与作者的谈话,1981年5月。

141　G·冈吉莱姆和C·普拉内(C.Planet),《论逻辑和道德》(*Traité de logique et de morale*),马赛,F·罗贝尔父子印刷公司(F.Robert et Fils imprimeurs),1939年。

142　《我是什么》(*Ce que je suis*),克洛德·莱维-施特劳斯和让-保尔·昂托旺(Jean - Paul Enthoven)以及安德烈·布吉埃尔(André Burguière)的谈话,第二部分,《新观察家》杂志,第817期,1980年7月5日,第18页。这一分析在克洛德·莱维-施特劳斯看来似乎极为重要,因为在其他几次谈话中,他几乎原封不动地把这些话重复了几遍。

143　《梅洛-庞蒂生前》(*Merleau - Ponty vivant*),《现代》杂志,1961年10月,第304页。

144　1939年10月3日,《奇怪的战争手记(1939年11月—1940年3月)》,伽利玛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

145　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1893—1946,纳粹德国政治家、种族主义理论家,战后被纽伦堡法庭判处死刑并执行。——译者注。

146　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纳粹德国外交部长,战后被纽伦堡法庭判处死刑。——译者注。

147　1939年10月20日,《奇怪的战争手记(1939年11月—1940年3月)》,第

152—156 页。

148 我已经在《年轻的萨特,或对历史的冷漠》(*Le jeune Sartre, ou la non - tentation de l'Histoire*)一文中提出了这种分析,这篇短文发表在《现代》杂志 1990 年 10—12 月两期的合刊上,这期合刊是关于让 - 保尔·萨特的专刊。

149 安妮·科昂 - 索拉尔,《萨特》,出处见前文,第 171 页。

150 《希望》(*l'Espoir*)是安德烈·马尔罗 1937 年完成的名著,该书描写了西班牙内战期间反对佛朗哥独裁统治的斗争。——译者注。

151 玛丽·让·格林(Mary Jean Green)曾提到过"明确的政治立场"("Clear political position")这一说法,摘自《历史礼物中的小说——法国作家和 30 年代》(*Fiction in the Historical Present. French writers and the thirties*),新英格兰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汉诺威和伦敦,1986 年,第 244 页。

152 《年富力强的时代》,第 345 页。

153 爱得华·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1884—1970,法国政治家,激进社会党领袖,"二战"前曾历任众议员、政府部长、总理等职,对德国法西斯的侵略行为采取绥靖政策,1938 年 9 月代表法国签署了《慕尼黑协定》。——译者注。

154 布尔热(Bourget),法国地名,位于巴黎北郊。——译者注。

155 让 - 保尔·萨特,《延缓》,出处见前文,第 1133 页。

156 《延缓》(*Le Sursis*)的创作"大约花了三年时间"(同上,第 1868 页),直到 1944 年秋才完成。

157 关于萨特的这段描写所内含的意义,以及它的可靠程度——出于小说家的放纵,萨特不愿对这段描写的可靠性作出承诺——参阅伊丽莎白·杜·雷奥(Élisabeth du Réau)在《爱得华·达拉第》一书中对其他资料所作的珍贵的比较,法亚尔出版社,1993 年,第 285 页。

158 同作者的谈话,1981 年 1 月 23 日。萨特去世后,雷蒙·阿隆在 1980 年 4 月 18 日的电视节目《指责》中,就已经作了同样内容的旁证。

159 关于致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信,参阅《致加斯托和其他几个人的信》,第 1 卷,出处见前文,第 210—217 页。关于萨特和保尔·尼赞表面上疏远的关系,同上,第 126 和 204—205 页。尼赞的《9 月编年史》(*Chronique de septembre*)发表于 1939 年,1978 年由伽利玛出版社重新出版,奥利维埃·托德(Olivier Todd)作序。

160 《永别仪式》,出处见前文,第 520 页。

161 雅克·德吉(Jacques Deguy),关于《恶心》的介绍,"图书资料馆"(Foliothèque),伽利玛出版社,1993 年,第 17 和 19 页。

162　资料来源：伽利玛出版社。

163　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1896—1966，法国作家、评论家，超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和领袖之一。——译者注。

164　卡夫卡（Kafka），1883—1924，奥地利作家。——译者注。

165　参阅《一代知识分子——两次大战之间高等师范的预备生和正式生》，出处见前文，特别是第424页。

第三章
世界大战中的两位知识分子

> 战争确实将我的生命一分为二。它的确使我从青年变成了成年。同时，战争也向我揭示了我自己和世界的某些方面。[1]

> 我一辈子都受到这一经历的影响，它使我倾向于一种积极的悲观主义。从此，我不再相信历史会自己服从善良人们的理智和愿望。[2]

战争爆发后，知识分子和其他被动员的公民们一样，成天无所作为，这种现象不久被观察家们称做“奇怪的战争”。矛盾的局势常常使从军的知识分子们感到困惑。比如，1939年12月4日，马克·布洛克在给米歇尔·莫拉的信中写道：“多么奇怪的战争啊！”很快，这位《经济和社会历史年鉴》的创始人就该反思“奇怪的失败”了，这也是他在经历了1940年春那次震撼之后所写的一本书的书名。萨特那一代比他年轻

的知识分子同样也感到了这种形势的奇特性。比如，保尔·尼赞在1939年10月18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思想单纯的战士们对自己说，国家动员我，是因为战争。战争就是打仗。而我无仗可打。我得把战争的定义改一改了。"[3] 对于喜欢经常探究事物意义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其实比其他人更难以接受这种局势。马克·布洛克称这种"行为越来越不聪明了"[4]，他1939年10月8日写信给吕西安·费弗尔[5] 时说，他对自己"被如此地大材小用感到非常生气"，他还补充道："作为一个人，作为一名被郎之万及其同党称为知识分子（信中这四个字是大写）的人，我要说，我很不乐意把我的雄心彻底掩藏起来。"他在总结自己这种被大材小用的感觉时说："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非常恼火。"[6]

萨特：一个"重大变化"

对于萨特来说，"奇怪的战争"是在下莱茵省发生的。不过，就他那一代知识分子而言，大部分人的命运是共同的。他们被动员，并被分散到东线和北线的法国军队中。从那时起，他们的确被分成了几类，战场的形势、和顶头上司的关系以及个人的性格，这一切促使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来利用他们从漫长的兵营生活里偷得的片刻空闲。所有人都在"反思"。离开了里昂高等师范预备班讲台的哲学家让·拉克鲁瓦比萨特和阿隆年长几岁——他出生于1900年——他在1940年2月的《精神》杂志上，细致地描写了"从军的知识分子"的命运，这是他简短的"编年史"的题目，落款是"拉克鲁瓦中士"。[7] 当时的知识分子"第一次感到自己抛弃了身上所有矫揉造作的成分"，但他们却受到了"精神反思"的威胁。当然，对于正在服兵役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反思"并不是他们的生活所固有的，也不是他们本身的特征。不管怎样，在军营半强制性的日常生活中，知识分子们所经常体

验到的反差,比起他们在其他那些已经受到权力和等级关系支配的行当里所体会到的,要强烈得多。

从军的知识分子们背井离乡、生活艰苦,他们希望保持自己的思想活动,因此从那时起,他们写下了形式各异的笔记和日记,从思想道德的总结到自我的描写都有。比如,哲学家乔治·弗里耶德曼的《1939—1940年战争日记》就属于前一类型,作者记叙了他在一所乡村医院里所经历的"奇怪的战争",反思了"一个摆脱了苏联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作者在1930—1936年曾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明言:"这本书首先是为我自己写的,不过它是完全真实的。"[8]

让-保尔·萨特的《奇怪的战争手记(1939年11月—1940年3月)》[9](以下简称《手记》)属于后一种类型。1939—1940年冬天,这位在阿尔萨斯服兵役的哲学家把他的《手记》说得一团漆黑,无论是对于萨特著作——这些著作的某些方面在他写于当时的一些文章的字里行间有所反映——的注释者,还是对于试图阐明萨特在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觉醒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本手记都是珍贵的资料。关于萨特的觉醒,有几句话特别重要。1940年2月,萨特关注着他生命中刚刚度过的20年,他在一行文字中拐弯抹角地提到了他"对政治的漠不关心"[10]。这早就被指出过,它和西蒙娜·德·波伏娃20年后在《年富力强的时代》中所作的回忆是相吻合的:"(1940年)2月初,我去巴黎火车东站等候萨特,那个星期是在散步和交谈中度过的。萨特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局势思考了很多;他决定不再远离政治生活。他努力要把他新的道德观付诸实施,这种道德观以真实的概念为基础,要求人们自觉'接受'自己的'处境';而要做到这一点,惟一的方法就是通过参与某种行动,超越自己的处境,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态度都是建立在恶意之上的逃避、自负和欺骗。

我们看到，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11]

萨特在《手记》中的坦白本身并不令人感兴趣——我们看到，所有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令人感兴趣的是根据这些坦白所作出的推论。这里涉及到的，仅仅是萨特在其迟到的清醒之后得出的简单结论，还是一种已经在折磨他的遗憾的表示？由于缺乏充分的资料，我们现在还不能对此作出判断。萨特本人的回忆在时间上和“二战”时期相距甚远。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当莫里斯·梅洛－庞蒂去世时，萨特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评价：“我不知道当他在1939年接触到那些被他的上司们奇怪地称为‘被领导者’的人们之后，是否对普通士兵的身份感到遗憾。但是，当我看到我的上司——这些废物时，我为自己战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感到遗憾。我们必须战斗，但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把指挥权交到了这些自命不凡的蠢货手里。”[12]不过，这些话的回忆成分太多，因此我们不能对它原封不动地加以接受和分析，更何况萨特是在1961年说这些话的，此话一出口，就立刻被人引用了，因此这些话是为一个目的服务的，那就是攻击卷入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军队。因为，如果说1939年，“指挥权”是在一些“自命不凡的蠢货手里”，那么，萨特在他的文章中补充道：“我们知道，在经过了抵抗运动短暂的职位空缺之后，指挥权仍然掌握在他们手里，这正是遗成我们一部分不幸的原因。”

因此，我们很难从萨特在1940年2月所说的话当中总结出什么意义来。最为重要的是，这些话的本身证明，当时萨特已经开始了他的转变。所以，我们必须抛弃这样一种传统的观点，即萨特是在遭受了1940年春天的失败和次年冬天第十二D号战俘营的打击之后，才发现了思想转变之路的。从1936年的西班牙到1939年夏的巴黎火车东站，历史已经逐渐走进了他的生活。而1995年初，萨特写于“奇怪的战争”期间的《手记》第1卷

的出版,有力地证明了他的转变,在此之前,这种转变仅仅是一种假设。[13]

所以,我们必须纠正这样的观点,即是战争的熔炉造就了具有独立思想的新萨特。其实,战争的前兆已经促成了他转变的开始。[14]实际上,这种说法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一方面,前兆的概念意味着在30年代末,甚至在1939年9月之前,世界就进入了一个历史加速期。另一方面,即使严格地说,战争本身不是促成萨特思想转变的根本原因,但它确实扩大和加快了这种转变。因此,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它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阿隆在30年代初就看出世界进入了一个动荡的历史时期,而萨特只是在这个十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才被历史抓住,两人之间存在着完全而彻底的对比。

35岁的萨特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正处在战争中的民族的一分子,说得更贴切些,是这个民族的保卫者。对于他来说,这种意识毫无疑问地加快了他的转变过程,而在此之前,这一过程开始得相当缓慢。关于这个确切的问题,笔者的分析证实了我们曾经引用过的《年富力强的时代》中的段落,在这些段落中,西蒙娜·德·波伏娃描写了1940年2月萨特在从部队回巴黎休假的那个星期里的思想状况:“他决定不再远离政治生活。”西蒙娜·德·波伏娃和让-保尔·萨特在1939年秋和1939—1940年冬的书信往来,还有我们手头的写于同一时期的六本手记,都有力地证实了萨特的这一决定,以及促使他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政治上的觉醒。

阿隆:坦克还是笔?

萨特于1940年6月21日,即他35岁生日那天被俘。两天后,雷蒙·阿隆在圣-让-德-吕兹[15]登上了去英国的船只。对

于他来说,“奇怪的战争”同样也是一个思考和写作的时期,这种思考转向了正在发生的历史。事实上,从1937年春天起,雷蒙·阿隆就开始对马基雅维里产生了兴趣。[16]他的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国际形势的观察。通过马基雅维里,他开始对专制制度采取武力和使用谎言的现象进行思考。我们很难确定他在1939年9月之前就这个问题所写的文章。尽管如此,在“奇怪的战争”期间,他重新开始撰写关于“20世纪马基雅维里主义”的著作。在1939年11月28日写给他夫人的一封信中,他提到了已经完成的第一部分,并告诉她正在撰写第二部分:“马基雅维里主义和20世纪的政治学说”。紧接其后的还有“马基雅维里主义和专制制度”,以及“处在蛊惑人心的专制时期中的法国”。最后他说:“这项工作使我得到了充分的消遣,至少在有些日子里是这样的,军事生活中的某一突发事件不足以让我为一件蠢事花费几个小时。”[17]

阿隆的工作有了进展,大溃退开始的时候,他和萨特一样,书包里沉甸甸地装满了在等待的日子里写就的文章。雷蒙·阿隆将这份未写完的手稿交给了他在苏西-昂-布里[18]的朋友,直到解放后才收回。但是,这篇被保存起来的文章后来丢失了,只是到了1990年才重见天日,并于1993年被正式发表。[19]这篇文章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它为我们提供了雷蒙·阿隆在政治和历史思索的发展过程中所缺少的那个环节。

因此,我们是在这篇文章完成后半个多世纪才读到它的,在这篇短小的文章中,雷蒙·阿隆写道:“作为希特勒、斯大林和墨索里尼的同代人,我重读了《王子》和《论说》[20]这两篇论著,并在寻找马基雅维里主义的秘密。如果我们取这个词的庸俗意义,那么很少有哪个时代比现在更不择手段了。”[21]其实,阿隆所指的既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也是斯大林。换言之,阿隆在哈娜·

艾伦特[22]之前,就在这篇评论中,开始对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作比较了。相对于战前而言,阿隆的变化是很明显的:“在我们眼里,苏联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不仅是不择手段,它们还狡诈、欺骗、撒谎、背信弃义、谋杀。”[23]

因此,所有的一切都表明,如果说战争是雷蒙·阿隆生命中一次史无前例的“经历”——正如本章开始的题词所说的那样——并且改变了他生命的进程的话,那么,在他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战争只起到了加速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本章的题词说得十分清楚,它摘自阿隆一篇经过反复推敲的文章——《法兰西公学落成典礼课》:“从此,我不再相信历史会自己服从善良人们的理智和愿望。”

阿隆的教学经历是出色的——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第一名,33岁就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同时也是传统的。战争爆发时,这一经历刚刚有了第一个结果。1939学年开学的时候,阿隆在图卢兹大学获得了一个讲师的职位。但是,他只是在16年后、五十出头时,才走上这所学校的讲台。在此之前,战争不仅推迟了他进入大学的时间,而且还改变了他生命的轨迹。

动员令发布后,阿隆中士去了位于阿登山脉的一座气象站,在那儿,他体验了“奇怪的战争”那沉闷的几个月。德军发动进攻后,他重新试图——就像他在冬天所做的那样——使自己分配到一支坦克部队,但德军推进极快,横扫一切,因此阿隆参加战斗的愿望,只能通过不久以后流亡英国的决定来实现了。

奇怪的是,在一些关于两位“小朋友”生活的对比研究中,阿隆的这一决定经常被认为是平淡无奇甚至是自然而然的。其实,我们应该强调,在法国教育界,阿隆的行为具有特殊性,从统计资料来看,甚至是一个例外。更何况,当时的阿隆已经不再仅仅是一名年轻的知识分子,他还有家室的牵累。后者直到1943

年7月才得以和他团聚,苏珊和多米尼克·阿隆在那时来到伦敦,次年6月,艾玛纽埃尔也在那里出生。在此之前,为了保护留在大陆的亲人,阿隆理所当然是用笔名——勒内·阿沃尔——写作的。

雷蒙·阿隆在伦敦的那些年是非常著名的,何况他当时刊登在《自由法兰西报》上的文章经常受到人们的分析。对于我们来说,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问题,是阿隆为何一开始就选择了笔作为武器。1940年5月,阿隆来伦敦的时候,原先希望参加装甲部队,但他被分配负责所在部队的会计工作。这段小插曲的本身当然是令人沮丧的,不过在一段时间里,它并没有对阿隆造成什么影响。事实上,阿隆的选择是在几个星期后作出的,这次他完全根据自己的独立意愿作出了决定。1940年8月17日,安德烈·拉巴特建议阿隆到他即将创办的杂志社担任秘书。后者在考虑了三天之后,作出了同意的答复。

此后,雷蒙·阿隆好几次,尤其是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折磨他一辈子的痛苦:他选择了思想领域的战斗,而不是直接走上战场,这个决定是否正确?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无权决断。选择是由一个人的信仰决定的,所有一切表明,阿隆的这一选择是在痛苦中作出的,此后,无论在战时还是战后,他都不停地自问这一选择的正确性。不过,这里我们有必要再次提醒读者,阿隆的踌躇不应该掩盖一个重要的事实:1940年6月,他是来到伦敦的极少数大学教师——当时,讲师是教师等级中的第一级——之一。我们还特别看到,这一选择影响了他的家庭生活。另外,尽管阿隆没有手握武器直接奔赴战场,但他却直接、彻底、坚定地参加了自由法国的战斗。除此之外,我们注意到,雷蒙·阿隆仿佛在嘲讽历史,他参加了思想领域的斗争,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所承担的这一职责,在1927年曾遭到他自己和年轻的高

等师范生们的谴责,当时,他们写了一封反对“保尔-邦古法案”的请愿书。我们还记得,这封请愿书攻击的是法案第四条的最后两段话,这两段话要求“把国家在知识界的资源运用到国防上去”,更广泛地说,要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以保证国家的斗志”。1940年,雷蒙·阿隆自己选择参加了自由法国的思想总动员,换言之,从那时起直到战争胜利,自由法国一直是他的“祖国”。尽管如此,阿隆在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这一选择,确实也令人想到1927年那封请愿书的另一个侧面,它提到了“一个武装起来的民族的思想,这种思想允许公民有选择的自由”。

在伦敦的四年里,雷蒙·阿隆写了许多文章。[24]这些专题文章经常长达十几页,它们内容丰富,引人入胜,因为在这些文章中,作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阿隆,同时——在讨论问题时——又是目击者和演员。鉴于本书的主题,我们这里对此不作深入分析。人们已经多次指出,1942年11月对阿隆来说是一个何等重要的创伤:“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维希政府在选择时有足够的远见、勇气哪怕是一点良心,那么,后人将会赋予他们的过去以另一种含义。”这一分析,以及其他一些相似的分析,使人们怀疑作者对维希政府有某种好感。对于一个如果留在法国本土就会受到“国家革命”[25]、“排犹法案”折磨的人来说,这种指责是不合适的;此外,阿隆是最早到达伦敦的人之一;最后,他一开始就预感到,法国之战并非战争的结束,相反,它只是战争的开端。除了这一切,那些对阿隆产生上述怀疑的人,其实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作为分析家,阿隆已经有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怀疑所有人都能预见冲突的进程是不对的,而认为所有人的动机都不纯洁也不见得合理”[26]。

雷蒙·阿隆尽量试图避免漫骂,他的判断总有深思熟虑的理由,他的意愿坚定不移,而且十分明显。因此,在反思一些作家

特别是夏尔多纳[27]、蒙泰朗[28]和德里厄·拉罗歇尔[29]与纳粹合作的动机时，他写道："不管我们多么想拒绝这一类文学，我们要强迫自己努力研究它。因为我们必须回答每个人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一些法国作家是如何、为什么、通过哪条途径，使自己沦为戈培尔的帮凶的？"[30]

我们不能因为阿隆这种分析事物的习惯和给被谴责者以发言权的倾向，从而得出他对维希政府有好感的结论。必须重申的是，人们可能忘记了他的流亡生涯早在1940年6月底就开始了。此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人们只知道萨特在纳粹占领期间发表过许多文章，殊不知阿隆从1940年9月起，就被列入了臭名昭著的"奥托名单"，这份名单罗列了占领者所禁止的著作。阿隆两次上了这份名单。一次，他在法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论著《当代德国社会学》被列入第一份被禁名单，另一次，他在"资料室"发表的作品之一《财产清单第二卷——经济和政治》同样也被禁止出版，受牵连的作者是"阿隆、沃歇尔等"[31]。此外，雷蒙·阿隆在为《自由法兰西报》撰文时，采取了和他30年代的思考一脉相承的原则。他参与国家大事的行动并不仅仅意味着发表某个想法，更广泛地说，还意味着一种权威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基础，是他对国际关系或经济的娴熟研究。这一点，他在《反对政权的公民的幻觉与梦想》一文中作了明确表示，这篇文章发表于1941年9月，它有着三重的重要性。因为，首先，阿隆在文章中和阿兰作品的政治倾向已经彻底决裂，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当时他的转变已经完成。其次，阿隆在文章中解释说，一个观察家必须具备辨别是非的才能。最后，他在文章中表示，从今往后，在判断一个政治决定的时候，他将会永远反思在同样情况下自己会采取什么态度。

当然，他当时所作的某些分析是由于迫切的局势造成的。

比如,雷蒙·阿隆在1941年春写道:"我们以后永远也不会如此大声地宣告,为反对希特勒德国而联合起来的民族是在为他们自己的生存而战。"[32]几个月后,他又进了一步:"这次战争是一次殊死的搏斗,它关系到一些民族的死亡和生存。"[33]但是,从一开始起,阿隆就在号召人们参加斗争的同时,对"拥护纳粹的国家"[34]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种国家的"目标,永远是把全社会组织起来,使集体和个人的存在统一于为国家的服务之中"[35]。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文章对阿隆起了一种网筛的作用。战前,这位大学教师很自然地倾向于著书立说,在另一个层次上,也倾向于在科学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战后,他开始了政论作家的生涯,随着岁月的流逝,他所发表的那些长度仅为几页的文章,成了他分析国际关系热点的基础。当然,《自由法兰西报》每月出版一期的时间间隔,使阿隆在评论时事的时候,能与之保持更多一点的距离,而他所主持的专栏的性质,也使他能有更多的机会写评论文章。不过,雷蒙·阿隆的类型转换,早在1940—1944年的伦敦时期就已经完成了。

此外,更广泛地说,战争还是雷蒙·阿隆的活动等级被迫停顿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没有这个原因,那么网筛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关于这一点,我们将会看到,以1939—1944年为界,雷蒙·阿隆的一生可以被分成前后两大时期。[36]

在对阿隆的文章作更为仔细的分析之后,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当时雷蒙·阿隆是如何判断自由法国的领导人的。不过这不是本书的主题。不管怎样,上述研究应该放在自由法国不同派别之间极为复杂的关系背景中进行。因此,我们应该把那篇写于1943年8月的著名文章《波拿巴家族的阴影》放到自由法国内部纷乱的历史中来研究。直到1991年,曾经流亡伦敦的莫里斯·舒曼[37]还认为《自由法兰西报》所采取的立场,特别是雷

蒙·阿隆的这篇文章，是可耻的。[38]

甜蜜的沦陷时期？

如果说上面提到的几点在雷蒙·阿隆的政治历程中十分重要的话，那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对历史学家来说，再现他在战争期间的那段经历并不是难以逾越的困难。研究者们认为，从技术上说，精确地再现让-保尔·萨特在沦陷时期的那段历史，则要复杂得多，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料对他进行研究，而萨特本人则并没有故意掩盖或者混淆这段历史。不过，事实就是这样。我们为读者描绘的萨特肖像，不仅要具有连续性——因为在1939—1940年以后，萨特在和历史的关系这个问题上继续发生着变化，这一点我们以后还会看到——而且是经常模糊不清的，并且早已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

比如，在萨特是否参加了抵抗运动这一问题上，分歧就很明显，各种说法相互矛盾。有人认为，从1941年春萨特从战俘营归来到1944年夏巴黎解放的三年里，萨特是一名沉睡的知识分子，只是在1939年从深沉的政治睡梦中稍微醒了一会儿，然后又昏然睡去，在沦陷时期的灰色年代里，他只顾埋头雕琢他的文学和哲学著作；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抵抗分子，以行动和自己的方式参加了抵抗运动。有关这一点的辩论在1991年变得更加复杂，那一年有人发表了一本著作，对世界大战期间的让-保尔·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作了严厉的抨击，该书作者认为，对于他们两人来说，那段历史仅仅是“一个如此甜蜜的沦陷时期”[39]。在此期间，萨特可能不仅仅扮演了法布里斯[40]在滑铁卢之战中所扮演的消极角色，他还可能以讨好敌人为代价，从事着某种野心勃勃的活动，也许他和西蒙娜·德·波伏娃一样，在战争年代只顾发展自己的文学生涯。更有甚者，除了

贪婪的野心和对敌人的妥协之外,萨特可能还是一个骗子,他侵吞了别人作出的牺牲,法国解放后,他篡夺了抵抗分子的头衔。

无论是这本书,还是某些评论家在报刊上发表的与其对立的观点,它们都很极端,这反映出要公正地看待萨特有多么困难。要想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重新回到“奇怪的战争”时期。尽管这一时期是萨特转变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但在他从军的那些日子里,这种转变并没有彻底完成。事实上,萨特在躲在工事里无聊地打发时光的时候,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矜持。他当时写下的那些文字不是一种逃避,而是一种寄托,它们内容丰富——特别是《手记》,它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当时的心情——表明萨特在马奇诺防线的堡垒群中,成功地筑起了自己的至少是内心的掩体。当然,西蒙娜·德·波伏娃后来写道,从那时起,萨特开始坚信,人必须“自觉接受”自己的“处境”,不过这种处境还没有成为国家的灾难。对于萨特来说,历史的大幕已经开启,但风暴还没有来临。1940年5月16日,也就是德军发动进攻之后的第六天,他在给“迷人的加斯托”的信中说,他“丝毫不相信”德国人会“突破”防线。这样一来,在“重新开始他的手记”之前,眼前的问题似乎是要“尽快结束这部小说”[41]。早在1939年8月底波兰危机爆发时,他就写信给露易丝·韦德里娜:“我并不真的相信战争会爆发。”[42]

我们知道,历史作出了和萨特不同的决定。军营的半隐居生活曾使后者得以静心冥思,但这种机会从此再也没有了。我们说过,让-保尔·萨特于6月21日被德军俘获。关于这点,吉尔贝·约瑟夫所搜集的材料是相互一致的。当时萨特的那三书包手稿似乎还显得很重要,尽管它们使他在行军时步履沉重,而且几乎没有对改善他难友们的日常生活起过什么作用。

由于法国的失败,历史这一次牢牢抓住了萨特,1940年,这

位35岁的士兵被关进了德国的一个战俘营。虽然他在那儿只呆了九个月，但这九个月却是这位哲学家生命的转折。因为他对社会关系的发现，可能就开始于或者说圆满完成于这个时候。吉尔贝·约瑟夫搜集的回忆表明，和难友们相比，萨特显得有些冷漠和落伍，而马里于斯·佩兰教士则用热情的笔调，描绘了他和萨特在战俘营里共同度过的那几个月。[43]不过不管怎样，这些并不重要。对士兵萨特的不同看法表明，他从此开始生活在周围平常人们的眼光之下，因为——不管是出于被迫还是自愿，这一点还有待澄清——他已经融入了这些人当中。这一对比十分强烈，更何况直到"奇怪的战争"之前包括在"奇怪的战争"期间，这种融人还只是表面上的。《手记》，特别是第一卷，清楚地反映出萨特和他同营房的战友们之间所存在的距离。在这方面，战俘营的确是一个转折点。三分之一个世纪以后，萨特这样对约翰·热拉希解释道："在战俘营里，我重新找到了一种集体生活的方式，自从我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就再也没有体验过这种生活。我在战俘营里喜欢的，是那种属于集体一分子的感觉。"[44]

在马奇诺防线的工事里，萨特对社会关系的发现几乎才刚刚开始，这种发现在第十二D号战俘营里得到了继续，并且由于萨特的战俘身份而进一步得到发展。因此，当萨特于1941年3月底回到巴黎时，他已经是一个脱胎换骨的人了。

在有关萨特得以从战俘营归来的条件问题上，同样也存在着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方，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的归来有何暧昧之处。他在被俘期间写的剧本《巴里奥纳》，是否真的像吉尔贝·约瑟夫所暗示的那样，表达了某种排犹思想呢？这个剧本是否是德国军事当局给予萨特特殊礼遇、将他提前释放的原因呢？除非拿出站得住脚的证据——目前显然没有这样的证据——否则这些分析都是很有争议的。说到底，在关于萨特离开第十二

D号战俘营的条件问题上,人们没有任何理由接受吉尔贝·约瑟夫的解释。当然,把萨特的这段经历说成和圣徒一样也是不恰当的,西蒙娜·德·波伏娃曾经说萨特是"越狱"出来的,这里"越狱"一词的意义遭到了贬低,因为萨特是被正式释放的。而在《如此甜蜜的沦陷时期:1940—1944年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和让-保尔·萨特》一书中,作者的论据本身也只是一个尚待证明的说法,因为他暗示萨特之所以获得自由,是因为他采取了和战俘营军事当局妥协的态度,但与此同时,他却拿不出证据。相反,马里于斯·佩兰的证词则使人们更相信萨特自己的解释,他说他的自由应该归功于一张伪造的病情证明,这张病情证明诊断他患有平衡紊乱疾病,这一解释也曾经被西蒙娜·德·波伏娃引述过。至今为止,它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即使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其他情况下,西蒙娜·德·波伏娃在《一个循规蹈矩的少女的回忆录》中几乎没有对这一解释作出过更明确的说明。[45]

不过,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关于处在黑暗年代中的萨特,除了由几个狂热分子传播开的某种有教益的说法之外,让-保尔·萨特的抵抗活动究竟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必须得到公正的分析。我们首先看到,他本人从来——至少是在战后的几年里——没有理直气壮地声明过自己对抵抗运动中某一具有教育意义的行为负责。大家都知道他后来所作的著名分析:"在沦陷时期,我是抵抗的作家,而不是写作的抵抗分子。"当然,这种区别有些似是而非,并且含有把自己视为抵抗分子的意思。但我们也可以认为,这句话表达了萨特对自己没有更加积极地参加抵抗运动的懊悔。在他的许多文章比如《安静的共和国》[46]中,我们可以大段地读到这种懊悔之情。1945年,萨特在《自由法兰西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真切地描述了一个完整的过程,人们只要稍不留意,就会在这个过程的引导下采取一系列态度,而

这些态度在半个世纪后被瑞士历史学家菲利普·布兰称为“妥协”[47]:“因此,我们生活在最为糟糕和不幸的惶恐之中,却又不敢承认,我们感到羞耻,同时又厌恶羞耻。而最为不幸的,是我们每走一步路、每吃一口饭甚至每呼吸一口空气,都在使自己变成占领者的同谋。”

当然,后来,萨特在确认自己参加抵抗运动的历史时,表现得不再保守。吉尔贝·约瑟夫告诉我们,1962年,萨特在加入作家协会之前,填写了一张生平表格,他在“战争”一栏中这样写道:“积极参加了抵抗运动和巴黎的巷战。”透过这些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内容各异的声明——总的说来,尽管这张生平表格填写得不够恰当,但其内容还是有具体的抵抗行动为依据的——我们又多了一个理由,来重新确定或回忆某些已经被证实的问题。

正如萨特对莫里斯·梅洛-庞蒂说的那样,1941年春,他希望“做点事情”[48],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他所指的“事情”,是通过建立一些知识分子小组,“进而编织一张蜘蛛网”,这些小组非常封闭,最多由五个人组成。他们经常开会,其中有一次是在德彪西路的一家旅馆客房里举行的,与会者有萨特、雅克-罗朗·博斯特、旺达和莫里斯·纳多[49]。使后者感到惊讶的是,萨特在会议结束时这样解释了他的目标:“一年之后,我们将要弄清这个由维希政府建立起来的国家的性质。”[50]这些可能全是细枝末节。萨特作为小组创始人的身份已经得到了证实,但他主要在知识界从事抵抗运动的观点——这在1941年是一个新的观点——却引出了一个史学界的传统问题:什么样的活动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抵抗活动?

萨特所创立的这个小组名为“社会主义和自由”,其真实性得到了让-图森·德桑蒂[51]的证明。自1940年起,后者曾经领导过另一个名为“铁蹄之下”的抵抗小组,该小组的另一位领导人

莫里斯·梅洛-庞蒂当时在乌耳姆路任教。这个成员多为高等师范学校师生的抵抗小组,后来并入了"社会主义和自由"。萨特的努力失败后,让-图森·德桑蒂加入了共产党人领导的抵抗运动。[52]尽管如此,即使那些证明萨特努力的回忆是真实可靠的,我们也不能夸大"社会主义和自由"的作用。另外,曾经是该小组成员的娜塔丽·萨罗特[53]对小组抵抗活动的程度作了很有保留的证明。有人问她:"您有一次在谈到萨特时曾对我说,战争期间您和他一起参加了同一个思想小团体?"针对这个问题,她在1990年作了不可辩驳的回答:"这是一个所谓的抵抗小组。其实,我们是在做关于未来法国的作业!我们只开了三四次会,仅此而已。"[54]即使我们考虑到以上说法可能会因为记忆的原因而失真,并且从时间上来看,它是在萨特和"新小说派"的作家们发生了严重的争执之后作出的,但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这位主要证人所作的回忆的确是不利于萨特的。此外,在《年富力强的时代》一书中,"社会主义和自由"几乎因西蒙娜·德·波伏娃而家喻户晓,自1960年该书出版以来,许多段落经常被引用,而引用者却甚至连历史评论所必需的最基本的责任心都没有。而且,西蒙娜·德·波伏娃关于沦陷时期的回忆经常是模糊的,有时是错误的。比如,她曾经说,1942年5月,"几乎整个法国知识界"都没有参加德国雕塑家阿尔诺·布莱克在杜伊勒里公园的奥朗杰里博物馆举办的展览,这一说法就是模糊的,或者至少是轻率的。与她所说的相反,可能有大批知识分子参观了展览,布莱克的支持者们甚至声称参观人数达到了8万名。[55]

的确,这些和萨特的政治参与并没有什么关系,它们在这里只属于个人意见的范畴,而关于萨特的抵抗活动,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回忆也仅仅是一家之言。但是,还是在萨特的抵抗活动这个问题上,她在某些方面的记忆有所衰退,这已是不争的事

实。比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回忆录中解释道,萨特的抵抗企图很快遭到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抵抗运动的敌视。她甚至把这种敌视说成是“社会主义和自由”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她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虽说从那时起到1941年6月22日,由共产党人个人发起的抵抗活动得到了大家的承认,但有集中领导的共产党抵抗运动实体却几乎不存在。[56]此外,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还没有抵抗占领者的明确路线。所以,我们不太明白,是共产党的哪道命令干扰了萨特的事业,以至于使它胎死腹中。至少,这里有一个时间上的错误,它把一个发生在晚些时候的情况提前到了1941年的第一季度。

此外,在其他情况下,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不再是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回忆是否可信,而是她本人是否诚实。我们指的是她对一些关键事件的历史真相所作的歪曲,这种歪曲可能是出自于她的本意,也可能是由于她的疏忽。比如关于西蒙娜·德·波伏娃参加电台播音的问题。事实上,在《一个循规蹈矩的少女的回忆录》中,她谈到了自己在获得抵抗组织批准之后,和维希广播电台合作的事情。我们对这种难以理解的说法感到惊讶,就目前所了解的关于西蒙娜·德·波伏娃参加抵抗运动的情况来看,我们无法判断她和她所谓的上级领导之间的这种接触有多么幼稚或狡猾,而这个上级领导本身也是模糊的,因为它既没有得到证实,也没有得到确认。西蒙娜·德·波伏娃没有必要在1960年对此保密,即使她把话说得更明确些,也不会伤害任何人。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即1983年,当她在《致加斯托的信》的编注本中重新提到此事时,仅仅加了一个注解,一方面说明她的确为维希广播电台工作过,另一方面说明她这样做是“得到批准”的。于是,在她和抵抗组织接触以及上级领导的问题上,又一次出现了错误、疏忽和不明了的情况。不过,维希广播电台

——为了确切起见,我们后面称之为国家广播电台——这件事,还引出了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当然,我们谈论的不是巴黎广播电台,因为后者已经成了同德国占领者全面合作的象征,法国听众都说:"巴黎电台在撒谎,巴黎电台在撒谎,巴黎电台里是德国人在称王。"埃莱娜·艾克的研究清楚地指出,在沦陷时期,国家广播电台向"一批天才"开放了它的播音室,尽管当时对贝当元帅的个人崇拜盛行,但在这个国家广播电台内部,"为节目提供主要素材的还是法国文化,这些节目并没有对占领者表现出多大的尊敬"。不过,这份研究还指出,1944 年第一季度,正是"菲利普·昂里奥在一场宣传运动中一展才华"的时候,这是一场"国家广播电台史无前例的、旷日持久的、充满仇恨的宣传运动"[57]。而西蒙娜·德·波伏娃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了国家广播电台的播音行列。事实上,从 1944 年 2 月 27 日起,在国家广播电台的节目周报《国家广播电台》上,就标有一档由西蒙娜·德·波伏娃主持的关于"杂耍歌舞起源"的节目

对于这件事情,历史学家在任何时候都无权评判,因为它属于一个人良心的范畴。历史学家的义务,只是为每个人的判断提供资料依据,尽管目前这些资料还不全面。然而,为了使这些资料更加全面,我们必须补充两点。首先,时间问题是不可能作弊的。我们看到,当时国家广播电台在它的一些政论节目中播出了强硬偏激的政治言论。这些言论的播出,在时间上和西蒙娜·德·波伏娃加盟国家广播电台相吻合,当然,这并不意味德·波伏娃赞同电台的所有言论。不过,既然知识分子的言论是借助媒体传播开来的,那么,难道他不同样应该有责任注意媒体所表达的观点吗?不管怎样,仅仅几个月后,萨特作了和我们观点一致的辩护,1944 年 9 月,他在《法兰西文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上面写道:"我们曾在上一期中说过,在沦陷时期,有些作家

的态度或文字曾经在思想或物质上帮助过压迫者,法国作家委员会的成员们作出承诺,只要哪家报纸、杂志、文集或丛书再发表这些作家的文章,委员会成员就将拒绝和它们进行任何合作。"[58]的确,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名字并未明确出现在声明上,但是,作为法国作家委员会的成员,她实际上是支持这份声明的。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西蒙娜·德·波伏娃没有履行她在态度上前后保持一致的义务——而我们有权要求一个知识分子履行这样的义务——因为仅仅几个月后,这位女哲学家的态度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

我们要补充的第二点,证实了人们后来对让-保尔·萨特的指责。当时,无论是他还是西蒙娜·德·波伏娃,都没有遭到狭小的巴黎文学界的排斥。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国家广播电台》是国家广播电台的节目周报,它在第132期(即1943年11月28日—12月4日那一周)告诉读者:"弗朗索瓦·德·鲁将在他主持的节目'每周一书'中,谈论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小说《女客》,最近,这部作品引起了公众和评论界对其作者——一位文坛新人——的注意和赞叹。"我们这里并不要求大家注意,在1944年第一季度,当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节目在国家广播电台播出的时候,让·卡瓦叶斯正身陷囹圄,并于几星期之后惨遭枪杀;也不是要提醒大家,法国解放后,《女客》的作者不愿在要求免除罗贝尔·布拉齐亚克死刑的请愿书上签字,她后来在《年富力强的时代》中解释说,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觉得自己同玻利泽尔[59]、德思诺斯[60]和卡瓦叶斯"休戚相关",要是她签了字,这些人就会"朝她的脸上吐唾沫"。我们不想提醒大家的,还有阿隆和西蒙娜·德·波伏娃之间的对比,前者为《自由法兰西报》撰文,而后者则被《国家广播电台》大肆赞扬。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有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萨特和波伏娃似乎都没有受到历史

的约束,在好几年的时间里,他们在感情上无动于衷,在态度上反复易变,在所作的分析和所采取的立场上前后矛盾。

是《喜剧》还是《法兰西文学》?

上述看法可能有点偏激。我们可以引用1944年1月西蒙娜·德·波伏娃从莫尔齐那[61]写给“最亲爱的小生命”的信,来证明它。这里我们所要谈论的,并不是那些信的轻浮内容,因为人们有理由希望在空间上和心理上摆脱那个不幸的时代。在莫尔齐那,历史暂停了它的进程,即使是“游击队员们”似乎也成了没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在旅馆的酒吧里边喝开胃酒,边等待某个“年轻漂亮却又令人反感的度假者”归来,后者“听说是盖世太保的成员”。一会儿,整个滑雪场的人都变得“不安”起来,因为游击队还“洗劫了滑雪用品商店”。[62]这段小故事发生在1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三,也就是27日。而让·卡瓦叶斯似乎也是在1月份的最后几天被德国人枪杀在阿腊斯[63]城堡的。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好像有点过分,但我们必须这样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两个至关重要的现象。一方面,许多参加抵抗运动的知识分子都迟迟不愿把萨特和波伏娃视为自己的同志;另一方面,也许两位当事人在内心深处受到了某种内疚感的折磨——这种内疚感毕竟给他们带来了荣誉——而正是这种内疚感,后来使萨特确定了他和正在发生的历史的关系。此外,这种关系的确定,只能增强参加抵抗运动的知识分子们对萨特的怀疑和恼怒。我们可以通过上述两种现象,至少是部分地解释这种对萨特的螺旋式的怀疑,这种怀疑和某些过于虔诚的萨特研究者所作的假设一样,使萨特的情况变得更加晦涩。

但是,这种晦涩的情况不应该导致对萨特和波伏娃不公正的历史分析。由于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国家广播电台的经历,

而把她归入和德国占领军合作的知识分子之列，这绝对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没有人怀疑她和让-保尔·萨特对德国以及维希政府的敌视情绪。所以，他们的某些地方还不很明确。比如，我们将会看到，西蒙娜·德·波伏娃之所以能被国家广播电台录用，是因为她有一个与德军合作的重要人物做靠山。而萨特也曾在这个人创办的周刊《喜剧》上发表过两篇文章。

当然，萨特同样也和地下刊物《法兰西文学》合作过，而且，他所参加的法国作家委员会机关报的工作，被公认为是除“社会主义和自由”之外他所从事的另一个抵抗运动。在1943年4月底油印版的《法兰西文学》第6期的第三和第四页——总共六页——上，让-保尔·萨特发表了《德里厄·拉罗歇尔或自我憎恨》一文。德里厄·拉罗歇尔当时是《新法兰西杂志》社的社长，因此，他经常成为参加抵抗运动的知识分子攻击的靶子。在为数不多的《法兰西文学》中，至少有11篇文章是针对他或他的杂志的。[64]至于萨特，他在很大程度上选择了从心理层次对德里厄进行抨击，他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德里厄，不够成熟，成天烦恼，和他自己的小说《丑角》的主人公一样，试图“用他人的鲜血来治疗自己烦恼的不治之症”。《法兰西文学》第14期（1944年3月号）预告将出版一份两页的增刊，名为《法国银幕》，它是“电影民族阵线的报纸”。从此，这份增刊就出现在《法兰西文学》的第五和第六页上，特别是在1944年5月的第15期上，让-保尔·萨特发表了一篇文章《给战后的一部电影》，他在文章中抨击了维希政府和德国大陆电影公司，说它们“像扔骨头给狗啃那样，把一些猥亵下流、令人昏昏欲睡的所谓‘巴黎’喜剧介绍给公众”。

萨特和知识界的主要地下刊物进行过合作，并在参加抵抗运动的电影工作者创办的报纸上发表了对战后电影的思索，这

些活动都得到了证实，而且具有浓厚的象征色彩。然而，我们在前面看到，与此同时，萨特也在一份和德国占领者关系极为密切的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由于他的摇摆不定，人们重新提出了萨特立场模糊甚至是可疑的问题。他的第一篇文章刊登在1941年6月21日的《喜剧》上，当时，萨特刚回到巴黎几个星期，文章是关于赫尔曼·麦尔维尔[65]的小说《白鲸》的。从中我们找不出任何作者与占领军合作的迹象；相反，从更深的层次上看，这篇文章可以被理解成反抗压迫的宣言。第二篇文章发表于1944年2月5日，是一篇纪念让·吉罗杜的文章。此外，在1943年4月24日的那一期《喜剧》上，有一篇关于《苍蝇》的采访。在这个问题上，虽然西蒙娜·德·波伏娃说明，1944年2月的那篇文章曾经得到法国作家委员会首肯，但是该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法兰西文学》却早在1943年11月的那一期中就这样提醒人们："大家都知道，《喜剧》每星期都要向纳粹的宣传机构出让欧洲栏目的一个版面。"另外，早在1942年11月的《法兰西文学》上，克洛德·莫尔冈[66]提到了柯莱特[67]为一份亲德国的杂志写的一篇关于勃艮第的文章，他指出，一篇文章，即使它没有任何政治倾向——正如柯莱特的这篇一样——也有可能被用来证明某种思想，并间接地产生负面影响。[68]

此外，尽管《喜剧》自称是一份没有明确政治倾向的报纸，但事实上，它所刊登的文章以及它主编的人格，都无可争议地使这份报纸带上了典型的政治烙印。在那个时代，毕加索在巴黎"勉强得到宽容，并且因为他的政治喜好而过于出名"[69]，而画家弗拉芒克[70]对他所进行的合情合理的攻击，正是刊登在《喜剧》上的[71]，那时布莱克的雕塑展在奥朗杰里博物馆仅开幕了几个星期，这个"长着和尚脸、法官眼的"卡塔卢尼亚人，把"1900—1930年间"的法国绘画引向了"消极、萎靡和死亡"。我们应当根据毕

加索当时的处境来判断弗拉芒克的攻击，那时候前者在法国的居住证已经失效。[72]至于《喜剧》的主编勒内·德朗日，他与德国当局的关系，可以通过1942年他参加布莱克雕塑展的贵宾委员会这一事实得到验证。[73]

此外，我们还将注意到，尽管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年富力强的时代》中有意淡化她和萨特同勒内·德朗日之间的联系，[74]但这种联系在沦陷时期仍然十分密切，以至于皮埃尔·阿苏里那[75]把德朗日说成是波伏娃和萨特在那一时期的"恩人"[76]。不管怎样，西蒙娜·德·波伏娃由于个人原因被迫离开中学讲台之后，正是德朗日把她弄进了国家广播电台。1943年7月8日星期四，她收到萨特的一封信，信的内容使她松了一口气："德朗日绝对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今天上午他对我说要为你找份工作。明年你可以主持12个广播短剧，每月一个(电台提供创意，你负责编写对白——时间大约是十分钟)，报酬是1 500至2 000法朗。这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你每月只要花四个小时。我欣喜若狂地替你答应了下来。明天他就要和电台负责人谈。明天我将和他，还有克罗默林克[77]共进晚餐。"[78]

在同一封信里，萨特还指出，德朗日前天在富罗尔咖啡馆找过他，(向他)建议由自己的秘书来为他刚完成的一部电影剧本"打字"。萨特还补充说："他告诉我说，他又见到了波尔德里，后者似乎对剧本的主题很感兴趣。所以希望很大。我们真的可以对该死的大学校园说再见了。"当然，萨特对德朗日的关心很感兴趣，他在另一封写于几天前的信中说：如果电影能够开拍，那么德朗日这只"小瓢虫"将参与它的发行。尽管如此，几个月后，在1943年11月1日以后的一年时间里，萨特开始在百代电影公司的手稿科工作，月薪为2.5万法郎。[79]总之，1943年是萨特硕果累累的一年：《苍蝇》上演，《存在与虚无》出版，通往电影界

的大门被打开。早在法国解放前很久,这一切就解释了——至少是部分地解释了——为何在1944年夏天以后,萨特会以不可阻挡之势名声大起。

上述事实非常重要,不管是出于有心还是无意,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的文学生涯起步于沦陷时期,对此任何人都毫无异议。就这一点说,1943年在萨特的一生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从现在来看,那一年是本世纪最为黑暗的年代,但也是萨特最为年富力强的年代。在跨入那一年门槛的时候,他已经度过了生命中三十七年半的时光,还有三十七年零四个月的春秋在等着他。不过,1943年除了是萨特生命的中点之外,还是他名副其实的转折点,因为《存在与虚无》出版前与出版后,确实是两个不同的时代。从那一年起,步入中年的萨特依靠他这部为读者所熟悉并接受的著作,获得了人们的重视。的确,这本书似乎在年轻的哲学家中间引起了兴趣,有时甚至是狂热。虽然这部著作难以理解,其主题也只是在战后才传播开来,但它却引起了一些年轻高等师范生的注意。在高师预备班中,哲学专业的学生都知道它,并且都就它进行过思考。比如霍尔日·桑普兰[80],他曾是1940—1941学年末全国哲学竞赛二等奖的获得者,在亨利四世中学完成了毕业班的学习,后又成为该校文科预备班的学生,五十多年后他写道:"1943年,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存在与虚无》。"[81]几个月后,这位年轻的哲学学生被关押到布琛沃尔德集中营,1945年春,当他侥幸活着从那里出来时,发现几年来萨特的名声又有了提高。

鉴于这一切,我们说沦陷时期毫无疑问是萨特和波伏娃作品累累、名声大起的年代。其间,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小说《女客》在1943年被印刷了4 400册,后来又重印了同样的数目,这部小说当年的销售量是7 073册。而在前一年,加缪的《局外人》

则卖了4046册。[82]

清白的档案?

说到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要确切公正地了解萨特这个人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根据不同的说法,他的面目是如此的不同和矛盾。也许还有一种方法可以使我们看得更清楚一些:在另一种人——也就是说在维希政府——的眼里,萨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可能有些天真和不妥,因为真正的抵抗分子必然会掩盖自己其他的地下活动。尽管如此,还是会有一种模棱两可的情况,有的知识分子即将或正在出名,虽然他们尚未在抵抗活动——如果他们参加了这些活动的话——中暴露,但仍然由于他们的影响力而经常受到怀疑。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到,让-保尔·萨特从未遇到过这种问题,这一点从他平安度过1943年开学时对巴黎高等师范预备班某些教师的清洗一事中可以得到反映。早在1941年10月开学时,他就已经得到了一次显赫的晋升。1941年复活节假期之后,他重新回到纳伊的巴斯德中学教书;后一个假期结束时,他就被任命为贡多塞中学高师预备班的哲学教师。这一晋升是一件很令人得意的事,而且,我们以后将会看到,作为年轻知识分子摇篮的文科预备班,在当时可能会受到特别的注意,萨特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到晋升,说明他没有遭到任何怀疑,而那时,抵抗团体"社会主义和自由"已经成立了好几个月了。不过,特别说明问题的是发生在1943年的几件事。原来,9月20日,也就是开学前几天,一纸行政命令把让·盖埃诺降职为布封中学的一年级教师,而他从1941年10月起就一直在路易大帝中学的师范预备班任教。[83]剥夺一位53岁的教师在高级班讲学的权利,这毫无疑问是一种令人恼火的行为——盖埃诺在法国解放后重新回到了高师预备班

的讲台,后来他又升为总学监——对此,当事人没有说错,1943年11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阿贝尔[84]和他宠儿们的阴谋得逞了。很明显,在整个一年当中,我将只能从事我的职业。我的任务无异于初出茅庐的教师,这是所有我的同事们所不愿干的。我每周不是上六小时而是上十七小时的课,我极为困难地试图用那些听我课的孩子们听得懂的语气说话。三个星期以后,我已经累得筋疲力尽,再也支持不住了。"[85]

至于让-保尔·萨特,他仍旧每周上六小时的课。他逃脱了1943年开学时涉及全体师范预备班教师的清洗运动。事实上,这些教师中有好几位遭到了清洗。在路易大帝中学,除了盖埃诺以外,历史学家、自1938年起就担任预备班教师的马塞尔·莱纳尔被降职为贡多塞中学的二年级教师,[86]原因可能是他曾经表示反对强迫劳役。[87]而在一年前,他的校长却评价说:"他的课极为出色。"同样,亨利四世中学的阿德里安·卡尔从1928年起就在预备班任教,先是在预备班一年级,后来在二年级,而且他曾两次在大战中被俘——一次是1914年11月,另一次是1940年6月,他于1941年获释——他也被"要求"在中学里"从事其他工作"。而受这次由国民教育部长阿贝尔·博纳尔组织的清洗运动危害最深的,还是让-保尔·萨特任教的中学。1944年4月,自1937年起就担任贡多塞中学校长的安德烈·勒鲁瓦被取消了职务,派往路易大帝中学教二年级;与此同时,和让-保尔·萨特教同一个预备班的历史学家莫里斯·克鲁泽也被降职到路易大帝中学教一年级,后者从1937年起就是预备班的教师了。他被指责"对抵抗运动有一种积极的好感"[88]。与人们所经常传说的相反,在1943—1944学年,哲学教师让-保尔·萨特既没有遭撤职,也没有致力于抵抗活动,他还是在贡多塞中学的预备班任教,并且每个季度都要在专门用于记录成绩的手册上写上学

生的分数，直到该学年结束。[89]

其他一些更加具体的事同样也很能说明问题。在1943—1944学年期间，几位刚进入巴黎高师的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属于1943级——成立了一个科学哲学联谊会。他们特别邀请萨特来谈谈《存在与虚无》，萨特在年轻的师范生们中间获得了名副其实的成功，那些师范生对他的著作已经很了解，包括反映他最新观点的《苍蝇》和《存在与虚无》。[90]然而，也是在那一年，当联谊会的组织者们想邀请让·盖埃诺时，却遭到了校长杰罗姆·卡尔可比诺[91]的拒绝。1944年1月14日，让·盖埃诺在《黑暗年代的日记》中提到了这件事："三年来，在高等师范得到许可的是一个天主教联谊会。学生们打算重新建立一个被他们称为'哲学联谊会'的组织，并要求我抽一个晚上为他们做讲座。我答应了。我准备讲(我们达成一致，避免涉及任何过于敏感的时事问题)文学创作的问题。可是，那些年轻的男孩子们一脸愧色地跑来告诉我，说他们的校长禁止我做讲座。也许我是一个'太有预见性的人'。"[92]

当然，我们不能对萨特和盖埃诺作更多的比较，因为当时前者还不到40岁，没有政治经历，而后者则是30年代左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是，这件事还是很说明问题。况且那时候盖埃诺并没有站到积极的抵抗运动的前列，他下定决心，只要德军占领不结束，就不发表作品，他认为这是最有效的反抗方式。从那时起，他一直游离于地下斗争之外。尽管后来他以塞书纳的笔名，通过子夜出版社出版了《在狱中》一书，但该书的手稿是在讲座流产之后才交到出版社的，而且直到1944年8月初才被出版。虽然他和让-保尔·萨特一样，是法国作家委员会的成员，但他们两人的角色却并不重要，至少在法国解放前是这样。

另一种人的看法,同样也反映在对1943年的《苍蝇》以及次年的《禁闭》的态度上。有人研究了当时评论界对萨特戏剧作品的反应。[93]研究者认为,评论界既代表了读者的观点,又代表了公众的态度。至于让-保尔·萨特的抵抗思想,“只有那些对萨特的哲学初入门道,并且经常拜读他著作的知识分子精英才能察觉得到。”[94]当然,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我们必须区分两种观众,一种观众更加年轻、更有知识、对该剧大为欣赏(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意识到了作品所含的信息),另一种是“普通的观众”,他们来自“保守的资产阶级”[95],对该剧不太欢迎。这份对当时评论界的研究还表明,甚至当《禁闭》在法国解放后重演的时候,后一种观众对该剧还抱着怀疑的态度。这位研究者强调说,的确,由于沦陷时期的特殊条件,特别是由于对文艺作品的检查制度,评论界对剧作的态度不能被公众完全理解。但是,我们仍然应该记住不同年龄观众的区别——在这一点上,人们的口述证实了作者的分析。除此之外,虽然在沦陷时期,一些评论对剧作持批评态度,但这不一定表示它们在思想上拒绝了该作品——不然,这就意味着评论者们察觉到了作品所包含的信息——它们只是反映了一种“因循保守态度”,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了战后。

总之,在某种程度上,《苍蝇》在沦陷时期的上演带有两重性。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人们争论的焦点又一次集中到了这部作品上,批评者有之,赞扬者也有之。批评者认为,接受德国占领者的检查制度,面对可能混杂着占领军军官的观众上演该剧,这等于是在接受不可接受的东西。相反,赞扬者则认为,这部话剧不仅高举起法国文学创作的战旗,而且实质上它在努力传递着推翻德国占领的信息,尽管这一信息在表达上较为晦涩。安格里德·加尔斯泰的研究表明,如果我们以评论界的观点为依

据，那么要对类似的事件作明确的判断是很困难的。即使我们参考对沦陷时期法国戏剧的直接研究，也看不出有什么迹象能够证明，这部话剧被大多数观众看做是具有抵抗思想的作品。[96]

尽管如此，《苍蝇》并不是一部受投降派评论界欢迎的话剧。相反，《法兰西文学》杂志却在1943年12月的那一期上对它给予了好评。[97]的确，该文的作者让·莱斯居尔当时是萨特的一位朋友。[98]在这种情况下，是什么因素占了上风呢？是思想观点的一致，还是社交结构的机械效应？

这个问题促使我们重新回到萨特的抵抗活动上来。即使萨特参加法国作家委员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一事实也只是在解放之后，特别是在知识界内部进行清洗的过程中才得到证实；[99]在此之前，除了西蒙娜·德·波伏娃提到的几次活动外，我们很难确定萨特抵抗活动的程度。何况说到底，抵抗活动这一概念的起点是什么？即使在这里，我们不准备精确地判断萨特在沦陷时期的政治态度，但我们还是觉得，对一个在时间和地点上均不确定的活动进行分析永远是困难的。当然，为了确保委员会成员的安全，必须控制开会次数和成员人数。但是，除了同委员会某些成员一些并不重要的接触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对《法兰西文学》杂志的认真参与外，我们还必须看到，即使不能否认萨特曾有过"抵抗的企图"[100]，我们还是要回到抵抗活动——不管它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的起点这个问题上来。萨特的反对者们后来说，由于一次以"社会主义和自由"为中心的知识分子抵抗活动遭到流产，让－保尔·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似乎放弃了所有明确的抵抗企图，这些抵抗当然不如精神领域的斗争那么著名，但正是它们赋予了日常的抵抗活动以荣誉。吉尔贝·约瑟夫评论道："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没有领导过某个地下组织，再说他们也未曾有过这种念头；他们也从来没有想

过自己可以参加营救那些受到迫害的人士,这其实也是抵抗行动的一种方式。"[101]

相反,戴尔德尔·贝尔则在他关于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书中,作出了对两人不予谴责的结论:"他们的档案并不完全清白,但也没有明显的污点。"[102]我们当然可以为他俩想出更加有力的辩护词,但是,以上这句经过深思熟虑的话,公正地反映了沦陷时期让-保尔·萨特的态度。可以肯定的是,他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也不像他自己至少一次试图使人相信的那样,是一位"伟大的抵抗分子",但他也不应蒙受某些反应过于灵敏的检查官大张旗鼓地加在他身上的极大耻辱。有人说,萨特在恬不知耻地玩弄两面派游戏,这一说法站不住脚,因为它抹杀了萨特反对维希政府和纳粹思想的明显倾向。而把他说成是一只在滔天的海浪中先后躲藏在好几家杂志社里的寄居蟹,则又肯定太过分了。根据菲利普·布兰对沦陷时期人们态度的分类,萨特似乎应该属于"被迫适应"环境的那种人,这一分类肯定超过了"最低限度地适应"环境的标准。我们是否能更进一步说萨特是"看机会适应"环境的人,也就是说是"不仅适应沦陷的现实,而且试图适应占领者"[103]的人呢?每个读者都可以根据前面的资料,在心里作出判断。[104]

一代人内部的大换班

20年后,有人——特别是萨特——指责克洛德·西蒙[105],说他和其他新小说派作家一样,在炮制反革命的作品。后者难以掩饰自己的恼怒:"我要求得到一位哲学家的支持,他必须亲自手持武器,同法西斯战斗过。"[106]其实,归根结底,到了后来,重要的并不是萨特抵抗行动的确切程度,而是这种抵抗行动和他本人在战争结束后立即大声疾呼的关注政治的义务之间的实际对

照。正是由于这一对照，萨特几乎自然而然地将自己永远置于被谴责的处境，因为事实上，他这一代人遭受了战争的沉重创伤。

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消除一种可能存在的错误看法。的确，初看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在萨特和阿隆这一代师范生中间造成人员的伤亡。虽然在 1939 年，这一代人中的大部分正当被动员的年龄，但较前一次大战而言，这次战争在军事上的损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样，战争对人们精神的打击一下子就减弱了很多。但是，淡化这种打击是错误的。一方面，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一代人深受和平主义的影响，战争的威胁和爆发常常使他们的梦幻破灭，从而促使他们进行痛苦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就算只谈论人员的损失，结果也远远不容忽视。在萨特和阿隆 1924 级文科班的 26 位同学——应该说是 24 位活着的同学，因为这一届师范生有两位分别于 1926 年和 1928 年因病去世——当中，有三人是作为军人牺牲的：保尔·尼赞死于 1940 年春，阿尔塞纳·亚历山大死于战俘营，而夏尔·勒·克尔则于 1944 年 7 月在率领一队摩洛哥步兵执行任务时死于意大利。此外，这一届师范生中还有一名死于流放，他是英国语言文化研究者、布封中学教师阿尔弗莱德·佩隆，他因参加抵抗活动于 1942 年 8 月被捕，先被关押在弗莱斯奈[107]，后被流放至毛特豪森[108]。1945 年 5 月 1 日，也就是获得解放后的几天，他因身体衰竭死于瑞士。后来他被追认为荣誉骑士团骑士，对他的表彰如下：“在被捕和受审期间，他均表现出极大的镇定，在痛苦的审讯中，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尊严。”[109]

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日期，对佩隆和躲在幕后的萨特作一个清楚的比较。在达拉第政府上台的头几个月里，被寄予厚望的人民阵线分崩离析，1938 年 7 月 14 日，社会党人佩隆参加了左

派政党组织的游行。而萨特则在多姆咖啡馆,他给西蒙娜·德·波伏娃写道:"天阴沉沉的,弥漫着可怕的共和气氛。"我们知道,他似乎还带着一丝讥讽的口气,在信中补充说自己遇到了佩隆,后者"刚参加完人民阵线的游行回来,衣服的扣眼上还别着一张小红标签,上面写着'遵守誓言,执行纲领、共和的西班牙万岁'"。[110]四年后的夏天,1942年8月16日,抵抗分子佩隆被德军逮捕。同样是在1942年夏天,萨特和波伏娃作了一次长途自行车旅行,他们先南下巴斯克地区[111],然后去了马赛,再经中央高原北上返回。最后,1945年5月1日,佩隆在被从毛特豪森集中营解放后几天,因精疲力竭死于瑞士一家医院。与此同时,萨特延长了他开始于1月11日的纽约之行,继续着与多洛莱斯·瓦奈蒂的艳遇。我们同样不会忘记,当时法国还处在战争当中。

这里要重申的是,我们并不想借助事实和日期的对比或者利用某些已经牺牲的人来攻击另外一些人。我们是否能因为萨特和佩隆的比较,而回避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迟迟不过问政治以及从那时候起政治对他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这两个问题呢?再者,要想把萨特放到一个确切的"历史环境"中,历史学家就必须借助于一些具体的事件。当然,在1945年5月,对于那些在抵抗运动中牺牲的人而言,让－保尔·萨特并不欠什么。但是,我们要补充一点,1944年夏,也就是巴黎解放后,有几名和他年龄相仿的知识分子参加了一个战斗组织。比如安德烈·代莱阿热,他曾和萨特同在路易大帝中学的师范预备班学习,但因患肺结核而未能参加1924年的高等师范入学考试。几年后,他成了《精神》杂志的创办人之一。毫无疑问,他是代表"30年代精神"的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也是马克·布洛克的学生,他于1940年10月成为南锡大学中世纪史的讲师,并被看做是一位颇有前途的历史学家。安德烈·代莱阿热比萨特和阿隆年长,他生于

1903年，作为一名抵抗分子，他以法国内地军[112]军官的身份参加了阿尔萨斯战役，并于1944年圣诞这一天倒在了战场上。

在和萨特同年级的高师学生中，阿尔弗莱德·佩隆未能摆脱流放的死神，他的另一位同学让·巴尤也是如此。1945年春，巴尤回到了自己被捕时任教的高等师范学校。半个世纪后，一位师范生是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的："他仍然穿着苦役犯肮脏的条纹长衫，由两位亲友搀扶着走了进来。这时，大家由于激动而鸦雀无声，这寂静既表达了对他的尊敬，又包含着对他的身体状况的担心。去年8月他离开我们时，还是个活泼强壮的人，现在却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活死人，只有他的双眼还在骨瘦如柴的脸上闪烁……让·巴尤当时嗜好抽烟斗，能重新满足这一久违的嗜好他非常高兴；然而，烟斗刚被放进嘴巴，就掉在了地上；他牙齿全无，再也衔不住烟斗了。"[113]

此外，同样也是1924级学生的乔治·勒弗朗，在20年代是高等师范社会主义团体的组织者，当时还和雷蒙·阿隆有过交往，但解放后，他却被指控与德国占领者合作，锒铛入狱。的确，战争不仅在1924级的师范生中间挖掘了一条很深的鸿沟，同样也使他们各自参加了相互敌对的活动，从而打乱了相互之间的友情关系和政治界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战斗中倒下的师范生们都死于同一个原因：被敌人所杀。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在20年代的几个年级的师弟们，死因则要复杂得多，他们有时甚至会为敌对的阵营而死。总而言之，大战对这几届师范生的震撼不如以前那么血腥，但却更为持久深刻，因为他们不仅直接体验到了战争涂炭生灵的感受，而且还长久地保留着1940—1944年民族分裂的创伤。那些在战前曾经是政治参与的代表人物的师范生，在大战中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或死于沦陷时期，或在战后名誉扫地。不管怎样，在两大敌对阵营

中,参与政治就意味着付出沉重代价。因而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为何在法国解放时,在20年代的这几届师范生中间,会发生一次同代人的大换班。站到舞台前面的,是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参与政治的幸存者比如乔治·冈吉莱姆,但同样也是那些当时四十来岁、迄今为止一直躲在政治参与大幕后面的人们。毫无疑问,让-保尔·萨特是后一种人的典型。我们不得不看到,由于其他人早于萨特参与政治,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因此在他这一代人中间出现了一个真空,为他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其实,我们可以在莫里斯·梅洛-庞蒂所在的高等师范1926级的学生中,看到同样的情况。这一届学生当中也有一名集中营的幸存者和多名遇难者。幸存者是安德烈·冈。雷蒙·阿隆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评价他是"我这一代人中最为纯洁的人物之一",还补充说,他代表着"参加战斗的哲学家的理想典范"。这位翻译黑格尔著作的哲学家是三个孩子的父亲,1940年沦为战俘,1942年因健康原因回国,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抵抗分子。1944年6月18日他再次被捕,由最后一列开往布琛沃尔德的火车载至德国流放,他在集中营里幸存了下来,被解放时体重只有35公斤,不久就患上了结核病。他的哥哥、哲学家皮埃尔·冈曾是路易大帝中学的师范预备班学生、在抵抗运动中化名比让,他却没能逃脱死亡的魔爪。他于1943年12月被捕,先是在位于福煦大街的盖世太保驻地受到严刑拷打,后被流放至布琛沃尔德集中营,集中营解放后没几天,就因伤寒死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家医院。

皮埃尔·冈[114]不是高师学生。但是,在和他弟弟安德烈同届的师范生中,有三人死于大战。不过这三个人的死因各不相同。布封中学教师安德烈·瓦蒂埃在1940年德军进攻时战死于法国军队之中。让-保尔·于泰是他那一届高等师范入学考试的"状

元”,他于1944年3月在库尔兰德地区[115]穿着德军的制服死去。[116]五个月后,哲学家阿尔贝·罗曼倒在了一支德军行刑队的枪口下。四年前,他在敦刻尔克战役中获得一枚勋章。战役结束后几天,即1940年5月30日,他被德军俘获,并押往位于西里西亚[117]的第四军官集中营D营。1941年10月14日,他借助一条自己挖掘的地道从铁丝网底下穿过,获得了第二次越狱的成功。越狱后他回到法国,住在图卢兹,他妻子就在那儿教书。对于他来说,重新当老师是不可能的了,维希政府的“排犹法案”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在图卢兹,他领导着一个抵抗网的地方分支,专门帮助人们经直布罗陀海峡逃往摩洛哥。1944年5月15日,这位师范生由于组织偷越国境再遭逮捕。7月底,他曾三次被押赴刑场。前两次,他分别在绞刑架底下和五个已经挖好的公共墓穴边等待死刑的执行,但执行命令都在最后一刻被延期。直到8月1日,那些墓穴才派上用场。清晨,阿尔贝·罗曼和其他几位抵抗分子一起被枪杀。整个战争期间,这位哲学家很注意为自己留出“专心思考的时间”,试图以此“重新反思他战前的作品”。[118]在斗争和危险之中,他构思了一部作品,并撰写了其中的两章,一章是关于“数学和物理学中的对称和不对称”,另一章则是关于“时间的问题”。也许,在他的脑海里,一直萦绕着数学家埃瓦里斯特·伽罗华[119]的命运,后者21岁时在一场决斗中被杀。1928年,在和他未来的妻子第一次见面时,他这样说道:“我不知道有什么会比决斗前的那个清晨更加悲壮,那时候伽罗华已经意识到自己再也没有时间来完成他的论证了。”[120]在进行地下斗争的过程中,他想像中埃瓦里斯特·伽罗华在决斗那天清晨的形象变成了现实。1944年5月,他在图卢兹火车站遇见他的同级同学、抵抗分子皮埃尔·贝尔托,后者在那儿等待两名在法国被击落的英国飞行员,阿尔贝·罗曼对他说:“知道吗,人在

临死前都会有那种经历。"[121]然而,他的命运却更令人心碎,两次死刑的延期所带来的恐惧,使这位年轻的哲学家经历了三个"决斗前的清晨",也使他三次"意识到自己再也没有时间来完成他的论证了"。

1946年,阿尔贝·罗曼写于沦陷时期的那两章作品,作为系列丛书《哲学评论》的一部分,由爱尔曼出版社出版。不过,该丛书的主编也来能看到这本书的出版。这位主编名叫让·卡瓦叶斯。在萨特前后几届的高等师范哲学专业学生中,卡瓦叶斯的命运有时会被用来和萨特作比较,这是因为这位前途无量的哲学天才,由于参与政治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而突然夭折的缘故。事实上,作为1923年高等师范学校入学考试的"状元",他是很有可能成为同代人当中最为出色的逻辑学家的。[122]战争之初,让·卡瓦叶斯在撤退到克莱蒙-费朗[123]的斯特拉斯堡文学院任教,不久就被巴黎大学聘为代课教师,他很早就积极参加了抵抗运动。正因如此,他倒在了德军行刑队的枪口之下。在12名于1944年1月被德军枪杀在阿腊斯城堡里的抵抗分子中,他的尸体被称为"五号无名尸",直到法国解放后一年才被鉴别出来。卡瓦叶斯死后——或者确切地说,是1944年11月20日后,从那天起,人们失去了有关他命运的准确消息——被称为法国解放事业的朋友,他从此长眠于巴黎大学小教堂的地下室里,和其他参加抵抗运动的大学教师的遗骸以及被占领者枪杀的布封中学学生的骨灰在一起。人们辨认出他的遗骸——这时已是1945年夏天了!——后,雷蒙·阿隆在1945年7月12日的《世界报》上写道:"他是战士,也是哲学家。"的确,确切地说,卡瓦叶斯对政治的参与起因于他的著作。1943年他去伦敦时,曾经住在阿隆家,他对阿隆说,他参与政治的必要性就和"数学规则的真实性一样"不容怀疑。这种参与很早就开始了。1941年2

月，当他被巴黎大学聘去代课时，就要求乔治·冈吉莱姆接替他在克莱蒙－费朗的课，同时也把他正在准备中的抵抗活动告知了后者。冈吉莱姆是萨特的同届同学，后来也成为伟大的抵抗分子，让·卡瓦叶斯和埃玛纽埃尔·达斯弟埃·德·拉·维热里[124]坐在克莱蒙－费朗文学院的一条长凳上起草解放运动——后来成为南方解放运动——的第一张传单时，冈吉莱姆也在场。同一时期，在克莱蒙－费朗，让·卡瓦叶斯参加了一场张贴传单的运动，传单的内容是反对与占领者合作——比如"读一读《格兰戈瓦尔》[125]吧，你会让希特勒高兴的"——这场运动波及了南部自由区的多个城市。[126]

此外，他的抵抗活动并不局限于思想范畴，其重点是提供情报和搞破坏，为此，他建立了一个名为"科奥尔－阿斯图里"的抵抗网。他第一次遭维希政府逮捕后，被关押在上维埃纳省的圣－保罗·戴若集中营，1942年12月他成功越狱，继续积极从事抵抗活动，后来再次被捕，终于在1944年1月站到了德军行刑队的面前。我们说过，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人们没有关于他命运的任何消息。1945年春天，戴高乐将军甚至派了一架飞机去毛特豪森集中营找他。因为，1944年1月21日，即在他被枪杀于阿腊斯之前，曾被假装送往那座死亡集中营。直到1945年6月底，"伟大的卡瓦叶斯"——自由法国的领袖就是这样称呼他的——才被辨认出来。我们知道，在此之前，他一直是阿腊斯公墓集体墓穴中的"五号无名尸"[127]。正如人们在他去世50年后所写的那样，卡瓦叶斯"留给我们一部甚至不能称其为不完整的著作；这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或者说，一部被谋杀的著作"[128]（布律诺·于伊斯曼语）。

以此类推，我们还能在这一代高等师范生中列出很多遇难者和被谋杀的著作的名字。许多默默无闻的伟人也因此而崭露

头角。比如雅克·莫诺,他在1923—1924年和让－保尔·萨特同在路易大帝师范预备班就读。他比后者晚一年考取高等师范,于1928年通过了文学教师资格考试。15年后,在占领期间,他和萨特一样,是师范预备班的老师,不过他在马赛任教。作为抵抗分子,他受到盖世太保的通缉,于1943年10月离开了讲台,并于次年6月8日参加了游击队。12天后,他手持武器,在康塔尔省的肖德赛格牺牲。这位"磨房主中尉"在阻击德军进攻一座桥梁时中弹身亡,临死前,他正用机关枪向敌人射击。他在出发参加游击队之前,应大学生基督教协会法国联合会的朋友的要求,写了一封信,信的结尾是这样的:"我走了,心中没有仇恨。我相信,作为基督徒,我们没有权力让那些异教徒们为了一个简单的政治理想,独自把生命投人到一场涉及国家命运、宗教命运以及我们后代精神命运的斗争中去。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几乎是一致的。"[129]在此我们仅要补充一点,以上文字的作者当时四十多岁,是六个孩子的父亲。的确,他不属于20年代最为出名的师范生,更不是那种在战后站到历史舞台上的师范生,之所以如此,确切地说,是因为在那个政治参与有时会以生命为代价的年代里,在生命即将步入成熟的时候,他达到了言行一致的目的,自己却被枪弹所击倒。

由此看来,把我们所列举的死者名字变成某种攻击萨特的材料,并且使人不由自主地想到他在法国沦陷的阴冷日子里,坐在富罗尔咖啡馆的软凳上和火炉边的情景,这是不恰当的。但是,我们能否因此而在做总结的时候,忘掉这些烈士的名字呢?我们曾经强调过,这些名字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何当萨特在战后开始鼓吹"参与政治的义务"时,许多他这一代的高等师范毕业生会被激怒。

否认萨特对维希政府和德国占领者发自内心的憎恶是恶魔

的行为。在这里,我们也不谈勒巴泰[130]和塞林[131]对萨特的恶毒影射,他们企图往萨特身上泼脏水,从而分散人们对他们自己参与政治的注意力。再说,由于哲学家萨特视力的衰退,他可能更加难以直接参加抵抗活动。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又如何解释马克·布洛克参加抵抗运动并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呢?他比萨特大19岁,有六个孩子。为萨特的弱点或无能辩解,无异于把他说成一个命令更年轻、更能干的人去死的传令官,这有点像曾经在前一次大战中推波助澜的法兰西学院院士。

神意裁判[132]

1940年3月11日,萨特在他的《手记》中写道:"我觉得作为大资产阶级的纪德,和作为出身公务员、自己也是公务员的我,我们只是过分地把现实当做了假象。其实,在纪德和我的身上,没有发生过任何不可挽回的事情。"[133]两个月后,法国沦陷。又过了几个星期,萨特的现实是他成了战俘。从此,他确立了和历史的关系。长期以来,历史对于哲学家萨特是一个盲点。相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我们在前文中看到,这一过程的开始略早于1939—1940年——历史开始对他产生影响。

萨特的反对者们后来甚至说,历史冲昏了他的头脑。这样的评论肯定会引起争论。而追寻萨特和历史关系的道路,恰恰能使我们避免这种争论,同时又不至于把萨特奉为神明。基于这一观点,萨特之所以从1945年以后起几乎直到他去世,都非常积极地参与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他对自己在战前的浑浑噩噩以及在战时没有什么特别光荣的举动而感到后悔,[134]也可能更加是因为在他和历史的关系经历了一个非常冷淡的时期以后,他想作出某种补偿。这种补偿通过他对历史明显的尊敬以及他服务于历史的行为而得以实现。历史有一个发

展的方向,我们必须顺应它,甚至加快它的发展。在这方面,战争起到了神意裁判的作用。

这样一来,我们更好地理解了萨特和共产主义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正是开始于那个时期。由于知识分子有义务推动历史的发展,而那时恰恰是法国知识界深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时期,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必须作出选择:要么和法国共产党竞争,这可能意味着双方的竞相许诺;要么和它联盟,鉴于两者的力量对比,这意味着萨特对于共产党的效忠。我们将会看到,上述两种情况在萨特身上先后都发生了。此外,正是在和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上,萨特和阿隆之间出现了思想分歧。

注:

1 让-保尔·萨特,《70岁的自画像》(*Autoportrait à sixante - dix ans*),《境地》(*Situations*),第10卷,伽利玛出版社,1976年,第179—180页。

2 雷蒙·阿隆,《法兰西公学落成典礼课》(*Leçon inaugurale au Collège de France*),1970年12月1日,法兰西公学出版社,1972年,第14页。

3 关于马克·布洛克的信,参阅《马克·布洛克致艾蒂安·布洛克的信——"奇怪的战争信札"》(*Marc Bloch à Éienne Bloch. Lettres de la 《drôle de guerre》*),由弗朗索瓦·贝达里达(François Bédarida)和德尼·佩尚斯基(Denis Peschanski)编订出版,摘自《当代历史研究院手册》(*Cahiers de l'IHTP*),第19期,1991年12月。尼赞的信同样也被该手册引述,该信发表于《1926—1940年的著作和书信》(*Écrits et correspondance 1926 - 1940*),玛斯佩罗出版社(Maspero),1967年,第263页。

4 1939年9月20日的信,出处见前文,第15页。

5 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8—1956,法国历史学家,和马克·布洛克同是《经济和社会历史年鉴》的创办人。——译者注。

6 同注3,第43—44页。

7 《精神——走钢丝者》(*Esprit—Le Voltigeur*),第89期,1940年2月,第291—294页。

8 乔治·弗里邱德曼(Georges Friedmann),《1939—1940年战争日记》(*Journal de guerre 1939 - 1940*),伽利玛出版社,1987年,第31、41、102和253页。

9　《奇怪的战争手记(1939年11月—1940年3月)》(*Les Carnets de drôle de guerre. Novembre 1939 – mars1940*),伽利玛出版社,1983年。新版本包括了在此之前从未公开发表过的《手记》的第1卷,伽利玛出版社,1995年。

10　《手记》第11卷,1983年,第216页。

11　《年富力强的时代》,第442页。

12　《梅洛–庞蒂生前》,摘自《现代》杂志,第184期,1961年10月,第304—376页,引文出自第304页(这篇文章后来被收进《境地》第4卷中,伽利玛出版社,1964年)。

13　本章是在1995年2月《手记》第1卷发表之前完成的,此前,该《手记》从未公开发表过,因此我们也从未有过机会查阅。我们不仅在本章而且在整本书里都证明了这一分析。《手记》的第1卷绝对是至关重要的。萨特在书中承认,很久以来,历史在他的面前"戴着面具"(第83页),他还多次进行了大段的自我批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篇文章的存在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它是一个暂时缺少的成分,其存在就像一颗行星,可以根据萨特的其他文章,通过数学演算推断出来。在和我们的主题有密切关系的段落中,特别要提的是第83—88页和第135—136页。

14　我们在前一章的结尾就提出了这一观点,它得到了《手记》第1卷第86—87页的证明。

15　圣–让–德–吕兹(Saint–Jean–de–Luz),法国西南部港口城市,位于法国和西班牙边境,西临大西洋。——译者注。

16　雷蒙·阿隆,《回忆录》,出处见前文,第210页。

17　《评论》(*Commentaire*),1985年2月,第233页。

18　苏西–昂–布里(Sucy–en–Brie),地名,位于巴黎东南,属瓦尔德马恩省。——译者注。

19　同时发表的还有他写的一组关于极权体制的文章,总题目为《马基雅维里和现代暴政》,德·法卢瓦出版社,1993年。

20　《王子》(*Le Prince*)和《论说》(*Discours*)均为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哲学论著。前者写于1513年,分析了夺取和巩固政权的方法。后者写于1513—1520年,全名是《关于提修斯–李维第一个十年的论说》(*Discours sur la première décade de Tite–Live*)。——译者注。

提修斯–李维(Tite–Live,拉丁语为Titus Livius),?—前208年,古罗马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史》。——译者注。

21　同注19,第59页。

22 哈娜·艾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德裔美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她是第一个把纳粹制度和斯大林体制相提并论的人之一。——译者注。

23 同注19,第119页。

24 他共写了67篇专题文章,其中最著名的一些最近得到了发表(《战争编年史——自由法兰西报(1940—1945)》(*Chroniques de guerre. La France libre*, 1940 - 1945),伽利玛出版社,1990年;另参阅战争结束时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的三本书:《从停战到国家暴乱》(*De l'armistice à l'insurrection nationale*),1945年,《帝国时代与法兰西前途》(*L'Âge des empires et l'avenir de la France*),1945年,《反对暴君的人》(*L'homme contre les tyrans*),1946年,该书第一版由在纽约的法国之家出版社(*Éditions de la Maison française*)1944年出版。我们的引文均出自这三本书。

25 "二战"期间,贝当领导的维希政府发起了一场"国家革命",其口号是"工作,家庭,祖国"和回归土地,目的在于掩盖傀儡政府不抵抗的现实。——译者注。

26 《从停战到国家暴乱》,第359和362页。

27 雅克·夏尔多纳(Jacques Chardonne),1884—1968,法国小说家、评论家。——译者注。

28 亨利·米雍·德·蒙泰朗(Henry Millon de Montherlant),1896—1972,法国小说家、评论家、剧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译者注。

29 皮埃尔·德里厄·拉罗歇尔(Pierre Drieu La Rochelle),1893—1945,法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二战"期间担任《新法兰西杂志》社社长,与纳粹侵略者全面合作,战后自杀而死。——译者注。

30 《反对暴君的人》,出处见前文,第132页。

31 关于这份名单,请特别参阅帕斯卡尔·富歇(Pascal Fouché),《沦陷时期的法国出版业》(*L'Édition française sous l'Occupation*),西欧货币研究所出版社(IMEC),1987年。

32 《反对暴君的人》,出处见前文,第37页。

33 同上,第201页。

34 同上,第40页。

35 同上,第45页。

36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雷蒙·阿隆的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有人作了初步、细致而综合的分析,请参阅瓦莱里·阿农(Valéry Hannon)的研究,《从大学到新闻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雷蒙·阿隆的影响(1939—1955)》(*De l'université au journalisme: le poids d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chez Raymond Aron*),摘自1993年克莱蒙-费朗学术

研讨会发言汇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的大学生、大学教师和大学》(*Étudiants, universitaires, universités en France pendant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待出版。

37　莫里斯·舒曼(Maurice Schumann),1911—1998,法国政治家,"二战"期间曾经在伦敦的"自由法国之声"电台工作。——译者注。

38　和蒂博·泰利埃(Thibault Tellier)的谈话,摘自后者的硕士学位论文,《1939—1945年的莫里斯·舒曼》(*Maurice Schumann 1939 - 1945*),里尔第三大学,1991年,第256页。

39　吉尔贝·约瑟夫(Gilbert Joseph),《如此甜蜜的沦陷时期:1940—1944年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和让-保尔·萨特》(*Une si douce Occupation… Simone de Beauvoir et Jean - Paul Sartre 1940 - 1944*),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Albin Michel),1991年。

40　法布里斯·戴尔·唐戈(Fabrice Del Dongo),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名著《巴马修道院》(*La Chartreuse de Parme*)的主人公,他作为拿破仑手下的士兵参加了滑铁卢战役。——译者注。

41　《致加斯托的信》,第2卷,出处见前文,第230—231页。

42　同上,第1卷,第268页。

43　马里于斯·佩兰(Marius Perrin),《和萨特一起在第十二D号战俘营》(*Avec Sartre, au Stalag 12 D*),让-皮埃尔·德拉日出版社(éditions Jean - Pierre Delarge),1980年。

44　与约翰·热拉希(John Gerassi)的谈话,1973年,该谈话未曾公开发表,在《小说作品》(*Oeuvres romanesques*)中有所引述,出处见前文,第56页。

45　但是,我们要指出,有人曾经对德里厄·拉罗歇尔在释放布拉齐亚克和萨特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了猜测,这一猜测并没有引起争议(参阅吉尔和让-罗贝尔·拉加什(Gilles et Jean - Robert Ragache),《作家和艺术家们在沦陷时期的日常生活》(*La Vie quotidienne des écrivains et des artistes sous l'Occupation*),阿歇特出版社,1988年,第76页)。

46　收入《境地》第3卷的开头部分。

47　菲利普·布兰(Philippe Burrin),《德国时代的法国(1940—1944)》(*La France à l'heure allemande. 1940 - 1944*),勒瑟伊出版社(Le Seuil),1995年。发表在《自由法兰西报》上的那篇文章同样也被收入了《境地》第3卷。

48　关于这点,参阅莫里斯·纳多的证言,《感谢他们——文学回忆录》(*Grâces leur soient rendues. Mémoires littéraires*),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90年,第56页。

49　莫里斯·纳多(Maurice Nadeau),1911—　,法国记者、作家、评论家和文学批

评家。——译者注。

50　同注48,第58页。

51　让-图森·德桑蒂(Jean-Toussaint Desanti),1914—　,法国哲学家。——译者注。

52　让-图森·德桑蒂,《哲学的命运》(*Un destin philosophique*),袖珍书出版社,第147页,以及《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好友协会简报》(*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s amis de l'ENS*),第122期,1971年12月。

53　娜塔丽·萨罗特(Nathalie Sarraute),1902—　,法国女小说家、评论家,新小说派的代表作家之一。——译者注。

54　阿尔诺·里克奈尔(Arnaud Rykner),《娜塔丽·萨罗特》,勒瑟伊出版社,1991年,第174页(作者和萨罗特的谈话是在1990年4月)。

55　洛朗斯·贝尔特朗·多雷亚克(Laurence Bertrand Dorléac),《失败的艺术:1940—1944》(*L'Art de la défaite. 1940-1944*),勒瑟伊出版社,1993年,第83和330页。另参阅吉尔和让-罗贝尔·拉加什,《作家和艺术家们在沦陷时期的日常生活》,出处见前文,第128—129页。

56　关于历史学家们就这个问题的争论,请特别参阅由让-皮埃尔·阿泽玛(Jean-Pierre Azéma)、安托万·普罗斯特(Antoine Prost)和让-皮埃尔·里乌(Jean-Pierre Rioux)主编的《从慕尼黑到夏多布里昂的法国共产党人》(*Les Comunistes fran-çais de Munich à Châteaubriant*),以及《黑暗年代中的法国共产党(1938—1941)》(*Le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des années sombres, 1938-1941*),国家教师工会联合会(FNSP)和勒瑟伊出版社,1986—1987年。

57　参阅埃莱娜·艾克(Hélène Eck),《追寻广播艺术》(*À la recherche d'un art ra-diophonique*),见让-皮埃尔·里乌(主编),《维希时代的文化生活》(*La Vie culturelle sous Vichy*),布鲁塞尔,孔布莱克斯出版社(Complexe),1990年,第269—292页,引文见第290页。

58　《法兰西文学》杂志(*Les Lettres françaises*),1944年9月16日,第5页,《费加罗报》,1944年9月19日,第2版。在前一周的《法兰西文学》(9月9日那一期)即"在解放的伟大日子里"出版的第1期杂志上,刊登了一份"法国作家的声明",要求"给伪君子和叛徒们以正义的惩罚"。让-保尔·萨特的名字也出现在六十多位签字声明者的中间。

59　乔治·玻利泽尔(Georges Politzer),1903—1942,法国哲学家,"二战"期间遭德寇枪杀。——译者注。

60 罗贝尔·德思诺斯(Robert Desnos),1900—1945,法国诗人,"二战"期间因参加抵抗组织而遭秘密警察逮捕,后死于集中营。——译者注。

61 莫尔齐那(Morzine),法国城市,位于上萨瓦省,是滑雪胜地。——译者注。

62 西蒙娜·德·波伏娃,《致萨特的信》(*Lettres à Sartre*),第2卷,伽利玛出版社,1990年,第250和252页。

63 阿腊斯(Arras),法国城市,位于加来海峡省。——译者注。

64 卡特琳娜·克罗歇特(Catherine Clochette),《1942—1944年的地下刊物"法兰西文学"》(*Les Lettres françaises clandestines 1942 - 1944*),巴黎第十大学硕士论文,1982年,第2卷,第93页。

65 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美国小说家,《白鲸》(*Moby Dick*)是他的代表作。——译者注。

66 克洛德·莫尔冈(Claude Morgan),原名克洛德·勒孔特(Claude Lecomte),1898—1980,法国小说家,"二战"期间秘密出版了第1期《法兰西文学》杂志,并担任了法国作家委员会秘书长。——译者注。

67 柯莱特(Colette),原名茜多妮·加布丽埃尔·柯莱特(Sidonie Gabrielle Colette),1873—1954,法国女作家。——译者注。

68 克洛德·莫尔冈,《柯莱特、勃艮第和戈培尔先生》(*Colette, la Bourgogne et M. Goebbels*),摘自《法兰西文学》,第4期,第3页。

69 洛朗斯·贝尔特朗·多雷亚克,同前书,第95页。

70 莫里斯·德·弗拉芒克(Maurice de Vlaminck),1876—1958,法国画家,野兽派的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71 莫里斯·德·弗拉芒克,《关于绘画的自由思想》(*Opinions libres ... sur la peinture*),摘自《喜剧》,1942年6月6日,第1和第6页。

72 洛朗斯·贝尔特朗·多雷亚克,同前书,第188页。关于《喜剧》在沦陷时期所持态度的总体分析,参阅帕斯卡尔·奥利,《合作分子》(*Les Collaborateurs*),勒瑟伊出版社,1976年,第205—208页。

73 洛朗斯·贝尔特朗·多雷亚克,同前书,第95页。

74 这一看法已经由戴尔德尔·贝尔(Deirdre Bair)提出过,见《西蒙娜·德·波伏娃》,法文译本,法亚尔出版社,1991年,第299—300页。

75 皮埃尔·阿苏里那(Pierre Assouline),1953— ,法国小说家、传记作家。——译者注。

76 皮埃尔·阿苏里那,《加斯东·伽利玛》(*Gaston Gallimard*),巴朗出版社(Bal-

land),1984年,第318页。

77 费尔南·克罗默林克(Fernand Crommelynck),1886—1970,用法语写作的比利时剧作家。——译者注。

78 《致加斯托的信》,第2卷,第312页。西蒙娜·德·波伏娃为该卷书信作了评论注解,关于在这里被提及的电台一事,她奇怪地说明:"维希电台。法国作家委员会允许在自由区播出。"那时候,自由区早在八个月之前就不复存在了! 而法国作家委员会的准许则更显得模糊不清。

79 1943年10月13日致让-保尔·萨特的信,百代电影公司档案(此信在名为"百代,第一个电影帝国"的回顾展上展出,该回顾展于1994年10月—1995年3月在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举行)。

80 霍尔日·桑普兰(Jorge Semprun),1923— ,用法语和卡斯蒂利亚语写作的西班牙作家、政治家。曾任西班牙地下共产党领导人,"二战"期间为抵抗运动成员,被流放于德国布痕沃尔德集中营。1988—1991年担任西班牙文化部长。——译者注。

81 霍尔日·桑普兰,《文字或生命》(*L'Écriture ou la vie*),伽利玛出版社,1994年,第84和100页。

82 资料来源:伽利玛出版社。

83 路易大帝中学档案。

84 阿贝尔·博纳尔(Abel Bonnard),1883—1968,法国作家和记者,后转而从政。"二战"期间与德国占领者合作,任维希政府国民教育部长。战后曾在德国和西班牙避难,先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驱逐出法国国境十年。1932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945年被除名。——译者注。

85 让·盖埃诺,《黑暗年代的日记》(*Journal des années noires*),伽利玛出版社,1947年,袖珍书出版社再版,第421页。

86 路易大帝中学档案。

87 强迫劳役(Service du travail obligatoire)是"二战"期间法国维希政府在德国占领者的压力下建立的一种劳役制度,目的是为纳粹德国的工厂提供劳动力。——译者注。

88 E·布鲁莱(E. Bruley),《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Historiens et géographes*),第242期,1973年4月,第675页。皮埃尔·勒努万(Pierre Renouvin)在《历史杂志》(*Revue historique*)1973年第250期第7页上,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89 贡多塞中学档案。尽管如此,这并不矛盾,萨特可能感到自己会有危险,于7月份离开了巴黎——而这一学年要到7月14日才结束。此事曾被吉尔贝·约瑟夫

提到过，但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的《一个循规蹈矩的少女的回忆录》中却寥寥数语，一笔带过。

90　这一观点的提出和证明，均见斯苔法妮·伊斯拉埃尔，《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L'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et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出处见前文，第1卷，第248页。于1943年秋被捕的霍尔日·桑普兰也回忆说，自己曾和其他人一起"成群结队"地去看《苍蝇》(同前书，第84页)。

91　杰罗姆·卡尔可比诺(Jérôme Carcopino)，1881—1970，法国历史学家，"二战"期间曾参加维希政府。1955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译者注。

92　《黑暗年代的日记》，第444页。

93　安格里德·加尔斯黎(Ingrid Galster)，《面对第一批评论家的让－保尔·萨特的戏剧》(*Le Théâtre de Jean－Paul Sartre devant ses premiers critiques*)，杜宾根(Tübingen)，根特·纳尔·韦尔拉格(Gunter Narr Verlag)，让－米歇尔广场出版社(Jean－Michel Place)，1986年。

94　同上，第330页。

95　同上，第333页。

96　塞日·阿戴德(Serge Added)，《维希时代的法国戏剧(1940—1944)》(*Le Théâtre en France dans les années Vichy.1940—1944*)，拉姆塞出版社(*Ramsay*)，1992年；《能说这是"抵抗戏剧"吗？》(*Peut－on parler d'un 'théâtre résistant'?*)，摘自《现代和当代历史杂志》(*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1990年1—3月号。

97　让·莱斯居尔(Jean Lescure)，《俄瑞斯忒斯和城市》(*Oreste et la Cité*)，摘自《法兰西文学》，第12期，第1和第3页。

俄瑞斯忒斯，一译奥列斯特，希腊神话中阿伽门农之子。阿伽门农被妻子谋杀后，俄瑞斯忒斯为父复仇，杀死母亲，因此受复仇女神惩罚，变成疯子。后为女神雅典娜所赦免，归国继承父位。——译者注。

98　参阅萨特1943年7月8日致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信，《致加斯托的信》，第2卷，第314页。

99　在清洗过程中，自尊可能不是萨特的首要优点：参阅皮埃尔·阿苏里那，《加斯东·伽利玛》，出处见前文，第384—385页，以及《知识分子的清洗》(*L'Épuration des intellectuels*)，布鲁塞尔，孔布莱克斯出版社(Complexe)，1985年，第100页。

100　这是米歇尔·贡塔于1993年6月在萨特研究会组织的报告会上提出的观点(参阅《世界报》，1993年7月2日，第31版)。

101　《如此甜蜜的沦陷时期：1940—1944年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和让－保

尔·萨特》,第155页。

102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342页。

103 菲利普·布兰,《德国时代的法国(1940—1944)》,(*La France à l'heure allemande, 1940—1944*),出处见前文,书中多处出现。

104 总之,菲力普·布兰本人明显地把萨特放在适应这一类人的下层,对于萨特来说,作品是参与政治的一种形式,他写道,直到1943年,"对作品的担心和对成功的渴望抵消了抵抗的愿望"(同上,第340页)。

105 克洛德·西蒙(Claude Simon),1913— ,法国作家,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译者注。

106 克洛德·西蒙,《致共产主义大学生联盟的公开信》(*Lettre ouverte à l'Union des étudiants communistes*),《快报》,1964年12月7—13日。几个月前,萨特曾在《世界报》的一篇文章里问道:"在一个饥饿的世界里,文学意味着什么?"而克洛德·西蒙早在5月24日的《快报》中就对此做了回答。

107 弗莱斯奈(Fresnes),位于法国瓦尔德马恩省。——译者注。

108 毛特豪森(Mauthausen),奥地利境内一村庄,"二战"期间纳粹在此建立起一座集中营,共有约十二万人死于此地。——译者注。

109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简报》,第55期,1947年12月,第31页。阿尔弗莱德·佩隆还被追授棕榈叶十字军功章、抵抗运动奖章和参战证书。

110 1938年7月14日致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信,摘自《致加斯托和其他几个人的信》,出处见前文,第183页。

111 巴斯克地区(Pays basque),欧洲地区名,分属法国和西班牙。——译者注。

112 法国内地军(Forces françaises de l'intérieur,简称FFI),成立于1944年,是集合所有法国国内抵抗德国占领军的抵抗分子和游击队员的武装力量。——译者注。

113 于佩尔·加莱·德·桑泰尔(Hubert Gallet de Santerre)的回忆,摘自小册子《向让·巴尤致敬》(*Hommage à Jean Baillou*),法国思想传播协会(Association pour la diffusion de la pensée française),1993年,第19页。

114 关于皮埃尔·冈(Pierre Kaan),参阅《伊冯·莫朗达未出版的回忆》(*Souvenirs inédits d'Yvon Morandat*),由罗朗·杜祖(Laurent Douzou)整理出版,《当代历史研究院手册》(*Cahiers de l'IHTP*),第29期,1994年9月,第98页。

115 库尔兰德地区(Courlande),位于立陶宛。——译者注。

116 参阅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一代知识分子——两次大战之间高等师范的预备生和正式生》,出处见前文,第557页。

117　西里西亚，东欧奥底河中、上游地区的总称，在波兰西南部，捷克斯洛伐克北部和德国东部，矿产极为丰富。——译者注。

118　他的妻子苏珊·罗曼(Suzanne Lautman)的回忆，见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46年《年鉴》，第59页。

119　埃瓦里斯特·伽罗华(Évariste Galois)，1811—1832，法国数学家，创立"伽罗华理论"。——译者注。

120　同注118，第56页。

121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简报》，第118期，1970年7月，第18页。

122　让·卡瓦叶斯比雷蒙·阿隆早几个星期，也就是在1938年1月22日在巴黎大学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123　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法国地名，位于法国中南部的中央高原，是多姆山省的省会。——译者注。

124　埃马纽埃尔·达斯弟埃·德·拉·维热里(Emmanuel d'Astier de la Vigerie)，1900—1969，法国政治家和作家。1941年在法国南部地区组织抵抗团体"解放"运动并创办报纸《解放报》。在戴高乐统一法国抵抗力量的活动中起过重要作用。法国解放后曾在临时政府中担任部长。——译者注。

125　格兰戈瓦尔(Gringoire)，维克多·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人物，其原型是法国历史上一位名叫皮埃尔·格兰高尔(Pierre Gringore)的讽刺诗人。——译者注。

126　参阅《贝尔特朗德·达斯弟埃·德·拉·维热里的监狱手记(1941年3月15日—4月4日)》[*Notes de prison de Bertrande d'Astier de la Vigerie (15 Mars – 4 avril 1941)*]，由罗朗·杜祖整理出版，摘自《当代历史研究院手册》(*Cahiers de l'Institut d'histoire du temps présent*)，第25期，1993年8月，第10页。

127　加布里埃尔·费里埃(Gabrielle Ferrières)，《让·卡瓦叶斯：1903—1944年战争中的一位哲学家》(*Jean Cavaillès, un philosophe dans la guerre 1903—1944*)，新版，勒瑟伊出版社，1982年。

128　让·卡瓦叶斯，《科学哲学全集》(*Oeuvres complètes de philosophie des sciences*)，布律诺·于伊斯曼(Bruno Huisman)整理，后接乔治·冈吉莱姆的《在记忆中》(*In Memoriam*)，爱尔曼出版社，1994年。

129　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书信》(*Lettre*)，重新刊登于《播种者》杂志(*Le Semeur*)，1944年11月，第43年，第1期，第2—3页。

130　吕西安·勒巴泰(Lucien Rebatet)，1903—1972，法国作家，曾是《法兰西行动

报》和《我无所不在报》的记者。——译者注。

131 路易－菲迪南·塞林,原名路易－菲迪南·勒图什(Louis－Ferdinand Destouches, dit Louis－Ferdinand Céline,),1894—1961,法国小说家。——译者注。

132 神意裁判,中世纪条顿族等实施的裁判法,如令被告将手插入火或沸水中,若不受伤,便定无罪。——译者注。

133 《手记》,第391页(1995年版的第575页)。

134 这种说法很常见,比如罗朗·迪马在回答安妮·科昂－索拉尔时这样说:"阿尔及利亚战争是他的战争。说到底,萨特错过了西班牙内战,错过了人民阵线。抵抗运动呢?他没错过,可是参加得太少。因此,他错过了他这个时代的所有重大政治事件,除了这一次,阿尔及利亚战争。"(《萨特》,出处见前文,第563页。)

第三部分
30 年的战争

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时代开始于 1945 年,这种观点似乎贬低了 30 年代前者在这方面所表现出的巨大热情。其实,这种观点来自于人们对历史的回顾,而正是这种回顾,确定了萨特所起的作用。如果有必要对上述观点提不同意见的话,那么法国的解放,同样也是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这一历史时期持续了大约三十年,直到 70 年代中期才告结束。它有两大主要特点:一方面,在知识界的记忆中,这一时期毕竟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时代,因为,如果说政治参与始于德雷福期案,并且通过 30 年代它在数量上的飞跃而逐渐扩大规模的话,那么,法国的解放,则标志

着知识分子明确宣布参与政治的开始。有时,政治参与还被视为知识分子应尽的职责。另一方面,尽管左派知识分子接二连三地改换招牌,但在这三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是他们占据了主导地位。

此外,在这30年里,知识分子在有关国家大事的辩论中起着首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30年是知识分子历史上"光荣的30年",重大事件层出不穷,社会局势动荡不安,这一时期经常被人们提及,但是现在看来,人们对它却颇有争论。另外,尽管我们不想过分渲染时间上的巧合,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正如后来法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所经历的光荣的30年中,在1973—1979年间受到两次石油危机的持续影响一样,法国的知识分子在70年代受到了两次思想震动。一次是1974年的"索尔仁尼琴[1]效应",另一次是70年代末对中国和印度支那的失望。此后,左派知识分子进入了一个"孤儿时代"。

在这30年中,让-保尔·萨特和雷蒙·阿隆常常代表着知识界两大对立、不久又成为相互敌对的阵营,就像一座山丘的两个坡面,萨特是山阳,阿隆是山阴。因此,对于这两位从前的"小朋友"来说,这个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场30年的战争。

注:

1 索尔仁尼琴(Alexandre Issaïevitch Soljenitsyne),1918— ,苏联作家。1945—1953年被捕入狱,1957年获得平反。他的作品大多抨击斯大林的独裁和苏联对人权的践踏。后被剥夺苏联公民权并被驱逐出境,流亡美国。曾获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第四章 大分裂

在这次长时间的分离之后，我们立刻变得接近了。[1]

1944年秋，萨特和9月份回到法国的阿隆相互重逢，这次重逢十分热烈。萨特为1944年11月的《自由法兰西报》撰写了一篇文章，又于次年1月在《战斗报》上对《自由法兰西报》大加赞扬。他评论说："《自由法兰西报》给人以最沉着、最冷静、最镇定的感觉。尽管它是在变化莫测的形势下出版的，但似乎总是与历史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它的编辑们在法国遭到驱逐、侮辱，被迫与家人分离，虽然他们的内心承受着希望和遗憾的折磨，但在这四年中，他们是如何保持这种不含私念的客观态度的呢？"[2]那时，他们两人甚至还计划创办一份周刊。[3]当然，我们必须把这个计划放到法国刚刚解放这样的历史环境中来看待，那时候，任何事情似乎都是可能的。由于后来周刊并没有问世，阿隆参与了

《现代》杂志的创办。作为编委成员,他为杂志的诞生花费了不少心血,并在杂志的第1期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自由幻想的破灭》和《事件之后,历史之前》。

如果说萨特和阿隆在30年代逐渐疏远了的话,那么法国解放时,他俩之间仍然保持着某种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是20年前他们在高等师范学校选择专业时所表现出的相投的志趣。战后几个月的时间里,由于两人共同的计划,他们似乎又重新找到了恢复友谊的理由。但是,战后的这段时间最终将是萨特和阿隆大分裂的时期。[4]一切都将在1948年结束,两位小朋友也将成为30年的敌人。

萌芽中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阿隆

但最初,除了他俩表面上重新恢复的友谊之外,萨特和阿隆还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似乎都离开了大学校园。1939年9月初的动员令发布前两个星期,阿隆被任命为图卢兹大学讲师。现在,这个职位仍在等着他。此外,波尔多文学院表示要聘请他讲授社会学。然而,年近四十的阿隆"染上了政治病毒"[5],他放弃了大学讲台,留在巴黎,走上了新闻工作这条捷径。不过,"政治病毒"的说法并没有很好地反映阿隆这一选择的原因,因为它意味着阿隆的转变来得十分突然,而事实上,这一选择是一个发展过程的结果,促成这种发展的因素有三个。

第一个因素形成于30年代初当他在科隆的莱茵河畔散步的时候,它使阿隆决心做一名参与政治的观众,这种说法的含义在上文中已经有所分析。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这一点上,战争构成了他思想转变的第二个阶段。因为,在旅居伦敦的50个月里,雷蒙·阿隆发生了新的变化。他对时事的观察是通过一种明确的方式——在定期出版的刊物,即《自由法兰西报》上发表

文章——来进行的。这位大学教师成了一名专栏编辑,并且已经形成了他日后的特点。他拒绝救世说,这也意味着他拒绝善恶二元论的诱惑,这种态度,在某种意义上他他故意疏远了自由法国的领导圈。我们曾经指出,对于雷蒙·阿隆来说,这些文章起到了一个筛选的作用。他暂时放下了大学教师首选的书本和科学或学会杂志,选择撰写长度仅有几页的文章和从事热点分析。然而,这种取舍在实际上更加明显:当时——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被颠倒的是表达方式的层次本身。也许,我们应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政治病毒"的概念,它既意味着一个年过四十的人——这个人既有在伦敦参加抵抗斗争的丰富经历,又经受过流亡的考验,一想到重新投人舒适的大学环境就感到深恶痛绝——对行动的愿望,又表达了一个从此停止退化的知识分子对思想斗争必要性的认识。

此外,这也恰恰是阿隆转变的第三个方面,他的身上逐渐显露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特点。雷蒙·阿隆去世那年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战前和战后,他的"一生分为两个看似不同的时期"[6]。他还说明,他的思想转变是在"二战"前的那些年里随着对"世俗宗教的批判"开始的,但是,这种转变尤其体现在"二战"期间的两篇文章中,这两篇文章对"世俗的宗教"作了阐述。所谓"世俗的宗教",就是"把国家引向极权的那两个政治运动"。他在1983年的这篇文章里用了"极权"一词,这不是他站在后人的立场上对历史作出的判断。早在1936年,他就开始使用这个词了。我们知道,阿隆关于这方面的思考是从纳粹德国开始的。因此,他他遗憾和痛苦的,当然不是对纳粹主义反思得过早,而是对苏联现象深人分析得太晚。但是,尽管阿隆认识这两个极权国家的规模和真实性在时间上有先有后,但苏联却早在"二战"之前就成为抵权国家了,阿隆那篇在1993年被收人《马基雅

维里和现代暴政》一书的文章,对于分析他思想发展的过程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1936年11月,埃利·阿莱维在为法国哲学协会作的一次演讲中,对德国、意大利和苏联的社会制度进行了类比。雷蒙·阿隆认为,这位作家的观点总的来说是贴切的,但他仍然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保留意见。他的论证在内容和语气上都很有力。他指出:"的确,所有极权制度都有共同点;它们权权和专制的事实本身就使它们具有某些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后者在感情上反对失去形式和民主的自由;但是对于从事总体分析的社会学家来说,这些相似之处就没那么重要了。"他在稍后又指出:"所以,即使、或者说特别是在民主国家,和自由主义相比,阶级斗争是一个重要得多的问题,因为人们对自由主义的兴趣相对较小。"[7]我们看到,那个时期,阿隆还远没有开始他从社会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转变。三年后,1939年5月,阿隆在《形而上学和道德杂志》上发表文章《埃利·阿莱维的专制时代》,在把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相比较的问题上,这篇文章的"左派偏见"——后来阿隆就是这样称呼自己当时的观点的——更加明显,因为他写道:"彻底忽视共产主义的理论、愿望和目标是不公正的。"[8]

但与此同时,阿隆表现出和埃利·阿莱维——他死于1937年,雷蒙·阿隆在1970年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他"很晚"才知道阿莱维[9]——的著作紧密接触的愿望,这表明,通过这次超越死亡的对话,雷蒙·阿隆在这个问题上开始等待,也就是说他进入了思想转变的时期。毕竟我们看到,他在1939年6月17日对法国哲学协会作演讲时,呼吁人们在比较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的同时,要捍卫"价值观念",尽管他指出这些价值观念必须不断更新。他还补充说,"保守的民主"在表面上是上述价值观念的

组成部分,"它只有通过自我更新,才可能拯救自己"[10]。从这段话所处的文字背景来看,它明确表达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在那些被雷蒙·阿隆认为过时因而被自动扫入坟墓的文章中,这种思想再也没有出现过。阿隆的思想转变在1939年更加明显,尤其是在《形而上学和道德杂志》所刊登的《专制时代》一文中,有一句话提出了"拯救人类信仰"的概念:"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对拯救人类信仰的颠倒和讽刺,而法西斯主义已经不知道什么是人类。"[11]

因此,通过"世俗宗教"的主题,阿隆对"专制"的思考内容已经开始丰富起来。在前文中,我们看到了他后来对这一转折所给予的重视。事实上,在1944年夏《世俗宗教的未来》[12]一文的两个分册中,这一思想变化得到了明确的体现。当然,那时候,雷蒙·阿隆向自由主义的转变只完成了一半,他的言论充满了统制经济的理论,这种理论当时十分流行,而阿隆本人也刚刚在英国目睹了它的实施:其实,在经济上,我们必须从以下的观点出发,"今天,不管什么社会制度,都应该保证所有人最低限度的经济安全(首先是就业安全),这意味着国家要直接或间接地肩负起统制整个经济的责任。"当然他还说明:"因此,那些意欲保留多元化和自由化的社会制度必须承担责任,否则人民不会原谅它们,同时,它们也要给市场自然机制以一定的地位,因为后者被认为是在一定的条件限制下符合大众利益的方法。"鉴于这一点,雷蒙·阿隆写道:"我们相信,从经济和社会角度来看,要想建立一个与对立的武断教条无关的中间社会制度是可能的。"他还举了自己在英国的所见所闻为例,然而,在法国,"旧统治阶级的反动盲目"可能会阻碍这一理论的实施。

同时,在政治上,雷蒙·阿隆提出了"普遍价值的意义",认为有必要"重新创立一种学说",该学说应该"以下列情感为依据:

个人权利、爱国主义以及对自由的要求"[13]。当时,阿隆的思想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因此暂时具有两重性。总之,一年后,1945年11月,他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社会主义的机遇"的文章,从中我们又看到了这种两重性:他为第三国际法国分部在第一次制宪会议选举中所获得的好成绩高兴,同时又指出,"社会党的崛起可能有一种更为广泛的意义。它的任务是在法国社会中引入社会主义的元素,即国家在人民群众的影响下领导经济,法国社会可以在消化这些社会主义元素的同时,保留在思想和人身方面的自由,法国是不会听任这些自由遭到牺牲的。"[14]后来,阿隆在他的《回忆录》中徒劳地把这篇文章称为"破烂"[15],后者有着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在自由主义的问题上,阿隆的两重性仍然存在;另一方面,这篇文章属于热点分析,而这恰恰是阿隆正在逐渐涉足的领域。

事实上,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政治病毒"对阿隆的主要影响,是使他加入了记者的行列。当然,在此期间,从1945年11月到1946年1月,他曾担任过新闻部长安德烈·马尔罗的办公室主任。但这段经历似乎并没有对雷蒙·阿隆产生影响,即使对于他来说,这是一次直接参观轮船机舱的宝贵机会。他认为,行动归根结底必须通过分析和评论来实现,除了影响轮船机舱以外,他更希望影响的是海堤。确实,在海堤上,人们也能够看到历史的风暴。

雷蒙·阿隆之所以能够进入《战斗报》,应当归功于安德烈·马尔罗。正是在他的建议下,阿隆才去拜访了帕斯卡尔·皮亚[16],后者当时和阿尔贝·奥利维埃[17]是这份报纸的主要人物。那时,《战斗报》的印数达15万份,正处于鼎盛时斯。[18]而加缪的光芒,更是为这份报纸在战后的巴黎知识界增添了声望。1944年8月25日,雷蒙·阿隆在该报上写了一篇题为《法国强盛的条

件》的文章。此后,其他文章接踵而来,比如1945年2月7日的《另一个德国》。1946年3月,他加入了《战斗报》撰稿人的行列,为该报工作了一年多,直到1947年6月初。1946年4月,他写了七篇系列文章,总标题为《政治舞台》,分析了法国的主要政党(4月14—23日)。"阿尔贝·奥利维埃和其他许多人都不无惊讶地向我表示祝贺。在新闻界这个小圈子里,(这些文章)突然使我拥有了我在战前所写的书从来不可能给我的地位,因为大多数记者都不知道我的那些书。我不再仅仅是专栏作者,我成了地地道道的社论作家。"[19]阿隆的撰稿十分频繁,在14个月的时间里,他写了140篇文章,也就是说平均每三天一篇。

让-保尔·萨特的成名

1946年春,雷蒙·阿隆进入《战斗报》工作,同时他准备离开《现代》杂志。该杂志在经过近十个月的酝酿之后,于1945年10月1日出版了第1期。事实上,在1944年12月14日召开的伽利玛出版社董事会议上,加斯东·伽利玛就告诉董事会成员们,"让-保尔·萨特先生向他提交了创办一份名为《现代》月刊的计划"。他还宣布了该月刊的编委人选:西蒙娜·德·波伏娃、莫里斯·梅洛-庞蒂、雷蒙·阿隆、米歇尔·莱里[20]、布里斯·帕兰[21]、让·波朗[22],当然还有让-保尔·萨特。[23]这一计划得到了董事会的批准,在后来的十个月里,以上人选没有多大变动,只有布里斯·帕兰不在其中,而阿尔贝·奥利维埃的名字则出现在第1期杂志的编委名单中。

从此,这份以红黑字体为标题的杂志,在知识界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有关它创办的情况,大家基本都已了解。社会学家安娜·博歇蒂受到皮埃尔·布尔迪厄[24]研究的启发,在一份分析报告的结尾中写道,《现代》杂志的诞生,是萨特蓄谋已久的产

物,是他有意在知识界树立威望的策略的成果,也是他巧妙运用自己的资本特别是名誉资本的结果。事实是否真的如她所写的那样呢?安娜·博歇蒂还指出,萨特在战后最初的几年里名声渐起,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就是他兼备了两类对立的知识分子的特长,在当时,这两类知识分子就是“教师”和“创作者”。[25]的确,萨特既像柏格森[26]又像纪德,他目睹了自己的思想影响力的飞跃。就此,我们是否能同意博歇蒂的观点,认为哲学家萨特所获得的思想主导地位,仅仅是他成功运用“策略”的结果呢?这里我们不谈由吉尔贝·约瑟夫发起的辩论,这场辩论我们已经在前一章中提到过:在沦陷时期,萨特是否曾经努力促进过自己的文学生涯?法国解放后,他又是否曾经利用过抵抗分子的称号,来继续提高自己的名声?我们说过,关于这一点,历史学家不能作出科学的、盖棺定论的回答,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涉及一个人的良心,历史学家无权在这方面滥用自己的特殊职责和权威。另一方面,这个问题特别应该放到另一个更加广泛的问题中去研究,那就是沦陷时期“沉默之海”的问题。由于那时,法国作家的任何言论事先都必须受德国人的检查,因此,这些言论可能被视为对法国被占这一既成事实的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作家是否应该有意识地停止文学创作?换言之,他们是应该采取思想上的焦土政策,使铁蹄下的法国沦为精神沙漠呢,还是应该相反地高举起法国思想和艺术的大旗?确实,许多迹象表明,这个问题只是在法国解放后的知识分子清洗运动中,才变得特别尖锐。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当时出现过一批出色而有前途的文学作品。此外,如果说有一部分文学和戏剧作品被占领者收买的话,那么作家们的大多数作品即使没有抵抗内容——原因不言自明!——但至少也没有和占领者合作的成分。

因此,关于在沦陷时期创作或上演的作品问题,不是几句话就说得清的,更不是一些笼统的词语所能概括的。最为现实的做法,应该是对个案进行分析,观察它顺应占领者的行为和程度。我们在前一章所采取的就是这种做法,这里就不再赘述,除了要提醒大家,萨特的成名是在沦陷时期开始的。因为我们都已看到,《恶心》在评论界引起强烈反响的同时,也在读者中间产生了名副其实的影响。萨特应征入伍的时候,的确还不是一位杰出的文学人物——我们应该根据这个依据,来评判他在以后几年里的成名——但他已经是文学界的组成部分了。正因他是巴黎文学小圈子的一分子,西蒙娜·德·波伏娃才会在给被俘的萨特的信中写这样的话,这些话不应该仅仅被看做是对当时远离文学环境的萨特的一种鼓励:"巴黎没有忘记你——报刊上时不时会出现一些关于你的短讯。《作品集》有一天报道:'有人告诉我们,萨特先生正在准备撰写一本名为《理智的年代》的小说;希望他能成功'……"[27]

萨特回到巴黎之后,特别是从1943年起,小有名气的他声望陡增。我们知道,从那时起,萨特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而且涉及的领域极为不同。比如1943年的《苍蝇》和《存在与虚无》,以及当年11月1日以后他和百代电影公司手稿部合作、月薪2.5万法朗的工作;还有1944年的《禁闭》和在《战斗报》上发表的关于巴黎解放的系列文章。1945年及以后的几年,萨特依靠媒体成为著名人物,但在此之前,作为作家和哲学家的萨特,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名誉资本,何况他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普及了他的哲学思想,从而使后者更加容易地被了解。我们看到,这一特点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即萨特最初开始写作的时代。

萨特很快就得到了他的名誉资本的回报。巴黎解放后,他一直在抛头露面,因为他的名字总是出现在报刊的头版。比如,

1944年9月9日的《法兰西文学》在头版刊登了他的文章《沉默的共和国》,这篇文章因开头的那句话而著名:"我们从来不曾比沦陷时期更加自由。"七个星期后,又是10月28日的《法兰西文学》在头版刊登了《延缓》的节选(《1938年9月23日》),当时这部小说尚未出版。此外,就像在沦陷时期的最后几个月一样,萨特还想着电影。1944年9月29日,百代电影公司在给萨特的一封信中,确认收到了"他关于抵抗运动的剧本"。12月1日,萨特在回信中说明,他正在继续该剧本的写作工作,同时还在创作一部"喜剧作品"[28]。如果说萨特的最终成名是1945年的事,那么早在1944年底,他就已经有了引起反响的能力。他1945年第一季度在美国的旅行生活几乎没有影响几个月后他的成名。1945年10月29日,萨特作了关于存在主义的著名讲座,现在看来,这个讲座所引发的骚动是他本人知名度的一个证明。1945年年中,萨特已经成名,面对刚满40岁的他,人们不禁想到奥古斯特·昂格莱,他在关于早期的《新法兰西杂志》的研究中,用这样的话描写了成熟的纪德:"这个盛夏,是纪德的年龄和创作如日中天的时刻。"[29]的确,我们将会看到,萨特的名声在以后的几年里还将更加显赫,并将很快达到世界水平,但是在法国,变化已经开始出现。

此外,在1945年1月15日《自由法兰西报》的一篇匿名文章——作者是不是雷蒙·阿隆呢?——里,有人公开把萨特和纪德作了比较,文章指出,萨特当时获得了"和巴莱士在1890年以及纪像在1905年所获得的同样的威望"。对于我们来说,这一比较的珍贵之处表现在另一个方面。就像过去的纪像一样,萨特从此开始嗅到了火药味儿。比如,像尔·克洛岱尔[30]在1946年1月17日给加斯东·伽利玛写了一封信,抱怨这位出版商在发表"极为平庸的蠢话"。因为"人们将不再阅读纪德、萨特或加缪

的作品,而只阅读保尔·克洛岱尔的作品”。其实,使这位作家恼怒的是“存在主义的丑行”:“我根本不喜欢存在主义,因为我把它看做是一种系统的害人举动,不幸的是,它在法国年轻人中间获得了和可怜的纪德过去所曾获得过的同样的成功。你们在为那些无耻之徒和坏蛋作正式的宣传,而我对接近这些人则根本不感兴趣。”[31]这一善良对邪恶的致敬很说明问题,萨特存在着,因为克洛岱尔遇上了存在主义。

这里,我们必须回到前而提出过的问题上来。哲学家萨特之所以能迅速获得优势地位,是否仅仅是因为他成功地运用了“策略”?答案很复杂,因为把让-保尔·萨特得以在知识界树立其权威的原因单纯地说成是策略运用得当,这肯定是片面的。我们不能把对各种关系和各种人的研究,简单归结为假设的做观社会效应。除非我们同意可以忽略知识分子行为的中心问题,即忽略能够做发他们的创造、孕育他们的才华、将他们的现实和精神连结起来的复杂行动。同样,在另一个层面上,除非我们认为可以回避而不是澄清以下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在特定的时间里,知识界的某种小气候是如何转变为精神的高压区的?说得更通俗点,报刊杂志是如何将它的规则强加于知识分子的?《新法兰西杂志》做到了这一点。面后来《现代》杂志——至少是在它创刊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也做到了这一点。

因此,事实上是我们看到萨特树立了自己的声望,他的成功即使不是精心策划的结果,至少也经过了他不懈的努力,而不仅仅是凑巧。这位哲学家在其职业生涯的各个阶段,都恳求过别人的支持,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比如夏尔·迪兰[32]写信给加斯东·伽利玛,向他推荐萨特和《忧郁》即后来的《恶心》[33];还比如《喜剧》的主编勒内·德朗日,根据萨特和波伏娃的书信往来,他不仅仅是波伏娃在战争期间的恩人。此外,现在看来,尽管萨特

在他的信中不时表现出对校园的讥讽,但他一直打算写一篇博士论文,希望以此保留自己在大学任教的可能性。比如,1940年3月13日,"手握武器的战士萨特"告诉布里斯·帕兰,他准备把《假想的事物》一书作为他的博士论文。两年后,当《存在与虚无》一书即将出版时,他又一次表示可能把它作为博士论文。[34]

尽管萨特野心勃勃,脚踏几只船,但这也属正常。至此,问题不是要弄清萨特当时是否存心企图占据知识分子霸主的地位,而是要认识到,他的确希望自己成为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既然如此,创办杂志就成了一个必然会被提出的问题,因为,在知识分子追逐功名的游戏中,办杂志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战略步骤。的确,在1945年初秋,让-保尔·萨特还只是声名乍起——前一年春天,他"很乐意地和'巴黎的头面人物'混在一起"[35]——但他的名声已经十分稳面;正是依靠这种名声,他在没有《现代》杂志的情况下,仍然拥有一席之地。但是,杂志能使他成为一种类型知识分子的代表,能帮助他向别人灌输自己的思想。因为一般说来,控制一份杂志,是获得成功的另一种有效手段。由于期刊的特点所带来的灵活性,以及"(它)所刊登的文章的思想同一性",杂志理所当然地成了"在文化和思想领域里最适合影响别人的工具"。[36]

所以,杂志既是知识界的心,又是知识界的肺,一些更为持久的精神时尚和思想现象,有时就是在杂志上得以形成和传播的。于是,对于某个年龄层次的人来说,杂志是他们进入知识界的大门,也是他们在知识界受人重视的希望。想要进入知识界的轨道,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或者是在现成的杂志里播序渐进,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就这样做着为某些专栏撰写短文的练习,而杂志的控制权则牢牢地掌握在那些年长者的手里;或者就是创办新的杂志,直接掌管对它的控制权。在前一种情况里,年

轻人必须等年长者交出他们的职位;而在后一种情况里,他则必须开辟一个新的天地。萨特未费吹灰之力,便做到了这一点。他借助法国解放的形势和自己的名声,不等年长者让位,就开出了一个新天地。

但是,萨特不仅是那种狡猾地把自己在知识界的资本同时拿到几个不同的窗口——即大学和出版社——去生利和致富的小本食利者。由于他的杂志有着四重意义,所以立刻产生了反响,而《现代》杂志正是依靠这四重意义才站住了脚。因为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主要问题不是萨特的动机,而是他成功的原因。为什么成功的是他而不是别人?知识界并不缺乏善于做小本证券买卖的天才。归根到底,如果我们仅仅把萨特在法国解放之后的飞黄腾达看成是他"策略"的结果,那么我们就是在宣扬知识分子历史的目的论观点。我们必须指出,即使不考虑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未知和意外的因素,萨特要想可能飞黄腾达,也必须具备好几个条件。这些条件能帮助我们弄清《现代》杂志的四个历史意义。

级别的变化

首先是代与代之间的交替现象,这种现象由于法国的解放而进一步加剧。不过,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指出的那样,这一现象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发生在一代人的内部,而不是两代人之间。这种情况比较罕见,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作出说明。

那时,1925年前后进入乌耳姆路学习的年轻人已有四十多岁,这一代崇尚和平主义的人在历史面前左右为难。我们看到,他们和历史的冲突是悲剧性的。法国解放时,1905年出生的那一代人已经分崩离析。而对整个30年代日益增大的战争威胁,以及在后来世界大战的风雨之中,和平主义的倾向使他们这一

代人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因此,作为当时高等师范学校社会主义和基督教团体的两个代表人物,乔治·勒弗朗和勒内·夏托经常和雷蒙·阿隆接触,他俩在法国解放后都被关进了监狱。和他们相反,在这个1944年的秋天,其他曾经参加过上述两个团体的成员或在抵抗运动中牺牲,或遭到流放而一直杳无音讯。从那时起,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得到了澄清:当时,一批像让-保尔·萨特和莫里斯·梅洛-庞蒂那样年近四十的知识分子走到了历史舞台的前台,这一现象的确具有传统的代与代之间相互更迭的性质——这一代二十多岁的人在又过了大约二十年后,开始"成名"——但同时更具有同一代人内部相互接力的性质。"1905年的一代"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此,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一代人的内部发生了一次接力。那些早在"二战"之前就已经积极参与政治的领跑者,或由于威信扫地而退出政治舞台,或因为参与政治而牺牲生命,在肉体上被消灭,进而消失在历史的深渊里。

何况,同样由于历史的这种碰撞,在1905年的这一代人当中,一些原先有着明确政治立场的人永远放弃了对政治的参与,因此,这些人和历史的关系,从此就成了个人的、隐私的范畴,而不再带有公众的性质。克洛德·莱维-施特劳斯就是一个例子,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在1980年声明:"我年轻时曾是个和平主义者,后来我经历了法国军队的大溃退,溃退从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边界开始,经萨尔特、屠尔、洛代兹和贝济埃,一直退到蒙彼利埃。我犯的错误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我对自己的政治判断发生了明显的怀疑。"[37]人种学家莱维-施特劳斯的这些声明带有倒退的特点,[38]这表明,从政治参与到退却放弃——至少是在公众面前退却放弃——的转变,在他的一生中是决定性的。

在和历史的关系这个问题上,1905年出生的这代人确实经

历了一次角色的互换。有些人遭到了淘汰或丧失了威信，有些人选择了更为近便的道路，而另有些人则在后来的日子里确定了自己和历史的关系。不管怎样，《现代》杂志就是从这一代人中间涌现出来的第二批知识分子的产物，和从同代人中涌现出来的第一批知识分子相比，前者显然没有"进入当时的角色"。因此，与其说这是同一代人内部的接力，不如说是一种更替。萨特和波伏娃通过惊人简洁的思维，以当时自己和历史并不亲密的接触为论据，证明了这种更替的必要性："战前，很少有知识分子试图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都——或者说几乎都——失败了，连最受我们尊敬的阿兰也丧失了威信，所以我们必须替换他们。"[39]

尽管如此，这种同一代人内部的现象并不发生在萨特一个人身上。因此，尽管他解释说，是《现代》杂志为他起到了特洛伊木马的作用，使他轻而易举地步入了文学界，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找出更加特殊的原因。所以，这里我们要重提法国解放时萨特的名声问题。造成这种突如其来的名声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萨特频繁的文学创作，二是由于对他的贬低而造成的逆反现象。

关于萨特在1943—1945年间文学创作的频繁性和多样性，我们在前文已经有所分析。知识界的一些报刊很快就对此作出了反应。比如，从1945年11月24日起，《法兰西文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由多米尼克·奥丽[40]主持的调查，题为《什么是存在主义?》。调查的第一篇文章有一个很说明问题的标题《进攻的战果》。因为在文章作者看来，"这很像是一次进攻。在将近三个星期的时间里，先后出版了让－保尔·萨特的著作《自由之路》的前两卷(《理智的年代》和《延缓》)、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小说《别人的血》和剧本《无用之辈》，还有把年轻的存在主义学说的赞同

者团结在一起的杂志《现代》。这还不包括让-保尔·萨特在'现在'俱乐部所作的关于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讲座。"所以,在作者眼里,这些活动就像是一次有准备的密集射击。此外,《法兰西文学》还使人们形成了一种公式化的看法,这种看法后来被一些较少为知识分子阅读的报刊引用:"就让我们看看这位存在主义学派的领袖吧。我们是在圣-日尔曼-德-普雷附近找到他的。"至于让-保尔·萨特,他一边宣传存在主义,一边这样回答前面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这种学说认为,存在永远先于本质、创造本质。人首先存在着,他在自我选择的同时自我创造,在行动中产生。"

由于对萨特的贬低而造成的逆反现象只是在后一个阶段才发生。事实上,萨特只是在以后的几年里,才在媒体上获得了某种知名度,因为媒体把他和发生在圣-日尔曼-德-普雷的运动混为一谈。这种不合时宜的说法,很能反映当时萨特迅速出名的奇怪特点。后来,人们经常提及那篇在某种意义上为萨特的出名奠定基础的文章,在1947年5月3日的《星期六晚报》上,雅克·罗贝尔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大家对"位于圣-日尔曼-德-普雷的酒馆"的注意。人们可以看到——也许相反,因为从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语气来看,这很可能是一条假新闻——在几个星期前开张的"禁忌"酒馆的厕所里,墙上写着这样的话:"存在主义者是成天把萨特挂在嘴边的人。"从那时起,出于时髦或懒惰,归根结底是出于因循守旧,当时的报纸把萨特的作品和圣-日尔曼-德-普雷教堂周围的"存在主义村庄"混为一谈,该教堂"已经成了萨特大教堂"。这件事大家都知道,因此这里我们毋庸赘述。也没有必要提醒大家,当时聚集在多斐那路的"禁忌"酒馆或卡尔迈路的罗里昂代酒馆里的年轻人,大部分都持"存在主义"的态度,他们的这种态度与其说是来自对《存在与

虚无》的刻苦阅读，不如说是来自战后典型的对发泄的需要。比起那些关于圣－日尔曼－德－普雷“酒馆”的轰动性文章来，几年后雅克·贝克尔[41]的电影《七月的约会》更好地反映了这些年轻人的感受。此外，在这一点上，萨特的态度十分明确，决不含糊。比如，他在1947年11月3日一档名为《现代论坛》的广播节目中说：“我记得。在瑞典有人打电话问我：‘您对禁忌酒馆的关门有何看法？’”他在电台里明确回答：“我从来没有去过这家酒馆。它关不关门我根本不在乎。”[42]

几年后，让·科克托在他的《日记》里不无幽默地指出：“‘存在主义者’，从来没有一个词像它那样言不达意。做存在主义者，就是无所事事、在小酒馆里酗酒。这就好像如果在纽约的酒馆里有一些‘相对论主义者’在跳舞，那么人们就会认为爱因斯坦也会在那里和他们一起跳一样。”（1951年7月16日）尽管如此，“存在主义”还是很快被战后的法国人看做是一种传奇的思想，而萨特也从那些无名的知识分子同胞们中间脱颖而出。何况，几乎与此同时，存在主义成了法国的一项出口产品。1947年2月，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给让－保尔·萨特的一封信中告诉他，她去距离纽约两个小时火车的瓦萨女子中学做讲座时，看到那里的学生们正在排练《苍蝇》。[43]在大战爆发的前夜和法国沦陷时期，让－保尔·萨特在巴黎知识界的小圈子里崭露头角，仅仅几年时间，他的名声就从这个小圈子传到了美国的大学校园。从此，人们在拿他和阿隆作比较的时候，就必须考虑两人在级别上的差异。虽然几年后，阿隆在大西洋彼岸的某些大学校园里也有了读者，有时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萨特和阿隆分别在两个不同的领域里活动。从那时起，由于萨特的知名度，他和过去的“小朋友”没有被分配到同一级别的比赛当中。甚至几年后，连美国电影都间接地以

他为题材。1956年,斯坦利·道能[44]在影片《滑稽小脸》中,把乔·斯托克通这一人物搬上了银幕,该人物由奥黛里·赫本扮演,是格林尼治村的一个年轻图书管理员,自称是“厌恶主义哲学的信奉者”,并来到法国的圣-日尔曼-德-普雷拜见该流派的大师埃米尔·弗罗斯特,后者由米歇尔·奥克莱尔扮演。于是我们看到,存在主义不仅成了法国的一项出口产品——就和许多高档工业产品一样,[45]因为影片的其他部分发生在摄影界!——而且还成了一种被大众文化媒介所替代的神话。

“文化”一词是被故意用在这里的,《现代》杂志迅速引起的反响也是一种文化历史现象。法国史学界有关文化历史的最新突破,要求人们在好几种时间条件下来研究这种现象,这能帮助我们对它的理解,引出它更多的历史含义。至于《现代》,这份杂志的崛起既要从短暂的记事角度来分析,也要从更为广泛的思想历史和知识分子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在前面看到,所谓短暂的记事角度,是指发生在同一代人内部的更替——这种更替的本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同时也是指我们刚刚研究过的萨特的成名原因。但是,萨特的名声,只有从两个更加广泛的角度来看,才显得有意义:一是哲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出现,而此时此刻,雷蒙·阿隆正在逐渐向其他领域发展;二是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时代的开始。

哲学的崛起

有一些颇具欺骗性的现象,把1945年初夏保尔·瓦莱里——他不是那种被保尔·尼赞在1939年称为“法国文学高级官员”的人,而是两次大战之间某种法国文化的代表——的国葬,和同年初秋让-保尔·萨特推出《现代》杂志相提并论,要是我们也被这些现象所迷惑,那么毫无疑问就错了。战后法国的文化

现实复杂得出奇。同样，一些文艺作品也由于它们地位的互换而被重新划分了等级，我们最好不要夸大这种地位互换的广泛性。当时发生在文学和哲学之间的地位互换只是局部性的。与此同时，某些迹象也非常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当时，哲学作为时代的特别标记，有时侵占了文学的领地。于是，小说经常被用做哲学理论的载体，这样做的不仅仅是萨特和加缪；同样，戏剧也成了一些哲学家表达和宣扬自己世界观的方法，在这方面，上述两位作家堪称典范。

的确，现在看来，至少是用广大群众的话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知识界发生了一次环境的变化，文学的时代变成了哲学的时代。关于这种变化的原因和表现，足足可以写一本书。这里我们仅说明一点，当时，即便是在巴黎高师预备班这个不受时尚侵扰的温室里，上述变化也毋庸置疑地存在着。战争前夕，安德烈·纪德是亨利四世中学师范预备班的思想大师，在这所中学里准备高师入学考试的，除其他学生以外，还有让·图夏尔和莫里斯·克拉韦尔。[46]沦陷时期，让－弗朗索瓦·里奥塔[47]和阿兰·土莱纳[48]曾就蒙泰朗和纪德的功劳对比进行了无休止的辩论。[49]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从那时起，哲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高师预备班学生们的谈话当中，1943年出版的《存在与虚无》就是在预备班产生了最初的共鸣。战后，受文学影响很深的文科预备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此，哲学成了知识大厦的穹顶和文化判断的标准。在那些影响学生的老师们——不管这些老师是大师还是启蒙者——当中，哲学教师正蚕食着文学教师的领地。在这方面，让·盖埃诺的时代正在过去，而今，给预备班学生以决定性影响的，是让·希波利特、斐迪南·阿尔基耶[50]、艾蒂安·博尔纳、让·波弗莱等人。随着老师们年龄的更替，胡塞尔、海德格尔[51]、马克思等哲学家的思想渐渐进入了师范预备

班,而在此之前,除了康德之外,预备班很少讲授莱茵河彼岸的哲学家。两次大战之间,阿兰似乎是这个预备班世界的自由电子。相反,他的晚辈、战后的哲学教师们则成了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代表人物。

当然,随之而来的是莱维·施特劳斯、拉康,不久是福柯[52]的"时代"。但是,在人文科学领域发生新的改朝换代之前,1945年开始大行其道的还是哲学。何况,即使当法国知识界逐渐进入一个新时期的时候,一些在思想上持强烈保守态度的人,仍然把哲学维持在很高的地位。师范预备班就如同保存言论和思想的场所,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一个哲学的群岛。再者,出自这个群岛的学生们后来自己也成了在中学里执教的教师,他们就像是那个哲学至上的时代遗留下来的产物。

萨特的荣耀

此外,尽管萨特有他的知名度做包装,但他并非是法国解放时惟一的著名哲学家。仅用社会进入了一个哲学的纪元来解释"萨特时代"(安妮·科昂-索拉尔语)的到来,这是远远不够的。《现代》杂志所引起的反响,也不单是由让-保尔·萨特日益显赫的荣耀所带来的影响造成的。在这个参与政治的时代,作家的影响和读者的反应都是前者进入知识界的敲门砖。

在法国解放和知识界大清洗的时候,知识分子的影响问题——也就是责任问题——十分时髦,甚至公众似乎都认为这种责任是存在的。1944年9月11—16日,法国公众意见研究院就"是否应该逮捕萨夏·吉特里[53]"这一问题作了一次民意测验,56%的人回答说应该,12%的人回答说不应该。在发表以上数字的同一期《法国公众意见研究院消息公报》上,还刊登了另一次民意测验的结果,在1944年夏末,有32%的法国人希望"判贝

当元帅的刑”，而反对者则占58%。[54]几个月后，公众的这种严厉态度同样反映在了知识分子的身上，1945年1月19日，罗贝尔·布拉齐亚克被判处死刑。在回答“您是否赞成判处报纸《我无所不在》的主编罗贝尔·布拉齐亚克死刑？”这个问题时，52%的人赞成，12%的人反对。[55]当然，许多观察家后来都不无道理地指出过这种存在于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之间的对比所包含的不公正成分。在《什么是文学？》一书中，让-保尔·萨特这样指出：“我们的职责和任务是社会强加到我们肩上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社会认为我们很可怕，因为它判处了我们中间曾经和敌人合作过的人死刑，却让那些犯过同样罪行的工业家们逍遥法外。今天，人们都说，建一堵大西洋的堵比谈论这堵墙要好。”[56]

无论如何，确切地说，那些曾经“谈论”——或者经常是撰写——的人有过某种影响，而且经过一个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清洗，后者已经“进入了当时的角色”。1944—1945年，有关这一主题的讨论、调查——比如1945年2月《十字路口》报的调查——和辩论层出不穷。甚至连戴高乐将军都在15年后《战争回忆录》的第3卷中，提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问题：“尤其是作家，由于他们的天职就是对人类的理解和表达，因此这场充满政治和情感冲突的战争特别能吸引他们。在文学界和在其他领域一样，才华是责任的一种称号。”[57]在这种背景下，萨特在1945年10月第1期《现代》杂志的《阐述》一文中，提出了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义务，并且列举了理由，当时，这篇文章只能算是对这场辩论的贡献之一。然而，后人却恰恰记住了这篇文章。此外，在萨特那个时期的文章和他本人的名声之间，存在着一种无休止的螺旋现象，他的作品帮助他巩固了自己的名声，反之，正是因为萨特已经拥有的名声，这些作品才会脱颖而出。

《阐述》一文非常著名，因此这里我们就不再多加谈论。有

关它的创作情况现在也已经很清楚,这篇文章早在1945年10月前很久就诞生了,其主要思想被刊登在当年5月份的一份英文杂志上。这里我们仅指出一点:从现在看,萨特似乎是通过这篇《阐述》,来表明他从此要在历史进程中扮演角色的愿望的。确实,作为作家,不管干什么,他都是在“参与”,都“处于(他)那个年代的环境当中”。“既然我们通过自己的存在作用于时代,那么我们决定要让这种行为成为有意识的举动。”从那时起,结论对于作家来说是明确的:“我们希望作家和时代紧密联系。”“时代”、“年代”,或者说历史,都在行进之中。就萨特而言,知识分子和历史的关系,成了判断前者身份标准的一个方面。从此,文学开始参与政治,并要求和时代紧密联系,这种联系有着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文学属于时代,是时代的镜子;另一方面,作家参与政治,是时代前进的推动者。

这样看来,政治参与的确不再仅仅是一种紧急情况下的自我动员,而是作家或艺术家的职责。然而,历史学家认为,这里仍然存在着某种矛盾,我们注意到,萨特对政治参与义务的原因的解释,其实只不过是对早在30年代就已经形成的传统的一种润色,当时,已经有大批知识分子参与了国家大事的辩论。根据这个观点,让-保尔·萨特在1945年10月为知识分子确定的目标,更多地是一个历史的终点,而不是什么革命性的突破,在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历史现实远远地走在了理论的前面。在这方面,1945年的历史现实已经体现在1936年或1940年中了,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当时人民阵线的汹涌波涛和沦陷时期的狂风暴雨,都预示着法国解放和冷战期间意识形态的巨大浪潮。当然,萨特并没有受到前者的洗礼。

尽管如此,如果有必要对政治参与的时代开始于1945年这一观点——这种观点以回顾的眼光再现历史,它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对萨特角色的决定——提出异议,如果《现代》杂志诞生之日只是被知识界一部分人神话般的记忆视为政治参与时代的开始之时,那么,与此并不矛盾的是,那个时期的确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这个阶段从法国解放到70年代中期,一共持续了三十余年,在此期间,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参与十分频繁,以至于参与政治"义务"的原则,被称为是知识分子惟一可以采取的态度,在当时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赞同。此外,尽管左派知识分子先后以各种形式出现,但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几乎独霸了思想的统治地位。因为在那些年里,右派不但在政治上失去了威信,[58]在思想上也遭到了否定。否定右派思想的手段很复杂,或者把一些"极端"的巴黎市民说成是德国占领者的合作分子,或者将他们等同于亲维希政府的知识分子,或者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对经济和政治的自由主义提出质疑,这种自由主义似乎——这至少是当时很多人的看法——曾经在30年代的危机中摇摆不定,似乎只是在苏联的决定性帮助下才战胜了法西斯主义。不管怎样,结果是明显的,虽然右派政党只花了不到几年的时间重整旗鼓——1952年3月,安托万·皮奈[59]被任命为政府首脑,这表明政治力量的对比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但是,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在右派思想的上空,一直笼罩着一个低压区。

在后来的整个一段时期里,知识界的政治气候完全取决于这个低压区。知识界不再仅仅受到在危机时刻通过思考参与政治的影响,而且还受到政治参与理论的巨大影响,其政治重心从此明显地偏向于左派。从1945年到7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是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光荣的30年",撰写这段时间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首先——至少在微观历史的层次上——意味着告诉大家这些知识分子的年龄等级,这几代知识分子都受过左派政治的教育,先后都完成了各自政治上的觉醒,比如,战后信奉共

产主义的一代,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一代,接着还有60年代更加年轻的一代。正因为如此,知识界在1995年提出了一种特别的分类方法,把知识分子分为几个对比明显但在政治上都带有左派色彩的年龄层:“前共产主义者”——因为自1945年大战结束后,共产主义在知识分子中间的影响逐渐削弱——的年龄都已经六十开外;略为年轻的一代知识分子年近六十,他们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影响下开始参与政治;再后面的一代知识分子大约五十来岁,他们的政治意识是在1968年前后“左倾思想”的活跃时期形成的。

然而,不管在什么时候,这几代知识分子都不得不以萨特为标准给自己定位。因为后者不仅仅是法国解放后政治参与义务的理论家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很快就成了这种义务的“化身”,在几年的时间里,他的影响变得非常巨大。《现代》杂志的第1期出版后几乎不到十二年,《快报》就“新浪潮”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调查,在回答问题“如果您被要求在下列作家中指出对您这代人有特别影响的一位,您会选择谁?”时,1957年的年轻人把萨特放在了首位,而安德烈·纪德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60]则被远远拉在其后。

从《现代》的创刊到《快报》的调查,萨特在其间的某一时刻,成了始于战后的知识分子时代的代表人物。从此,出现了一种政治参与的萨特模式,而萨特本人也像在他之前的一些作家一样,其名字被用来命名一个已经开始的“萨特时代”。伏尔泰创立了“‘知识渊博的’大作家的称号”,并且“使法国人习惯了从文学天才那里得到娱乐以外的东西,即信仰的方向”[61];在后一个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左拉因为在德雷福斯案中写下了《我控诉……》而被人们铭记在心中;至于萨特,不管怎样,他将成为知识分子“光荣的30年”的象征。再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将

同伏尔泰和左拉一样，在生前就被认为是一个神话。在每个时代，产生这些活神话的过程总是神秘的，因为，即使这一过程的每个环节——正如前面对于萨特来说一样——都可以被记录下来，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关系却仍然十分奇特。由此产生了一对仅仅是表面上的矛盾，的确，在1945年，萨特只满足于将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情感——即知识分子必须参与政治——具体化，但后来，他赋予了这种情感更多的分量，使它引起了公众的兴趣。从某种意义上说，从那天起，知识分子通过历史解释世界的行为得到了萨特的光大。

结果就是这样，在30年代，让－保尔·萨特从来不是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的模范，但法国解放后，他却迅速成了这类知识分子的典型。从此，萨特的"荣耀"时代到来了。我们在这里所用的"荣耀"一词，含义和让·图夏尔在谈及贝朗瑞[62]时所用的这个词一样，面贝朗瑞这位19世纪的诗人生前曾受到人们的极力奉承。[63]让·图夏尔致力于研究一位作家在读者的想像或情感中的反映，因此他对所研究时代的文化根底作了一次真正的剖析。19世纪末，维克多·雨果的"荣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去世以后所得到的荣耀——和小学以及小学教师的统治时代同时到来；半个世纪后，萨特的"荣耀"和他的其他一些特点一样，既反映了中学教育的崛起，又反映了中学哲学教师的影响，以及人们对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的尊重。而后来，在60年代，莱维－施特劳斯、福柯、拉康以及其他一些所谓人文科学的支持者所获得的"荣耀"，则同那十年中大学生人数激增以及一些主要政论性周刊的文化版面所同时扮演的角色有关。

眼下，我们有必要再次指出，两位"小朋友"渐渐不再在同一个领域里发展，今后若要想继续观察他们如何穿越世纪，就必须采取变化的方式看待问题。何况，战后的几年，也是他们俩不和

睦的时代开始的几年。

走向"分手"

1974年,让-保尔·萨特对西蒙娜·德·波伏娃说:"阿隆从伦敦回来后,我就常见他,可我们渐渐觉得,他根本不是站在我们这边。"在提及1947年秋发生的那次"不和"时,他明确表示:"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谈话时完全不赞同他。该分手了。"[64]然而,最初,雷蒙·阿隆是参加了《现代》杂志的工作的。我们知道,他为该杂志的第1期写了两篇文章。[65]此外,杂志的封底还有预告,说"今后几期"将刊登雷蒙·阿隆的"政治专栏",以及一篇标题很有吸引力的文章:《反对存在主义的潮流》。虽然后来雷蒙·阿隆和《现代》的这种长期的合作并未实现,但他仍两次为该杂志写稿。我们说过,11月份,他对"社会主义的机会"提出了疑问;1946年6月,他又写了一篇关于"临时宪法"的文章。因此,他同《现代》的合作成果不算少,在九期杂志上共发表了四篇文章,与此同时,萨特共发表了六篇,而西蒙娜·德·波伏娃、莫里斯·梅洛-庞蒂和米歇尔·莱里则各发表了五篇。

但是,决裂很快就发生了,在1946年7月1日的第10期《现代》上,编委名单中只出现了主编的名字。因为阿尔贝·奥利维埃和雷蒙·阿隆离开了杂志。当时,似乎是苏联问题使鸿沟越来越深,以至于这些人不可能继续长期在同一份杂志里共事。西蒙娜·德·波伏娃在《事物的力量》中说:"雷蒙·阿隆的反共思想逐渐显露出来",但她并未指明具体的时间。此外,她还提到了在高尔佛-汝昂[66]的一次午餐:"阿隆说他既不喜欢美国,也不喜欢苏联,不过一旦发生战争,他会和西方国家结盟;萨特反击说他既不欣赏斯大林主义,也不欣赏美国人,但打起仗来,他会站在共产党人一边。"[67]尽管在这两位共进午餐者之间发生的争

论没有明确的时间，但这件事还是很能说明问题。更何况西蒙娜·德·波伏娃补充说，她和萨特认为，后者和阿隆的这种对立是"根本上的"。

尽管如此，当时冷战的格局十分明显，其后果也已经显露出来。在这个时代，阿隆并非是惟一采取行动的人。加缪同样也注意到了可能发生的政治地缘分裂，在这一点上，他和阿隆一样，预见得十分准确。不过，较阿隆而言，加缪的变化更加深刻，因为他在1944年秋天时的政治立场是非常接近共产党的。他认为，反共政策在当时甚至就是"独裁的开始"[68]。两年后，他在1946年11月19—30日的《战斗报》上，发表了八篇系列文章，总标题为《既非牺牲品又非刽子手》，他在这些文章当中"含蓄地提到了在保尔·拉马迪埃[69]开始行动前的六个月共产党部长们被解职的事情"，并说"从1946年起，发生了彻底的决裂"[70]。此外，1946年年底，加缪和阿隆的立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就在《既非牺牲品又非刽子手》一文发表前几天，阿隆在1946年11月6日的《战斗报》上写了一篇题为《进步的错觉》的文章："久而久之，神话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变得显而易见。如果在劳动者和官僚主义之间，社会主义制度成了一种绝对的信条、一种冷酷的纪律（罢工和对抗都被视为犯罪）、一种无所不在的警察体系、一种与资本主义制度不相上下的不公正，那么，我们惟一所能说的，就是这种解放并没有实现人道主义者的梦想。"

在这方面，加缪写于1946年11月的这些文章有点像化学试剂，反映了此后将两位"小朋友"分开的鸿沟。因为，即使那时候阿隆没有采取和加缪同样的分析方法——原因在于他们两人所受的政治熏陶不同——但归根到底，在苏联问题上，他俩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而萨特则不然。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一年后他们的唇枪舌剑中感觉到。1947年11月，让·达尼埃尔[71]的杂志

《卡利班》[72]在第11期重新刊登了《既非牺牲品又非刽子手》。这些文章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提及。因为它们不是阿尔贝·加缪的即兴之作,而是反映了他某些主要思想的系列文章,后来他在《反抗的人》当中,再次提及了这些思想:摈弃马克思主义,对为了证明革命的目的而不顾所采取的手段会引起毁灭性后果这种做法提出怀疑,对闭口不谈东方国家所犯的罪行这种片面观点进行揭露——“你们不应该谈论俄国对艺术家的清洗,因为这会被反动派利用”——总之,对建立一个“相对”的、“更加朴实、更加牢固的”乌托邦的革命愿望的绝对性提出疑问。隔了几期之后,同样在这份杂志上,让-保尔·萨特既谴责了资本主义,也谴责了民主制度,他文章的标题本身就揭示了一个道理:“感到饥饿,这已经意味着要求自由。”[73]相反,在后一期的杂志中,阿尔贝·加缪则为“民主——谦虚的实践”作了辩护。[74]

戒备中的友谊

从1946年初夏起,萨特和阿隆之间在政治上开始互不信任,先是两个人的逻辑不同,不久就变得敌对了。他们的友谊也由原先的志趣相投转而变为相互戒备,这种互不信任很快就导致了一些变故,有时令人痛心。比如,1946年11月8日,在《死无葬身之地》彩排时,苏珊·阿隆由于受不了抵抗分子遭到酷刑的场面,在幕间休息时离开了,她的丈夫出于对妻子的关心也跟了出去。对此萨特非常不快,尽管苏珊表示了歉意,但他还是认为她的举动带有政治含义。这一含义后来在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事物的力量》一书中,被生硬地简述如下:“这场风波的含义十分明显,资产阶级正准备联合起来,他们认为唤醒人们不愉快的回忆是没有品位的。”[75]不管上述分析有多么不恰当,它表明了当时以及以后,阿隆已经被萨特及其追随者看成是资本主义

阵营的先锋了。[76]

很快，争执就不再局限于感情的范畴了。从法国解放以来就逐渐形成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鸿沟，特别在1947年2月表现了出来，当时，阿隆在哲学学院作了一个关于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讲座，并且对这两种思想都作了严厉的批评。该讲座的发言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性。一方面，萨特和阿隆的分歧公开化了，正如萨特和加缪之间的一样。另一方面，在经过了战后一段时间的犹豫之后——在那个变化越来越快的时代，这种犹豫是不可避免的——阿隆的思想这一次似乎有了自己的基础。此外，人们从中已经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的主题，而该书是在1955年出版的。辩论的主题自然是历史："关于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他们之所以求助于唯物主义的神话，不仅仅是因为萨特所说的原因。唯物主义的神话暗含着一种历史的决定论，后者必然会导致没有阶级的社会制度的产生。我们在想像一种历史必然，它可以通过其本身实现历史的意义。"[77]

仔细看来，1947年2月的这篇讲座稿是一篇承上启下的文章，它既是友谊结束后的一次总结，又是冷战开始前的一个固定点。因为确切地说，在1947年冬天行将结束时，历史重新开始起步。从前一年起就被人们指出的冷战局面，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完全形成了。3月，杜鲁门总统提出了"遏制"理论，并且建议向那些希望抵抗"奴役企图"的国家提供援助。几个星期后，第三帝国的征服者们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谈失败，这使西方和苏联的分歧公开化。夏天，这种分歧在地理上得到了具体的体现，首先是苏联，接着是那些迫于苏联压力的中欧和东欧国家，它们先后都拒绝了美国于6月5日提出的马歇尔计划。最后，秋天开始时，在波兰举行的茨克拉斯卡－波雷巴会谈，最终确认了东西方的这种决裂。苏联代表日丹诺夫[78]提出了两大"阵营"的理

论,几天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79]成立。从此,早在5月5日就被拉马迪埃赶出政府的法国共产党,就成了第四共和国顽强不屈的敌人,尽管他们曾经为这个共和国的建立贡献过自己的力量。

在此期间,雷蒙·阿隆于1947年初春加入了由戴高乐将军刚刚创立的法兰西人民联盟[80]。该联盟在知识界的影响经历了一个奇特的命运。它曾经被人遗忘,但是此前它确实存在过。这个戴高乐主义联盟诞生于1947年4月7日的斯特拉斯堡演讲上,此后,法兰西人民联盟很快就形成了。1948年初,路易·巴斯德·瓦莱里-拉铎[81]向法兰西人民联盟执行委员会提交了有关知识分子委员会的第一份总结报告,当时,他正在组建这样一个委员会。[82]次年3月5日,安德烈·马尔罗在普莱耶尔会议厅发出了"对知识分子的号召"。11个月后,他创建了杂志《精神自由》,由克洛德·莫里亚克[83]任主编。虽然知识分子不像预期的那样蜂拥而至,[84]但结果也不差。我们先谈论一下保尔·克路岱尔的情况。1947年4月30日,也就是法兰西人民联盟创立之后几天,戴高乐会见了他。1947年8月31日和1948年5月5日,他们又见过两次面,特别是后一次,戴高乐建议克洛岱尔加入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全国委员会,并表示打算把"领导知识界的任务"交给他。[85]保尔·克洛岱尔谢绝了后一个请求,但他同意加入全国委员会。他远不是惟一采取这种断然行动、加入法兰西人民联盟的知识分子,雅克·苏斯泰尔、莫里斯·克拉韦尔、马塞尔·普莱洛、马塞尔·瓦里纳等人也作出了同样的决断。还有其他一些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是否戴高乐主义者,都曾和《精神自由》合作过,如让·安鲁什[86]、皮埃尔·德·布瓦岱弗尔[87]、马克斯-波尔·富歇[88]、斯坦尼斯拉斯·菲梅[89]、罗歇·尼米埃[90]、加埃唐·皮孔[91]、弗朗西斯·蓬热[92]、德尼·德·鲁热蒙[93]、莱奥波尔·塞达尔·桑

戈尔[94],等等。

然而,这些名字并不能蒙骗人们的眼睛,虽然一些知识分子成了戴高乐主义的同路人,但这个核心和法国共产党不同,在它的周围,并没有形成一个广泛的影响范围。换言之,在法兰西人民联盟当中,同路人现象从来不曾有过意义上的扩展。此外——这又是一个与法国共产党的不同之处——法兰西人民联盟没有广泛渗透到年轻学生中去。当时,位于乌耳姆路的高等师范学校是年轻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摇篮,在那里,戴高乐主义仅仅勉强有一些地盘,信奉戴高乐主义的师范生组成一个小团体,由罗贝尔·布雅德[95]和让·夏波奈尔[96]领导。[97]

尽管如此,雷蒙·阿隆很快加入了法兰西人民联盟。而且很早,早在斯特拉斯堡演讲后几天就加入了。这更促使他在几星期之后,即1947年6月3日,离开了《战斗报》。[98]但是,事先没有任何因素使他倾向于加入法兰西人民联盟。他在伦敦的几年根本不是在戴高乐主义的影响中度过的。同样,虽然他正在逐渐向一名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转变,但这种转变最初并不是朝着戴高乐主义的方向发展的。不过,他接近法兰西人民联盟也远远不是一时的冲动。一方面,我们很难想像一个成熟的阿隆会在政治上糊涂一时,违心地背离自己的基本原则,他加入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决定毫无疑问是经过反复权衡和深思熟虑的。另一方面,即使这段经历后来留给他的是一种均衡的回忆——既不是"耻辱",也没有特别的自豪,这大体上就是后来他在《回忆录》中所作的分析[99]——但这是一个年富力强、有自决权的知识分子的行为,而且它持续了至少六年。

说到底,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尽管雷蒙·阿隆没有在《回忆录》中说明这一"战斗经历"确切开始的时间——"1947年或1948年"——但他承认自己后来一直留在法兰西人民联盟当

中,直到"后者停止存在"[100]。由于根据不同作家的观点,法兰西人民联盟是在1953年或1954年解散的,因此我们很难明确这一"战斗"时期结束的时间。不过,雷蒙·阿隆在人民联盟的机关刊物《联盟》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事实上,这篇文章发表在1953年6月25日的那一期上,是一次经济讲座的节选,该讲座举行于1953年6月23日,是法兰西人民联盟的一次"斗争行动"[101]。这篇文章被刊登在《联盟》杂志的第一页,雷蒙·阿隆本人也参加了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斗争行动,所有这些迹象都十分明显地表明,他当时是一名戴高乐主义者。我们看到,由于雷蒙·阿隆在1947年春天就加入了法兰西人民联盟,所以他的"战斗经历"至少持续了六年,而这样长的一段时间也清楚地说明,阿隆对政治的参与不是他的心血来潮。

更何况,阿隆对政治的参与不仅局限于参加几次知识分子的会议,比如和帕斯卡尔·皮亚、儒勒·莫纳罗[102]、雅克·苏斯泰尔和安德烈·马尔罗等人一起参加互助会。[103]他同时也是法兰西人民联盟全国委员会和研究委员会的成员。此外,他定期为月刊《精神自由》撰稿,还就劳动协会和1949年在里尔召开的法兰西人民联盟会议等主题作了报道,甚至还曾经准备参加1951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立法选举的竞选。[104]的确,我们看到,1983年出版的《回忆录》从未对阿隆加入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情况作出过歪曲,但它也没有完全再现阿隆持续了五年以上的政治参与行动。

因此,阿隆加入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原因很值得分析。目前,这些原因已经为大家所熟知,因为阿隆怀疑第四共和国的制度机构——尽管他在是否成立第四共和国的全民公决中投了赞成票——也因为"阿隆对自己在1942年后极端仇视戴高乐而感到长久的内疚"[105],但同时还因为他觉得法兰西人民联盟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最坚固的堡垒。不管怎样,重要的并不是了解雷蒙·阿

隆内心深处促使他参与政治的主要动因，而是在冷战的最初几年里，他完全而明确地选择了一个与共产主义对立的党派，并且这个党派——我们后面还将提到——和共产党构成了一对敌对的势力，正是这样一对势力，组织起冷战时期知识分子的争论。

走向不归之路

此外，我们看到，1947 年春，雷蒙·阿隆从《战斗报》转到了《费加罗报》。后者的主编皮埃尔·布里松在该报 1947 年 6 月 19 日的头版写道："我要非常高兴地告诉读者，《费加罗报》的编辑队伍又将增加一名合作者，他就是雷蒙·阿隆，他在《战斗报》上的文章曾经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雷蒙·阿隆属于在两次大战之间成长起来的一代，这一代人亲眼目睹了一些重要的观念逐渐遭到怀疑和颠覆，而他们的长辈却以为战争胜利后，这些观念得到了保全。阿隆于 1928 年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不久就成为一名出色的年轻哲学家。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他为之献身的历史哲学不可避免地、随时随地地把我们引向当今世界的一些问题，而这个尚未成型的世界产生于我们的不幸。在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过程中，雷蒙·阿隆表现出清醒的头脑和渊博的知识，这使他很快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权威。特别是他在分析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独立精神，对我们来说非常珍贵。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不管这种压迫是社会的、政治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像他这样的人认为，民主不是竞选的诱饵、虚幻的谎言，或者是为商业寡头提供方便的工具。他的第一篇文章将在几天内和大家见面。"果然，三天之后，即 1947 年 6 月 22 日，阿隆和《费加罗报》长达 30 年的合作开始了。这种合作极为频繁，因为到 1977 年 5 月 27 日为止，阿隆共计为该报撰写了 2 299 篇文章。[106]他本人曾多次对自己转向《费加罗报》的原因作过解释，[107]我们在本

书中将不加赘述,除非为了说明他的决定更加把他和萨特眼中的世界割裂开来。

事实上,阿隆和萨特之间的关系,在1947年恶化得更加迅速。虽然前者在2月份所做的讲座已经勾划出知识分子对抗的决斗场,但它并不标志两个人的对立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这种标志出现在那年秋天。在此之前,两人于1947年3月共同完成了他们最后的杰作,即为尼赞而写的请愿书,后者在去世后遭到了共产党人的贬斥。其实这一次,萨特—阿隆—尼赞的三驾马车,又一次令人想起1927年12月24日后者在另外两位面前举行的婚礼,这也是1940年尼赞去世后三驾马车最后一次组合在一起。不过,《尼赞的例子》——这是请愿书的题目——并没有使两位"小朋友"出现裂痕的友谊重新愈合,现在看来,它只不过是萨特和阿隆最后一次肩并肩地站在一起、捍卫一项共同的事业。或者说是最后第二次,因为22年后,1979年6月,他们为了"越南船民"的利益,在暮年的时候曾经再次走到一起。

《尼赞的例子》这份请愿书是由让-保尔·萨特执笔的,目的在于捍卫保尔·尼赞因共产党势力的中伤而被玷污的声誉。这些中伤由来已久。因为保尔·尼赞曾是共产党员,并且是该党一名才华横溢的作家和记者,但在1939年春天,《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定几个星期之后,他却脱离了共产党。1940年5月23日,他在弗朗德尔地区[108]战死。然而,在他去世以前、脱离共产党之后,对他的中伤就开始了。[109]特别是莫里斯·多列士,他在1940年3月称尼赞是"警察局的特务"。在沦陷时期,有一篇秘密发表的文章也说尼赞是"警察"。不过,萨特之所以要写请愿书,是因为法国解放后反对尼赞的运动重新开始并不断扩大的缘故。比如,1945年6月,为了纪念"为法国牺牲"的作家,法国作家委员会组织了一次作品销售活动,而阿拉贡[110]却将尼赞的著作排

斥在这次销售活动之外，并且经常在私下攻击尼赞，指责他是两面派。第二年，亨利·勒费弗尔[111]在他的著作《存在主义》中，对尼赞进行了公开的攻击，指出后者有"叛徒思想"的倾向，并说这种倾向影响了"他所有的著作"。尼赞的遗孀为澄清事实进行了徒劳的努力，她分别给阿拉贡和多列士写信，并和罗朗·卡萨诺瓦[112]见面，在得知此事之后，让-保尔·萨特写了《尼赞的例子》，这份请愿书先后发表在1947年3月29日的《费加罗文学报》和4月4日的《战斗报》上："人们不时提醒我们，雅克·德古尔[113]、让·普雷沃、韦尔奈等人是为我们而死的，这很好。然而，在提到尼赞，这位于1940年被德寇杀害、在同代人中间最具天赋的作家的名字时，这些人却一声不吭；没有人敢谈论他，似乎大家要把他再一次葬入地下。但是，在一些政客的圈子里，有人悄悄说他是叛徒。阿拉贡曾向我们中间的一个人断言，说尼赞给内政部提供有关共产党活动的情报。如果您要求证据，这些人永远也拿不出，他们会对您说，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是玻利泽尔在临终前不久说的，他们还会说，只要读一读尼赞的书，就可以知道他是叛徒。勒费弗尔先生在他的最新著作《存在主义》中写道：'保尔·尼赞很少有朋友，我们曾自问他究竟有什么秘密。现在我们知道了，他所有的作品都围绕着背叛的思想在转'，'他来自于反动的甚至是法西斯的环境。也许他本来就是反动派或法西斯，因为他自称观察过他们'。不过，据我们所知，共产党人能够加给尼赞的罪名，只有他在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定时离开共产党这件事。关于这点，保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原则作出判断，这完全是政治上的事，不属于我们妄加评论的范围。但是，要是有人指责尼赞是密探却又拿不出证据，那么我们就不能忘记，他是一位作家，是在战场上牺牲的，而作为作家，我们有责任捍卫他身后的名誉。所以，我们要对勒费弗尔先生（以

及所有和他一起损害别人名誉、指责别人的人)说话,我们要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说尼赞是叛徒,是不是仅仅因为他在1939年离开了共产党?如果是,那么就明确说出来,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原则判断。或者你们是在暗示,他早在战前就同意向反共政府提供贵党的情报?要是这样,请出示证据。如果我们得不到回答,或者得不到所要求的证据,我们会对你们的沉默作出反应,我们将再发表一篇文章,确认尼赞的清白。'雷蒙·阿隆、乔治·亚当、西蒙娜·德·波伏娃、雅克-罗朗·博斯特、安德烈·比利[114]、安德烈·布勒东、朱利安·本达、皮埃尔·布里松、皮埃尔·博斯特[115]、罗歇·卡伊瓦[116]、阿尔贝·加缪、莫里斯·丰伯尔[117]、让·盖埃诺、亨利·让松[118]、米歇尔·莱里、雅克·勒马尔尚[119]、让·莱斯居尔、勒内·马厄、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莫里斯·梅洛-庞蒂、让·波朗、布里斯·帕兰、让-保尔·萨特、让·施伦贝格[120]、菲利普·苏波[121]、让·戴克西埃。"[122]

如果说在这份请愿书的签名者当中,有很多《现代》杂志的编委,[123]那么雷蒙·阿隆当然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参与其中。这份名单涉及好几个相互交错的社交圈,特别是由一些在乌耳姆路接近保尔·尼赞的"高师校友"——即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就读的学生——构成的圈子,因此,他们当中有萨特、梅洛-庞蒂,也有勒内·马厄和雷蒙·阿隆。对我们而言,保护尼赞的请愿书有另一方面的珍贵意义。它表明,那时,萨特还完全置身于共产党及其同路人之外,并且毫不犹豫地抨击法国共产党。而当时的背景,是法国作家委员会内部的分歧已日趋明显。该委员会原来的一些代表人物如波朗、莫里亚克、施伦贝格和委员会的关系逐渐恶化,他们也在请愿书上签了名。反之,法国作家委员会的在职委员长路易·马丹-肖菲埃[124],却先后在4月4日的《战斗报》和5月15日的《卡利班》杂志上,解释了他拒绝在请愿

书上签字的理由："我和我共产党朋友的关系不允许我用这种口气和他们说话"，因为这样的举动"显示出一种挑衅的愿望"，"目的在于引起轰动"。这位委员长在这里所表明的看法也许得到了同辈们的广泛赞同。因为归根到底，一位知识分子受到了中伤，而他的同行中只有不到三十人参加了捍卫他名誉的斗争——通常，这种情况会引起知识分子更为广泛的团结精神——这反映出法国共产党在当时所占的优势地位。然而，后者并没有因此而忽视它的反对者。4 月 4 日，《人道报》有一篇文章再次公开提到了 1939 年的"叛徒"尼赞的问题——"他是党的叛徒，同时也是法国的叛徒"——从那时起，人们可以就这个问题提出疑问，"尼赞的叛徒态度是不是他以前活动的延续"。最后，文章还提醒萨特和其他请愿书的签名者，"五年的痛苦足以反映出反共思想所掩盖的阴谋，这种阴谋同时对它的从事者和被庇护者作出了审判"。此话和萨特在几年后有机会大声疾呼的话非常相似。

但是当时，萨特好像几乎根本不在乎别人指责他是反共分子。1947 年 4 月 11 日，《法兰西文学》发表了法国作家委员会领导小组的一项声明，谴责那些"自诩在捍卫保尔·尼赞名誉的宣言上"签名的人，并称这些人"并不完全有资格以道德的名义反抗"。声明发表后，《法兰西文学》遭到了随后出版的那一期《现代》杂志的尖刻回击。因为萨特在杂志上写道："既然法国作家委员会如此操心捍卫其成员的荣誉，那么我首先要声明，我还是该委员会的一分子，但我不记得自己在成为共产党人攻击目标的时候，受到过委员会的保护。其次，阿拉贡先生的上述声明是针对我。难道他认为这些声明的性质是如此特殊，以至于对它们纯粹而简单的引用会使其作者威信扫地吗？要不他就是在否认自己作过这些声明？请他说话，人们自会作出判断的。"[125]

“各奔东西”

我们只有记住萨特在1949年春天对共产党的态度,才能对他后来所走的道路作出评判。就当时而言,萨特与共产党之间的距离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和阿隆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因为,正如我们所见,从那时起,有关国际形势的分析更加复杂多样。1947年开始的冷战,也只能进一步促成两个人的分歧,不久之后,由于萨特先后所采取的中立主义和支持共产党的态度,这种分歧又得到了加深。不过,在1947年秋天,使萨特和阿隆的关系陷入无可挽回的境地的,还是有关法兰西人民联盟的问题。当时,让-保尔·萨特和他的朋友们在巴黎广播电台主持一档名为“现代”的星期论坛节目,该节目在晚上20点播出。在第一次节目播出前几天,让-保尔·萨特在《战斗报》上对路易·波韦尔斯[126]声明:“如果这档节目遭到禁止,那么我们就将不再犹豫。这表明自由受到极大的威胁,而我们的行动则更具有空前的必要性。”这些话带有一定的预见性,因为后来,这档论坛节目只是在8月20日到11月24日期间播出了六次,接着就突然停止了。同时,它有理由使人高兴,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是政府总理——当时法国广播局隶属于政府管辖——不顾电台台长弗拉基米尔·波尔歇的反对,促成了“现代”论坛的创办,双方这样做的确切原因我们无法通过档案了解清楚。[127]但是,不管怎样,当时既仇视戴高乐主义又同共产党不和的萨特,却一点都不令社会党人保尔·拉马迪埃反感。后者的政府在那年5月赶走了共产党人,而1947年秋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崛起也构成了使的心腹大患。

总之,在反对戴高乐这一点上,萨特的节目丝毫没有让拉马迪埃感到失望,恰恰是这个原因,间接地造成了萨特和阿隆之间

关系的破裂。这种情况从节目的第一次播出就开始了。节目的参与者们对市长选举之后法国的政治形势作了分析。他们在节目中提到了戴高乐，公开嘲笑这位"上天赐予的人物"，并且明目张胆地作了两项比较，一是拿这位6月18日的英雄[128]和贝当元帅相比，二是拿法兰西人民联盟和法国当局相比。曾和萨特在勒阿弗尔中学共事的阿兰·博纳菲甚至这样描写戴高乐将军的一张招贴画："除了额头上的那绺头发之外，其他（与贝当元帅）都一模一样。"[129]节目播出后第二天，报界反应巨大，不过特别要指出的是，论坛决定立刻录制一档节目作为答复，因为戴高乐主义者们表示了他们极大的震惊。在录音棚里，两位戴高乐主义者贝努韦尔将军和亨利·托莱斯对萨特进行了激烈的抨击。阿隆也在场，当时他和萨特的友谊虽然不如从前，但毕竟还没有破裂，从感情角度说，他是倾向于戴高乐主义的，这使他感到左右为难，因此他保持沉默。可是，他从前的小朋友却把这种沉默视为背叛。直到1974年，萨特对此还记忆犹新："阿隆装出没见到我的样子，他走到其他人那里；我的理解，是他看到了别人，而不是故意冷落我。从那时起，我知道阿隆在政治上是反对我的。我认为他和戴高乐主义者保持一致，就是在和我决裂。我同别人不和总是有重要原因的，但是最终，每次都是我首先不理别人。"[130]1983年，雷蒙·阿隆也对那件事情作了他的解释。虽然他所描述的细节和事情的由来可能和萨特所说的不同，但得出的结论却是一致的："大家都各奔东西了。"[131]

对除萨特和阿隆以外的其他人来说，这件事其实无关紧要，我们有必要还它以本来的地位。"巴黎论坛"节目几乎每天都在巴黎广播电台——特别是从1946年2月起，在每周一次的"温文尔雅的记者论坛"节目中——组织辩论。后一档节目很快就大受欢迎，但由于它过于激烈，因此在1947年3月和10月先后

被中断了两次。[132]此外,雷蒙·阿隆是该节目的忠实的听众和积极的参与者,从1947年到1949年秋的两年时间里,他一共参加了20次节目的播出,涉及的主题十分多样,比如:“大西洋条约”、“马歇尔计划”、“关于奥古斯特·孔德[133]”以及“是否存在历史的教训?”[134]等。巴黎电台播出的这档节目听众人数很多,与节目名称所表示的相反,它很快就在法国的广大地区拥有了听众,到1948年,该节目覆盖了整个法国。

所以,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1947年10月20日发生在“现代”论坛的事情是微不足道的。再说,让-保尔·萨特的这档节目还将继续存在一个多月。事实上,直到11月24日,当社会党人拉马迪埃的总理职位被“人民共和运动”[135]的罗贝尔·舒芒[136]取代之后,这一档令许多人咬牙切齿的节目才被取消。不过,尽管弗拉基米尔·波尔歇起初有过犹豫,但后来他似乎是支持这个每周一次的论坛继续存在下去的,而文学艺术节目的负责人费尔南·普埃好像也曾“袒护”过这档节目。不管怎样,两年后他写到了这段事情:“在把话筒交给让-保尔·萨特时,是不能向他提任何附加条件的。要么让他主持节目,要么拒绝。我们选择了前者。的确,这一切使电台不得安宁。但我丝毫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137]

尽管如此,论坛节目将于11月24日——也就是罗贝尔·舒芒就任总理的那一天——最后一次播出,而此后几天录制并计划用于12月1日、8日和15日的三套节目,却再也没有被播出过。[138]那时,让-保尔·萨特乐得在12月3日的《战斗报》上亲自为他的节目致悼词:“我被要求主持这档论坛节目,在接受之前,我提出要有对任何事件自由发表看法的权利。我这样做既非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也非为了服务于某一党派。事实上,我不属于任何政治团体,我只是想致力于恢复人们对言论自由的

爱好，我们知道，这种爱好目前正在消失，逐渐被守旧和狂热所代替。”

在这种背景下，萨特和阿隆的不和当然是次要的。但是，这种不和反映了始于1947年秋——也就是冷战后的第一个秋天——的紧张气氛和政治划分，也反映了法国知识界的结构调整。这种调整特别围绕着两个极点进行，它们分别是共产党和戴高乐党。尽管后者从未有过和前者相同的影响，而且两者之间有着毋庸置疑的不平衡，但事实上，这对敌对的政治力量的确存在着，它们分别由信仰共产主义和信仰戴高乐主义的知识分子组成，并且确定了冷战时期知识分子之间展开的辩论。更何况，在两大力量各自“阵营”的内部，共产主义和戴高乐主义的影响和恐吓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每个人都必须表明自己对它们的态度，尽管事实上，知识分子们更多地是聚集在共产党的周围。[139]这种镜子游戏的迹象比比皆是，它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唱主角的两大政治力量相互之间的默认。何况，共产党和戴高乐党分别为对方充当着陪衬的角色。因此，如果说共产党是右派特别是戴高乐派知识分子仇视的对象，那么后者也很快成为左派知识分子首选的攻击靶子。右派作为左派头号敌人的地位，体现在后者反对戴高乐和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持久斗争当中。因此，在1948年10月的《精神》杂志上，阿尔贝·贝甘[140]宣布，马尔罗“在某种意义上是法国惟一真正的法西斯分子”。共产党知识分子当然不甘落后。皮埃尔·埃尔韦也在《行动报》上指责马尔罗，并号召大家不要疏忽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本质”：即“法西斯主义，以及它的恐怖、集中营和屠杀”。

这对相互敌对的政治力量不久就影响了整个知识界。在加入各自的阵营之前，萨特和阿隆采取了“反对”的态度。阿隆早在冷战尚未爆发时就开始反对苏联，并于1946年春末离开了

《现代》杂志。而萨特也在接近共产党之前就开始反对戴高乐主义。归根到底,这就是萨特和阿隆所经历的意外事件的意义。事实上,阿隆那时开始成为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同路人。因此,发生在广播电台的事件,有点像两个海军大国之间的军事摩擦。萨特的朋友故意向一面展开的旗帜射击。他们有宣战的理由,因为在1947年的这个秋天,不仅仅是萨特和阿隆已经彻底分裂,所有的人都摆脱了前一年武装下的和平,转而进入了相互敌对的阵营,并向对方射出了第一批枪弹。1974年,萨特在西蒙娜·德·波伏娃面前提到了"电台的事",他承认,到了这个地步,两个人"必须分手",这是"由于一件不愉快的事引起的"。[141]这件不愉快的事拉开了一场长达三十余年的战争的序幕。

注:

1　雷蒙·阿隆,《回忆录》,出处见前文,第198页。

2　让-保尔·萨特,《一份在伦敦的伟大的法国杂志》(*Une grande revue française à Londres*),摘自《战斗报》,1945年1月7—8日。萨特在《自由法兰西报》(第9卷,第49期,第9—19页)上的文章题为《沦陷的巴黎》(*Paris sous l'Occupation*)。

3　参阅尼古拉·巴弗莱兹,《雷蒙·阿隆》,出处见前文,第206—207页,书中引用了一封萨特于1944—1945年冬天写给阿隆的非常友好的信。

4　我们将会看到,相比较而言,这一时期,两人各自的活动领域在层次上发生了变化,让-保尔·萨特很快出了名。我们之所以必须提到这一点,不仅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历史,而且是因为它直接构成了本书研究的一个部分。因此,在本章中,雷蒙·阿隆将会相对处于比较次要的地位,这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出于作者表达观点的需要。

5　《回忆录》,第196页。

6　该文写于1983年1月6日,目的不详,后被登在1985年2月《评论》杂志的第517—519页。

7　雷蒙·阿隆,《马基雅维里和现代暴政》,出处见前文,第307—308页。

8　摘自《评论》杂志(*Commentaire*),第28—29期,1985年2月,第339页。

9　同上，第327页。

10　雷蒙·阿隆，《马基雅维里和现代暴政》，出处见前文，第179页。

11　《专制时代》，第339页。

12　雷蒙·阿隆，《世俗宗教的未来》（*L' avenir des religions séculières*），第1、2册，《自由法兰西报》，第8卷，第45和46期，1944年7月15日和8月15日。研究阿隆思想的专家们自然经常引用这两篇文章，并给予了它们应有的地位，比如参阅阿丽安娜·谢贝尔·德·阿波罗尼亚，同前书，第465—467页。

13　同上，第2册，第275—276页。

14　雷蒙·阿隆，《社会主义的机遇》（*Les chances du socialisme*），《现代》杂志，第2期，1945年11月，第233—234页。

15　《回忆录》，第48页。

16　帕斯卡尔·皮亚（Pascal Pia），《战斗报》主编。——译者注。

17　阿尔贝·奥利维埃（Albert Ollivier），《战斗报》的社论作者。——译者注。

18　参阅伊夫－马克·阿日尚波姆（Yves－Marc Ajchenbaum），《生与死——"战斗报"的历史（1941—1974）》（*À la vie, à la mort. Histoire du journal《Combat》, 1941－1974*），世界出版社（Le Monde Édition），1995年。另参阅1987年5月举行的关于加缪和《战斗报》的学术报告会论文集，主编让伊夫·盖兰（Jeanyves Guérin），欧洲空间出版社（Éditions de l' espace européen），1990年。

19　《回忆录》，第209—210页。

20　米歇尔·莱里（Michel Leiris），1901—1990，法国作家和人种学家。——译者注。

21　布里斯·帕兰（Brice Parain），1897—1971，法国作家和哲学家。——译者注。

22　让·波朗（Jean Paulhan），1884—1968，法国小说家、评论家，曾任《新法兰西杂志》的秘书、总编辑。"二战"期间参加了抵抗运动，是地下刊物《法兰西文学报》的创始人之一。法兰西学院院士。——译者注。

23　资料来源：伽利玛出版社。

24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　，法国社会学家。——译者注。

25　安娜·博歇蒂（Anna Boschetti），《萨特和《现代》杂志——一项知识分子的事业》（*Sartre et les《Temps modernes》. Une entreprise intellectuelle*），子夜出版社，1985年。

26　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生命哲学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译者注。

27　1941年3月14日的信，《致萨特的信》，出处见前文，第2卷，第239页。

28 百代电影公司档案。

29 奥古斯特·昂格莱(Auguste Anglès),《安德烈·纪德和〈新法兰西杂志〉的第一个团体——评论的年代(1911—1912)》(*André Gide et le premier groupe de*《*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l'âge critique*, *1911—1912*),伽利玛出版社,《思想观点图书馆》,1986年。

30 保尔·克洛岱尔(Paul Claudel),1868—1955,法国诗人、戏剧作家、评论家,还是一位外交官。——译者注。

31 《保尔·克洛岱尔和加斯东·伽利玛1911—1954年间的书信集》(*Correspondance 1911—1954 de Paul Claudel et Gaston Gallimard*),由贝尔纳·代尔瓦伊(Bernard Delvaille)整理、介绍并注释,伽利玛出版社,1995年,1946年1月17日的信。

32 夏尔·迪兰(Charle Dullin),1885—1949,法国电影演员、导演。——译者注。

33 参阅1937年2月27日加斯东·伽利玛的回信,后者在信中声称他将要阅读萨特的手稿(资料来源:伽利玛出版社)。我们知道,加斯东·伽利玛对该书的出版——甚至在选择《恶心》作为书名——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布里斯·帕兰在1937年10月12日写信给萨特:"加斯东·伽利玛给你的书取了一个名字,我觉得这名字非常好:《恶心》。"(同上)

34 同上。

35 西蒙娜·德·波伏娃,《事物的力量》,出处见前文,第46页。

36 让-玛利·多姆纳克(Jean-Marie Domenach),《在先知和教权之间》(*Entre le prophétique et le clérical*),摘自《杂志的杂志》(*La Revue des revues*),第1期,1986年3月,第21—30页。

37 《我是什么人》(*Ce que je suis*),摘自《新观察家》杂志,1980年6月5日,第18页。

38 克洛德·莱维-施特劳斯在前一年对让-玛丽·贝诺阿(Jean-Marie Benoist)说道:"大约在1930—1935年,我是个和平主义者,后来我经历了奇怪的战争和大溃退,我终于懂得,把政治现实禁锢在形式的思想之中是大错特错的"(《世界报》,1979年1月21—22日,第14版)。特别是在1984年,他对《新观察家》杂志说:"在'二战'之前的那些年,我是个和平主义者。后来我经历了奇怪的战争和大溃退,对自己的政治判断力完全失去了信心"[《克洛德·莱维-施特劳斯,你是个超现实主义者吗?》(*Claude Lévi-Strauss êtes-vous surréaliste?*),摘自《新观察家》杂志,第1017期,1984年5月4日星期五,第94—97页]。同一天,他在电视节目《顿呼》中提到了自己战前的和平主义思想,并自称犯了年轻人的"大错"(法国电视二台,1984年5月

4日)。

39　西蒙娜·德·波伏娃,《事物的力量》,出处见前文,第1卷,第15页。

40　多米尼克·奥丽(Dominique Aury),1907—1998,法国女记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曾任《法兰西文学》杂志的秘书长。——译者注。

41　雅克·贝克尔(Jacques Becker),1906—1960,法国著名电影导演。——译者注。

42　国家音像研究院资料,详细附注见下文。

43　西蒙娜·德·波伏娃,《致萨特的信》,出处见前文,第2卷,第293页(1947年2月7日的信)。

44　斯坦利·道能(Stanley Donen),1924—　,美国电影导演、音乐剧和轻歌剧作者。——译者注。

45　这是西蒙娜·德·波伏娃后来在《年富力强的时代》中作的评论,她声称存在主义成了法国的某种特产,就和高档时装一样。

46　让·图夏尔(Jean Touchard),《文学和政治》(*Littérature et politique*),巴黎政治研究院,不定期刊物,打字版,第2卷,第43页。

莫里斯·克拉韦尔(Maurice Clavel),1920—1979,法国小说家,评论作家。——译者注。

47　让-弗朗索瓦·里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1924—1998,法国哲学家。——译者注。

48　阿兰·土莱纳(Alain Touraine),1925—　,法国社会学家。——译者注。

49　阿兰·土莱纳,《一个历史愿望》(*Un désir d'histoire*),斯托克出版社,1977年,第21页。

50　斐迪南·阿尔基耶(Ferdinand Alquié),1906—1985,法国哲学家。——译者注。

51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译者注。

52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法国哲学家,法兰西公学教师。——译者注。

53　萨夏·吉特里(Sacha Guitry),1885—1957,法国作家、电影和戏剧创作家。——译者注。

54　《法国公众意见研究院消息公报》,第2期,1944年10月16日,第6和第8页。

55　同上,第12期,1945年3月16日,第70页。

56　萨特,《什么是文学?》,第281页。

57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3卷,《解放》(*Salut*),普隆出版社,1959年,第141页。

58　参阅让-吕克·皮诺尔(Jean-Luc Pinol),《解放:右派政党趋于灭亡?》(*La Libération vers l'élimination des droites?*),摘自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主编),《法国右派政党史》(*Histoire des droites en France*),第1卷,《政治》(*Politique*),伽利玛出版社,1992年,第337页及以下多处。

59　安托万·皮奈(Antoine Pinay),1891—1994,法国政治家,曾多次出任政府部长和总理之职。——译者注。

60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1885—1970,法国小说家、评论家、诗人、新闻记者、剧作家,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译者注。

61　勒内·波莫(René Pomeau),《伏尔泰本人》(*Voltaire par lui-même*),勒瑟伊出版社,1955年,第34页。

62　贝朗瑞(Pierre-Jean de Béranger),1780—1857,法国诗人。——译者注。

63　让·图夏尔,《贝朗瑞的光荣》(*La Gloire de Béranger*),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出版社,1968年,共2卷。

64　西蒙娜·德·波伏娃,《永别仪式》,后接《和让-保尔·萨特的谈话》,出处见前文,第354页。

65　同上,第76—105页和第153—162页。

66　高尔佛-汝昂(Golfe-Juan),法国南方阿尔卑斯海滨省的一个海水浴场。——译者注。

67　同注64,第93—94页。

68　《战斗报》,1944年10月7日。

69　保尔·拉马迪埃(Paul Ramadier),1888—1961,法国政治家,社会党人,1947年任政府首脑期间促使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决裂。1948—1957年间曾多次出任政府部长。——译者注。

70　让伊夫·盖兰,《阿尔贝·加缪:公民艺术家肖像》(*Albert Camus. Portrait de l'artiste en citoyen*),弗朗索瓦·布兰出版社(François Bourin),1993年,第116页。

71　让·达尼埃尔(Jean Daniel),1920—　,法国记者、作家。——译者注。

72　科里那·勒努(Corinne Renou),《卡利班:一份文化普及杂志?》(《*Caliban*》, *une revue de vulgarisation culturelle?*),摘自《20世纪——历史杂志》,第40期,1993年

8—10月，第75—85页。

卡利班（Caliban），莎士比亚作品《风暴》中的人物，是个丑陋的侏儒，可怕力量的化身。——译者注。

73 《卡利班》，第20期，第11—12页。

74 科里那·勒努，同前文。

75 西蒙娜·德·波伏娃，《事物的力量》，第128页。

76 事实上，对于阿隆夫妇来说，这一事件似乎的确没有什么政治意义。苏珊·阿隆受不了酷刑的场面，感到不适，只好和丈夫一起离开[多米尼克·阿隆－施纳佩尔（于1986年3月3日）对戴尔德尔·贝尔的回忆，摘自《西蒙娜·德·波伏娃》，出处见前文，第763页]。

77 雷蒙·阿隆，《关于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看法》（*Remarques sur les rapports entre existentialisme et marxisme*），摘自《人，世界，历史》（*L'Homme, le monde, l'histoire*），阿尔托出版社（Arthaud），《哲学学院手册》（*Cahier du Collège philosophique*），1948年，第165—195页，引文见第194页。

78 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日丹诺夫，1896—1948，苏联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历任苏共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政治局委员。——译者注。

79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7年由斯大林创建的全球性机构，1956年解散。——译者注。

80 法兰西人民联盟（Rassemblement du peuple français，简称RPF），1947年4月由戴高乐将军创建的政党，1953年解散，是右翼政党"保卫共和联盟"的前身。——译者注。

81 路易·巴斯德·瓦莱里－拉铎（Louis Pasteur Vallery－Radot），1886—1970，法国著名化学和生物学家、微观生物学的创始人路易·巴斯德的孙子，致力于抗过敏和肾脏疾病的研究，法兰西学院院士。——译者注。

82 让·夏尔洛（Jean Charlot），《反对派戴高乐主义（1946—1958）》（*Le Gaullisme d'opposition, 1946－1958*），法亚尔出版社，1983年，第143页。

83 克洛德·莫里亚克（Claude Mauriac），1914—1996，法国批评家、小说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儿子。——译者注。

84 雅妮娜·莫絮－拉沃（Janine Mossuz－Lavau），《安德烈·马尔罗和戴高乐主义》（*André Malraux et le gaullisme*），第1版，1970年，阿尔芒·科兰出版社，第2版，法国国家政治科学出版社（PFNSP），1982年，第70和89页。

85 热拉尔·安托万（Gérald Antoine），《保尔·克洛岱尔或天才的地狱》（*Paul*

Claudel ou l' Enfer du génie),拉封出版社,1988年,第333页。

86　让·安鲁什(Jean Amrouche),1906—1962,用法语写作的阿尔及利亚作家。——译者注。

87　皮埃尔·德·布瓦岱弗尔(Pierre de Boisdeffre),1924—　,法国评论家、小说家,曾任法国广播和电视局局长。——译者注。

88　马克斯-波尔·富歇(Max-Pol Fouchet),1913—1980,法国诗人、散文家。——译者注。

89　斯坦尼斯拉斯·菲梅(Stanislas Fumet),1896—1983,法国评论家、政论作家。——译者注。

90　罗歇·尼米埃(Roger Nimier),原名罗歇·尼米埃·德·拉佩里埃尔(Roger Nimier de La Pierre),1925—1962,法国小说家、评论家。——译者注。

91　加埃唐·皮孔(Gaëtan Picon),1915—1976,法国评论家,曾任法国文化部文艺司司长。——译者注。

92　弗朗西斯·蓬热(Francis Ponge),1899—1988,法国诗人、评论家。——译者注。

93　德尼·德·鲁热蒙(Denis de Rougemont),1906—1985,用法语写作的瑞士评论作家和道德学家。——译者注。

94　莱奥波尔·塞达尔·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1906—　,诗人,曾任塞内加尔总统,法兰西学院院士。——译者注。

95　罗贝尔·布雅德(Robert Poujade),1928—　,法国右派政治家。——译者注。

96　让·夏波奈尔(Jean Charbonel),1927—　,法国右派政治家。——译者注。

97　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1945年后乌耳姆路的高等师范生:共产主义的一代?》(*Les normaliens de la rue d' Ulm après 1945: une génération communiste?*),《现代和当代历史杂志》(*Revue d' 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第4册,1986年。

98　尼古拉·巴弗莱兹,《雷蒙·阿隆》,出处见前文,第221和228页。

99　雷蒙·阿隆,《回忆录》,第237页。

100　同上,第226和234页。

101　雷蒙·阿隆,《衰亡的威胁》(*La menace de la décadence*),摘自《联盟》(*Le Rassemblement*),第306期,1953年6月25日—7月1日,第1—6页。

102　儒勒·莫纳罗,(Jules-Marcel Monnerot),1909—1995,法国社会学家。——译者注。

103　此外,1948年11月18日,他还参加了一次"为精神自由"而进行的集会。

参加这次集会的，除上面提及的人之外，特别还有加埃唐·皮孔和莫里斯·克拉韦尔（参阅《联盟》，第9期，1948年11月27日）。

104　尼古拉·巴弗莱兹，《雷蒙·阿隆》，出处见前文，第232页。

105　雷蒙·阿隆，《回忆录》，第228页。

106　瓦莱里·阿农，《雷蒙·阿隆和〈费加罗报〉》（*Raymond Aron et*《*Le Figaro*》），里尔第三大学深入研究文凭学位论文，1988年，书中多处提及。

107　特别参阅《回忆录》，出处见前文，第218页及以下多处。

108　弗朗德尔地区（Flandre），欧洲西北部沿海平原，包括法国北部、荷兰等沿北海地区。——译者注。

109　参阅安妮·科昂－索拉尔，《保尔·尼赞：不现实的共产主义者》，出处见前文，第252页及以后多处；另参阅帕斯卡尔·奥利，《尼赞：一个反叛者的命运》，出处见前文，第237页及以后各处。

110　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1897—1982，法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先加入达达文学运动，后参加超现实主义流派。法国共产党员，"二战"期间是抵抗分子，《法兰西文学》杂志的主编。——译者注。

111　亨利·勒费弗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颇有研究。——译者注。

112　罗朗·卡萨诺瓦（Laurent Casanova），1906—1972，法国共产党人，"二战"结束后曾任政府部长。——译者注。

113　雅克·德古尔（Jacques Decour），原名达尼埃尔·德古尔德芒什（Daniel Decourdemanche），1910—1942，法国作家，大学教师，地下刊物《法兰西文学》的创办者，"二战"期间参加抵抗运动，后被捕遇害。——译者注。

114　安德烈·比利（André Billy），1882—1971，法国小说家、文学批评家、多份报刊的专栏作家，曾当选为龚古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委员，并因其全部作品而获得法国全国文学大奖。——译者注。

115　皮埃尔·博斯特（Pierre Bost），1901—1975，法国小说家，曾获泰奥弗拉斯特－勒诺多文学奖。——译者注。

116　罗歇·卡伊瓦（Roger Caillois），1913—1979，法国作家、评论家，法兰西学院院士。——译者注。

117　莫里斯·丰伯尔（Maurice Fombeure），1906—1981，法国诗人、小说家、散文家。——译者注。

118　亨利·让松（Henri Jeanson），1900—1970，法国电影编剧和对白作者。——

译者注。

119 雅克·勒马尔尚(Jacques Lemarchand),1908—1974,法国小说家、戏剧评论家。——译者注。

120 让·施伦贝格(Jean Schlumberger),1877—1968,法国小说家、评论家、剧作家,《新法兰西杂志》的创办者之一。——译者注。

121 菲利普·苏波(Philippe Soupault),1897—1990,法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最早的超现实主义作家之一。——译者注。

122 上文引用的是刊登在《战斗报》上的请愿书,签名者名单综合了发表在不同报刊上的几份名单,这些名单有两到三处细微差别。

123 此外,这份请愿书同样也在《现代》杂志上刊登过,见《现代》第24卷,第22期,1947年7月,第181页及以后多处。

124 路易·马丹-肖菲埃(Louis Martin - Chauffier),1894—1980,法国小说家、评论家。——译者注。

125 《现代》,第22期,1947年7月,第183页。

126 路易·波韦尔斯(Louis Pauwels),1920—1997,法国小说家、新闻记者、评论家。——译者注。

127 根据艾莱娜·艾克就第四共和国时期的广播电台所作的研究——该研究目前尚未发表——这一点现在已经确定。这里我们要感谢她为我们指出了这条如此重要的线索,在这方面许多档案的记载是相互一致的,但是,这些档案还不足以使人了解政府总理保尔·拉马迪埃及其办公室的动机。在《事物的力量》一书中,西蒙娜·德·波伏娃也仅仅满足于说:"(萨特)过去的一位同事博纳菲和拉马迪埃很熟,是他向后者提议,让我们在电台里主持一档论坛节目。"

128 法国战败后,戴高乐将军流亡伦敦,并于1940年6月18日发出了著名的抵抗号召。——译者注。

129 《让-保尔·萨特:现代论坛》(*Jean - Paul Sartre. La Tribune des Temps modernes*),国家音像研究院有声资料,《历史之声》系列,2盒,4盘磁带,国家音像研究院和法国广播电台共同出版,1989年(1947年10月和11月录制)。

130 西蒙娜·德·波伏娃,《永别仪式》,后接《和让-保尔·萨特的谈话》,出处见前文,第354页。

131 雷蒙·阿隆,《回忆录》,出处见前文,第317页。

132 参阅艾莱娜·艾克,《法国的广播、文化和民主:注定失败的野心(1944—1949)》[*Radio, culture et démocratie en France : une ambition mort - née (1944 - 1949)*],

摘自《20世纪——历史杂志》,第30期,1991年4—6月,第55页及以后多处。

133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法国哲学家,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译者注。

134　艾莱娜·艾克,同注132,第317页。

135　人民共和运动(Mouvement républicain populaire,简称MRP),1944年11月建立的基督教民主党派,1968年消亡。——译者注。

136　罗贝尔·舒芒(Robert Schuman),1886—1963,法国政治家,曾多次出任政府部长,1947—1948年间任政府总理。欧洲煤钢联营的缔造者之一,1958—1960年间任欧洲议会主席。——译者注。

137　费尔南·普埃(Fernand Pouey),《电台里的自由民》(*Un ingénu à la radio*),多马出版社(Domat),1949年,第249页,艾莱娜·艾克引用,引文在第66页。

138　它们于1989年8月在法国文化广播电台被首次播出。此后,它们被收入我们先前提到的国家音像研究院档案的第四盘磁带。

139　我曾经在《冷战时期的法国知识分子:在共产主义和戴高乐主义之间?》(*Les intellectuels français au temps de la guerre froide : entre communisme et gaullisme?*)一文中,对此观点作了分析。这篇文章刊登在斯蒂法妮-库图瓦和马克-拉扎尔主编的《法国激情50年——戴高乐和共产党人》(*Cinquante ans d'une passion française. De Gaulle et les communistes*)上,巴朗出版社(Balland),1991年,第257—268页。

140　阿尔贝·贝甘(Albert Béguin),1901—1957,法国散文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曾担任《精神》杂志的领导工作。——译者注。

141　西蒙娜·德·波伏娃,《永别仪式》,后接《和让-保尔·萨特的谈话》,出处见前文,第354页。

第五章
冷战期间

让－保尔·萨特和雷蒙·阿隆两人决裂之后，很快成为法国思想领域两大对立阵营的代表，他们的地位同时也反映出这两大阵营的不均衡性。冷战期间，萨特越来越被法国共产党所吸引，后者在法国知识界的影响很大。相反，阿隆则重新投入了同共产党及其支持者的战斗，处于非常孤立的境地。

事实上，在思想斗争的舞台上，萨特光芒四射，犹如一座领袖的雕像，很快就成为无法回避的人物；阿隆则几乎躲在幕后，一些对历史的深刻含义不甚了解的人说他是历史的逆流，而另一些人则把他看成是对历史预言百灵百验的卡珊德拉[1]。因为这里所涉及的，仍然是他们两人和历史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两人对历史的理解粉碎了他们的友谊：他们中的一个人是知识分子政治参与义务的“代表”，他自称是赋予事物意义的人，其实，这意义和马列主义所

宣扬的只是大同小异；反之，另一个人把自己打扮成政治参与这一至高无上的义务的审判者，并很快指出了这种义务对思想的麻醉作用。

要想把萨特和阿隆之间的辩论重新置于一个完整的历史背景下，就不能忘记，这种辩论是在第四共和国时期发生的，而后者和历史运动的关系非常密切。正是这种运动，使第四共和国在1958年春的动荡中遭到了灭亡。此后，一些人对这个业已灭亡的共和国作了不少分析，但这些人的动机并非都那么纯洁。比如，有人诊断说，第四共和国的制度功能不全，这其实是在为制度的更替辩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更替也是一种休克疗法。即使那些赞同这一看法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一切风平浪静，那么第四共和国可能会继续存在下去。说到底，这个共和国的悲剧，在于没能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从它的幼年起，就受到了来自两条战线的进攻；而它的青少年时代则先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

事实上，从1947年起，由于冷战开始，共产党被逐出政府，处境危险，从此，它就成了第四共和国不可调和的敌人。同时，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出现，也使第四共和国多了一个反对者。对于一个政治制度而言，这已经够多的了，更何况不久以后，它又受到了冷战和殖民地独立运动两轮冲击波的直接打击。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任何一个西方民主国家，都没有经历过如此广泛的双重震撼。的确，当时意大利和法国都拥有一个势力强大的共产党，因此，它们不同于其他国家，对于它们来说，冷战不仅仅是一个对外方针和国防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极为关键。不过，意大利没有海外领地，因此它不用同时经受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困扰。相反，虽然英国不得不面对这种独立运动，但由于它在国内不存在真正意义的共产党，因此，除了工党内部曾经

就核装备问题进行过争论之外,冷战对于它来说并不是一个内在的问题。

所以,当萨特和阿隆加入冷战的时候,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他们两人活动的环境是法国知识界,而后者并不仅仅是塑造了贝波内和堂·卡米罗这两个人物的乔瓦尼·瓜雷斯基[2]所描绘的某个位于意大利波河平原的小村庄,法国知识界是一个将要承受所有的历史风暴特别是殖民地独立运动和冷战这两阵狂飙的圈子。的确,当时,冷战是萨特和阿隆之间关系新动向的背景。[3]

永别

他们两人的友谊公开破裂的时间是可以确定的。其标志是1948年11月《现代》杂志"书信"专栏的一篇大章,题为《雷蒙·阿隆的一封信》。这封信是阿隆对1948年6月18日萨特和鲁塞[4]的长谈所作出的反应,那次长谈的内容发表在同年9月的《现代》杂志上。[5]当然,我们应该把那次谈话放到革命民主联盟的背景下来看,当时萨特参加了该联盟,我们后而也将提到它。但是,在这里,重要的是萨特在那次谈话中攻击了法兰西人民联盟——"资产阶级需要法兰西人民联盟的重新集结,这种需要是战术上和即时策略上的"——并且明目张胆地将该联盟比做维希政府和法西斯。此外,在那次谈话中,他还指名道姓地直接批评了雷蒙·阿隆。[6]

正是为了回击萨特的批评,雷蒙·阿隆才在1948年10月22日给《现代》的"主编先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发表在该杂志1948年11月那一期的最后:"我无意在您的杂志上回答让-保尔·萨特先生的攻击,我只是不想让您的读者产生误解。萨特先生强加给我的观点,不是我本人在自己的文章和著作中所表达

的，那些被放在引号中间的话并非出自我口。也许萨特先生把那些话视为我内心思想的特征，他以为我的思想可以反映在不久以前我们的友好谈话当中。可惜的是，不管是关于冻结工资，还是关于技术进步所引起的社会问题，他都粗暴地歪曲了我的思想。

"您的读者只要参阅一下我最近的著作《大分裂》，就可以证实这一点。

"如果您能发表这封信，我将非常感谢。请接受我对您最崇高的敬意。雷蒙·阿隆。"

《现代》杂志在发表这封信的同时，还配了一段署名"J.-P.S."的评论："雷蒙·阿隆确实对我说了我在《关于政治的谈话》中所引述的那些话。既然我无权怀疑他的诚实，那么只能假设他为了能使我听懂，把自己的思想简单化了，而事后，他又忘了这暂时的行为。他指责我曾经提到过一次'友好'的谈话。我要回答他，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谈话已经不再真正友好了，因为他的行为已经不再友好。"

四年后，另一封《致〈现代〉杂志主编的信》引起了知识界的又一次分裂，这封信是阿尔贝·加缪写给让-保尔·萨特的。前者厌倦了发表在1952年5月《现代》杂志上的对《反抗的人》的批评，他说自己"感到有点累，因为看到自己特别是看到那些过去从未拒绝过任何斗争的老战士，在不停地受到批评者有关斗争功效的教训，至于那些批评者，他们除了自己的职位，在历史的进程中什么都没有留下"。萨特反驳道："因为可怜的自负和脆弱，您总是不敢彻底说出真相。结果您成了抑郁过度的俘虏，这掩盖了您内心的困难，您称这种抑郁过度为地中海式的标准。这一点早晚会有人告诉你的；既然如此，那么就让我来当这个人吧。"[7]

的确,1948年萨特和阿隆的不和,并没有像1952年萨特和加缪的龃龉那样,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关于萨特和加缪的不和,1952年9月6日的《法兰西晚报》打出标题:"萨特和加缪彻底决裂。"[8] 这一反差表明,上述两种情况的对比仅此而已,因为在1948年,阿隆远远比不上加缪在同时代和在1952年那么出名。但我们不能忘记,在两位"小朋友"的友谊结束时,曾有过一次尽人皆知的论战,这一场公开的争论拉开了知识界一系列不和和决裂的序幕。

其实,这一序幕并不是完全由萨特和阿隆的论战拉开的,因为在和阿隆决裂之前,萨特已经和亚瑟·科斯特勒[9] 发生了争吵。1945年12月,后者的小说《正午的黑暗》[10]在法国由卡尔曼-莱维出版社出版,它立刻招来了法国共产党的仇视,后者组织了一个代表团,由雅克·杜克洛[11]率领,拜访了该书的出版商罗贝尔·卡尔曼。[12]至于莫里斯·梅洛-庞蒂,他在1947年的《共产主义与恐怖》一书中,对《正午的黑暗》作了反驳。前一年年末,亚瑟·科斯特勒发表《瑜伽信奉者和特派员》之后,梅洛-庞蒂同样在《现代》杂志中发表了一篇题为《瑜伽信奉者和无产者》的文章,对此进行了批判。当时,萨特和科斯特勒关系破裂,西蒙娜·德·波伏娃后来在《事物的力量》中,对后者作了描述,并从宿命论的观点出发,断言"在政治上看法不同的人,是不可能成为朋友的"。此外,1954年,西蒙娜·德·波伏娃还在《要人》中为科斯特勒画了一幅讽刺画。

在这方面,莫里斯·梅洛-庞蒂的参与很能说明问题。正如皮埃尔·格雷米雍最近指出的那样,"今天,思想的历史已经有一点得到了最终的肯定:最初,在确立杂志政治路线的过程中,是莫里斯·梅洛-庞蒂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也是他保持着严峻的警惕,包括对萨特在内,为的是避免极权主义的概念被运用到苏联

体制上去。”[13]

富尔敦效应

萨特和阿隆的关系于 1948 年秋最终破裂，这绝非巧合。与此同时，阿隆在那年的夏天出版了著作《大分裂》。该书是阿隆双重身份的写照：他既是知名的分析家，又是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

《大分裂》的前两部分有关外交和意识形态的分裂，深刻分析了地缘政治的破裂和由此引发的外交、军事形势。在这一点上，它们是阿隆对冷战最早的形式化的分析，他用一句流传后世的话对此作了概括：“无望的和平，不定的战争。”《大分裂》使阿隆成为冷战及其蕴涵的大分析家之一，他这位理论家同时也是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那时候，他是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成员。该书的后两部分主要以政治参与的眼光，更多地谈论了当时发生在法国人之间的辩论。“思想和道德的改革”必须通过“对现实的认可和为改善人类命运所作的徒劳而缓慢的努力”来完成。[14]我们看到，雷蒙·阿隆前几年还在探索，而从《大分裂》出版的那一年起，他的思想已经稳定，意识形态已被武装起来。他注意到，世界被一分为二，他必须选择其一：“有一个军事和宗教的集团，它严格采取以下原则：不赞成我的人就是我的反对者。面对这样的集团，惟一值得尊敬的态度，就是完全赞同或彻底否决，没有中间选择。”

《大分裂》在 1948 年 7 月出版后，受到了《现代》杂志下半年某一期——确切地说，是刊登阿隆书信的后一期——的抨击，发表抨击文章的人是让·普雍。[15]从这一点来看，《现代》杂志还处于支持共产党的时期。事实上，由于雷蒙·阿隆参加法兰西人民联盟，以及他在《大分裂》一书中所作的分析，他很快就成了共产

党和亲共知识分子的靶子。比如,一些亲共的年轻师范生后来把矛头指向了他。由这些师范生主持的简报《乌耳姆路》这样报道:"1948年11月,雷蒙·阿隆来向学生们宣扬法兰西人民联盟的章程,他用了一个颇具诱惑力的题目:《如何赢得冷战》。亲共的学生们让他闭上了嘴巴。"然而,这并没有妨碍雷蒙·阿隆两个月后再来,正如同一份简报所说的那样:"1949年1月:雷蒙·阿隆不甘失败,重新做了一次'讲座',而共产党人声称该讲座已被禁止。"

从此,雷蒙·阿隆被共产党看做是一个敌人。以至于在随后的十年里,共产党对阿隆的态度一直很生硬。他成了《费加罗报》的代表、工人阶级的公敌、最为保守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甚至连亲共产主义的文学也将他形容成一个特别令人反感的人物。1951年,皮埃尔·库塔德在《吉米》一书中、用贝尔纳这一人物,生动地描绘了阿隆的形象。贝尔纳在《日报》上对国际形势进行分析,他的确想把自己的分析建立在社会学和统计学的基础之上,但是,他"总是从本来非常确切的事实当中",得出"最为模糊、最为混乱的结论"。此外,他还表现出一种对纳粹的怀念。[16]其实,这一主题在让·卡纳帕的笔下已经出现过了,在他的《存在主义不是一种人道主义》中,雷蒙·阿隆被称为"新法西斯分子"[17]。虽然共产党人对阿隆的攻击并不总是带有这样的内容,但在隆后的那些年里,他们的语气是严厉的,1955年出版的《知识分子的鸦片》并没有他这种语气得到缓和。比如,安妮·贝丝(克里耶盖尔)[18]在1955年7—8月的《新评论杂志》中写道:"阿隆先生做了一件世界上最为庸俗的事情,他否认了自己的年轻时代。他曾是一个有着宽宏思想的少年,可现在却成了《费加罗报》的合作者。他不会为此感到安慰的。"

即使阿隆的共产党对手当时把他看成是《费加罗报》的服务

者,但如果我们认为撰写社论是阿隆惟一的活动,那么我们就犯了一个观点上的错误。的确,阿隆在这方面的作品很多:第四共和国时期,雷蒙·阿隆平均每年在《费加罗报》上发表82篇文章[19]。此外,从一开始起,这份报纸就给予了阿隆信任而公开的欢迎,在1947年和1948年两年,阿隆所有的文章都无一例外地被刊登在第一版上。因此,作为评论员,他的活动只占用了他一天当中很少的时间。1948年,在担任《费加罗报》评论员几个月后,雷蒙·阿隆在一篇文章里指出:"评论员总是拿那些最迟不晚于晚上7点或8点收到的新闻作为社论的主题;由于他写一篇社论需要一个小时,所以,他9点以前就能写完,获得自由。"[20]但这并不是说评论员的工作不严肃,11年后,他在一次讲座上声明:"评论员的职业要求一定的思想素质。"[21]

归根结底,这一点非常重要。"评论员"使分析性的思考在新闻报道中得到普及和扎根。在当时的背景下,是冷战的世界动员了这两位联合起来的作家。[22]更何况,雷蒙·阿隆预见到了这个世界会一分为二。我们已经知道,他是在1946年春开始疏远《现代》杂志的,因为万一美国和苏联发生冲突,知识分子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关于这个问题,阿隆和创立该杂志的编辑班子意见不一致。1930—1931学年在科隆以及两年之后在柏林,年轻的高等师范生阿隆本能地感到历史重新开始启动,从某林意义上说,和那个时候一样,四十多岁的雷蒙·阿隆在他同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之前,预见到历史又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在他的圈子里,他是第一个采取对策的人之一,这一对策可以被称为"富尔敦效应"。1946年3月5日,温斯顿·丘吉尔在富尔敦发表演说,称"一个苏联的势力范围"正在形成,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共产主义的第五纵队"。他有一句话流传后世:"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23]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24],一道铁幕缀

缓落下,将欧洲大陆一分为二。"其实,他已经在采取"二战"大同盟解散后的对策了。

和雷蒙·阿隆一样,有些人将会对这种对策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作出评判。比如贝尔特朗·达斯多尔格针对亚瑟·科斯特勒出版《正午的黑暗》一事,在《精神》杂志上写道:"人们把这本书置于政治情感的范畴。这是相对于它能帮助我们与之斗争的'敌人'、相对于它所推荐的武器、相对于它可以提供的宣传而言的。事实上,连我们的骨子里都带上了政治倾向。"[25]特别从1947年起,在共产主义的问题上,"政治情感"将影响到知识界。但是,这种情感的本身,必须放到一个受力量关系控制的背景中来看。

在冷战中的巴黎

萨特和阿隆发生龃龉时,巴黎知识界逐渐受到了冷战的影响。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正在东欧建立起来,在觉察这种制度对自由的破坏性以及在接受有关证据的方面,巴黎知识界是否表现出某种无能呢?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在正确观察东欧现实的问题上,他们遇到了困难:比如,弗朗索瓦·费日托在他的《回忆录——从布达佩斯到巴黎》[26]中,讲述了他1949年11月发表在《精神》杂志上的一篇关于拉日克[27]案的文章[28]所遭到的极端仇视,他和周围的人有了隔阂,一些朋友也同他疏远了。

那么,这种现实存在的困难,是否因此而成为一种几乎功能性的无能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盎格鲁-撒克逊历史学家托尼·裘特最近所提出的论点之一。[29]他认为,"当时,法国人关闭了他们的思想国界。全体知识分子社团的定义遭到了更新,为的是把斯大林主义的受害者——不管他们是否赞同这种意识形态——排斥在外"。这样一来,"欧洲东半部分的知识分

子”“从此可能受到两重意义上的排斥：一方面，他们被共产党剥夺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则被自称为欧洲共同文化的捍卫者拒绝在该文化的门外”。上述结论是严厉的，批评是无情的。这种结论和批评当然引起了争论。关于这一点，尽管它只是著作的一个方面，托尼·裘特可能低估了在法国非共产党左派和自由主义右派当中，某些知识分子小圈子的注意和接受能力。事实上，笼统地谈论巴黎知识界是片面的，因为即使我们对它作一番肤浅的分析，也能立刻看出它的多元性：其实，法国知识界是一个盘根错节、各种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的圈子。而来自东欧的消息，恰恰是通过其中的某些社会关系网得到传播或禁止的。我们在后文中将有机会谈到这样的几个关系网。但是，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得到注意。这仅仅是为了让大家从一开始就记住，说当时巴黎的知识分子对铁幕那一边的现实不闻不问、沉默不语，这是一种陈词滥调。这一点在这里十分重要，更何况提醒大家这一点，就足以使以下两种说法免于绝对化：一是在患上了盲目症的知识界里，阿隆是惟一清醒的知识分子；二是在40年代末，萨特对发生在中欧和东欧的事情全然不知。

尽管如此，虽然许多巴黎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收到了来自东欧的消息，但从宏观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仍然存在着一个不争的事实，它由于我们前面的说明而显得更加明显：当那些来自东欧的消息传到法国知识界时，其力度已经大大减弱了。或者更加确切地说，那些消息如同逐渐干涸的河流，消失在冷战中的巴黎。从此，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问题是如何解释这种消息的渐弱现象。这样做的条件是他不能局限于对内在价值的简单判断，比如盲目地把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说成是厚颜无耻的人，或者把非共产主义的左派知识分子谈成是同情法国共产党或在后者的威吓面前卑鄙怯懦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曾有过上述态

度,否则,我们提出的关于知识界的看法就会是一尘不染,就会是出自于一个对我们恭顺无比的历史,而我们也就会否认缺点的存在或个性的不存在;而是因为我们对上述态度的解释肯定有着局限性,通俗地说,我们必须回到当时巴黎知识界意识形态的力量关系这个问题上来。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当时共产党知识分子所拥有的反击能力和拒绝能力,特别是在对待来自东欧的消息的态度方面。

的确,从现在看,许多重要的研究使我们看清了法国共产党自称是"法国知识分子"政党的断言,比如,在法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上,乔治·高尼奥[30]就是这样说的。其实,就像雅妮娜·韦尔黛-勒鲁写的那样,如果仅仅就著名知识分子而言,那么共产党人只是他们中间一个"很小的圈子"。此外,必须补充说明的是,这个"很小的圈子"只是一个范围更为广泛、构成更为合理的政治势力的核心,这种政治势力一方面由亲共分子组成,他们的人数远比著名"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多,另一方面由知名度稍低甚至是默默无闻、更为年轻的共产党知识分子组成。因为共产党更多地是在法国解放后完成政治觉醒的年轻一代中吸纳成员。的确,当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学术上出名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常常早已离开了法国共产党;但在这方面,当时共产党的影响却是广泛的。比如,单就历史学家而言,就有莫里斯·阿居龙[31]、阿兰·贝藏松[32]、让·布韦埃、费朗索瓦·费莱、安妮·克里耶盖尔和埃玛纽埃尔·勒·鲁瓦·拉杜里[33]等人,成为了战后受到共产主义诱惑的那一部分年轻教师的代表[34]。

总而言之,通过信仰及亲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的稳定影响,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些知识分子所占据的并非"霸主地位",他们也从来不曾有过这种地位,而是"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给了共产主义势力一种反击的能力,并且通过两条渠道

反映出来：一是对左派的威吓力量，二是对右派的打击力量。单是关于威吓力量，就可以写整整一本书，因为它产生于现实和精神的复杂关系，兼有思想恐怖主义和爱恨交加的感情。比如，《精神》杂志和法国共产党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该杂志——至少在战后初期——所包含的“哲学共产主义”[35]的丰富内容，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一份倾向左派的杂志，《现代》也根据共产主义的坐标为自己定位，这是不足为奇的。同样，在革命民主联盟时期，让－保尔·萨特被法国共产党暗地里勒令作汇报，这也是不足为奇的。

说实话，“汇报”这种说法不如“担保”来得贴切。这里，我们重新看到了针对右派的打击力量。因为，站在第一线反对右派并履行对右派的反击职责的，经常是非共产党的左派。但是，后者的这一角色，也许不足以解释为何巴黎知识界不能很好地接受来自东欧的消息。这种现象常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对上述消息的拒绝：只要消息的内容令人难以置信，那么它就不可能存在。因此，不能把所有的现象都简单地归结为建立在策略、无耻和怯懦基础上的“躲在幕后的愿望”。造成这种现象的，同样还有“预见能力的缺乏”，这种说法比起“盲目”一词来，感情色彩要少一些。

法国共产党借助其在思想上的打击力量，迫使左派知识界服从一种三段论的推理，推理的结果是，知识分子有必要加入共产党，或至少有必要围绕在该党的周围。推理的前提是：必须作出选择。因此，朱利安·本达1948年在《欧洲》杂志上写道：“法国人民必须在这两个阶级集团及其在法国领土上的表现形式之间作出选择。”[36]这一下子就排除了人们漠不关心、折衷妥协或恪守中立的可能性。所以，正在产生的中立主义意味着拒绝选择，理应遭到谴责。鉴于此，这种必不可少的选择，同时也是一

种缺乏真正的二者取一原则的选择。因为如果一个人谴责资本主义,那么他就不会是反共分子。1947年第一季度,历史长河改变了流向,这时候,保尔·弗莱斯在《精神》杂志上这样指出:"人们不能在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或避免该制度为了摆脱矛盾而转变为新法西斯主义)的同时,同共产党人作斗争。"[37]当然,这位作者几个月以后又明确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和纳粹主义是解决同一个问题的极端办法,它们都求助于同样的极权手段,消除反对力量",而"警察制度成了至高无上的武器,它的成效来自于告密。在普通法范围内建造起来的监狱已经不够,集中营的出现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必需。"[38]然而,由于法国面临着新的极权威胁,"新的抵抗运动使我们和前一次一样,和共产党人站在了同一个阵营。"

就这样,反共批评的影响被抵消了,就像在莫里斯·梅洛-庞蒂的笔下一样。在后者把马克思主义看做历史哲学的那些年里,特别是在1947年的《人道主义与恐怖》一书中,他从未因此而停止批评苏联制度的某些方面,他谈到了"集中营制度"和"警察制度",但立刻又声称,反共思想不会带来任何真正的解决办法,"马尔罗、科斯特勒、蒂埃里·莫尼埃[39]、布尔纳姆之流",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团体"和"退休的知识分子",他们曾"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对混乱表示过赞同"。[40]事实上,当时,反共思想成了很多法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可耻的疾病"[41]。

"是萨特有一双肮脏的手"

我们应该以这种力量的对比为基准,来审视萨特和法国共产党之间的复杂关系。但要做到这点非常困难,因为这种关系同样必须放在一定的背景之下,而当时的背景是:在战后的几年里,法共在美学问题上展开了多次攻势。事实上,从一开始起,

共产党人对存在主义就表现出怀疑的态度。我们知道，对于让-保尔·萨特来说，1945年秋是一个重要的时期，那时，有好几位共产党知识分子走上了斗争的前线。1945年11月24日，《法兰西文学报》就"什么是存在主义?"这一主题，发表了多米尼克·奥丽的一项调查，在调查中，亨利·勒费弗尔撕破脸皮，声明"有些东西(使他)感到厌恶"。特别是一个月后，罗杰·加洛蒂[42]首次在《法兰西文学报》上发表文章，他断言："这至多不过是几个知识分子染上的瘙痒或低热，抵抗运动结束之后，这些人自认为'可以复员'了。"[43]的确，从上一年的年末起，萨特已经感到了共产党人对存在主义的敌视，因此他在《行动》杂志上发表了一项声明；[44]不过，真正的敌视开始于1945年的下半年。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在1945年6月召开的法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乔治·高尼奥和罗杰·加洛蒂双双作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为民族文化的复兴大唱赞歌，并且谴责了那些被认为是反民族和堕落的文化形式。特别是存在主义和抽象艺术，它们都成了攻击的靶子[45]。此外，在前面提到过的刊登在《法兰西文学报》上的那篇文章中，亨利·勒费弗尔说得十分明确："这种倾向似乎向我揭示了某种病态的东西和堕落的现象，这种现象完全处在资产阶级文化的腐朽路线上。"至于罗杰·加洛蒂1945年12月28日的那篇文章，它占据了《法兰西文学报》第一版的半个版面，确切地说，是七栏中的五栏。文章作者攻击萨特是一个"梦游的知识分子"，被战争惊醒；也攻击存在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亵渎，不但"没有对马克思主义作补充，(相反)和它背道而驰"。这样一来，任何对话都成为不可能，因为"这种与现实割裂开的思想对工人阶级毫无影响，而在今天，后者是哲学金科玉律的卫士：思想产生于行动，其本身就是行动，并服务于行动。"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存在主义的危险并不十分强烈，因

为它只是一场“低热”而已。

这场低热也许蔓延得太快,因为共产党人的攻势不仅在继续,而且在扩大,它揭露了这一“蛊惑人心的哲学”,说它的“社会功能,是在(年轻人)遇到人类的‘具体’问题时,向他们散布气馁和投降的情绪”。[46]1948年,萨特在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境地》的第1卷时,他过去的学生让·卡纳帕对他进行了抨击:这部作品“乏味得要命”,“从头到尾全是谎言”,其作者“总是作出错误的判断”,采取“评论界在哲学上的舞弊行为”,表现出他是一个“蹩脚的艺术家”和“蹩脚的评论家”。结论是:“在这300页里,萨特先生什么都没说,或者净是在说蠢话”,而“罗杰·加洛蒂则用了90页的篇幅,为我们带来了四篇价值重大的评论研究,因为这些研究的主要内容,恰恰是关于莫里亚克、马尔罗、科斯特勒和萨特的”。[47]

确实,在此期间,法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域里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如果说1945年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显示出罗杰·加洛蒂和皮埃尔·埃尔韦对所有特殊的共产主义美学观的反对,那么第二年,阿拉贡成功地使人们接受了一种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的艺术观点。[48]而在1947年6月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又把一条更为严厉的纪律强加给知识分子和亲共的报刊杂志。[49]此外,在那次大会的报告里,莫里斯·多列士抨击了被称为是“腐朽”的文学,其中包括科斯特勒、米勒[50]和萨特的作品,这种文学表达的是“资产阶级腐朽的意识形态”[51]。

所以,在革命民主联盟成立之前,萨特就遇到了共产党的点名攻击。我们可以通过共产党报刊对萨特的戏剧所作的评论,看到这种敌视态度的发展过程。1946年11月,当《死无葬身之地》在安托万剧院上演时,[52]让·阿弗朗在11月14日的《今晚报》上写道:“这是一出几乎完全失败的话剧,阿兰·居尼、弗朗索瓦·

韦拜尔和马丽·奥丽韦埃都是多少有点相似的存在主义者。"当然，在同一场演出的下半段上演的《必恭必敬的妓女》，受到了这篇评论的欢迎。但这是因为该剧对美国的批评："它对美国的种族主义和普遍的社会虚伪现象作了激烈、彻底、恰如其分的讽刺。"其实，1947年秋，对萨特的攻击变本加厉，它一部分是由法共的思想机器发动的。在1947年11—12月份的《思想》杂志上，波尔·加亚尔认为萨特是"掘墓人和走狗"。而1948年4月8日的《法兰西文学报》则宣称："是萨特有着一双肮脏的手。"这是在影射萨特正在上演的新作，后者很快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的确，在此期间，萨特参加了革命民主联盟。另外，许多报纸都公开地把公众的政治参与和戏剧创作作比较。比如《晨曦报》在一片题为《从冬季自行车赛车场[53]到安托万剧院》的文章中，向萨特询问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关系问题。后者回答说："我不是一个专门从事撰写宣传作品的苏联作家。"[54]共产党开展对这部剧作的批评运动并非毫无道理。一方面，一些年轻的共产党积极分子被要求去扰乱该剧的演出。[55]另一方面，共产党及亲共的报刊也纷纷上阵。玛格丽特·杜拉斯[56]在1948年4月的《行动报》上，提到了让－保尔·萨特的"资产阶级"观众，并指出他"出色地满足了(这些观众的)窥视欲"。波尔·加亚尔在《法兰西文学报》上对该剧作出了最后的判决："它的风格就保非常蹩脚的《星期六晚报》。"的确，萨特所犯的渎君之罪是严重的，因为共产党人就如同"一群芝加哥杀手"。但是归根结底，即使萨特的"剧作获得了成功，他也只是证明了反共者是最大的白痴"[57]。五个月后，《行动报》再次对该剧展开了攻击，并指责了这种"骇人听闻的比较"，说它"出于同样的怨恨，以可怕的手段——这种手段是革命人道主义国家实现世俗解放所必不可少的——'混淆'和谴责了希特勒主义的方式和方法"[58]。很明显，让·科斯达

的攻击带有政治性:"该剧是针对某一理论、某一政治行动的斗争,这种斗争所采取的手段,比臭名昭著的《正午的黑暗》更加卑鄙。"

右派报纸则经常对该剧持欢迎态度。蒂埃里·幕尼埃发表了两篇关于该剧的文章[59],并预言说:"很久以来我们就知道,不赞同共产党的人就是反对它的人,而反对它的人注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由此而引发的不仅是关于该剧的辩论,同样还有关于人们对该剧的反应的辩论。乔治·阿尔特曼在1948年5月5日的《游击队报》上,以挑衅和被挑衅的措辞,提出了这一问题:"我们毫不犹豫地说,不管那些企图把《肮脏的手》拉到自己一边的反动评论家是否有意,只要他们想让这出戏成为'右派话剧',那他们就和某些共产党评论家一样,都大错特错了。我们断然否认有钱人和反革命分子有任何辨别《肮脏的手》的主题的能力和才智。"不管怎样,该剧获得了成功:"我们从不把自由和革命分开,我们认为,像萨特在《肮脏的手》里那样说话,就是在显示自己的革命立场。"雅克·勒马尚在1948年4月6日的《战斗报》上也这样总结:"只要智慧、艺术和技巧糅合在一起,我们这个失宠的时代就能得到观众的欣赏,而我们也就会成为讽刺挖苦的对象。"[60]

1948年夏,由于8月25—28日期间,在波兰的弗罗茨瓦夫召开了世界知识分子保卫和平大会,因而紧张的气氛进一步加剧。这次大会在历史上非常重要,因为它促使了和平运动的诞生。大会是以苏联作家联合会秘书长亚历山大·法德耶夫[61]措辞激烈的报告开始的,他首先抨击了"反动派"和"希特勒政策的模仿者"们,然后又谴责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文学代理人"——亨利·米勒、"叛徒"多斯·帕索斯[62]以及托马斯·期蒂恩斯·埃里奥特[63]——和"剥夺了人们思考能力的小人"。他的以下抨击后

来非常著名："如果豺狼能学会打字，鬣狗会舞文弄墨，那么它们'创作'的作品一定和米勒、埃里奥特、马尔罗和萨特之流写的书差不多。"[64]尽管这份报告反响激烈，但大会结束时，在到场的357名代表中，有337人投票赞成最后的决议，该决议揭露了"战争贩子"，确定了成立知识分子保卫和平联系委员会的原则。参加大会的法国代表团成员主要有：弗雷德里克和伊伦·约里奥－居里[65]、毕加索、艾吕雅[66]、伊夫·法尔日、朱利安·本达、马塞尔·普勒南、罗歇·瓦扬[67]、费尔南·莱热[68]和罗朗·卡萨诺瓦。

从中立分子到共产党的同路人

尽管遭到法国共产党的攻击，在40年代的最后几年里，萨特的想法和当时许多非共产党的左派知识分子是一样的：反共至少是一个错误，也许是一种罪恶。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了引出这种结论的推断。这种结论使萨特在对国际关系的判断中采取了中立的态度，而恰恰是这种态度，遭到了雷蒙·阿隆的批判，后者在《大分裂》中写道："惟一受人尊敬的态度，就是完全赞同或彻底否决。"我们看到，在揭露"中间选择"的同时，雷蒙·阿隆对中立主义的谴责，随着他和艾蒂安·吉尔松[69]的著名论战而登峰造极。[70]因此，前一年，即1948年秋，雷蒙·阿隆在和萨特彻底决裂之前，对革命民主联盟的抨击是温和的，该联盟的计划介于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中立主义的情感之间。[71]1948年2月20日，阿隆在《费加罗报》上指出这个党派正在形成，他并没有显示出对它怀有明显敌视的态度："在官僚专制和资本主义"之间，革命民主联盟的创立者"试图开辟革命浪漫主义的道路"。当时，最残酷的打击不是来自他们自己的阵营，而是来自法国共产党，后者立刻攻击该联盟是"第三国际法国分部的尾巴"[72]。

其实，中立思想在法国知识界的暂时兴盛，从来真正影响过

法国共产党的主导地位。这种情况有点荒谬:中立主义者公开表示关心的事情之一,是如何不使法国共产党重新被孤立。从力量关系的意义上讲,这种被困者为别人解闲的狂热只会对法国共产党有利。不管怎样,由于从1949年起国际形势日趋紧张,中立主义也受到了削弱。

如果说1947年是冷战的开始,那么1949年也是关键的一年,因为大西洋同盟的成立改变了冷战双方的对抗方式。该同盟的诞生确实反映和加剧了东西方关系的恶化,这种恶化似乎可以证明中立道路的正确性,因此也加强了中立主义的力量。但与此同时,这种恶化又削弱了中立的力量,因为人们从此必须作出选择,比如中立的革命民主联盟马上就感觉到了这种影响。1949年4月,在对共产主义所应采取的态度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看法。4月30日,达维德·鲁塞在"冬季自行车赛车场"组织了一天反独裁、反战争的活动,加缪、阿尔道斯·休克斯利[73]、伊格纳齐奥·西罗奈[74]均到场参加,但梅洛-庞蒂和萨特却没有去。当然,以上这些人并非全是革命民主联盟的成员,但作为该联盟的首要人物,萨特和鲁塞在看法上的分歧,很能说明这种影响的后果。到了夏天,革命民主联盟的失败已是无可争议的了,1949年10月,让-保尔·萨特正式离开了联盟。

至于阿隆,他从一开始起就选择了自己的立场。他在1948年12月21日的《费加罗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大西洋公约》的文章,表明他支持这一"处在酝酿中的大同盟",何况"目前,西欧可以说没有防卫力量"。在这个"和平没有保证"的年代,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他还预言说:"旧大陆可能将有一代人要生活在一个分裂的世界里。"同样,从那时候起,雷蒙·阿隆就已经明确揭露了苏联的"强制劳动营"[75]。所以,在几个月后的克拉夫琛科案[76]中,他选择了站在克拉夫琛科这一边。

克拉夫琛科案是指发生在民事诉讼人维克多·安德烈耶维奇·克拉夫琛科和《法兰西文学报》之间的诉讼,该诉讼由塞纳省轻罪法庭第十七分庭受理,从1949年1月24日—4月4日,总共经历了26次法庭审讯。诉讼的原因是1948年1月,克拉夫琛科控告《法兰西文学报》对他进行诽谤。诽谤缘于1947年11月13日《法兰西文学报》刊登的一篇题为《克拉夫琛科是如何被炮制出来的?》的文章,该文的作者以西姆·托马为笔名,指责克拉夫琛科只是一个造假者。事实上,《我选择了自由》这本书一出版,共产党的打击力量就立刻完全展开了,其目的在于诋毁该书作者的名誉,从而使他的证言丧失威信。早在西姆·托马之前,罗歇·瓦扬就已经称克拉夫琛科是"不诚实的人"和"叛徒"了。

尽管克拉夫琛科赢得了这场诉讼——《法兰西文学报》被判对损害作出赔偿——但他却输掉了关键的方面。对法庭诉讼内容的分析和对被提及的证人名单的检查表明,除了法国共产党断然拒绝了克拉夫琛科的指责之外,亲共分子和共产党的同路人还反驳了克拉夫琛科的证言以及那些试图声援和支持《我选择了自由》的作者的人。[77]那时候,知识界内部的力量对比明显有利于克拉夫琛科的对手。所以,对他的拒绝和反驳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由此出现了一种荒谬的情况:《我选择了自由》一书在法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销量超过了5万册、几乎和30年后《古拉格群岛》出版第一年的销量相同;但是,这本书在当时没有引起任何深刻的震动,因为它未能获得知识界的首肯,而只有知识界,才能给予某种言辞以思想的震撼力。

就我们而言,克拉夫琛科案同样也十分重要。1949年冬,萨特和阿隆之间的龃龉刚刚公开几个星期,他们就无可争议地加入了两个相互敌对的阵营。事实上,《现代》杂志回避了现

实。[78]在苏联,人们的自由是否受到侵犯,这个问题是克拉夫琛科案辩论的焦点,就这个问题,让－保尔·萨特曾在塞纳省轻罪法庭第十七分庭的判决宣布后不久,在《现代》杂志上写道:“不管目前苏联的社会性质如何,大体上说,这个国家在力量对比的平衡中,还是属于反对我们所知道的各种剥削形式的阵营的。”我们可以对“大体上说”这种说法加以批评:冷战刚刚开始,并将由于第二年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进一步加剧;同时,有关苏联性质的问题成为知识分子辩论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让－保尔·萨特却给自己的政治分析蒙上了一层模糊的色彩。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倾向很快就具备了一种阵发性的趋势。但是,另一方面,这句话同样也令人感兴趣:“反对”“各种剥削形式”这种说法也是阵发性的,它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了让－保尔·萨特的政治参与过程。

1949年秋发生了鲁塞案,萨特更加直接地参与了此案。在这里,我们同样必须看到,与其说他的参与是在支持对苏联的攻击,不如说是更多地在谴责这种攻击。事件起因于达维德·鲁塞1949年11月12日在《费加罗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十分明确:《救救苏联集中营里的流放者——达维德·鲁塞向原纳粹集中营的流放者们发出的号召》。达维德·鲁塞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它由曾经遭受过纳粹流放的人员组成,负责前往苏联进行调查。在号召的结束语中,作者对苏联作了严词抨击和明确揭露:“试想我们又重新聚合在布琛沃尔德集中营的大广场上。如果其他获得自由的流放者只知道讲述他们自己的痛苦,而对生活在死亡中的人们只字不提的话,我们会怎样看待他们?其他那些从未进过集中营的人可以借口缺乏想像或无能为力,来为自己辩护。可我们是集中营的熟客和专家,这就是我们必须为别人给予我们的额外生活而支付的代价。我们既

不能堵住耳朵，也不能闭上眼睛；我们不可能绕道而行或借口推脱；我们甚至无权沉默。"

五天后，11月17日的《法兰西文学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毛特豪森集中营第59807号囚犯皮埃尔·代答达维德·鲁塞》。在这篇文章中，皮埃尔·代指责鲁塞"庸俗地把发生在纳粹集中营里的事情搬到苏联"，以此来篡改事实。正如克拉夫琛科案一样，这起争端又一次被诉诸公堂，鲁塞向法院起诉，控告代和《法兰西文学报》主编克洛德·莫尔冈对自己进行诽谤。起诉书于1950年2月11日递交，同年11月25日，塞纳省轻罪法庭第七分庭开始审理此案。当然，就像此前的克拉夫琛科一样，鲁塞于1951年1月12日赢得了这场官司。但是，"即使共产党在法庭上输了，但由于它孤立了鲁塞，因而获得了巨大的象征性胜利，因为这种孤立折断了在法国知识界抨击苏联的左翼批评家的翅膀"。再者，"在压制鲁塞的攻击、阻止他在政治上把对集中营制度的揭露引到对苏联专制制度的抨击上的过程中，《现代》比《精神》起到了更为重要的决定性作用"[79]。

从此，一切，或者说几乎一切，都把萨特和阿隆对立起来。关于这点，他们各自对美国的看法很能说明问题。从1947年起，美国对于萨特而言是"绝对的恶"，而对于阿隆来说则是"相对的善"。[80]这里，我们必须再一次看到，相对于战前来说，两人的态度发生了错位，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年富力强的时代》中提到，战前，她本人和萨特都"被美国所吸引"[81]，他们欣赏这个国家的音乐、电影和文学。这种好感一直持续到大战刚结束的那些日子。1945年1月，萨特去美国住了好几个月，他为《战斗报》和《费加罗报》写了32篇文章。马丽－克里斯蒂娜·格朗戎在分析了这些文章之后，指出它们"缺乏区分善恶的标准"，还指出萨特在文章中对因循守旧和个人主义作了深邃的思考。然

而,两年后,西蒙娜·德·波伏娃去美国做了一次巡回报告,四个月的旅美生活(1947 年 1 月 20 日—5 月 20 日)给她留下了保守得多的印象。的确,她在《在美国的日日夜夜》一书中描写了自己的感受,这本书于 1948 年出版。在此期间,冷战爆发了。

1946 年,《必恭必敬的妓女》公演之后,蒂埃里·莫尼埃指责萨特是反美分子。后者在 1946 年 11 月 20 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上为自己作了辩护:"我根本不是反美分子,我不懂反美分子的意思是什么。"两年后,他在该剧美国版的前言中确认:"我甚至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82]尽管如此,由于冷战,让-保尔·萨特终于有了其他的情感。早在他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之前,他朝这方面的思想发展似乎已经开始了。事实上,朝鲜战争聚集了不同的立场。西蒙娜·德·波伏娃用这样的文字描写美国大兵:"七年前,我们曾经爱过他们,这些身着土黄色军装、看上去如此和善的士兵,他们给我们带来了自由。现在,他们却在保卫一个为地球各个角落的独裁腐败政府——李承晚、蒋介石、佛朗哥、萨拉扎尔[83]、巴蒂斯塔[84]等——撑腰的国家。他们的军装,意味着我们的从属地位,意味着一种致命的威胁。"[85]如果我们简单地计算一下(法国解放后七年),就能推算出说这席话的年份:1951 年。由于这段文字写于好几年以后,因此我们有必要想一想,作者在描述对美国士兵的这种看法以及这种看法所引起的感情时,是否会受到日后的政治参与这面可能使事实失真的棱镜的影响,换言之,她是否会受到 1952 年后她成为共产党同路人这一事实的影响。不过,在这方面,所有的迹象都是一致的。1950 年朝鲜战争开始后,萨特对美国的仇视以及他对美国是战争挑起者的指责,都使大家认为他的思想变化从那时起已经开始;另外,确切地说,发生在 1946 年《现代》杂志编辑班子内部的关于"一旦战争爆发"的辩论——尽管这场辩论是理论上

的,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它在萨特和阿隆之间划出了一道裂痕——在朝鲜问题上第一次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有人说,雅克·杜克洛在1952年5月反对李奇微将军的集会上被捕后,萨特"怒发冲冠",并因此而步人了接近共产党的时期。我们将会看到,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朝鲜战争开始后,让-保尔·萨特的立场已不再处于中立主义的路线上了。所以,我们必须弄清楚,究竟是不是法国共产党在1952年向萨特伸出了手,一段时间以来,萨特一直在试图接近该党。不管怎样,由于缺乏确切的材料,我们无法肯定或否定这种假设,但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在50年代开始的时候,中立主义已不再时髦,萨特走的是一条强硬的反美路线。

至于雷蒙·阿隆,他只是在1950年秋才第一次去美国,比萨特晚得多。但从那时起,他和这个国家的关系很快就变得非常密切。他根据首次旅美的印象以及所作的分析,写了一组题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伟大考验》的系列文章,发表在1950年12月的《费加罗报》上。在这次去大西洋彼岸之前,雷蒙·阿隆就已经在1950年9月的《精神自由》杂志上发表了另一篇文章,题为《中立还是参与》,他在文章中明确指出:"作为一名法国知识分子,我声明支持美国同斯大林主义影响的斗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同样也赞同美国文化的所有特点。我保留揭露这个国家法规制度或道德风俗、广告宣传或种族关系的权利,因为上述的文化特点令我不满,必须谴责。另一方面,有人把斯大林奉若神明。感谢上帝,我们每个人都有权表达自己对杜鲁门总统的才华的看法。"

的确,从1950年12月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开始,雷蒙·阿隆就把他这种独立判断的原则付诸实施了。该系列文章的第四篇写于1950年12月14日,题为《民族的团结性》,在这篇文章中,

阿隆提到了“反共的狂热”和“对异教徒的猎捕”。对于“麦卡锡的过激行为”,他作了毫不含糊的揭露;这些“无休止的怀疑”和“笼统而缺乏根据的指责”,“说到底”是在干“敌人想干的事情”。雷蒙·阿隆还提到了对阿尔杰·希斯的审判,后者是美国国务院的工作人员、雅尔塔会议美国代表团的秘书长,他被控告向某苏联谍报网提供了“文件”。阿隆深刻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麦卡锡运动的确必须谴责,“但平心而论,我们应该承认,现在还没有人找到以自由主义的手段来抵制专制制度渗透的方法”。因此,共产党人很容易故意迫使“自由社会的捍卫者采取一些与他们的原则背道而驰的手段”。

几个月前,即1950年2月9日,美国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威灵[86]发表演说,抨击了共产党在国务院的活动和影响。一个月后,《华盛顿邮报》的一位漫画家第一次运用了“麦卡锡主义”的说法。同年秋天,当美国进行众议院议员和三分之一参议院议员的提名选举时,许多法国报纸特别是《世界报》,报道了麦卡锡主义变本加厉的选举气氛。比如,莫里斯·费罗在1950年11月7日的《世界报》上写道:“战斗非常残酷。候选人们从来不曾作过如此激烈、甚至如此带有侮辱性的人身攻击。选举中所出现的这种激烈氛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麦卡锡造成的。”尽管如此,关于“参议员麦卡锡蛊惑人心的反共思想”,法国只是在一年半以后,才由亨利·皮埃尔在1951年12月21日的《世界报》上,作了深刻的分析。[87]

所以,在法国尚未开始就麦卡锡主义展开辩论时,雷蒙·阿隆就已经对此感到不安并进行抨击了。我们看到,与此同时,他一开始就拓宽了分析的视野,指出了自由民主制度所处的矛盾境地,因为该制度为了捍卫自由民主,不惜冒放弃自身原则的危险。此外,他还揭露了那些把对麦卡锡主义的敌视当做手中的

工具的行为。比如,在1953年3月13日的《费加罗报》上,他再次谴责了麦卡锡主义,为这种"徒劳的过激行为"感到悲哀,希望美国总统能"使疯子们恢复理智"。但同时,他又在1955年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中,揭露了某种反麦卡锡主义的守旧思想。[88]这一观点,阿隆一年前在《新法兰西杂志》的一篇文章[89]中已经有所阐述:"麦卡锡主义谴责的是人民的自由以及一个自由社会为反对阴谋和渗透而有权采取的措施"[90],但他哀叹道:"斗争处于模糊的阶段",而麦卡锡主义则由于对手的合并而"改变了面貌",成为一个"没有明确界限的大杂烩",此外,在关于共产主义的问题上,另一个阵营也发生了同样的合并。

1952年夏

当然,雷蒙·阿隆对这种"大杂烩"作了谴责,而让-保尔·萨特则被他看成是造成"大杂烩"的罪魁祸首之一。同时,我们说过,萨特逐渐成为一名坚定的反美主义者,他从1952年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之后,反美思想与日俱增。萨特为什么会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呢?关于这个问题,他本人说,雅克·杜克洛的被捕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1952年5月28日,共产党人组织了一次示威活动,反对李奇微将军来法国担任北约军队欧洲最高司令,这次示威事先遭到了禁止,杜克洛就是在这次示威中被捕的。李奇微过去指挥过朝鲜战争,苏联共产党的宣传工具谴责他曾在朝鲜战场上使用了细菌武器。在这个抗议"鼠疫李奇微"的日子里,雅克·杜克洛在一道障碍前被逮捕。当然,在此之前,法共领导机关也知道领导人被捕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此他们采取了预防措施,正如奥古斯特·勒克尔几年后所说的那样:"一过正午,杜克洛和勒克尔就将离开党部,到另一处不属于他们自己的住所过夜。尽管安全事务负责人干预了十次,雅克·杜克洛

还是没有执行决定。他很晚才离开已经受到警方监视的共产党党部。并且他没有去约定的地点,而是去了《人道报》报社,可想而知,他像傻瓜一样地被逮捕了。"[91]雅克·杜克洛被带到警察局,在他的公文包里发现一本小学生的作业本,上面有他在秘书处和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记录。[92]由于雅克·杜克洛被捕时是一名国会议员,而国会议员只有在现行犯罪时才能被逮捕,因此两个小时后,内政部长夏尔·布律纳发表声明,说雅克·杜克洛的坐车携有武器。这位法共二号人物的保镖的确带着一支手枪,此外车里还有一架电台和"两只被精心掩藏在一条被子底下的信鸽"。

共产党立刻抓住了这一声明的破绽。[93]5月30日,雅克·杜克洛起诉警察渎职,他在第二天转载在《人道报》上的一项声明中指出,有些人"极为愚蠢地想像信鸽可能和什么阴谋有关,因为在我的车里有两只别人白天送给我的肉鸽"。然后内政部长要求解剖鸽子,法国共产党巧妙地利用了这一滑稽的情况,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6月4日的《人道报》讽刺说:"炖鸽,飞鸽传信的滑稽故事。"

我们有必要重提上述事件,因为让-保尔·萨特在回忆中对它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报界很快就称这一事件是"鸽子的阴谋"。为了纪念刚刚去世的莫里斯·梅洛-庞蒂,萨特在1961年10月的《现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他用以下话语证实他开始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这种卑鄙的小儿科行为让我恶心。我的观点变了。反共者是狗,我无法摆脱这种思想,永远不会。我要么写作,要么窒息。我夜以继日地写出了《共产主义者和和平》的第一部分。"[94]

至于西蒙娜·德·波伏娃,她只是把以上解释重复了一遍:萨特当时在意大利,当他得知杜克洛被捕的消息后,"怒发冲

冠"[95]。有时,其他人也会提到杜克洛的被捕在萨特身上所引起的这种情感,比如萨特的传记作者们。[96]但事实上,这种情感的可信度值得怀疑。它可能只是一股巨大的"怒火",重新点燃了哲学家萨特对自己资产阶级出身的憎恶![97]对于这桩被公认为并非微不足道的事件来说,这样的解释太短促了。在冷战当中,法国最为著名的知识分子站到了"和平的阵营"里,同时还带走了他的武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和辎重,具体说,就是《现代》杂志。难道这样重大的决定能用一时简单的感情冲动来解释吗? 如果能的话,这无异于把萨特说成是文坛的拉孔伯·吕西安[98],他的命运之所以发生转折,仅仅是因为那天雅克·杜克洛的车里有几只鸽子。

当然,这里必须提醒大家,自从1950年10月莫里斯·多列士患了偏瘫之后,事实上是雅克·杜克洛在代理领导着法国共产党。再者,他只是在1954年7月1日,即被捕后一个多月才被释放,直到那时,检察院才得出结论,取消刑事审判程序,恢复当事人的自由。因此,应当把萨特的"怒火"放到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分析。尽管如此,我们看到,相似的情况过去也出现过。此外,1952年初,让-保尔·萨特积极参加了法国共产党组织的、声援海军下士亨利·马丹的运动,后者椎指控从印度支那回国后,散发反对印支战争的传单,因而被布雷斯特军事法庭判处监禁。的确,从1952年夏开始,让-保尔·萨特在政治上采取了同苏联一致的立场。那年夏天,他关于"共产主义者和和平"的系列文章就是明显的证明,而在冷战期间,这一系列文章的标题,是对1947年秋以来苏联所捍卫的论点的公开支持。所以,当时的萨特还远远不是一名中立主义者,从那时起到1956年,他都是用东方集团的观点来看待许多问题的。有必要注意的是,萨特同苏联在态度上保持一致的时候,恰好是法共和"斯大林主义

的第二个冰川期"(这种说法是几年后埃德加·莫兰[99]在《自我批评》一书中发明的),也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中有玛格丽特·杜拉斯、让·杜维尼奥[100]、克拉拉·马尔罗[101]、狄奥尼·马斯科洛、埃德加·莫兰等人[102]——离开共产党或遭共产党开除的时候,当时,法共还没有开始"修正"[103]它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这种"修正"几年后才发生。

自然,萨特和共产党的接近,加剧了他的反美倾向,这一点通过他在罗森伯格案[104]中所采取的立场表现出来。朱里尤斯·罗森伯格和他的妻子埃瑟尔分别于 1950 年 7 月 17 日和同年 8 月 11 日被捕。1951 年 3 月 6 日—4 月 5 日,对他们的审判在纽约联邦法庭进行。3 月 29 日,他们被陪审团宣判犯有间谍罪,并于 4 月 5 日被判极刑。只是在一年半之后,即 1952 年 11 月,为罗森伯格的辩护才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运动,这也许是为了抵消在捷克斯洛伐克处决鲁道夫·斯兰斯基[105]以及"白衫党"案件之后,东欧国家可能发生的反种族主义的诉讼。[106]在这次运动中,法国共产党又一次站到了最前列,11 月的《人道报》称罗森伯格夫妇是"替罪羊",他俩的死是一次"祭祀性的谋杀"。1953 年 1 月,法国解放后八年,在冬季自行车赛车场这一有着特殊情感意义的地方,举行了一次声援罗森伯格的集会。一份题为《新的"德雷福斯案"——罗森伯格案》的小册子被印刷了 3 万册。[107]

一部分法国报刊,特别是进步报刊,也步其后尘。继 1953 年 2 月 11 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拒绝对罗森伯格夫妇进行特赦之后,克洛德·布尔岱[108]于 1953 年 2 月 19 日在《法兰西观察家》上写道,罗森伯格夫妇"被一个民族当做祭品供奉给仇恨的神话,正如在世界的另一半,其他不幸的犹太人也曾经或即将被供奉给现行的、相似或不同的神话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中,反种族主义也许不是一个理由,而是一种环境,一件国家犯罪的附属品。

如果受害者不是犹太人，那么他们的结局肯定会好一些。"右派报刊提出的论据和社会党报刊有所不同——怀疑可能对被告有利，争论同样也围绕着死刑展开。有些人站在一个更带有政治倾向的层面上，指出人们是在向共产主义供奉祭品。

朱里尤斯和埃瑟尔于1953年6月19日被处死。报界又一次哗然，但它们的立场仍然各不相同。在这样的情况下，萨特在1953年6月22日的《解放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后来经常被他人引用和评论。作者认为，对罗森伯格夫妇的死刑是"一次披着法律外衣的私刑审判，它把整个民族都覆盖在鲜血之下"，这位哲学家还说，在"发疯的"美国，存在着一种"新纳粹主义"。因此，必须斩断"我们和这个国家的所有联系，否则就会轮到我们被咬或者发疯"。对于我们来说，这篇文章有两方面令人感兴趣。一方面，它表明了当时萨特和法国共产党的一致程度。因为，如果说罗森伯格夫妇被处决后，左派群情激奋的话，那么这种激奋的表达方式有好几种。在1953年6月21—22日的《世界报》上，于佩尔·伯夫－梅里[109]用"天狼星"的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不无讽刺地以《正义得到了伸张……》为题。尽管文章也谴责了罗森伯格夫妇的死刑，但其语气却和萨特截然相反。比如，天狼星承认："的确，这个世界上，每天还有其他许多可怕得多的谋杀。同样，有些人根本不屑花这么多的精力和时间，直接就把受罚者和嫌疑犯送上了祭坛。"说到底，天狼星所控诉的，是"两个怎么看都不应该死的人"被处以了极刑，这可能会成为对"惟一能证明西方国家清白的主要价值观"的嘲讽，特别是在这个"原先被锁住的敌对世界似乎已经对自己的暴政感到厌倦，并且好像就要被打开"的时刻。

共产党报刊的语气截然不同。比如在北方，《自由报》声明："美帝国主义杀害了罗森伯格夫妇"，从中它看到了"法西斯的印

记”(6月21日)。这一事件目的在于“帮助麦卡锡主义所赞同的法西斯恐怖进一步统治美国,以虐待人民,使之俯首听命地接受美国在更大的范围内被法西斯化”(6月24日)。因此,萨特和共产党人的话语不仅几乎完全一致,而且它们离“中立”的立场距离相当遥远。另一方面,萨特的确是在1952年的冷战时期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的,但在1953年春末,当朝鲜战争临近尾声、斯大林的去世又稍稍使东西方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的时候,萨特仍然继续着这种立场,这一点是非常令人吃惊的。尽管从现在看来,于佩尔·伯夫-梅里的最后一个观点显得过于乐观,但它还是注意到了当时人们的激奋心情。至于萨特,与其说当时他是一个独立自主、对国际关系的波动十分敏感的大知识分子,不如说他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附属品,这一运动把人们因罗森伯格夫妇的死刑而感到激奋的心情引向了同一个方向。

共产党对萨特的话剧的评论,也间接地证实了两者之间毋庸置疑的接近。1951年6月17日,《星期日人道报》还在攻击《魔鬼和上帝》;而到了1953年11月《基恩》在萨拉-贝尔纳特剧院上演时,《人道报》则为之叫好:“在皮埃尔·布拉瑟[110]的指挥下,所有的演员都为我们再现了情节剧最优秀的传统。”[111]相反,从那时起,《现代》杂志已不再满足于和某些反对苏联的大作家比如亚瑟·科斯特勒、雷蒙·阿隆、达维德·鲁塞决裂,它还以神殿的守卫者自居。冷战期间,因反共而遭到该杂志驱逐的,先后有阿尔贝·加缪以及该杂志本身的编辑莫里斯·梅洛-庞蒂和克洛德·勒弗尔。

过去经常宣判别人的萨特,那时——至少是在1952—1956年期间——就其在政治参与中的亲共力度和信仰深度问题,向自己报出了疑问。在赞同一种思想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经常寻找的是什么?主要是两样:一是理解世界的原则,二是通过加入

某一团体而使自身和他人同一的原则。换言之，是确信和默契。我们看到，这两个原则令人想到宗教信仰的过程。当然，这种对比有其局限性，这里我们仅比较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和非宗教的信仰现象。阿兰·贝藏松在他的《回忆录》中，分析了冷战期间他自己的共产主义政治参与，在这方面，他的话很说明问题："共产主义是现代魔法的一种形式。"[112]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的话，就会引出正统的概念。正如哲学家让·格勒尼埃在1938年的《论正统精神》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正统紧接信仰而来。信徒信赖所有人，以使后者有和他相同的信仰；而正统派则否定所有和他信仰不同的人。"[113]对于正统派而言，困惑者、迟疑者甚至是漠不关心者，都是潜在的异端分子。因此，他们更有理由认为，那些可能通过言论引入怀疑因素的人必须被否定，而那些言论本身的影响也必须被肃清。此外，我们看到，这种否定不单是策略性的、有预谋的。当它捍卫知识分子信仰的时候，就涉及到了后者的身份，在许多情况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

这种分析原则是否因此而适用于让－保尔·萨特呢？的确，后者在《梅洛－庞蒂生前》一文中提到自己在1952年站到了共产党的阵营，他还写道："经过十年的深思熟虑，我终于面临着决裂的时刻，我需要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刺激。用宗教用语来说，这是一次信仰的改变。"但是，这次改变使萨特变成了信徒还是正统派？这个问题丝毫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它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它还决定着另一个问题的答案。1954年6月，让－保尔·萨特从苏联归来后，向《解放报》声明："在苏联，人们有绝对的批评自由。"他这样说的时候，是一名受信仰驱使的信徒，还是一名正在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正统派——而可能并不是信徒——呢？他后来在1974年就这个问题所说的话，恐怕不一定能肯定第一种假设，远远不能。

冷战中

不管萨特在政治上所宣扬的来世是他真正的向往,还是他简单模仿出来的憧憬,这都无所谓,至少对于他和阿隆之间的争论是这样。当时,阿隆主张根据自己所体验到的世界而不是根据经过改造以后的世界进行思考。1950年的柏林大会是保卫文化自由大会的组成部分,在那次大会上,阿隆的报告反映了他对冷战世界的理性分析:"只要满足两个条件,战争受到遏制的希望就会增加:(1)不能让苏联获得某种优势,哪怕是最初的优势,否则冒险的诱惑会令它无法抵挡。希特勒就没有抵挡住这种诱惑。轻信人民之父的智慧将是危险的。(2)阻止苏联在政治战中取得成功,这会增强它的力量,从而使所有平衡的希望破灭。我并不认为上述条件是充分的,但我肯定它们是必要的。"[114]

和在其他文章中一样,雷蒙·阿隆在这里指出,力量的考验可能要持续一代人的时间。尽管如此,"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家必须承认,他们的社会制度不是历史的结束,而是许多社会制度中的一种"。在两个十年交替之际,雷蒙·阿隆是这样一位混合型的知识分子,几年来,他一直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但暂时也接受了戴高乐主义的思想;尽管如此,实际上戴高乐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一致的,因为我们看到,阿隆参加法兰西人民联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地缘政治影响所作出的反应,而这种反应的根源就是自由主义。的确,我们说过,知识分子经常在寻觅能够解释世界的总的理论体系所提供的理念,这种理论体系出自于意识形态,并且使人产生一种历史感和促成历史变化的愿望。然而,戴高乐主义缺乏这种历史感,因为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并不希望赋予全部人类历史以某种意义。

在这个思想高压的时代，对于某些准备加入法兰西人民联盟的知识分子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困难，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在寻找思想的支撑点和对世界的总体解释，而只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才可能为他们提供这一切。不过，说到阿隆和其他几位法兰西人民联盟的知识分子，他们加入这一政党远不是在思想上自我节制的表现，相反，这反映出他们希望通过对立和影响参加意识形态斗争的坚定意愿。

此外，雷蒙·阿隆通过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思考，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有些时期，意识形态特别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是通过国家体现出来的。在这个冷战逐渐形成的时代，这一过程可能是相同的。正如他在1951年写的那样，"对意识形态的选择，同时也是对势力范围或统治权的选择。"[115]于是，无论在1939年之前还是在1945年之后，知识分子对历史的思索，是通过他们同时肩负起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责任来实现的。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50年代的雷蒙·阿隆和让-保尔·萨特不再在同一个世界里活动。比如，1954年，当萨特在6月份的《解放报》上，对斯大林后的苏联作充满诗意的描述时，阿隆正在就核战略进行思考。在福斯特·杜勒斯发表关于镇压人民的演讲一个月后，他在1954年3月22日的《费加罗报》上写道："核武器不能应付所有形式的攻击。"

同样，萨特和阿隆的世界，也因他俩政治参与的方式和个人的影响而变得不同，当然，让-保尔·萨特的影响要大得多。在第四共和国时期，他是请愿活动领域的冠军，把其他请愿和宣言的专家远远抛在了身后。比如，要是我们对1946年10月—1958年10月发表或刊登在《世界报》上的125篇请愿书作一番分析的话，就会看到，萨特在28篇请愿书上签了名，这使他遥遥领先于克洛德·布尔岱(22次)、弗朗索瓦·莫里亚克(22次)、

让-玛利·多姆纳克(21次)和让·卡苏[116](20次)。[117]面对萨特这样的影响力,雷蒙·阿隆并没有因此而失去表达的手段,当时,他远远不像一些人所描述的那样,是孤独的知识分子。这种说法是一种陈词滥调,原因至少有三个。首先,我们看到,阿隆或多或少参加的戴高乐党远不像后人所描写的那样纤弱。《精神自由》杂志在其周围聚集了一批知识分子,尽管他们不是共产党人,但他们的光芒却并不因此而受到削弱。如果说知识分子永远必须参加发生在他们之间的重大战斗,以免自己上当受骗的话,那么《精神自由》杂志以及法兰西人民联盟借以引起注意的这份名单,还是构成了一股无可争议的知识分子打击力量。其次,除了这股打击力量,还有《论据》杂志的影响。当然,对这份杂志的攻击从不间断,而且,人们后来发现它的资金来源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这使该杂志承担了公开同美帝国主义同流合污的罪名,以前对它的攻击似乎因此而有了合法的依据,它所受的耻辱好像也是应该的,人们对该杂志的回忆更是因此黯然失色——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切看来都是不公正的。如果重读这份杂志所刊登的文章,我们就会看到,它是关于专制现象的早期集体思考的熔炉。的确,50年代中期,阿尔及利亚战争占据了知识分子争论的核心地位,因此,总的说来,关于专制现象的思考被推迟了。《论据》杂志被歪曲的形象,以及被推迟进行的反对专制的思考,这些都不应使人忘记,当时有一批人在思考,而雷蒙·阿隆就是这批人的代表。

最后,我们不能小看阿隆作为《费加罗报》头号笔杆的威信和影响。再说,雷蒙·阿隆逐渐成了共产党和亲共知识分子攻击的主要靶子之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参与能力。我们已经在前文中列举了冷战期间他所受到的部分攻击。当然,他之所以和其他一些作家一样,成为共产党攻击的目标,还因为他和

《论据》杂志合作。该杂志由保卫文化自由大会提供资金，第1期出版于1951年3月，那时，正是冷战和朝鲜战争期间。《论据》立刻就被法国共产党称为"警察"杂志，《世界报》也说它是"亲美"的，而《精神》杂志则揭露了它的"宣传功能"[118]。四年后，即使国际关系已不再那么紧张，人们对该杂志的警惕却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关于这点，人们对《知识分子的鸦片》的态度很说明问题。莫里斯·杜韦尔热[119]在《世界报》上为"阿隆先生著作中那深深的悲怆之情"感到遗憾，并总结说："在攻击那些没有走和他相同的发展路线的人时，他试图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他要想做无辜者，就必须让其他人成为罪人。"[120]至于《现代》，则通过让·普雍的文章，把雷蒙·阿隆视为"小丑"。的确，同一年，阿隆在《论据》上写道："今天的革命宣言，包括让-保尔·萨特的在内，都是些滑稽可笑的举动。"[121]

自从1948年萨特和阿隆的书信往来之后，两人争论的嗓门又升高了一级。不过，他们身后的背景却在渐渐发生变化。尽管苏联的吸引力依然重要，但它将不再成为论战的惟一参照。50年代中期，法国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面对着双重的身份危机：帝国的大厦开始出现裂缝，而由光荣的30年所引起的社会变革，使以前的大部分政治和社会分析都显得陈腐不堪或者至少是过时落伍。在这种情况下，孟戴斯主义填补了空白，起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填空作用，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它还起到了寻找新的政治社会交际形式的作用。因此，就孟戴斯现象，萨特和阿隆或公开或隐蔽地选择了自己的立场。

在雷蒙·阿隆和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之间，不可否认地有过个性的冲撞，后者曾不无恼怒地对此作了简述，让·达尼埃尔引用了他的一段话："很奇怪，每当阿隆勾勒出一个不确定的主题轮廓时，他就显得无比快乐。"[122]另一方面，尽管有关传说根深

蒂固,在孟戴斯政府为期230天的执政期间,雷蒙·阿隆并没有经常在《费加罗报》的专栏上指责孟戴斯·弗朗斯,相反,该政府倒台后几个星期,他却写道:"没有人对他异乎寻常的才华提出异议,如果他找不到其他机会来施展这种才华,那将是一件可悲的事情。"[123]

有人说,雷蒙·阿隆在《费加罗报》的论坛上对孟戴斯·弗朗斯政府大肆攻击,如果这种说法过分了的话,那么阿隆对孟戴斯·弗朗斯的怀疑是明显而强烈的,即使后来,这种怀疑也非但没有淡薄,反而似乎随着孟戴斯主义的"空想"而与日俱增。尽管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阿隆在《参与政治的观众》里说话口气温和了点,阿隆写道,他和孟戴斯·弗朗斯属于"不同的集团"[124]。但他在其他场合对孟戴斯·弗朗斯的分析却更加强硬,尤其是在高等学府里,比如,1984年12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现代历史研究所组织了一次题为《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和孟戴斯主义》的学术研讨会[125],在研讨会准备阶段的谈话会上,雷蒙·阿隆提出,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于零",他还谈到了孟戴斯的"空想"。阿隆在这次分析中所用的言辞,几乎和当时他同《权力》杂志谈话时所用的言辞相同:"所以,孟戴斯主义是知识分子的空想。"[126]

的确,50年代中期,雷蒙·阿隆和孟戴斯·弗朗斯分属"不同的集团",当时,前者刚完成《知识分子的鸦片》的撰写,正与左派知识分子唇枪舌剑;而后者却恰恰在试图拉拢这些知识分子。但是,这种拉拢在萨特及其朋友面前失去了效用。更有甚者,萨特集团很快就开始反对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比如1954年12月19日,西蒙娜·德·波伏娃向《星期日人道报》宣称:"我认为左派知识分子应该和共产党合作。"当和她谈话的雅克-弗朗西斯·罗朗提到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对某些"名人"的吸引时,

德·波伏娃立刻对此作了断然的谴责："这种吸引只能是恶意的，或者是一种误会：只有天真的人才相信右派政府会执行左派政策。政府在北非问题上采取了一种犯罪的态度，它固执地着手重新武装德国，它的经济'纲领'很难掩盖披着所谓改革外衣的观望主义政策，这一切最后都将使人们睁开双眼，使他们意识到所谓孟戴斯·弗朗斯谎言的真相。"

孟戴斯主义对于阿隆是空想，对于波伏娃则是谎言，虽然两人的论据对立、理由不同，但他们的结论却是一致的。这一事实绝对值得注意，因为，我们将会看到，不久以后，在关于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上，萨特和阿隆也将对法国政府的政策作出谴责，但是引出这种谴责的分析却又一次是完全对立的。尽管如此，我们有一个问题：西蒙娜·德·波伏娃关于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所说的话，是否也反映了萨特的想法呢？所有迹象都表明，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当时，整个萨特集团都以《现代》杂志为武器，走上了斗争的前线。对孟戴斯·弗朗斯的攻击是双重的：1月份，马塞尔·佩儒揭露了他的行为"含糊不清"；春天，《现代》杂志的一期合刊则解释了真正的左派应该是什么样的。[127]

如果说雷蒙·阿隆特别在1955年2月3日的一篇文章中对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提出了指责，指出他不久就会被推翻，那么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诅咒，而《现代》杂志的分析和当时的实际情况也是脱节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也许——至少是部分地——表明，在50年代中期，萨特对处于上升阶段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吸引，不如几年前他对年长一点的知识分子来得大。孟戴斯·弗朗斯政府执政的时期，也是这位《现代》杂志的主编使拉丁区迷失方向的时期，他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并且非常小心地避免让左派工人运动绝望。1954年6月，萨特从苏联回国后，在《解放报》

上发表了五篇系列文章,他声明:“在苏联,人们有绝对的批评自由”,随后他又预言,“1960年左右,1965年之前,如果法国仍然停滞不前的话,那么苏联的平均生活水平将比我们高出30%到40%。”[128]这里的日期很重要:在1954年7月中旬,谁看上去更有能力吸引拉丁区?是企图在日内瓦赢得赌博的政治家,还是在理论上被迫承担起警惕义务的知识分子?何况,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萨特发表上述第二个论断的时候,法国经济增长的效果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尚未体现出来,但毕竟它正在把这个国家推向历史上最为迅速的社会经济变革,因此,萨特的这个论断令人沮丧地给人以一种过时的感觉。根据这个观点,对于许多年轻知识分子来说,不管对还是不对,孟戴斯现象首先被当做了反对“知识分子模式论”的反应,如果大家同意这种观点的话,那么萨特可能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陪衬人的角色。

其实,与此同时,事情要复杂得多,因为当时萨特的作品使他光芒四射。我们曾经说过,早在50年代初,让-保尔·萨特就已经成为著名作家,得到了公众的承认。许多迹象都一致表明了这一点。比如,当《魔鬼和上帝》上演的时候,在文学艺术管理总局负责审核巴黎各剧院所提出的补助申请的巴黎剧院资助委员会,向该剧发放了一笔贷款。这件事很值得注意,何况该委员会通常不资助著名作家的作品。决定资助的理由既证实了萨特的名声,又表明委员会对使的剧作特别“重视”:“尽管该作家在戏剧方面取得的成功减弱了剧院所承担的风险,但鉴于该剧的规模、布景和服装的昂贵成本,以及众多的演员人数,本委员会建议向该剧发放50万法郎的贷款。”[129]

尽管如此,法国解放后和50年代,人们很难对让-保尔·萨特在报界所取得的名声作出确切的估量。的确,1957年,《快报》就“新浪潮”文学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调查[130],我们看到,在回

答问题"如果要您指出一位对您这一代人的思想影响最深的作家,您会选哪一位?"的时候,年轻人们把萨特放在遥遥领先的位置。此外,在他后面两位被提到的作家——安德烈·纪德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远远落后于他。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这类调查所反映的,是在特定时间、某一类型的人的情感。再说,这些不到30岁的法国人仅仅是潜在的读者群的一部分,至少在法国解放后的十年当中,他们还不足以使萨特作品的印量名列前茅。在1945年以后的那些年里,萨特在知识界引起的轰动都成了徒劳,他在1944—1945年卖得最好的书只在销售榜上名列第51位。事实上,1955年4月16日的《快报》[131]根据《文学新闻》杂志的调查结果,列出了法国出版界包括翻译作品在内的最为成功的作品。如果说阿尔贝·加缪的《鼠疫》以36万册的销售量排名第7,那么《肮脏的手》的名次仅仅在50以后,销量只有14万册,也就是说,是安德烈·苏比朗[132]的小说《白衣人》中任何一卷销量的一半。

不过,冷战的痕迹同样也反映在这个排行榜上。排名遥遥领先的作品,是乔瓦尼·瓜雷斯基1951年译成法语的小说《堂·卡米罗的小小世界》(79.8万册,紧接其后的是皮埃尔·克洛斯泰尔曼[133]的小说《大马戏场》,52.7万册),维克多·克拉夫琛科以作品《我选择了自由》排在第三位(50.3万册)。我们不得不指出,排名靠前的全是那些通俗易懂的文学作品:亚瑟·科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列第四位(45万册)。因此,《肮脏的手》的销量能达到14万册,这本身已经相当可观了。特别是当时,在1957年的法国,青少年们正在进行两代人之间的交替,中学教师的人数在迅速增长,与此同时,学生的人数也开始上升,这对后来的十年影响非常深刻。结果是,在第四共和国行将结束以及以后的几年里,让-保尔·萨特逐渐成为一个"经典"作家。我们知

道,最初,《恶心》在1938年印刷了4 400册,而到了1960年末,所有版本的印数加起来达到了395 370册。[134]同时,普鲁斯特[135]出版于1919年的小说《斯旺》被印刷了448 956册,同年出版的纪德的《田园交响曲》也达到了584 314册。在法国解放15年后,让-保尔·萨特终于成为伽利玛出版社的代表作家,他的《恶心》也成为该出版社印数最多的作品。在比他稍稍年长的作家中,只有圣-太克絮佩里[136]的《南方通讯》在1960年以536 389册的印数超过他;而在比他略微年轻的作家当中,只有阿尔贝·加缪的《鼠疫》和《局外人》达到了和他相同的印数。

这一统计结果使人们更加难以忘记萨特在1960年初所占据的地位。在伽利玛出版社在世的作家当中,这位55岁的哲学家的著作印数是最大的。伽利玛出版社的印数成了萨特成功的三张王牌,因为,当时该出版社可以给予知识分子以绝对正统的地位,而且可以保证他的下一部著作获得成功。与此同时,人们迷恋人文科学的时代的确也将慢慢来临。但是,这种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分析过的现象,和萨特爬上"经典"作家地位的情况并不矛盾,几年后,萨特被拉加尔德和米夏尔[137]列为名人,这进一步证实了他这种"经典"作家的地位。

当时,在50年代中期,萨特和阿隆早已决裂,这种决裂因两人之间形成了公开的敌视态度而进一步升级。阿隆的笔通常是有所克制的,但有时,他也会听任自己的感情好恶,甚至作出一些冷漠的分析。比如他在1954年6月的《巴黎杂志》上写道,萨特"满口漫骂,心怀仇恨,打着人道主义理想的幌子,鄙视活着的人们,他之所以能摆脱虚无主义,靠的仅仅是对一个空想的无产阶级的眷恋、对一种不能实现的革命的信仰"[138]。如果我们读一读"迷人的加斯托"1954年6月8日写给萨特的一段信,就能了解当时存在于萨特和阿隆之间的鸿沟,以及他俩各自的影响。

在那封信中，西蒙娜·德·波伏娃恰好也提到了阿隆的那篇文章："这个星期是在对右派伪思想家的研究中度过的（这些伪思想家在本周的《巴黎杂志》上，炮制了阿隆的一篇反对'共产党和和平'的文章——这篇文章一钱不值——还在《论据》杂志上炮制了一篇无名小卒的文章，将《共产党和和平》社论事件和 L 的文章混为一谈——这篇文章半文钱都不值）。"[139]

两个人的鸿沟及其破碎的友谊，体现在 1955 年彼此发表的作品中。1955 年春，《涅克拉索夫》在安托万剧场上演，剧中，萨特影射《论据》是一本宣扬贝当思想的杂志，其特点就是"工作、家庭、祖国"[140]。至于阿隆，他的《知识分子的鸦片》则以萨特为主要的、几乎被典型化了的人物。如果还需要其他证据，我们可以到六年前雷蒙·阿隆的一篇文章中去找，这篇文章写于两人决裂后几个月，阿隆坚决回击了萨特在《关于政治的谈话》中对他所作的攻击："他谈及政治的时候，就像青年人一样多愁善感。"他还总结道："西蒙娜·韦尔[141]在对马克思的著名论断作修正时说：革命是人民的鸦片；而在《关于政治的谈话》中，革命仅仅成了知识分子的鸦片。"[142]

鉴于在 1949 年以后的几年里所发生的沉重历史，我们更加清楚，1905 年左右出生的那一代人，在法国解放后成了颇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萨特和阿隆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冷战的折腾几乎没有给这些知识分子留下友谊的机会。此外，我们看到，早在 1956 年，雷蒙·阿隆就已经不无忧愁地描述了这种情况："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任何友谊都没能战胜政治观点的分歧，为了避免分道扬镳，一些朋友不得不同时改变政治立场，这种情况既是情有可原的，又是悲哀的。"[143]确切地说，这席话是指不久前发生在萨特和梅洛－庞蒂之间的决裂。不过雷蒙·阿隆可能由此联想到了他自己和让－保尔·萨特的关系。萨特也一样，几年后，

当他谈到自己和刚去世的加缪之间的不和时，也许也想到了他的这位小朋友："我和他之间有了龃龉；龃龉算不了什么。尽管我们必须永不再见，这仅仅是我们在这个上帝赐予的狭小世界里共同生活、相互关注的另一种方式。"[144]

注：

1 卡珊德拉(Kassandra)，一译迦桑德拉。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公主，得阿波罗帮助，能预卜吉凶，但因拒绝阿波罗的求爱，遭到诅咒，从此无人再信她的预言。——译者注。

2 乔瓦尼·瓜雷斯基(Giovanni Guareschi)，1908—1968，意大利作家，著有六卷系列小说《堂·卡米罗》(*Don Camillo*)。前文提到的堂·卡米罗和贝波内都是该小说里的人物，前者是一位性格幽默、粗暴的神甫，后者是一位反对宗教的共产党人。——译者注。

3 在这段冷战的时期，两人的行动和文章都很频繁。单是这段时期，就可以写整整一本书。因此，本章不求对这个时期作全面的研究。这里，我们只对萨特和阿隆的立场作比较，并着重说明与此有关的问题。

4 达维德·鲁塞(David Rousset)，1912—1997，法国新闻记者、评论家。"二战"期间参加抵抗运动，遭德国秘密警察逮捕和严刑拷打。战后获得自由。曾和共产党相当接近，但后来与之决裂。——译者注。

5 《关于政治的谈话》(*Entretien sur la politique*)，摘自《现代》杂志，1948年9月，第36期，第385—428页。

6 同上，第338、390和406页。

7 《现代》，1952年8月，第332和334页。

8 另请参阅刊登在1952年9月24日《世界报》上的皮埃尔·德·布瓦岱弗尔的文章。

9 亚瑟·科斯特勒(Arthur Koestler)，1905—1983，用英语写作的匈牙利作家，后加入英国国籍。他的作品《正午的黑暗》谴责了斯大林主义。——译者注。

10 《正午的黑暗》，英文书名为《Darkness at noon》，法文译本名为《Le Zéro et l'Infini》(意为"零和无限")。这里的中译名根据原著的英文名称而来。——译者注。

11 雅克·杜克洛(Jacques Duclos)，1896—1975，法国政治家，长期担任法共政治

局委员,"二战"期间领导法共从事地下斗争,曾于1969年参加法国总统竞选。——译者注。

12　蒂埃里·科杜尔(Thierry Cottour)《〈零和无限〉(原名〈正午的黑暗〉):一个背叛者的小说的变迁和后事》[*Le Zéro et l'Infini* (*Darkness at noon*). *Les vicissitudes et la postérité du roman d'un apostat*],摘自《历史和政治——致M·E·莫南日的文集》(*Histoire et politique. Mélanges offerts à M. E. Monange*),布雷斯特,1994年,第285—295页。

13　参阅皮埃尔·格雷米雍(Pierre Grémion)十分出色的著作《反共的知识分子——巴黎捍卫文化自由大会(1950—1975)》(*Intelligence de l'anticommunisme. Le Congrès pour la liberté de la culture à Paris. 1950 - 1975*),法亚尔出版社,1995年,引文见第300页。该书对理解那个时代非常关键。

14　雷蒙·阿隆,《大分裂》(*Le Grand Schisme*),伽利玛出版社,1948年,第8和第305页。

15　让·普雍(Jean Pouillon),《重药》(*Un remède de cheval*),摘自《现代》,第39期,1948年12月—1949年1月,第139—154页。

16　皮埃尔·库塔德,《吉米》,第240和第243页。

17　让·卡纳帕,《存在主义不是一种人道主义》,社会出版社(Éditions sociales),1947年,第53页。

18　安妮·贝丝(克里耶盖尔)[Annie Besse(Kriegel)],1926—1995,法国历史学家,共产党人。——译者注。

19　此平均数由瓦莱里·阿农得出,出处见前文。

20　雷蒙·阿隆,《评论员》(*L'éditorialiste*),摘自《新闻的问题与技巧》(*Problèmes et techniques de la presse*),多马-蒙克莱蒂安出版社(Domat-Monchrestien),1948年4月,第65—83页。

21　雷蒙·阿隆,《记者和教师》(*Journaliste et professeur*),在比利时高等研究院的讲话,1959年10月23日,摘自《布鲁塞尔大学杂志》(*Revue de l'université de Bruxelles*),第177—196页。

22　关于这点,参阅雷蒙·阿隆的《费加罗报文章集》(*Les Articles du Figaro*),第1卷,《冷战(1947—1955)》(*La guerre froide, 1947 - 1955*),由乔治-亨利·苏图(Georges-Henri Soutou)编辑并注释,德法卢瓦出版社(De Fallois),1991年,第1418页。

23　斯德丁(Stettin),现名什切青(Szczecin),波兰西北角城市,奥得河口的大海港和河港。——译者注。

24　的里雅斯特(Trieste),意大利城市,位于南欧亚得里亚海东北岸、伊斯的利

亚半岛西北侧。——译者注。

25　贝尔特朗·达斯多尔格(Bertrand d'Astorg),《亚瑟·科斯特勒——196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Arthur Koestler, prix Nobel 1960*),摘自《精神》,第2卷,1946年,第379页。

26　弗朗索瓦·费日托(François Fejtö),《回忆录——从布达佩斯到巴黎》(*Mémoires. De Budapest à Paris*),卡尔曼-莱维出版社,1986年,第215页。

27　拉斯洛·拉日克(Laszlo Rajk),1909—1949,匈牙利政治家。年轻时代就是共产主义积极分子,曾以国际纵队成员的身份参加西班牙内战,"二战"期间被关押在德国一集中营。战后担任政府内政部长、外交部长和工人党副总书记。后被政敌加以实行铁托主义的罪名,于1949年9月16—24日受到审判,并被处死。1956年得到平反昭雪。——译者注。

28　《拉日克案是一起国际性的德雷福斯案》(*L'affaire Rajk est une affaire Dreyfus internationale*),摘自《精神》杂志,1949年11月。

29　托尼·裘特(Tony Judt),《并非完美无瑕的过去:1944—1956年法国的知识分子》(*Un passé imparfait. Les intellectuels en France 1944 - 1956*),法亚尔出版社,1992年,第330页。

30　乔治·高尼奥(Georges Cogniot),法国共产党人,曾任法共机关报《人道报》主编。——译者注。

31　莫里斯·阿居龙(Maurice Agulhon),1926—　,法国历史学家,于1960年加入法共。——译者注。

32　阿兰·贝藏松(Alain Besançon),1932—　,法国历史学家,于1972年加入法共。——译者注。

33　埃玛纽埃尔·勒·鲁瓦·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1929—　,法国历史学家,于1972年加入法共。——译者注。

34　这一代人当中,一些人的证言很著名:如埃玛纽埃尔·勒·鲁瓦·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巴黎—蒙彼利埃》(*Paris - Montpellier*),伽利玛出版社,1982年]、莫里斯·阿居龙(Maurice Agulhon)[《从幕后看》(*Vu des coulisses*),摘自《自我历史漫笔》(*Essais d'ego-histoire*),由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整理并编辑,伽利玛出版社,1987年]、阿兰·贝藏松(Alain Besançon)[《一代人》(*Une génération*)、朱里亚出版社,1987年]和安妮·克里耶盖尔(Annie Kriegel)[《我认为懂得的东西》(*Ce que j'ai cru comprendre*),拉封出版社,1991年]。

35　米歇尔·维诺克(Michel Winock),《〈精神〉杂志的政治历史(1930—1950)》

[*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revue Esprit (1930 - 1950)*],勒瑟伊出版社,1975年,第289—314页。

36　朱利安·本达,《对话可能吗?》(*Le dialogue est-il possible?*),摘自《欧洲》杂志,1948年3月,第8页。

37　保尔·弗莱斯(Paul Fraisse),《基督教徒参与政治》(*L'engagement chrétien*),摘自《精神》杂志,第1卷,1947年,第165页。

38　保尔·弗莱斯,《面对直接的危险》(Face au danger immédiat),摘自《精神》杂志,第2卷,1947年,第803和805页。

39　蒂埃里·莫尼埃(Thierry Maulnier),原名雅克·路易·塔拉格朗·莫尼埃(Jacques Louis Talagrand Maulnier),1909—1988,法国作家,曾与《法兰西行动报》和《费加罗报》合作,法兰西学院院士。——译者注。

40　莫里斯·梅洛－庞蒂,《共产主义—反共产主义》(*Communisme - anticommunisme*),摘自《现代》杂志,第2卷,1948—1949年,第188页。

41　米歇尔·维诺克,《意识形态的分裂》(*Le schisme idéologique*),摘自《冷战时期》(*Le Temps de la guerre froide*),勒瑟伊出版社,1994年,第104页。

42　罗杰·加洛蒂(Roger Garaudy),1913—　,法国政治家、大学教师。历任法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国民议会和参议院议员。曾发表多篇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著。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后,他的观点与法共发生分歧,故被先后逐出政治局和共产党。——译者注。

43　罗杰·加洛蒂,《关于一种反动的哲学——伪预言家:让－保尔·萨特》(*Sur une philosophie réactionnaire. Un faux prophète: J. - P. Sartre*),摘自《法兰西文学报》,1945年12月28日,第2页。

44　《关于存在主义:声明》(*À propos de l'existentialisme: mise au point*),摘自《行动》杂志(*Action*),第17期,1944年12月29日。

45　参阅马克·拉扎尔,《法国共产党和文化》(*Le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et la culture*),摘自《活力手册》(*Les Cahiers de l'animation*),第57—58期,1986年,第57页及以下多处。

46　吉·勒克莱尔(Guy Leclerc),《存在主义:一个骗局》(*L'existentialisme: une mystification*),摘自《法兰西文学报》,1947年1月17日,第4页。

47　让·卡纳帕(Jean Kanapa),《评论的评论》(*Critique de la critique*),摘自《法兰西文学报》,1948年3月11日,第5页。这篇文章把最后一期《现代》杂志(第27期)说成是"卑鄙无耻"的杂志。

48　《共产党有一种美学观:现实主义》(*Le parti communiste a une esthétique: le réalisme*),摘自《法兰西文学报》,1946年11月22日。我们同样也必须考虑当时发生在法共和让-保尔·萨特之间的、纯意识形态的争执。比如在1946年,萨特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唯物主义和革命》(*Matérialisme et révolution*)(该文被收入《境地》第3卷,伽利玛出版社,1949年,第135—225页),这篇文章肯定是萨特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必要时,它也可以向我们证实,从1946年起,萨特和阿隆已不再在同一个意识形态的宇宙里遨游。

49　参阅马克·拉扎尔,《红屋——解放至今的法国及意大利共产党》(*Maisons rouges. les Partis communistes français et italien de la Libération à nos jours*),奥比埃出版社(Aubier),1922年,第60—61页。

50　亨利·米勒(Henry Miller),1891—1980,美国作家,曾于1930—1938年间旅居巴黎。——译者注。

51　莫里斯·多列士,《为法国人民服务,法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47年6月25—28日)》[*Au service du peuple de France, rapport au XIe congrès du PCF (25-28 juin 1947)*],法共出版社,第42页,马克·拉扎尔引用,同上。

52　而在1946年9月,《禁闭》再次在波蒂尼埃剧院上演,这表明萨特的知名度在不断提高。

53　冬季自行车赛车场(Vélodrome d'hiver,简称Vel' d'hiv'),位于巴黎,建于1910年,1959年拆除。1942年7月16—17日的夜晚,大约8 600名犹太人在法国警察的搜捕行动中被关押于此,随后被送至各集中营,战后仅有三十余人幸存。这次搜捕行动被后人称为"冬季自行车赛车场大搜捕"。——译者注。

54　《晨曦报》(*L'Aurore*),1948年3月30日。

55　参阅帕特里西亚·德沃(Patricia Devaux)搜集的共产党积极分子所作的回忆,见她的博士论文《法国冷战时期的戏剧(1946—1956)》(*Le Théâtre de la guerre froide en France. 1946-1956*),共2卷,1993年,巴黎政治研究学院,论文导师皮埃尔·米尔扎(Pierre Milza)。

56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法国小说家和剧作家。——译者注。

57　《法兰西文学报》,1948年4月8日。

58　让·科斯达(Jean Costa),《行动报》(*Action*),1948年9月31日。

59　《观众》(*Spectateur*),1948年4月6日;《费加罗文学报》(*Le Figaro Littéraire*),1948年4月10日。

60 上面的部分引语摘自帕特里西亚·德沃的博士论文,出处见前文。

61 亚历山大·法德耶夫(Alexandre Fadeïev),1901—1956,苏联小说家。——译者注。

62 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1896—1970,美国小说家。——译者注。

63 托马斯·斯蒂恩斯·埃里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美裔英籍作家,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译者注。

64 《世界知识分子保卫和平大会,弗罗茨瓦夫,1948年8月25—28日,大会报告》(*Congrès mondial des intellectuels pour la défense de la paix, Wroclaw 25 - 28 août 1948, compte rendu*),华沙,1948年,第4页,由约瑟夫·拉普多斯(Jozef Laptos)引用,见《驯服的和平主义:1948年的世界知识分子保卫和平大会》(*Le Pacifisme apprivoisé: le congrès des intellectuels pour la défense de la paix en 1948*),摘自莫里斯·瓦伊斯(Maurice Vaïsse),《20世纪20至50年代欧洲的和平主义》(*Le Pacifisme en Europe des années 1920 aux années 1950*),布鲁塞尔,布鲁伊朗出版社(Bruylant),1993年,第325页及以后多处。

65 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Frédéric Joliot - Curie),1900—1958,法国物理学家,曾任法国核能委员会第一任高级专员,法国共产党党员,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和其夫人伊伦·约里奥-居里共同获得1935年诺贝尔物理奖。伊伦·约里奥-居里(Irène Joliot - Curie),1897—1956,法国物理学家,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之妻、皮埃尔和玛丽·居里夫妇之女。——译者注。

66 保尔·艾吕雅(Paul Éluard),1895—1952,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译者注。

67 罗歇·瓦扬(Roger Vailland),1907—1965,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记者。二战期间是抵抗运动成员,战后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译者注。

68 费尔南·莱热(Fernand Léger),1881—1955,法国画家。——译者注。

69 艾蒂安·吉尔松(Étienne Gilson),1884—1978,法国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译者注。

70 参阅他1949年4月的文章《精神自由》(*Liberté de l'esprit*)。

71 当然,这里我们不准备描写革命民主联盟的历史。在有关这方面的著作完成和出版之前,若想对此问题作初步的了解,可参考米歇尔-安托万·布尔尼耶(Michel - Antoine Burnier)的著作《存在主义者和政治》(*Les Existentialistes et la politique*)的第四章,伽利玛出版社,1966年出版。

72 皮埃尔·埃尔韦,见1948年3月2日《人道报》。

73 阿尔道斯·休克斯利(Aldous Huxley),1894—1963,英国作家。——译者注。

74 伊格纳齐奥·西罗奈(Ignazio Silone),1903—1989,意大利小说家。——译者注。

75 《斯大林的伟大心愿》(*Le grand dessein de Staline*),摘自《费加罗报》,1948年9月15日。

76 维克多·安德烈耶维奇·克拉夫琛科(Victor Andreïevetch Kravchenko),1905—1966,苏联流亡作家。1947年出版著作《我选择了自由》,描写苏联劳改营的内幕。该书被亲共报纸《法兰西文学报》说成是编造,由此引起作者与报纸之间的诉讼,人称克拉夫琛科案。——译者注。

77 纪尧姆·马劳里(Guillaume Malaurie),《克拉夫琛科案》(*L'Affaire Kravchenko*),罗贝尔·拉封出版社,1982年。

78 该杂志在1949年5月号的《时事进展》专栏中,就克拉夫琛科案发表了一篇三页的短文[题为《克拉夫琛科案》(*L'Affaire Kravchenko*),见第954—956页]。让·普雍在这篇文章中特别写道,克拉夫琛科的"错误""在于用习惯的反共观点讲述他的经历,这当然可以理解,但却不能告诉我们任何新的东西"。前一年,《现代》杂志刊登了克洛德·勒弗尔(Claude Lefort)的一篇文章,尽管他采取的是中立态度,但他对此案还是很关注的[《克拉夫琛科和苏联问题》(*Kravchenko et le problème de l'URSS*),1948年2月,第1490—1515页]。不过,编辑在为这篇文章作注解时说,他是故意将此文安排在《观点》专栏中的,这表明文章所反映的只是其作者的观点。

79 皮埃尔·格雷米雍,《反共的知识分子——巴黎捍卫文化自由大会(1950—1975)》,第296和300页。对达维德·鲁塞所发起的号召的谴责,收录在一篇题为《我们生命的日子》(*Les jours de notre vie*)的著名文章中,文章作者是莫里斯·梅洛-庞蒂和让-保尔·萨特——其实文章应该归功于前者;参阅《符号》(*Signes*),伽利玛出版社,1960年,第330页及以后多处——的确,文章证实,在苏联的确存在公民遭到流放的事实,并指出有1 000万至1 500万人被关押在集中营(《现代》杂志,第51期,1950年1月,第1153—1168页,有关内容见第1155页),但文章坚决和鲁塞决裂,谴责他"把矛头集中指向"苏联,并在进行一场宣传运动(第1168和第1165页)。

80 马丽-克里斯蒂娜·格朗戎,《萨特、波伏娃、阿隆:模糊的激情》(*Sartre, Beauvoir, Aron: les passions ambigües*),摘自《记住美国——一个世纪的魅力和反感》(*L'Amérique dans les têtes. Un siècle de fascinations et d'aversions*),由德尼·拉考纳(Denis Lacorne)、雅克·鲁普尼克(Jacques Rupnik)、马丽-弗朗丝·多瓦奈(Marie-France Toinet)主编,阿歇特出版社,1984年,第144—163页。

81 西蒙娜·德·波伏娃,《年富力强的时代》,第1卷,第160页。

82 米歇尔·贡塔和米歇尔·里巴尔卡,《萨特的著作》(*Les Écrits de Sartre*),出处见前文,第137和189页。

83 安东尼奥·德·奥里维拉·萨拉扎尔(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1889—1970,葡萄牙政治家,1932—1968年,他对葡萄牙进行了长达36年的独裁统治。——译者注。

84 巴蒂斯塔·伊·萨尔蒂瓦(Batistay Zaldivar),1901—1973,古巴军人、政治家,曾于1940—1944年担任古巴总统,1952年通过政变重新上台,并实行独裁统治,于1959年被费德尔·卡斯特罗推翻。——译者注。

85 《事物的力量》,出处见前文,第1卷,第348页。

86 威灵(Wheeling),美国城市,位于西弗吉尼亚,离匹兹堡东南约64公里。——译者注。

87 参阅萨皮娜·罗艾朗特(Sabine Roelandt),《透过地方性报刊和一份全国性日报——〈世界报〉(1950—1954)——来看麦卡锡主义》[*Le Maccarthysme au miroir de la presse régionale et d' un quotidien national, "Le Monde" (1950 - 1954)*],打字版,硕士论文,里尔第三大学,1994年。

88 《知识分子的鸦片》,第316页。

89 该文收入《论战》(*Polémiques*),伽利玛出版社,1955年,第235—236页[阿尔诺·拉费特(Arnaud Lafitte)引用,摘自《雷蒙·阿隆——对美国的一种看法》(*Raymond Aron, une vision des États - Unis*),硕士论文,里尔第三大学,1988年,第111页]。

90 此外,雷蒙·阿隆所参加的《论据》杂志(*Preuves*)的编辑人员,从来没有对约瑟夫·麦卡锡的行动主义表示过好感。比如1954年,弗朗索瓦·蓬蒂(François Bondy)指责它是"一种对思想的控制,它怀疑所有的创新思想和批评精神,而缺乏这种思想和精神,一个自由社会就不能生存"[弗朗索瓦·蓬蒂,《麦卡锡和归来的十字军》(*McCarthy et la croisade rentrée*),摘自《论据》,第38期,1954年4月]。

91 奥古斯特·勒克尔(Auguste Lecoeur),《意料之中的自我批评》(*L' Autocritique attendue*),圣-克鲁(Saint - Cloud),杰罗出版社(édition Gérault),1955年,第38页。关于1952年3月28日的游行,参阅米歇尔·毕热奈(Michel Pigenet),《在冷战年代共产党的活动时期:反对李奇微的示威》(*Au coeur de l' activisme communiste des années de guerre froide: la manifestation Ridgway*),阿尔马唐出版社(L' Harmattan),1992年,以及皮埃尔·米尔扎(Pierre Milza),《鼠疫李奇微》(*Ridgway la Peste*),摘自米歇尔·维诺克(Michel Winock)(主编),《冷战时代》(*Le Temps de la guerre froide*),出处见前文,第143

页及以后多处。

92 最近这些记录的节选被出版,由克洛德·阿迈尔(Claude Hamel)整理,发表在《社会历史手册》(*Les Cahiers d'histoire sociale*)上[题为《两只鸽子和一本作业本》(*Deux pigeons et un cahier*),同前书,1994年春,第143页及以后多处]。

93 同上。

94 收入《境地》第4卷,伽利玛出版社,1964年,第189—287页,引文见第248页。

95 西蒙娜·德·波伏娃,《事物的力量》,出处见前文,第281页。

96 如安妮·科昂-索拉尔,《萨特》,出处见前文,第428—430页。

97 事实上,萨特在其1961年的文章的续文中,提到了他对资产阶级的"憎恶"(《境地》第4卷,第249页)。

98 拉孔伯·吕西安(Lacombe Lucien),法国著名导演路易·马勒(Louis Malle)1974年拍摄的同名电影的主人公。——译者注。

99 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1921— ,法国社会学家。——译者注。

100 让·杜维尼奥(Jean Duvignaud),1921— ,法国小说家、戏剧家、评论家。——译者注。

101 克拉拉·马尔罗(Clara Malraux),1897—1982,曾是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的妻子,离婚后仍保留了马尔罗的姓氏。——译者注

102 马克·拉扎尔(Marc Lazar),《红星》(*Maisons Rouges*),出处见前文,第70页。

103 同上,第72页。

104 罗森伯格案:美国工程师朱里尤斯·罗森伯格(Julius Rosenberg)及妻子埃瑟尔·罗森伯格(Ethel Rosenberg)被指控在"二战"期间向苏联提供了核机密,尽管指控证据不足,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抗议,但他们仍于1951年被判死刑,两年后被处死。——译者注。

105 鲁道夫·斯兰斯基(Rudolf Slansky),1896—1953,曾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副主席,1950年因"犹太复国主义"的罪名被捕,1953年遭处决,1962年得到平反。——译者注。

106 安德烈·加斯比(André Kaspi),《罗森伯格夫妇有罪吗?》(*Les Rosenberg étaient-ils coupables?*),摘自《历史》杂志(*L'Histoire*),第181期,1994年10月,第8页及以后多处。

107 同上。

108 克洛德·布尔岱(Claude Bourdet),1909— ,法国记者。——译者注。

109　于佩尔·伯夫－梅里(Hubert Beuve-Méry),1902—1989,《世界报》的经营者和主要股东之一,经常以"天狼星"的笔名在该报上发表文章。——译者注。

110　皮埃尔·布拉瑟(Pierre Brasseur),1905—1972,法国电影、戏剧演员。——译者注。

111　《人道报》,1953年11月20日。

112　阿兰·贝藏松(Alain Besançon),《回忆录》,第321页。

113　让·格勒尼埃(Jean Grenier),《论正统精神》(*Essai sur l'esprit d'orthodoxie*),伽利玛出版社,1938年,1967年再版,《思想》丛书,第16页。

114　雷蒙·阿隆的报告,见皮埃尔·格雷米雍引用的资料,《反共的知识分子——巴黎捍卫文化自由大会(1950—1955)》,第38页。

115　安德烈·泰里夫(André Thérive),《论背叛》(*Essai sur les trahisons*)一书的序言,卡尔曼－莱维出版社,1951年,第24卷。

116　让·卡苏(Jean Cassou),1897—1986,法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历史学家。——译者注。

117　我们对《世界报》的分析工作,得到了一篇政治科学高等研究文凭毕业论文的帮助,该论文的主题是第四共和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宣言,研究的根据是《世界报》的晚报[作者伊夫·阿居拉(Yves Aguilar),波尔多,1966年]。

118　除了我们已经提及的皮埃尔·格雷米雍有关保卫文化自由大会的著作之外,参阅他的《冷战时期在巴黎的〈论据〉杂志》(*《Preuves》dans le Paris de la guerre froide*),摘自《20世纪——历史杂志》,第13期,1987年1—3月,另参阅他所编辑的、1989年由朱里亚出版社出版的文章选读《〈论据〉——一份在巴黎的欧洲性杂志》(*《Preuves》, une revue européenne à Paris*)。

119　莫里斯·杜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1917—　,法国作家、记者。——译者注。

120　《世界报》,1955年8月27日。

121　《法国知识分子和乌托邦》(*Les intellectuels français et l'utopie*),摘自《论据》杂志,第50期,1955年4月,第14页。

122　《为什么是阿隆?》(*Pourquoi Aron?*),摘自《新观察家》杂志,1983年10月21—27日。

123　《费加罗报》,1955年3月5—6日。

124　《参与政治的观众》,第199页。

125　研讨会论文集由弗朗索瓦·佩达里达(François Bédarida)和让－皮埃尔·里

乌(Jean-Pierre Rioux)主编,次年由法亚尔出版社出版;而会前的谈话内容则作为资料,保存在现代历史研究所。

126 《权力》杂志(*Pouvoirs*),1984年,第28期,《与雷蒙·阿隆的谈话(1983年2月)》[*Conversation avec Raymond Aron (février 1983)*],采访者严·库代·杜·福雷斯特(Yann Coudé du Foreste),引语见第178页。

127 马塞尔·佩儒(Marcel Péju),《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或含糊不清》(*Pierre Mendès France ou les ambiguïtés*),摘自《现代》,1955年1—2月第109期,第961—971页,以及《左派》(*La Gauche*),特刊,1955年,第112—113期。

128 《解放报》,1954年7月15日和20日。

129 国家档案馆,文学艺术管理局(国家教育部),巴黎剧院委员会,1951年6月23日的笔录(由帕特里西亚·德沃引述,同前书,第1卷,第35页)。

130 这次调查最初刊登在1957年10月3日的第328期《快报》上,总共持续了十期,到1957年12月7日的第337期结束。另参阅几个月后由弗朗索瓦·吉鲁(François Giroud)发表的调查——该调查的对象是出生于1927—1939年之间的法国人。

131 《您读过几本?》(*Combien en avez-vous lus?*),摘自《快报》,1955年4月16日,第99期,第13页。

132 安德烈·苏比朗(André Soubiran),1910— ,法国小说家,其享有盛名的佳作是小说《白衣人》(*les Hommes en blanc*),共四卷。——译者注。

133 皮埃尔·克洛斯泰尔曼(Pierre Clostermann),1921— ,法国飞行员,"二战"期间曾参加自由法国空军,他在小说《大马戏场》(*le Grand Cirque*)里讲述了自己的战斗经历。——译者注。

134 资料来源:伽利玛出版社。

135 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法国小说家、诗人、专栏作家、评论家,著有旷世巨作《追忆逝水年华》。——译者注。

136 安托万·德·圣-太克絮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1900—1944,法国小说家、散文家,"二战"期间应征人伍,成为空军飞行员,在驾机执行任务时失踪。——译者注。

137 安德烈·拉加尔德(André Lagarde)和罗朗·米夏尔(Laurent Michard),法国著名教科书编撰者。——译者注。

138 雷蒙·阿隆,《让-保尔·萨特和共产主义》(*Jean-Paul Sartre et le communisme*),摘自《巴黎杂志》(*La Revue de Paris*),第61年,1954年6月,第79页。

139　西蒙娜·德·波伏娃,《致萨特的信》,第2卷,出处见前文,第428页。

140　这是"二战"期间以贝当为首的亲德的维希政府为消磨法国人民的抵抗斗志而提出的口号。——译者注。

141　西蒙娜·韦尔(Simone Weil),1909—1943,法国女作家、哲学家。——译者注。

142　雷蒙·阿隆,《答让-保尔·萨特》(*Réponse à Jean-Paul Sartre*),摘自《精神自由》,1949年6月5日,第141页。

143　雷蒙·阿隆,《辩证法的幸与不幸》(*Aventures et mésaventures de la dialectique*),选自《论据》(*Preuves*),1956年1月,第15页。

144　《法兰西观察家》(*France Observateur*),1960年1月7日。

第六章
从阿尔及利亚到越南

50年代，阿隆和萨特依靠的仍然是历史，但他们在这方面的分歧已经无可挽回。阿隆写道："在20世纪，任何行动都意味并且导致人们就苏联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回避这个问题，就是在谈论历史的同时，回避历史现实的束缚。"[1]与此同时，正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萨特于1956年2月写道："作为历史的产物，共产党表现了极为客观的智慧。"在阿尔及利亚战争逐渐占据知识分子思想舞台的前台之前，对共产党的态度问题在当时仍然是辩论的中心。

"我对共产党人的赞同"

1952年7月，自从《共产主义者和和平》的第一册出版以后，萨特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共产党的同路人，尽管他身为一个享有世界性知名度的知识分子，但他对共产党并没有表现出

任何积极性，从而可能引起人们对"同路人"这种说法的异议。的确，在这篇系列文章的第三部分，萨特特别指出："本文的宗旨，是要表明我在一些确定的问题上对共产党人的赞同，这种赞同来源于我本人的原则，而非共产党人的原则。"[2]然而，萨特接近共产党的迹象非常明显，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比如，1952年12月，他去维也纳参加了和平运动大会。回国之后，他声明说："我在维也纳看到的是和平。"[3]几个月后，莫里斯·梅洛－庞蒂辞去了《现代》杂志的编辑职务。

第二年，萨特和共产党更加接近了，这方面的例子愈发多见。比如，当让·卡纳帕和让－保尔·萨特之间似乎将就狄奥尼·马斯科洛的著作《共产主义》展开新的论战时，前者甚至在3月24日的《人道报》上声称，论战的矛头并非指向萨特。[4]1948年11月，还是这个卡纳帕，在一篇文章中奉劝萨特到煤矿去，[5]不过现在，那篇文章早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至于萨特，他在这个1954年的春天做了更多象征性的举动。5月份，他对奠边府大败后法国禁止上演苏联芭蕾舞剧的决定提出了严正的抗议。同一个月即将结束时，他去柏林参加了和平运动决策机关的另一次会议，并且作了题为《氢弹——反历史的武器》的演讲，该演讲后来得到了发表。[6]接着，他对苏联作了一次著名的访问，访问结束后，他为《解放报》写了五篇系列文章，阐述了他对苏联的印象。[7]

这五篇前文已经提到过的文章经常被人们引用，许多人批评说，这些引用往往是断章取义的。但是，有些引用甚至被用来做文章的标题：《在苏联，人们有绝对的批评自由；苏联公民在一个持续进步的社会里不断改善着他们的生活条件》（7月15日）；《做精英可不轻松，因为他们时刻都会遭到全体公民的批评》（7月17—18日）。我们前面指出过，萨特在作上述判断的

同时,还对"1960年左右"苏联和法国的生活水平进行了预测性的比较。雷蒙·阿隆在1954年11月8日《费加罗报》的一篇文章里,对这种预测作了间接的回击:"目前,人们谈论得很多的,是'苏联的繁荣'在不久以后的几年里对西欧所构成的威胁。"其实,这篇文章特别要批驳阿尔弗雷德·索韦[8]和莫里斯·罗莱,他们两人根据东方国家提供的官方数据,对苏联的工业增长进行了分析。[9]阿隆在揭露这些官方数据以及它们所要反应的繁荣——这个词应该打上引号——的同时,又一次和萨特唱起了反调。

1954年12月,萨特担任了法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在1955年一年中,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像是一位典型的共产党同路人。这不仅是那年春天出版的《知识分子的鸦片》的观点;与此同时,莫里斯·梅洛-庞蒂通过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辩证法的冒险》,在该书的第四章中指名道姓地攻击了"萨特和极端的布尔什维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论断在1956年2月得到了证实,当时,萨特在《现代》杂志中,猛烈抨击了一名对共产党进行批评的共产党员。这位共产党员名叫皮埃尔·埃尔韦,他刚发表了一篇题为《革命和物神》的文章,萨特就紧接着发表了《修正主义和物神》[10]。那时,萨特和共产党的一致达到了顶峰,这种一致不仅是思想上的——"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哲学;它还是我们的思想环境,是思想获取养料的来源"——同样也是政治上的:"作为历史的产物,共产党表现出一种极为客观的智慧;它很少会犯错误。"鉴于萨特的这种倾向,他当然不会对1956年2月发表的《赫鲁晓夫报告》作出判断。

1956年的冲击

事实上,对于法国知识界来说,1956年整个一年都是关键

性的，因为历史出现了反弹，在八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两次震撼世界的大事。第一件大事波及西方较晚。2月25日，尼基塔·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苏共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一篇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罪行的秘密报告。起初，在法国发表的仅是经过删节的报告，它的全文并不为人所知——除了法国共产党的某些领导人之外：比如，在4月19日的《世界报》上，安德烈·封丹纳[11]以很大的篇幅，谈到了这份报告。只是到了春天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国务院才于6月4日发表了报告的全文，而《世界报》则于6月6日起，分11部分刊登了这份报告，这在整个新闻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6月23日，法国资料部门也在《资料摘要和研究》系列杂志上，分25页全文刊登了这份报告。6月18日，法共政治局开始反击，它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的开头是这样的："资产阶级的报刊发表了一篇据说是赫鲁晓夫同志所作的报告。"当然，这份声明没有对报告作任何否定，它甚至还谈到了斯大林的"失误"和"严重错误"，但整个声明对报告本身仍有所保留，特别是7月份在勒阿弗尔召开的法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没有像某些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同路人所希望的那样，对报告进行讨论。7月23日的《人道报》总结说："大会的闭幕式在代表们一致而热烈的拥护声中结束。"

萨特似乎不仅对赫鲁晓夫的报告感到惊讶，而且从心底里反对它，甚至反对报告的根本原则。他在那年秋天承认说："是的，我们必须了解自己需要什么、究竟走向何方，必须循序渐进地进行改革，而不是一开始就大肆张扬。从这一点来谈，赫鲁晓夫的报告也许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在我看来，在人民的生活水平事先没有得到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不能对一个长期以来代表着一种社会制度的圣人进行如此直率的攻击，任何对他本人公开正式的谴责以及对他错误的详细暴露，都是疯子的举

动。结果,人民群众了解了真相,但他们对此并没有作好准备。只要看看在我们法国,这份报告使共产党知识分子和工人受到何种程度的震撼,我们就能意识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人民对理解这份可怕的报告多么缺乏思想准备,因为这份报告在列举斯大林罪行和错误的时候,既没有作任何解释也没有作历史的分析,它是非常草率的。"[12]看起来,"人民群众"一时忘记了历史决定论中政治物理学的原则,而赫鲁晓夫的报告则被说成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相反,雷蒙·阿隆对赫备晓夫的报告内容却不感到惊讶。不可否认,在《知识分子的鸦片》发表并引起争论之后的几个月,他反而在这份报告中得到一种报复的快感。此外,他在 1956 年 7 月 10 日的《费加罗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有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标题——《他们一直这样说》,它就像一面胜利的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阿隆指出,那些陶醉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由于来自苏联内部的意外事实而感到沮丧,即使"比起对那位伟大人物的赞扬来,N·S·赫鲁晓夫的发言并没有对斯大林时代作出更好、更决定性的总结"。他还补充说,那些信奉第三条道路的人也丧失了人们对他们的尊敬,因为"一个人同样也不会因为同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保持同等距离,而成为公正的人;当涉及到政治清洗、全民族流放或彻头彻尾都是报造的供词的时候,反共产主义者是完全正确的。真理不一定永远反映在正确的手段之中,20 世纪的暴政已经到了极为可怕的程度。"

上述话语的作者已不再仅仅是《费加罗报》的社论作家。自 1955 年秋天起,他担任了巴黎大学的教报。他刚在那里结束了第一个学年的授课,从此,他在这一新的岗位和事业上花费的精力,比他在记者活动上所花费的更多。[13]这一事业是如此宏大,以至于从 1955 年秋到 1968 年 1 月——雷蒙·阿隆在那个时候离

开了巴黎大学，去高等研究实践学校工作，他从1960年起就开始担任这所学校的教务处长——的12年，成了他作家生涯的中心和重点。从1955—1956学年起，他开始讲授关于工业社会的课程的第一部分，该课程由三部分组成。[14]在第一部分中，他研究了苏联的问题，就这样，最早从1956年春天开始被泄露出来的赫鲁晓夫报告，如同来自外部世界的回声，回荡在巴黎大学的梯形教室里。

这种回声，由于是年秋天的匈牙利事件，而变得愈发强烈。11月5日，也就是说，几乎还在匈牙利事件余波未平的时候，雷蒙·阿隆就在保卫文化自由大会的请愿书上签了字，这份请愿书被发表在次日的《解放报》上。请愿书的签字者们"以全人类良心的名义"，"恳求"联合国采取"紧急措施，以捍卫匈牙利人民的自由和独立，并保护这个英雄的民族免遭苏联军队的粗暴镇压和恐吓"。当时，保卫文化自由大会的主席，由卡尔·雅斯贝尔斯、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15]、雅克·马里坦[16]和伯特兰·罗素共同担任。在这份请愿书中，雷蒙·阿隆特别和德尼·德·鲁热蒙、达维德·鲁塞和马内·斯佩尔贝[17]站在了一起。

同样，让-保尔·萨特也几乎立刻就作出了反应。但是，和阿隆相比，他这样做也许更加困难，因为这一事件更加直接地触及到他的政治参与和信仰。1956年春天，在赫鲁晓夫报告最初的影响过去之后，共产党的同路人们重新站到了斗争前列，他们在迄今为止同共产党紧密团结的态度和他们经常自诩的独立态度之间左右为难。在这方面，发生在法国作家委员会内部的混乱很说明问题。当时该委员会的主席是作家维尔高尔[18]。几个月后，他在一本书中讲述了1956年的那次思想震动，这本书的标题含义很明确：《向法共告别》。他在书中说，赫鲁晓夫的报告是一个"晴天霹雳"。1956年5月初，由许多在维尔高尔看来是

"体面的知名人物"组成的法国作家委员会聆听了该委员会主席的一个报告,在报告中,维尔高尔特别谈到了"腐败"的问题。他在《向法共告别》一书中指出,大家"目瞪口呆、精神集中"地听完了这个报告。[19]尽管如此,我们应该更加准确地衡量这第一次震撼的广度,因为由于那年下半年所发生的事,或者更广泛地说,由于"前共产党人"和前共产党同路人的选择和重组,赫鲁晓夫报告的震撼可能会在人们的记忆中变得更加强烈。

不管怎样,我们看到,萨特的感情是十分复杂的。何况在11月份,他称报告的发表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使无产阶级感到震惊。我们必须看到,当时,对于萨特来说,最为迫切的需要,是不使左派力量感到绝望和迷茫。也许在赫鲁晓夫报告发表几个月后,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声明,来为他在春天的沉默辩解。不过,这种沉默的原因并不重要。它要么是因为对报告的反对,正如他在秋天所说的那些话使人想到的那样,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萨特,面对社会主义最初的崩溃,他和前几年一样,在1956年夏天,采取了一条和共产党非常接近的路线;要么是因为混乱或疑惑,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萨特在秋天所说的话表明,他的混乱是有限的,他很快就恢复了理智,因此他久久不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

但是,他对11月份匈牙利事件的反应却是迅速和公开的。1956年11月8日,他在一份发表在《法兰西观察家》上的请愿书上签了字。请愿书标题很明确:《反对苏联的干涉》;萨特的抗议也很坚决,他谴责了"用大炮和坦克镇压匈牙利人民的反抗及其独立愿望"的行径。这里必须注意几点。首先,虽然萨特不是请愿书的发起人——维尔高尔第二年在《向法共告别》一书中坦白说,请愿书是在他的倡议下签署的——但他是这一活动的主要人物。他的名字在所有签名者中位居第一,而且在他的追随者

和《现代》杂志的合作者中,有好几个人都站在他这一边。其次,萨特在谴责苏联干涉行动的同时,确实和阿隆在表面上取得了一致,《现代》和《论据》这两份杂志似乎第一次站在了同一条战壕里。

但是,事实其实并非如此。当阿隆和他的朋友们在大声疾呼"全人类良心"的时候,萨特和他的支持者却在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说话。从这一点上,虽然他们的请愿书也对苏联作了谴责,但读后却使人觉得它是在揭露那些"敢于在今天感到气愤的伪君子"。请愿书后面的文字表明,签名者首先都是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当然,这里我们有必要注意辩证意义上的均衡,但两份请愿书在文字上的分量差别却是显而易见的。此外,在同一期的《法兰西观察家》杂志上,也是在第四页,刊登了另一篇左派知识分子谴责苏联干涉的请愿书,请愿书只是提醒人们,"签名者们"——特别是乔治·絮费尔[20]、让-马利·多姆纳克、吉尔·马蒂奈、克洛德·布尔岱、埃德加·莫兰、让·杜维尼奥、罗杰·斯蒂法尼[21]等——"最近抗议了法英两国在埃及的军事行动",然后他们才言归正传。

此外,与此同时,阿尔贝·加缪的态度更为直接。他在发表于11月6日《世界报》上的一份请愿书上签了名,该请愿书完全站在匈牙利人民这一边。签名者们"强调,克里姆林宫的领导者们在目睹他们的坦克和飞机向反抗者扫射的同时,就像沙皇时代一样,重新将莫斯科造就成全世界反动专制主义的首都,面对世界人民的解放力量,他们再次扮演起神圣同盟[22]和凡尔赛军队[23]曾经扮演过的血腥超级警察的角色。他们使这些杀人者受到全人类的鄙视,并且使自由国家的共产党领袖们蒙受了耻辱,后者在追随他们的同时,双手也沾上了匈牙利人民的鲜血"。尽管蒂埃里·莫尼埃的名字也出现在签名者的名单中,但请愿书的

立场还是左派的。此外,对"凡尔赛军队"的影射,也把这份请愿书纳入了对左派历史的回忆。历史学家注意到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法国共产党纠缠不休并带有威胁性的存在,但是,我们不应该就此得出结论,认为只有对苏联的谴责——这种谴责的语气,已经因为可能对西方民主国家侵犯自由的揭露,而有所减缓——才是可行的。当时,左派政治态度占据了上风。

1952年,《反抗的人》出版后,萨特和加缪爆发了一次争吵;早在那次争吵中,萨特就采取了对可能发生在两大阵营内部的暴力事件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关于出现在苏联的集中营现象,他在《现代》杂志上写道:"是的,加缪,我和你一样,觉得这些集中营是不可接受的;但是,'资产阶级报纸'每天利用集中营大肆宣传,这同样也是不可接受的。我没有说:马达加斯加人比土库曼人高贵;我是说,我们不能利用某些人强加给土库曼人的痛苦,来证明我们迫使马达加斯加人受苦是正确的。我曾经看到,反共分子们对这些关押苦役犯的监狱兴高采烈……"[24]

至于雷蒙·阿隆,他在1956年7月10日的一篇文章中对萨特的说法作了驳斥,尽管这种说法经常出现在当时知识分子的辩论当中。他对所谓"正确手段"的谴责,深深地扎根于十年的斗争之中,其间,他一直反对着萨特的这种推理。早在一年前,他就对这种推理断然作出了结论,他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写道:"一条界线将知识分子一分为二,一些知识分子不否认集中营的存在,而另一些知识分子则谴责集中营的存在。正是这两种态度,区分了知识分子的两大阵营。"此外,在关于苏伊士运河军事行动的问题上,阿隆似乎并没有感觉到萨特的抨击和他有什么关联。从他这方面来说,早在法英军队遭受失败之前,他就分析了这次行动,比起《费加罗报》及其主编皮埃尔·布里松来,阿隆的分析带有更多的细微差别。比如,1956年11月2日,

他在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标题反映出他的迟疑:《武力只是一种手段》。当然，文章并没有对军事干涉的原则作实质性的谴责，但它的内容和语气明显反应出了作者的迟疑，我们必须重申的是，这种迟疑是表现在一份对那次军事行动持完全赞同态度的报纸上的。另外，我们应该把这篇文章放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来看，那时，受慕尼黑综合症的影响，一些左派知识分子借口捍卫民主，谴责纳赛尔是新的希特勒，称只有用武力，才能粉碎他的阴谋。[25]

不过，这里，我们必须回到萨特身上来。由于他的公开介入，也由于他的知名度，他几乎成了发生在1956年秋的危机的代表人物，那次危机触及了共产党的同路人们。一方面，尽管那封"反对苏联干涉"的请愿书措辞均衡，并且攻击了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但它仍不失为对苏联的公开谴责，并且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另一方面，萨特第二天就更新了他的谴责，他在《快报》上发表文章，表明自己的立场，文章标题为《在布达佩斯之后，萨特说》[26]。他在文章里特别宣布和法共决裂。因为"(对他来说)不管和共产党决裂是多么令人不快"，但鉴于"目前领导(该党)的那些人"，这样的决裂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是30年谎言和僵化的结果"。萨特曾为法共"极为客观的智慧"而额手称庆，并且总结说"它很少会犯错误"，但这个时代似乎已经十分遥远了——事实上，那只是同年2月份的事!

在这篇文章中，萨特同样也"彻底而毫无保留地"抨击了苏联的干涉，说它是一种本身就值得谴责的"犯罪"，"由于12年的恐怖和痴愚"，这种犯罪"是可能的，也许(当然这是站在苏联的立场上)还是必要的"。他对事件的历史总结是:"匈牙利人民用鲜血告诉我们，作为苏联的舶来品，社会主义彻底崩溃了。"萨特

的攻击非常直截了当,法共对此立刻作了反击.更何况在共产主义的势力范围里,匈牙利事件的冲击波不仅波及到共产党的同路人,同样也影响到了一些已经"注册"的党员知识分子。[27] 12月12日,也就是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二,马塞尔·塞尔万[28]在《人道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白蚁及其同党》的文章,声称必须严厉惩罚"那些企图从内部腐蚀党的人",何况他们的破坏活动十分危险。严惩的对象之一就是萨特,因为他的行为"卑鄙无耻"。四天后,轮到瓦尔德·罗歇[29]在同一份报纸上变本加厉了:"今天,萨特在攻击和污蔑我们的党",而"党员中有一些机会主义分子,也在(他)后面亦步亦趋"。结论:"在我党的所有重大历史时期,总有那么一些生性胆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会在困难的时刻,屈服于阶级敌人的压力。"

对"阿尔及利亚悲剧"的"回答"

从50年代中期起,意识形态的时代旋律逐渐发生了改变。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赫鲁晓夫的报告"解除了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思想豁免权"[30]。如果我们补充说,虽然在1962年之前,东西方还没有进入和平共处的时期,但双方的紧张关系却逐渐得到了缓和,那么从那时起,在萨特和阿隆曾经活动过的舞台上,一切都和过去不再相同,甚至连舞台的曲目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同共产主义及其代表国家的复杂对话中,萨特将开始他立场和语义的转变。至于阿隆,他的人格——至少是在知识界眼中的人格——也得到充实和变化。即使许多人——包括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都在阅读和评论他关于国际关系的著作,但在绝大多数人看来,他首先是冷战时期的一个社论作家,成天同直接或间接受到共产主义影响的左派知识分子政党作着激烈辩论。直到那个时期,他的其他许多著作本身就带有

明显的论战性质。我们看到，这位巴黎大学的教授从此将要潜心撰写一部科学著作，尽管这部著作涉及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有所改变，但它把阿隆在战前的活动重新联系了起来。此外，阿隆凭借他在知识界的影响及其在大学里的地位，慢慢被一些人看成是同战后摆脱共产主义参与活动的一代人进行对话的人。这种现象在后一代人身上得到了更新，它和某些前"左派分子"一样，在当时有着统计学上的现实意义，理所当然地被纳入了意识形态的范畴。因此，对于战后的一代共产党人来说，这种两大阵营相互接近的现象尽管不很明显，但是已经存在。不管怎样，对于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说，"巴黎大学的巨匠"将成为"同从斯大林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人进行对话的伟大人物"。[31]

不过，历史背景的变化其实并不局限于来自东欧的震撼。50年代中期，全世界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法国也被卷入了阿尔及利亚战争。这场战争很快就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心。此外，用米歇尔·克鲁泽的话来说，它也是知识分子的一场"笔战"[32]：他们有的给权利机构写请愿书，有的在舆论上发表声明，一些著名作家比如萨特公开了自己的观点，另一些比如加缪则在沉默后不久大声疾呼。所有采取上述态度的知识分子——包括表面上一反常态的阿隆——都俨然是威严的统治者，[33]尽管对于他们来说，那个时代在某种意义上同样也是一个政治参与的艳阳天。不管怎样，就萨特和阿隆而言，那个时期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萨特来说，反对殖民主义说到底也许是他最为突出的政治参与活动，更何况他影响了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完成政治觉醒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至于阿隆，他似乎显得一反常态，极力主张阿尔及利亚独立。此外，他同样也在和左派的绝大部分人唱反调，因为自阿尔及利亚冲突一发生，他就在鼓吹上述解决办法，而当时，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绝大多数人都倾向

于维持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控制。毫无疑问,在萨特和阿隆各自的政治旅程中,这一时期的参与活动是被人们研究得最多的。何况,已经有人对他俩的这段历史作了比较。[34]因此,我们在这里仅谈论最重要的一点:必须看到,尽管他俩就阿尔及利亚问题的结论趋于一致,但结论的前提却大相径庭,而且他们的思维也分属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体系。

直到1955年秋,即1954年的诸圣瞻礼节事件发生后一年,第一批"笔战"的先锋们才真正开始表明立场。当然,从1954年11月1日起,他们就从没放松过警惕。"发生在北非的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早在1954年12月的《精神》杂志上,让-马利·多姆纳克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同一个星期,即1955年1月,克洛德·布尔岱在《法兰西观察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您的阿尔及利亚盖世太保》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自从阿尔及利亚的费拉加骚乱[35]开始之后,该国的盖世太保就充满热情地重新投入了工作。"至于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他在刊登于《快报》的《问题》[36]一文中,揭露了酷刑现象。但是,人们只是在后来才逐渐意识到冲突的严重性,那些在1955年秋走上战场的知识分子只不过是发出警报的尖兵,而且这些警报毕竟显得很不和谐。在这一点上,阿尔贝·加缪是一个代表人物,他在1955年10月8日的《快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在自由的气氛中》,着重回答了以下问题:为什么作为"知识分子"的他,要"写有关时事的文章"?他只是在后一个时期才选择了沉默。在雷蒙·阿隆这方面,他在10月12—15日的《费加罗报》上发表了四篇系列文章,题为《法国在非洲赌最后一把》。他强调:"想要削弱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思想,就不能对它不理不睬。"至于萨特,他也在同一时期加入了争论。事实上,他在11月6—7日的《世界报》的第四版上写了几行文字,披露说:"好儿名重要人物组成了一个行

动委员会,反对将北非的战争继续下去。"根据该委员会的一位创始人回忆,尽管创始人们坚决"反对殖民主义战争的原则,拥护人民权利的原则"[37],但他们的语调还是很温和的。虽说他们发出的号召涉及到"阿尔及利亚人民",但它首先要求的是"停止镇压"、停止"在海外和本土的种族歧视"以及"展开谈判"。对必须采取什么类型的政治手段来结束战争这个问题,号召的签名者们没有发表意见。

上述签名者的身份各异:他们当中有罗歇·马丹·杜加尔、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安德烈·布勒东、让·卡苏、让·盖埃诺、让·罗斯唐[38]、让－保尔·萨特、让·瓦尔、让·科克托、雅克·马多尔[39]、皮埃尔教士[40]、勒内·朱里亚和让－路易·巴罗[41]。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在9月24日的《快报》中写道,当时,像他这样的人并没有想到"抛弃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相反,该行动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对形势的看法则要激进得多。这种不同之处特别反映在两个月后委员会在瓦格拉姆大厅举行的一次示威当中。1956年1月27日,安德烈·芒杜兹向"阿尔及利亚的抵抗运动"表示"致敬"[42],而让－保尔·萨特则宣称:"殖民主义正在自取灭亡。但它仍然毒化着环境,它是我们的耻辱,它蔑视或丑化我们的法律;它以种族主义危害着我们。我们的任务,是促成它的灭亡。我们惟一能够和必须努力去做的,是同(阿尔及利亚人民)并肩斗争,以便把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同时从殖民主义的暴政中解放出来。"[43]

雷蒙·阿隆当时的态度和上述分析相距甚远。此外,他同意在1956年5月23日《世界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上签字,这篇文章的标题十分明确:《巴黎大学的一些教授表示赞同政府的政策》。签名者们在文章中表示,他们保证"尽其所能,使那些肩负着恢复阿尔及利亚和平使命的年轻法国人,从他们年长者的尊

敬之中,得到他们理应得到的精神支援”。我们有必要仔细分析雷蒙·阿隆在1955年秋天和1957年春末之间所持的立场和所写的文章。不管怎样,当时他发表了《阿尔及利亚悲剧》一书,并在书中公开表示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说得更确切些,他指出,在他看来,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在所难免。这本书作为普隆出版社的《自由论坛》系列丛书之一,于1957年6月份出版。该系列丛书刚刚由夏尔·奥朗哥创办,号称直接反映当时的时事。自1957年起,该丛书特别出版了米歇尔·德勃雷[44]的《统治我们的君主》和安德烈·菲利普[45]的《遭到背叛的社会主义》。此外,后者是丛书的第一部著作,紧接其后的就是雷蒙·阿隆的《阿尔及利亚悲剧》。早在一年前,雅克·苏斯泰尔就通过普隆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被爱和受苦的阿尔及利亚》,这次他立刻拿起笔来,在8月份就发表了《阿尔及利亚的悲剧和法国的衰落——答雷蒙·阿隆》一文。事实上,夏尔·奥朗哥只用了十几天时间,就完成了系列丛书的印刷工作。

雷蒙·阿隆在自称写于1956年4月和1957年5月的两篇文章中,以现实原则的名义,得出了以下的结论:“比起打一场违心的、缺乏果断和获胜希望的战争来,最好还是采取放弃阿尔及利亚、撤回侨民的英雄举措。”阿隆的分析有着不可改变的逻辑,主要以以下事实为依据:“地中海两岸人口增长率的差别过于悬殊,因此那些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民,不可能成为同一个社团的一分子。”作者还建议政府筹措一笔五千亿法郎的资金,以便在未来把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侨民撤回本土。[46]阿隆的判断引出了上述预测,可以想像,这样的判断使人们感到震惊。那些和他持对立观点的人们,趁机隐蔽或公开地指责他的分析枯燥乏味。比如,雅克·苏斯泰尔写道:“我们不可能把那些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人‘撤回’本土,这些人的父亲、祖父、曾祖

父都出生在那里,并且永远地安息在那里。"[47]对此,雷蒙·阿隆在第二年以他自己的方式作了回答,这个回答并不令人惊讶:"政治行动是对一种形势的回应,而不是理论的阐述或情感的表达。"[48]

在阿尔及利亚成为全国争论焦点的情况下,这一回答虽不令人惊讶,但并不缺乏勇气。此外,经过行动的锻炼——因为,在这样的形势下,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本身就是一种行动——雷蒙·阿隆的观察比起那些冗长的理论论述来,更加简略地概括了他的参与观。从这一点来看,当时的阿隆和作为年轻哲学教师资格获得者的阿隆是一脉相承的,1930—1931年的冬天,这位年轻的哲学教师资格获得者在科隆的莱茵河畔决定,要成为一名"参与政治的观众",也就是要成为一名提供"答案"而不是阐述"理论"或表达"情感"的分析家。此外,阿隆的这种态度实际上使他面临着非常激烈的反应,而他的书也如同是在"大弥撒上开了一枪"[49]。有些人比如雅克·苏斯泰尔把它看成是"资产阶级道德的楷模"[50]。另一些人比如路易·泰尔诺瓦[51]在1957年6月26日的《十字路口》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甚至写道:"鉴于雷蒙·阿隆先生的过去,我们对他感到遗憾,因为他令人不禁想起'皮埃尔·赖伐尔'[52],后者以为国际形势在1940年大局已定。"在这份周刊接下来的一期上,路易·泰尔诺瓦说阿隆的思维"仅仅是放弃思想的一个借口"。左派的让·达尼埃尔在《快报》中认为,"说到底,从保守主义到失败主义的转变总是相同的",他还为雷蒙·阿隆的话感到惋惜,因为后者鼓吹"立刻把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撤回本土,他认为这些法国人不可能在一个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国家里生活"。[53]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也在同一期的《快报》上,提到了《阿尔及利亚悲剧》一书的作者"清晰而冷漠的洞察能力"[54]。

一些呼吁阿尔及利亚独立或出于道德揭露法国军队某些敲诈行为的知识分子,关于他们作用的辩论在1957年的确已经非常激烈了。有些人认为,那些"亲爱的教授们"在故意破坏法国的战争努力,他们减弱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获胜的任何可能性。另一些人则认为,知识分子们挽救了法国的荣誉,这一荣誉由于先后发生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多年的殖民战争而遭败坏,同时由于暴力镇压和滥用酷刑而受玷污。对上述两种看法的选择属于个人思想的范畴,而不是历史科学的领域,因此我们仅要指出,这样的选择,无论它是公开还是发生在内心深处,常常都是痛苦的。我们都知道加缪1957年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所作的机敏回答:"我相信正义,但在我母亲和正义之间,我首先捍卫的是前者。"这句话在左派中间引起了轰动。由于经常遭到歪曲或错误理解,它仅仅被看成是一种迟疑和不安在思想上的大胆表示。

此外,攻击加缪的不仅仅是左派知识分子,雷蒙·阿隆也指责了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因为在1958年的《阿尔及利亚和共和国》一书中,他写道:"人们在读阿尔贝·加缪先生不久前发表的文集(《现状集》第3卷)时,会害怕发生最坏的情况。尽管阿尔贝·加缪先生有着正义的愿望和宽宏大量,但他还是不可能超越一个善良的殖民者的态度。无论在什么时候,他似乎都不懂得民族要求的本质以及这种要求的合法性。"[55]这不是阿隆第一次对加缪态度严厉。早在1955年出版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中,加缪的《反抗的人》就被看成是这样一本书,"论证的主线被混淆在一连串相互衔接得很差的研究之中,文章的笔调和道学家的语气几乎和哲学的严谨格格不入",这使该书没有带来"任何在其他地方难以找到的东西"。归根到底,加缪"从本质上说同样也属于思想正统的左派分子"。当然,阿隆此外还承认加

缪有“诚实的愿望”，并且“拒绝假象和伪装”。[56]但是，他仍然保留着对加缪的负面印象。

萨特的战争

我们曾经在前面提到过罗朗·迪马就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萨特所发表的看法：“阿尔及利亚战争是他的战争……他错过了他这个时代的所有重大政治事件，除了这一次——阿尔及利亚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项伟大事业和一个伟大人物的会面。”[57]的确，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让－保尔·萨特经常站在知识分子重大战斗的第一线。这里，我们不可能对这种积极的战斗作详细叙述。[58]不管怎样，事实上，萨特很快就成为主张维持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统治的人所仇视的对象。1955年12月，年轻的让－马利·勒·庞[59]作为布热德运动[60]的候选人参加了当时的立法选举，并于次年1月2日当选为议员，他就法兰西联盟的问题声明道：“我们每次被人在屁股上踢了一脚以后，总要把裤子刷干净。法国被一伙鸡奸者统治着，他们是萨特、加缪、莫里亚克。”[61]不过，萨特是在1960年夏末表示了他对“行李工”[62]的支持以及参加了“121人团体”[63]之后，才成为一种象征和陪衬的。10月初，六个老战士运动团体在凯旋门发起了121人宣言，在一次反对该宣言的抗议活动中，示威者们喊出了“枪毙萨特”的口号。[64]而萨特的右派同辈们，则通过他们的请愿书和公开声明，把萨特的丑事公诸于众。加布里埃尔·马塞尔[65]在发表于10月6日《战斗报》上的一次采访中，说萨特“公开背叛”，而亨利·马西斯[66]则在该报上把萨特写成“像圣－热内[67]一样”寻找“殉道者的光环，以便使自己的存在具有意义”。

在许多法国人眼里，当时的萨特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圣－日尔曼－德－普雷教堂的卡西摩多[68]。事实上，一切都像是他的

激进立场,使逐渐形成于知识分子、权利机构和一部分舆论中间的仇恨,都集中到了他的名下一样。早在1956年4月5日,亨利-伊雷内·马鲁在《世界报》上发表他的著名论坛《法国,我的祖国……》,并提到"名副其实的酷刑实验室"时,居伊·莫莱[69]政府的国防及武装力量部长莫里斯·布尔热-莫努里就已经讥讽过"亲爱的教授们"了。1956年,反对维持殖民局势的斗争激怒了许多人,就像在几年前的冷战时期,这些知识分子当中某些人的哲学共产主义激怒了许多人一样。1953年11月,内政部长莱昂·马蒂诺-德普拉在塞纳省激进党人联合会的一次宴会上,发表了一篇"反对聚集在圣-日尔曼-德-普雷或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的讲话,并称"在那些地方,性的偏差常常伴随着思想的偏差"[70]。当时,逐渐出现了一种逆圣-日尔曼-德-普雷主旋律而行的现象。1960年9月24日,《不妥协的巴黎报》谈到了121人宣言发表时"为开小差行为辩护的人",并且把它说成是典型的圣-日尔曼-德-普雷现象:"他们都是同一种类型的人,这种人把他们的巴黎生活彻底局限在两杯咖啡之中,这样做也许是为了避免承担失去智慧的风险,而正是这种智慧,使他们得以在巴黎的生活中喘息。他们是圣-日尔曼表兄弟。"

的确,有时候权力机构和知识分子抗议者双方都得不到人们的支持。比如,安德尔-卢瓦尔省年轻的参议员米歇尔·德勃雷在1956年4月21日的《世界报》上发表了一篇"自由观点",题为《被失落的非洲,被赤化的法国》,他写道:"那些生活在首都的政府阶层、知识阶层以及上流社会的人们,是估量不出法国人所受的侮辱的,这种侮辱折磨着成千上万地位低微的法国人的心!"相反,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政府阶层"和"知识阶层"所说的话,经常会遭到参加宴会的人们的讥讽。有时候,这种讥讽带有明显的蔑视,并且牵涉到对集体责任的追究。比如1957年7

月7日，罗贝尔·拉科斯特[71]面对曾在阿尔及利亚战斗过的老战士声明说："近几天来，恐怖主义势力在阿尔及尔造成了20人死亡、150人受伤，这种情况的罪魁祸首是那些有暴露情感和思想的癖好的人们，他们展开了一场反对酷刑的运动。我希望这些人受到你们的蔑视。"[72]

不过，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抗议者之间的相互敌视是司空见惯的，而且说到底是符合逻辑的。不同寻常的是人们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憎恨，它反映出一部分舆论对知识分子的不理解。从这种态度到把知识分子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相互对立，两者之间仅一步之遥，某些辩论家却跨出了这一步。比如，在1955年1月《法国博爱》杂志的第1期里，皮埃尔·布热德写道："我是一个16岁就开始养活自己的人，不应该由我来告诉你这位知识分子，什么是法国的精神。但是，我能够而且必须转向你这一边，因为没有我们，你只能是一架思想的机器，一面普通的鼓，鼓的确能发出响声，但鼓皮的下面却只有空虚。"如果我们从这种角度来看，就能更好地理解对萨特的攻击是何等广泛。1960年夏末，萨特既是《121人宣言》的签名者——该宣言宣告，人具有不屈服的权利——在某种意义上又是"行李工"诉讼案的缺席证人。在9月20日星期二的法庭审理中，律师罗朗·迪马宣读了哲学家萨特的一封电报和一封信，当时萨特正在巴西作巡回演讲。电报表达了他对被告的"彻底声援"。至于那封写于9月6日的信——其实此信是由他的亲信们在巴黎撰写的——则声明："如果让松[73]要求我拿行李或者为阿尔及利亚的政治活动分子提供住所，而我又能安全地为他们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去做的。"[74]

对萨特的攻击不仅仅限于口头上。几个月后，当秘密军组织[75]开始在法国本土采取有目标的恐怖主义活动时，作为《现

代》杂志的主编,萨特又一次首当其冲。1961年5月13日,该杂志社被炸。接着,让-保尔·萨特的寓所分别于1961年7月19日和1962年1月7日两次遭到同样的命运。至于雷蒙·阿隆,他则收到了秘密军组织的"恐吓信"[76],其中的一封被保存在他的档案里。信的开头充满了火药味:"先生,我们不得不遗憾地看到,由于戴高乐的背叛,一个与日俱增的危险时期正等待着我们的祖国,面对这样一个时期,您不想去理解它在法国的历史中意味着什么,却和那些把国家引向灾难的人站在一起。"[77]信的结尾则是赤裸裸的威胁:"请把这封信看成是我们最后的警告。我们有办法——而且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些办法——让那些或是故意或是傻里傻气地把我们祖国的大门向共产主义或国际金融集团的霸权主义敞开的人闭嘴。"[78]

萨特和阿隆就连面对危险所采取的态度也大相径庭,归根结底,这些态度和几年来他们两人的分析和行动是一脉相承的,说到底,甚至连他们的语气都和他们说过的话相符。比如,雷蒙·阿隆在秘密军组织的暗杀浪潮此起彼伏时,甚至在他自己也可能成为暗杀的目标时,还向他在巴黎大学的社会学学生们宣布:"我已经把我对阿尔及利亚和秘密军组织的看法告诉了你们,我请求你们中间和我持同样观点的人,不要为盲目的狂热所诱惑,因而去反对站在你们对立面——也就是同情秘密军组织——的那些同学。"因为,阿隆指出,如果说他"几年来带着某种绝望"经历了"这出悲剧的全过程",那么他感觉这出悲剧有"把法国人引向相互争斗"的危险。他总结道:"只要狂热一旦被煽动起来,那么炸药的影响可能会比言语更大。但是,在巴黎大学,我们理所当然是使用言语而不是使用炸药的人。我希望你们所有人,不管怀有什么政治情感,都首先是使用言语的人。"[79]

使用言语的人对使用炸药的人!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萨

特——不仅在面对秘密军组织的活动而采取的态度方面——有着和阿隆完全不同的做法。大家都知道他为弗朗兹·法农[80]的著作《全世界受苦的人》所作的序言。该书的作者祖籍马提尼克岛，自1956年起倒向了民族解放阵线。1961年，36岁的他通过马斯佩罗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这本书。弗朗兹·法农——他在几个月后，即1961年12月，死于白血病——在书中不仅鼓吹以“绝对的暴力”来反对殖民主义，还鼓吹同西方国家彻底断绝关系。他说必须停止向“成天谈论人类却同时在屠杀他所碰到的每一个人”的欧洲“进贡纳税”，而应该“建立国家、政权以及由此而萌发的社会”。不管怎样，“当非殖民化运动被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眼前时，它浑身上下都令人想到随时待发的炮弹和沾满鲜血的刺刀”。“两位主角决定性的致命”冲突，要求“人们在天平上鼓人所有的手段，当然也包括暴力”。事实上，对于被殖民者来说，“生命只能产生于殖民者腐烂的尸体”。[81]

在言辞的激烈程度上，该书序言的作者让-保尔·萨特也不示弱，甚至可以和法农相提并论，他的话令人震惊。当时，有一句话被引用得最多，使许多观察家感到困惑。原来，萨特写道：“因为，在反抗的最初阶段，必须有杀戮，杀死一名欧洲人能起到一箭双雕的鼓果，既消灭了一个压迫者，也减少了一个被压迫者，剩下的只是一个死人和一个获得自由的人；活着的人第一次体会到，在他脚下的，是本民族的土地。”[82]这里，我们必须避免把这些话同那篇被经常引用的文章的社会背景割裂开来。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变得生硬的不仅是萨特的语气，还有他的思想，这种思想陷人了漫骂，并且在宣扬集体的责任：“被财富填饱了的欧洲，在法律上把人道主义赋予了它的全体居民。在我们这里，一个人就是一个同谋，因为我们大家都从殖民剥削中得到过好处。”[83]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触及了萨特因内疚心理而产

生的自我憎恨:"在我们(欧洲人)身上,没有什么比种族的人道主义更加彻底了,因为,欧洲人只是在制造奴隶和鬼怪的同时,才把自己变成了人。"[84]从此,第三世界的问题在于"走进历史"[85]。我们可以通过阅读让-马利·多姆纳克发表在《精神》杂志上的报告,[86]意识到萨特和左派其他派别之间的距离。

这里有一个我们既不能回避又不能决断的问题:说到底,这些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是否有什么影响?这个问题很关键,何况"阿尔及利亚战争首先是一场政治战争,在这场战争中,非军事斗争比军事行动更具有决定性"[87]。但是,在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和随之而来的舆论战当中,是什么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呢?是知识分子的文章,还是所有被图像和声音——在当时的法国社会中,它们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所代替的表达形式?我们可以既不含挑衅性又比较恰当地作以下假设:在最终的天平上,将军们发动政变[88]时人们手中的收音机,或者遭秘密军组织暗杀的小德尔菲娜·勒拿尔[89]那满脸鲜血的照片,可能比萨特和阿隆的分量重得多。不过,在谈及历史的时候,事情从来不会如此简单,对某一件事情的影响力较弱,并不等于没有影响力。在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后面,有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影响历史的因素从来不是单一的,在民主社会里,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是政治决断这一精神与现实的复杂关系的完整的一分子。因此,他们的作用因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同样也取决于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和发表言论的途径。因为,虽然知识分子的思考具有内生性的特点,也就是说,他们总是在自己的圈子里进行思考,但他们思想和辩论的影响却可以波及到这个圈子之外,这种影响的强弱程度,尤其取决于他们参与政治和发表言论的途径。

此外,在这方面,1960年是一个转折性的时期。正是由于

这个原因，阿尔及利亚战争就像我们曾经说过的那样，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如同一个政治参与的艳阳天，尽管这个艳阳天是痛苦的。的确，在当时正在进行的"笔战"当中，这些知识分子都是主要的笔杆子，但与此同时，其他一些以图像和声音为基础的交流形式已经开始替代他们的文章。所谓图像，是刊登在《巴黎竞赛报》上、使800万法国读者感到震惊的照片，是自1959年起开始播出的第一批"头版的五栏"节目，是德尔菲娜·勒拿尔的脸，在舆论评判极端分子的活动时，那张脸所起的作用比知识分子的宣言和请愿书大得多。所谓声音，是那些应征入伍的士兵们的收音机，1961年4月，在将军们发动政变的过程当中，这些收听巴黎广播的士兵表现了对共和国法律的忠诚。当时，知识分子进入了他们历史的一个新阶段，但对此却并不察觉。此外，我们以后还会提到，他们察觉这种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时间，将被大大地推迟。

第三世界，革命的新乐园

与此同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巨大机遇正在发生着变化，我们看到，这一过程早在5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通过非殖民化的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的主题在更广泛的程度上取代了以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为基础的革命希望。这种变化不会不对知识分子的时代环境造成影响。用弗朗索瓦·费莱的话说，在左派工人运动中再也找不到社会的秘密，我们必须到《沉闷的热带区》[90]一书中去寻找，是莱维－施特劳斯奇迹般地让人们知道了这本书。[91]从此，"结构主义"的势力开始日益壮大。

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存在主义的领袖、马克思主义的对话者，萨特必定会遭到许多人的质问。当时，萨特意味深长地选择了政治领域，企图展开反击。事实上，当他直接或间接地遭到一

些新近出版的比如福柯的,或早已为人所知的比如莱维-施特劳斯的著作的质问时,他又重新回到了政治以及同历史的关系这条防线上。比如,在1966年他和米歇尔·福柯发生论战的时候,《词语和事物》[92]一书出版了,萨特随即在杂志《弓》上发表声明,回答了贝尔纳·潘戈[93]就论战的内容所提出的一个问题[94]:"这种拒绝历史的现象并不普遍,但它至少是一种主流。"因为,他补充说,福柯拒绝"人类改变自然和社会关系的行为——也就是说拒绝历史——的干预"。最后他作出了新然的判决:"他的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他妄图建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建造最后一座资产阶级用以阻挡马克思主义的大坝。"

那时候是1966年。如果说萨特在知识界的影响在60年代有所减弱的话,那么他的政治参与活动却十分频繁。在1958—1969年——也就是戴高乐执政的第五共和国时期——的《世界报》上,我们总共找到488篇宣言,其中萨特签名的有91篇,遥遥领先于其他有影响的签名者:

让-保尔·萨特	91	让·德莱士	43
罗朗·施瓦兹[95]	77	皮埃尔·维达尔-纳盖[97]	39
西蒙娜·德·波伏娃	72	克洛德·鲁瓦[98]	38
让-马利·多姆纳克	69	玛格丽特·杜拉斯	37
弗拉基米尔·扬凯莱维奇	63	克洛德·布尔岱	36
阿尔弗雷德·卡斯特莱[96]	61	埃玛纽埃尔·达斯弟埃	35
雅克·马多尔	52	安德烈·奥里乌	35
让·卡苏	51	莫里斯·纳多	34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47	皮埃尔·科	31
路易·马丹-肖菲埃	47	达尼埃尔·梅耶[99]	31[100]
路易·阿拉贡	45		

换言之，排行第1名的签名数是第20名的三倍，而后者不是别人，正是人权协会主席——达尼埃尔·梅耶。

和一部分左派知识分子一样，萨特的政治参与，是他在语义和立场的双重转变完成之后，在一个重新组成的思想环境里进行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逐渐被"无产阶级"第三世界和"帝国主义"的对立所取代。而后者可能是未来革命的根源，因此，人们的情感和思想都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如果说，当时的中国吸引了一部分人的憧憬，那么古巴则成为可能席卷整个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的中心。

尤其是萨特，他参与了这种亲古巴的狂热，而他的报道——《蔗糖上的飓风》——则被刊登在1960年7月的《法兰西晚报》上，此后，这篇文章经常被引用在他那些不受后人欢迎的分析当中。这里，我们仅摘录一段他对费德尔·卡斯特罗的公开声援："卡斯特罗说新制度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确如此。不过我们必须承认，许多革命在最初阶段都无愧于这个美丽的称号，但是，在使命的重压下，它们后来都失去了这一称号。今天，古巴革命之所以能够得到保护——也许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还会得到保护——是因为它被掌握在反叛者的手中。"[101]至于西蒙娜·德·波伏娃，她在同一时期宣布，一个"真实的、自由的、负责的，总之是存在主义的"社会正在古巴诞生。直到11年后，让-保尔·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才在一封致"费德尔·卡斯特罗司令"的请愿信上签名，表达了法国知识分子的"羞愧和愤怒"，谴责了强迫古巴诗人赫伯托·帕迪亚[102]作自我批评的做法。[103]

60年代初，一部分法国知识分子从捍卫苏联——后者的形象自1956年起就受到了动摇——转而开始颂扬成为革命希望之所在的第三世界，在这些知识分子"重新伸张正义"[104]的过程中，越南战争将很快成为他们重新参与政治的首选领域，萨特和

阿隆也将毫不例外地从这场战争中得出不同的分析结果。在此之前,发生在法国的事件确实给了他们另一个冲突的机会。

1968年的直接碰撞

萨特和阿隆的传记作家们对他俩在1968年5—6月间的态度已经作了细致的分析。[105]这里我们之所以再次谈及这个问题,与其说是为了提醒大家他俩在那几个星期里所表现出的积极性——尽管归根到底这种积极性从未占据过首要的地位——不如说是因为他俩曾经扮演过某种角色,而这种角色给人们包括受他们各自影响的人留下了对比鲜明的回忆。总而言之,在当时的那些事件结束之后,他俩谁都没有变得更加伟大,他们只是做了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他俩的所有活动都是习惯性的,但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却符合他们的一贯做法。也许正是他们扮演的这些角色和所起的作用,给了他俩在1968年5月一次直接碰撞的机会。

当1968年危机开始的时候,萨特早已在很大程度上投入了他的作品《福楼拜》的巨大冒险之中。从一开始起,他就对学生运动表示了公开而坚定的支持。比如,他在一份题为《学生运动表现并保持其拒绝力量是至关重要的》[106]的声明上签了字,和他一起签字的还有玛格丽特·杜拉斯、安德烈·高尔兹、亨利·勒费弗尔、弗朗索瓦·夏特莱、莫里斯·布朗肖[107]、雅克·拉康和莫里斯·纳多。[108]此外,他还和达尼埃尔·科恩-本蒂[109]进行了一次交谈,交谈的内容被发表在《新观察家》杂志上。[110]鉴于这次谈话的内容以及后来萨特在1968年5—6月间所持的立场,我们觉得这位哲学家的参与行动总的来说很平庸,而且常常几乎是漫骂性的。他当时所说的话之所以平庸得令人震惊,还因为它们和埃德加·莫兰、高纳柳斯·卡斯托里亚蒂[111]或阿兰·土莱纳等人所

作的及时分析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对比。

比如,这种平庸特别表现在萨特在广播电台发表声明的时候:“我们是怯懦、衰竭、疲乏的人,由于完全的服从而变得萎靡不振,彻底成为一个封闭制度的牺牲品。”[112]那些在1968年5月之后赋予反极权思想以生命的思想家,他们参考的肯定是其他的观点,而不是上述和西方社会现实相脱节的看法。早在1968年之前,西方社会就被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文化变革之中,确切地说,声明发表的时候,西方社会并不处于一个完全服从的境地。萨特的话很轻率,何况其中还夹杂着漫骂。用他的话来说,戴高乐将军5月30日的号召是“共和国总统发出的杀人号召”;典型的大学教师是那位“做了一篇博士论文并一辈子在背诵它的先生”。我们将会看到,这位被萨特提到的先生,理所当然地是指雷蒙·阿隆。当然,这些话应该被放到1968年5月全法国群情激奋的背景下来看,但是,让-保尔·萨特认为,其中有些话非常合适,很能反映他的思想,后来他把这些话不加任何改动地收入了1972年出版的《境地》第8卷当中。[113]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文章当时并不仅仅被刊登在范围狭小的思想刊物上,其中的几篇是由《新观察家》杂志在危机时刻发表的。

在这些文章中,萨特把漫骂的矛头直接指向他过去的“小朋友”,因为他的主要文章题为《雷蒙·阿隆的巴士底狱》。[114]这篇文章指名道姓地对阿隆进行了残酷的抨击,萨特特别在文中写道:“目见衰老的阿隆喋喋不休地向他的学生们重复着他在“二战”爆发前就完成的博士论文的观点,而那些听他讲课的人却不能对他作丝毫的批评和约束,这时,他的确在对学生们施加着影响,但这种影响的基础绝不是和他的名声相符的学识。”同时,萨特还说了一句题外话:“这意味着人们不再认为,像阿隆那样独自坐在写字台后苦思冥想——而且思想的内容30年来一成不

变——的做法是一种思想练习。"当然,要是不把这句话放到1968年5月那个在根本上有争议的背景下来看,那么这种做法同样是不诚实的。此外,萨特明确说明了他的思想:"这尤其意味着每个教师都要接受学生的评判和异议,他还必须对自己说:'他们看到的是赤裸裸的我。'这对于教师来说很难堪,但要是他想重新无愧于教师的称号,就必须经历这一阶段。"多年以来,特别是在他就《福楼拜》一书进行沉思的60年代末,萨特不也是坐在写字台后面完成他的"思想练习"的吗?

不管怎样,在萨特眼里,雷蒙·阿隆或许很早就被剥去了外衣,因为他总结说:"既然现在所有法国人都看到了一个赤裸裸的戴高乐,那么就必须让学生们也能够看到一个赤裸裸的雷蒙·阿隆。只有当他接受了人们的异议之后,我们才会把衣服还给他。"如果我们阅读了雷蒙·阿隆的《回忆录》,就会发现,20年的争论已经使他和萨特产生了隔阂,而这篇文章,以及——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1968年5月发生的那些事件,就像是一阵刺痛,重新激起了他们两人在去世前的敌意,尽管这种敌意与其说是感情上的,不如说是意识形态上的。归根到底,"刺痛"一词的含义十分广泛,因为萨特的抨击非常坚决,阿隆因此受到了深刻而持久的创伤。

早在五月危机爆发前几个月,阿隆就已离开巴黎大学,去高等研究实践学校的第六处担任教务处长了。几乎是在五月事件发生的同时,他在《无双的革命——关于五月事件的思考》一书中,对该事件作了分析,当然,这些分析和萨特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阿隆通过这一事件,证实了"现代秩序的脆弱性"[115],在他看来,这是十分令人担忧的;相反,萨特则在《雷蒙·阿隆的巴士底狱》中,把五月事件看成是"另一种秩序的希望"[116]。特别是《无双的革命》将5月的震荡说成是没有结果的事件。从政治角

度来看，1968年5月的风暴的确没有引起一场革命。相反，由于在6月23日和30日两天里，有294名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成员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因此，曾经为1967年3月立法选举的脆弱结果所动摇的第五共和国，从此有了一个绝对的多数派，因而也有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无双议会”[117]。所以，我们应该在其他领域里寻找五月风暴的结果，而不同的观察家对结果的理解也有所不同。有些人认为1968年5月的风暴只是一个次要现象，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一次深层的震撼，使人们意识到了法国社会的缺陷。五月事件过去后两年，让·图夏尔在《法国政治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归纳出十几种对该事件的假设，有人说它是一场颠覆政府的阴谋，有人说它是一场文化的危机，还有人则说它是高等教育的危机、年轻人的冲动、传统或新型的社会冲突或者是环境引起的连锁反应。

阿兰·士莱纳在《空想共产主义》一书中断言，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将会出现新型的社会斗争；接着，斯坦利·霍夫曼也在他的《法国漫笔》里说，这种新型的社会斗争是“对法国专制制度的反抗”。与此同时，雷蒙·阿隆非常及时地在《无双的革命》中指出，五月事件是一出“心理剧”，换言之，是一场模仿性质的革命。这一分析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引起过争论。因为，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这等于把那场危机说成是没有结果的事件。另外，人们之所以经常对阿隆的分析提出异议，还因为它抹杀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1968年的春天没有发生开天辟地的事件，但它至少起了启示者和催化剂的作用。人们对工业和城市文明的价值达到了一致，这使社会得到富裕，而且在表面上更加巩固。在这样的社会里，1968年的春天不仅揭示而且加速了一种变化，这种变化正在发生，但在此之前，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人们的异议不无道理，特别是它所反对的，是未来——

也就是两年后——法兰西学院现代文明社会学的教授。

的确,阿隆在书中所说的那些话,实质上应该被放到政治的层面上来理解。但是,恰恰是在这个层面上,由于他的分析完成于运动发生的同时,因此也许并没有充分反映出五月风暴在意识形态方面相互矛盾——即既是马列主义又是自由主义——的特点。因为1968年5月的事件,向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对理解后十年的历史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对于法国知识分子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复杂关系来说,1968年的春天,是这种意识形态在人们经历了对东欧特别是对1956年的失望后重新反弹的跳板,还是它垂死的断头台?表面上看,在五月风暴过后的一段时间里,苏联的社会主义继续渗透在知识分子的词汇中,似乎很好地利用了这块跳板。但此后十年的历史表明,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在当时法国社会所经历的行为和思想的变化中,1968年五月事件的"自由主义"特点所产生的影响,比苏联的社会主义特点的影响要大得多。

面对这矛盾的两方面特点,萨特游刃有余,何况,上述矛盾的任何一方面即使不完全同这位哲学家相符合,至少也在感情和意识形态上和他相对比较接近。这一点清楚地反映在5月20日当萨特来到被占领的巴黎大学的大梯形教室的时候。[118]在"文化讨论办公室"张贴的海报上,除了萨特,还有科斯达·阿克塞罗、皮埃尔·布尔迪厄和玛格丽特·杜拉斯等人的名字。[119]同样是在这个5月的下半个月,阿拉贡在圣-米歇尔大街遭到了达尼埃尔·科恩-本蒂毫不客气的质问,而与此同时,见面会的记录证明,萨特的发言受到了人们的聆听和鼓掌。尤其是他最后所说的那席话:"现在我要离开大家了,因为我开始觉得有点累。如果继续回答你们的问题,我就会说出蠢话来。所以,我最好还是走(喧哗)。不过在走之前,我要强调一下你们曾经组织过的

并且将要在作家和学生之间继续下去的辩论的新颖之处。这次辩论只是第一次，今后你们爱作多少辩论，就会有多少辩论。再见（鼓掌）。"[120]

当然，这次见面会是以当时正在蓬勃开展的社会运动为背景的，我们不应夸大它的重要性。比如，在以后的几天里，没有一份北加来海峡省的地方性日报对萨特出现在被占领的巴黎大学作任何报道。[121]不过，学生们对萨特的喝彩至少反映了两点。一方面，这位哲学家被重新捧为神明。从1965年起，他就被拉加尔德和米夏尔收入了《关于20世纪的教科书》当中，[122]并且——尽管是违心地——在生前就被冠以永垂不朽的称号，由于他是神明，因此他的讲话得到了人们必恭必敬的聆听。不管这一点有多么平庸，它都非常关键。萨特影响了新一代年轻人，从而进一步确立了他在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历史中空前绝后的地位，也就是说，他是一位跨越了几代人的知识分子。就这样，接连几代年轻的知识分子受到了他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来自于一部作品——因为在这方面，情况并无与众不同之处，要接受一种思想，理所当然地必须花好几十年的时间——同样也来自于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统帅象征的人物。归根到底，不管萨特是否愿意这样，这并不重要。惟一重要的是事实，以及造成这一事实的复杂关系。

同时，这种把萨特神圣化的现象是和知识分子历史中的某一阶段相符的，而萨特正是这一阶段的"化身"。如果说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的造反运动是以声音比如《抗议歌》和图像比如电视以及对越南战争的报道为背景的话，那么在法国，1968年5月的事件，至少在大学生这一方面，受到了巴黎大学和知识分子的影响。于是，学生们对法律的违背和反抗，被象征性地体现在为萨特鼓掌、对阿隆轻视以及对阿拉贡喝倒彩等方面，这一

切都发生在巴黎大学及其周围的学校。这样，一方面，在大西洋彼岸，B-52轰炸机和鲍勃·迪伦[123]效应大大超过了哥伦比亚大学和贝克莱大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旧大陆，巴黎大学遭到占领，这所学校被提到了和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布特列罗夫工厂[124]相同的地位，同时，人们在对萨特喝彩，他被认为有义务向人们指出声援左派工人运动的方法。

此外，我们必须看到，当时的社会已经完全被图像和声音所控制。《街垒之夜》是在电台广播之后才被赋予深刻的历史含义的，而戴高乐将军的演讲也是在5月30日的电台广播之后才引发了危机。爆炸和结局一样，之所以能作为事件得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有引起反响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萨特在巴黎大学的梯形教室里得到的掌声是徒劳的，因为他已经被历史所超越。在战后沸腾的日子里，他的知名度来自于他的著作及其所依赖的物质环境。他的哲学作品由于他的长、短篇小说，特别是他的戏剧，以及一本很快就享有盛名的杂志，而得到普及。1970年，萨特在雷诺汽车厂的雇员们面前作了一次演讲，当时，他还是出版界的一分子。甚至连他当时手里拿着的话筒，似乎也只是他的著作《人民的事业》的简单附属品。相反，1969年，在互助会[125]的一次集会上，他却听到了对他大不恭敬的口号，这些口号出自年轻的政治活动积极分子之口："萨特，别罗嗦！"他曾利用其他互助会集会的机会，长时间地阐述了他的分析以及他支持或反对某种观点的理由；而在那些年轻的政治活动积极分子中间，有些人早已成了像安迪·瓦霍尔[126]这样的明星，进入了麦克鲁汉[127]的时代。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在新世纪的第一大冲突——越南战争期间，完成了他们政治学徒的阶段的。

在越南的影响下

让-保尔·萨特很快就站到了反对越南战争的斗争前列。越南战争真正开始于1965年的头几个月，更确切地说，那场战争是在那时改变了规模。2月7日，美军空军开始对北越实施空中打击，春天，海军陆战队开始在岘港登陆。2月24日，《世界报》刊登了第一篇重要宣言，谴责了美国的"军事干涉"。让-保尔·萨特在该宣言上签了字，也在同年5月27日的一份宣言上签了字，后者号召"至少在西欧范围内"成立一个反对美国越南政策的运动。在这次斗争中，萨特又一次和罗朗·施瓦兹、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泰奥多尔·莫诺[128]、让-皮埃尔·韦尔南[129]、莫尔万-勒贝斯克[130]、罗杰·加洛蒂、阿兰·雷奈[131]、爱德华·皮尼翁[132]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等人站到了一起。次年春天，互助会于1966年5月26日举行了"声援越南的六小时"活动，活动开始之前，发出了一个号召，谴责"美国对越南的占领"，支持"南越人民在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所进行的争取独立的斗争"。萨特又一次在号召上签了名，和他一起签名的还有弗拉基米尔·扬凯莱维奇、欧内斯特·拉布鲁斯[133]、玛德莱娜·勒贝里欧[134]、保尔·利克尔[135]、罗朗·施瓦兹和皮埃尔·维达尔-纳盖等。

与此同时，萨特还是审判战争罪行的罗素法庭成员。他负责起草了法庭判决书，该判决谴责了美国在越南犯下的战争罪行，得出结论说美国在越南有意识地进行着屠杀，并作出了美国犯有"种族灭绝"罪的判决。[136]这一判决的基础是一种把美国妖魔化的观点："越南的胜利将会证明，人是可以反抗'物'的，也就是说，是可以反抗物质利益及受其奴役的人的"，"越南人民是在为全人类而斗争，而美国军队则是在反对人类"。[137]且不谈上述结论不符合时代的地方，但它们有两点是值得人们注意的。第

一点，当然是萨特的这些话在十几年后，当幻想破灭和"孤儿时代"来临时，显得分量很重。因此，人们对暮年的萨特在1979年为越南船民所进行的斗争褒贬不一。有的人认为这是他毕生坚持正义、反对压迫的斗争的延续，有的人则认为这种斗争带有矛盾的性质，因为现在看来，船民的存在与越南人民曾经"为全人类"而斗争的事实是背道而驰的。

更深刻地说，由于使用"种族灭绝"这个词的人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为著名的知识分子，因此，在刚刚获得解放20年后的法国，这个词的含义会不会受到削弱并失去一部分力量呢？关于这一点，我们也许有必要追溯到几年前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早在那时候，就已经有一些知识分子在用这个词了。比如，在《不屈服的权利("121人团体"资料)》的《编者按》中，弗朗索瓦·马斯佩罗[138]写道："六年来，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坚持不懈地——尽管不是成功地——进行着有步骤的种族灭绝行动。"[139]同年，萨特在他为弗朗兹·法农的著作《全世界受苦的人》所作的序言中指出："那些不参加暴力行动的人看上去不错，他们既不是受害者，也不是刽子手！得了吧！如果你们不是受害者，那么当你们投票选举的政府和你们年轻兄弟服役的军队在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进行着'种族灭绝'的时候，你们毋庸置疑就是刽子手。"[140]尽管我们可以找到使用这个词的先例，但由于萨特和罗素法庭的郑重推出，这个词的使用得到了认可，并反复出现。比如，在1966年5月14日《世界报》刊登的一份呼吁书中，70名知识分子强调："越南人民是名副其实的种族灭绝的受害者。"再如，1972年，在美国恢复对北越轰炸之后，7月28日的《世界报》指出，"650名法国研究人员和大学教师"给"美国的大学教师们"寄去了"一封信"，信中特别提出一个问题："当一场战争具体体现为对三个民族的种族灭绝时，它怎么还会是正义的呢？"

尽管如此，萨特自己后来还是唱起了老调。1973 年 1 月 20 日，在前一年 11 月竞选连任的理查德·尼克松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在同一天的《世界报》——即 1 月 21—22 日的那一期——上，发表了一份由几年前罗素法庭的主持者们签名的声明，这些人是让－保尔·萨特、弗拉基米尔·德迪杰尔和罗朗·施瓦兹。他们声称："鉴于无法立刻召集法庭的全部成员，所以由我们这几个签名者来对美国总统提出诉讼。"他们的判决也很坚定："总之，我们控告理查德·尼克松是一名战争罪犯，他犯有和纳粹领导人同样性质的罪行，应该和他们一样受到纽伦堡法庭的审判。"当然，我们必须把这些话放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来看。几个星期前，也就是 1972 年 12 月，美国对北越的大规模轰炸激起了人们的愤慨。但尽管如此，说这些话的人是那些在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和种族灭绝的说法一样，"为全人类而斗争"的说法也曾多次引起反响，并传播开来，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被罗素法庭的分析所遇到的共鸣所替代。比如，"印度支那团结阵线"在 1971 年 4 月 23 日的《世界报》上发表了他们的成立公告，公告特别声明："今天，全世界人民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印度支那战场。"早在 1968 年 3 月 23 日，让－保尔·萨特等知识分子就倡议组织了一个"知识分子声援越南日"，要求全世界知识分子"胜利地迎接这个对人类文化价值的挑战"。我们将会注意到，在这里，伴随着捍卫文化这一主题而重新显现的，是 20 世纪 30 年代尤其是西班牙内战期间反法西斯斗争的主题。这种看法并非无关紧要，因为——我们以后还会提到——在越南战争的影响下，整整一代人都觉得自己重新面临着和 30 年前西班牙内战期间内容相同的参与行动。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从 70 年代末开始，有些人要萨特一个

人承担政治参与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引起的后果,这是不大公正的,何况,这种政治参与涉及到广大的法国知识界,并且是好几代知识分子。不过,我们将会看到,萨特的确是开始于60年代末的巨大形势转变的主要受害者,特别是在他去世以后。这种形势转变的广泛性,以及它在某些人身上的具体体现,只有被放到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才有意义。短时间来看,萨特在表明立场的同时,正在使自己陷入一种矛盾,这种矛盾概括在他的一项声明中,后者发表于金边和西贡陷落几天之后,这两大城市的陷落,标志着在印度支那半岛持续了30年之久的战争宣告结束。事实上,他是这样在1975年5月10日的《世界报》上归纳当时的形势的:"我希望越南的共产主义有一个崭新的面貌,这和他们有关。我们怀着某种希望等待着,因为越南人民是出色的战士,而这些战士同时也是一些可爱的人。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总是难以相信他们会如此勇武。"对于一场正在结束的战争而言,上述话语有点令人哭笑不得。特别是四年之后,萨特又在为保护越南船民的利益而斗争了。当然,这两件事放到一起,可能会被看成是一场论战的缩影,但我们必须把它们放到一起,因为这篇发表于1975年5月的文章确实包含着一对矛盾,这对矛盾很快就变成了令那些最为清醒的人都感到苦恼的悔恨。思考之后,我们会觉得这篇文章很奇怪,当亚洲的一个地区投入共产主义势力范围的怀抱时,并非共产党人的萨特却在宣布他的"希望"。如果欧洲国家也有这一天的话,他会怎么办呢?某些知识分子先是在关于越南的文章上签名,短短几年后,他们又在捍卫团结工会和波兰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身上难道不存在着一种矛盾吗?

的确,1980年夏天的波兰事件开始时,萨特已经去世几个月了。但对于他和其他人而言,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因为

它把越南战争期间知识分子的参与活动置于一个更为广泛的政治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奥利维埃·托德在1987年以自我批评的方式所作的评论："如果要对埃德加·莫兰的话作解释，那么说到底，我曾经为在西贡建立的社会制度斗争过，而这种社会制度后来却在布拉格和布达佩斯遭到了我们的谴责。"[141]知识分子们所犯的主要过失非常明显，他们既是盲从者，又是同谋者。由于这两个词很可能带有主观色彩，因此笔者在使用它们时非常谨慎，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注意到，正如前面说过的那样，与其说当时那些带有萨特签名的文章是一种深刻的分析，不如说是一种漫骂。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到时间紧迫的因素。那些文章大多都是和形势紧密相关、取决于当时所发生的事件并以复杂的相互关系为基础的。但这也意味着我们从此承认，知识分子判断是非的义务——哪怕是简单而大概的是非标准——已经让位于政治参与这一惟一的义务了。就其本身而言，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是严谨的，甚至是崇高的，但在本质上，它同样又是片面的，更何况在萨特的笔下，它既带有浓厚的感情蕴涵，又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它既是大卫[142]和歌利亚[143]之间的战斗，同时又是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此外，这种态度几乎还包含着一种救世主的意味，从《全世界受苦的人》的序言开始，我们可以在萨特的许多文章里体会到这种意味。第三世界在成为胜利者的同时，还是资本主义世界所有罪恶的赎救者。

我们必须注意，不要忘记把知识分子的这种参与行动放到它的政治和感情背景之中。从政治上看，在法国，反对美国在越南进行战争的思想根深蒂固，更何况当时的两大政治力量——戴高乐党和共产党——都在谴责美国的军事干涉。除此之外，宣传媒体也加剧了群众的激奋。这不是因为当时的各大新闻渠

道故意歪曲了它们和越南战争的关系。相反,它们是凭着良心在完成它们的工作的,但是,它们所展示的,只是别人给它们看的东西,也就是说,是美国人的战争。由于这种对战争的展示是单方面的,所以这场战争震撼了人们的思想,触及了人们的情感,激起了人们的良知。“B-52效应”得到了充分的发挥,1967—1972年,共有700万吨炸弹被倾泻在印度支那半岛上,这等于是“二战”期间盟军投弹总量的2.5倍!在此之前,B-52轰炸机一直被人们看做是夺取战略制空权的工具和捍卫“自由世界”的保障,但现在,它却成了一个大国镇压一个弱小民族的象征。[144]

当然,这种“B-52效应”有其特殊的背景,那就是在60年代的法国,电视的力量与日俱增。这种活动的画面所产生的全新影响,很快取代了报刊照片的统治地位,并在新一代觉醒的过程中发生了作用,一下子把他们完全淹没于其中。事实上,在人口激增时期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年轻人,是“第一代每天从大量的画面和声音当中切实感受到整个世界的人”[145]。此外,对于他们来说,“B-52效应”又和“切[146]效应”合而为一。在这个第三世界革命模范不断涌现的十年里,“切”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世俗圣人的化身,他和身着黑色宽松长裤的越共游击队员一样,被视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象征。

知道了这样的背景,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在60年代,萨特和阿隆之间的对立会进一步升级,并且会在1968年达到顶峰。当时,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政治上,他们两人每时每刻都是相互对立的。我们看到,越南战争期间,萨特的分析和语气又一次变得强硬起来。因此,在1965年,他拒绝了一些美国大学教师向他提出的访问康奈尔大学的邀请,并且解释说如果不这样做,他就会被第三世界认为是去访问“敌人”。[147]其实,萨特

的愤怒只是单方面的，因为在他看来，对立的双方一个是“极端工业化的国家”，一个是“贫困潦倒、走投无路、不得不在他们中间实行铁的纪律的农民”。[148]出于这种分析，萨特只能和康奈尔大学或其他学校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大学教师们保持距离。更何况我们早就看到，他对公开敌视自由民主的运动有着某种吸引力。因此，在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的初期，《现代》杂志刊登了一些有关黑人革命者——包括那些主张武装斗争的人——的文章。萨特这方面的消息来源于约翰·热拉希，后者是他一对朋友夫妻的儿子，也是一个名为“气象员”的地下组织的积极分子。我们可以对萨特在评价这些小团体的重要性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疑问，因为这个角色有损于美国的新兴左派和非暴力的潮流。[149]在越南战争期间，萨特确实对这种潮流的影响产生过怀疑。

雷蒙·阿隆的立场一开始就完全不同，他公开拒绝充当“普遍观点的表达者”[150]，因为他对分析的渴望又一次战胜了情感的表露。归根结底，虽然他感到自己当时“左右为难”[151]，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在道德范畴之外来分析这场冲突，它几乎持续了十年，并且成了当时国际关系的中心。此外，不管怎样，这也把阿隆的分析纳入了政治参与的远景。再说，他本人甚至在战争结束前，就在《帝国主义的共和国》一书中对此作了默认，并且在《回忆录》中公开重提此事：“在1965年或1968年，存在着一个南越共和国，对我来说，它似乎比北方的专制制度更加可取。”[152]

不过，总而言之，阿隆的这种态度完全和他30年代初在德国所追求的“参与政治的观众”的身份相符合。他的分析在三个层次上展开。自从《大分裂》一书出版之后，阿隆的两面性逐渐显现。而上述三个分析层次可以灵活地调节评论和分析在这两面性当中所占的比例。关于另一次危机，即越南战争爆发前几

年的古巴危机,有人清楚地阐明了“知识分子的习惯做法”[153],也就是阿隆所进行的三个层次的思考。第一个层次的思考开始于危机发生的同时,它们经常被刊登在《费加罗报》上,接着,他对自己的思考作了初步的梳理,发表在那些更加通俗、以受过教育的读者为对象的著作上——这里指的是1963年底,即危机结束后一年出版的《大辩论》,以及十年后、也就是1973年出版的《帝国主义的共和国》两本书。上述所有的著作,都是以他在事件发生前后所从事的理论工作为基础的,这些理论著作当然是《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或是《想像战争,克劳塞维茨[154]》。古巴危机时期还证明,阿隆对正在发生的历史的分析,远远不是出自于先前制定好的、一成不变的模式,相反,他的分析时时刻刻以不断发展的历史为养料。因此,古巴危机过后,雷蒙·阿隆有关地缘战略的一些观点也不可否认地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涉及到一些主要的问题。[155]鉴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仔细分析阿隆在《费加罗报》上发表的许多关于越南战争的文章。和大多数观察家一样,[156]阿隆是在1965年末才开始对越南战争作不懈的关注的,比如,他在1965年3月20—21日的《费加罗报》上,发表了一篇有关越战的文章——《轰炸机对游击队》,并且很快指出了这场战争有多么“悲哀和荒诞”[157]。从此,他开始持续地关注这场战争。从1965年冬末到1968年4月,他写了大约十五篇关于战争的文章,1968年4月以后又写了三十多篇。[158]因为,虽然此时美国人已经宣布不再介入战争,但战争还在继续,直到1975年1月17日,阿隆还在《费加罗报》上的一篇文章里思考越南问题和那些“没完没了的战争”。

尽管他争开始之初,阿隆刚刚在1963年被选为道德和政治研究院院士,而萨特则在几个月后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但相对于当时公众激昂的情绪而言,阿隆的立场即使不是孤立的,至少

也是无足轻重的。相反，萨特却融入了这种激昂的情绪，而罗素法庭则给了上述情绪一种形式和意义。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尽管萨特的立场非常真诚，但它却没有任何令人不快之处。何况我们已经看到，从政治上说，这一立场和当时两大主要政治势力——即共产党和戴高乐党——的立场并不相悖。形势对萨特很有利，再说在客观上"越南效应"使萨特成了60年代后半期在极左思想的启蒙下觉醒的一代政治新人的参照——至少是部分的参照。

另一方面，对阿隆不利的因素却与日俱增。人们——至少是那些没有仔细阅读过他的著作的人——觉得他祝福的是那些美国轰炸机的飞行员；他似乎在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情感大唱反调，因此，他这种无足轻重的立场得不到政治斗争先锋们的尊敬；相反，后者当时把他看成是旧势力的卫士。换句话说，"B－52效应"和"切效应"使阿隆本人及其形象变得模糊不清，而与此同时，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生前就似乎已经名垂千古的萨特却成了一名反叛者。

总之，在越南问题上，对萨特和阿隆两人立场的比较，远远超出了趣味性的范围，对我们来说，这种比较非常重要。因为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法国知识界的辩论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围绕着越南战争进行的。此外，当时，一代新人就是在这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完成他们的政治觉醒的。越南战争所占据的这一中心地位，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政治参与的频繁性，更是成了衡量70年代后半期人们反应程度的依据。何况，当时有一些词语——如种族灭绝、抵抗运动、解放，等等——的含义被淡化了，这迫使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归根到底，既然在受到大家听从并且影响不断扩大的知识界，知识分子打着理解的名义来看待他们的行动，那么反过来，广大人民难道不要求知识分子即

使不能合理地——这是一个主观的概念——使用一些用以反映复杂形势的词语,至少要在经过思考之后使用它们吗?词语和事实的背离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愈加明显,这种情况在70年代末难道不进一步加剧了知识分子的危机吗?

这个问题十分关键,因为在70年代末,历史很少这样迅速地对一代人的主要参与活动作出谴责。因此,当1939年以后支持西班牙共和国的斗争成为所有左派知识分子记忆中的一大亮点时,有关越南战争的斗争却很快遭到了人们的遗忘,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然而,追忆这段往事,对于理解1975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是非常必要的,当时,法国整个知识界无可置疑地发生了一次危机。从此,由于萨特急于参与政治,也由于他那种继承于战后两大阵营十几年激烈斗争的非善即恶的守旧观点,他在分析问题和公开表明看法时表现出某种自觉的特点,当人们对他提出质疑时,他根本没有还手之力。此外,由于疾病的困扰,在70年代后半期,他只是在继续走自己走过的道路,比如在关于西德极左恐怖主义的问题上。和他相反,阿隆则将成为"孤儿时代"的主要受益者。

注:

1 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普吕里尔出版社(Pluriel),1991年,第66页。

2 《现代》杂志,第101期,1954年4月,第1731—1819页。

3 《法兰西文学报》,1953年1月1—8日。

4 《卡纳帕行动》(*Opération Kanapa*),摘自《现代》杂志,第100期,1954年3月,第1723—1728页。

5 《这些先生和矿工们》(*Ces messieurs et les mineurs*),摘自《法兰西文学报》,1948年11月4日。

6 《保卫和平》(*Défense de la paix*),第38期,1954年7月,第18—22页。

7 另参阅几年后西蒙娜·德·波伏娃在《事物的力量》一书中对此所作的回忆,

出处见前文,第 327—329 页。

8　阿尔弗雷德·索韦(Alfred Sauvy),1898—1990,法国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译者注。

9　《谁是共处的敌人?(第 3 卷)——从所谓苏联繁荣的威胁谈起》(*Qui sont les ennemis de la coexistence? III. De la prétendue menace de la prospérité soviétique*),摘自《费加罗报》,1954 年 11 月 8 日。

10　该文刊登在《现代》杂志 1956 年 2 月号上(第 1153 页及以后多处),后又被收入《境地》第 7 卷,伽利玛出版社,1965 年。

11　安德烈·封丹纳(André Fontaine),1921—　,法国记者,曾任《世界报》主编。——译者注。

12　《快报》,第 281 期,1956 年 11 月 9 日,第 13—16 页。

13　参阅尼古拉·巴弗莱兹,《雷蒙·阿隆》,出处见前文,第十章,《从巴黎大学到法兰西学院》。

14　这门由三部分组成的课程于 1955—1958 年被讲授,在它的基础上诞生了《思想》丛书的三部"经典之作":《工业社会 18 讲》(*Dix - Huit Leçons sur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1962 年)、《阶级斗争》(*La Lutte des classes*)(1964 年)和《民主和专制》(*Démocratie et totalitarisme*)(1965 年)。

15　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Salvador de Madariaga),1886—1978,西班牙外交官、作家,反佛朗哥独裁的斗士。——译者注。

16　雅克·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1882—1973,法国哲学家。——译者注。

17　马内·斯佩尔贝(Manès Sperber),1905—1984,法国小说家、评论家,原籍奥地利,1933 年定居法国,并开始用法语写作。——译者注。

18　维尔高尔(原名让·布吕莱)[Vercors(Jean Bruller, dit)],1902—1991,法国小说家、评论家。——译者注。

19　维尔高尔,《向法共告别》(*P. P. C.*),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57 年,第 31、37、47 和 289 页。

20　乔治·絮费尔(Georges Suffert),1927—　,法国记者。——译者注。

21　罗杰·斯吉法尼(Roger Stéphane),1919—1994,法国作家、记者。——译者注。

22　1815 年滑铁卢战役之后,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签定神圣同盟,共同镇压欧洲人民的自由和民族主义运动。——译者注。

23　指 1871 年巴黎公社时跟随梯也尔政府逃到凡尔赛并对公社进行血腥镇压

的法国军队。——译者注。

24 《境地》第4卷,1964年,第104页。

25 比如在《世界报》的一些专栏上,莫里斯·杜韦尔热就是这样一位强硬态度的赞同者(参阅他发表于8月2日和9月5日的分析)。

26 《快报》,第281期,1956年11月9日,第13—16版。

27 参阅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知识分子与法兰西激情——20世纪的声明和请愿书》的第八章,《1956年的秋天》,出处见前文。

28 马塞尔·塞尔万(Marcel Servin),1922— ,法国政治家,共产党人。——译者注。

29 瓦尔德·罗歇(Waldeck Rochet),1905—1983,法国政治家,曾担任过法国共产党总书记。——译者注。

30 布兰科·拉齐奇(Branko Lazitch),《赫鲁晓夫报告及其历史》(*Le Rapport Khrouchtchev et son histoire*),勒瑟伊出版社,1976年,第35页。

31 弗朗索瓦·费莱,《法国左派进入了战后时期》(*La gauche française entre dans l'après-guerre*),摘自《研究法国知识分子历史的材料(1953—1987)》(*Matériaux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intellectuelle de la France, 1953-1987*),见《辩论》杂志(*Le Débat*),第50期,1988年5—8月,第20页。

32 米歇尔·克鲁泽(Michel Crouzet),《法国知识分子的战斗》(*La bataille des intellectuels français*),摘自《正殿》(*La Nef*),第12—13册,1962年10月—1963年1月,第47—65页,引文见第51页。

33 让-皮埃尔·里乌和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主编),《阿尔及利亚战争和法国知识分子》(*La Guerre d'Algérie et les intellectuels français*),布鲁塞尔,康柏莱刻斯出版社(Complexe),1991年。

34 参阅马丽-克里斯蒂娜·格朗戎(Marie-Christine Granjon)的珍贵研究,摘自《阿尔及利亚战争和法国知识分子》,出处见前文。另有两篇出色的硕士论文:卡里亚那·科(Kaliane Khan),《让-保尔·萨特和阿尔及利亚战争》(*Jean-Paul Sartre et la guerre d'Algérie*),里尔第三大学,1991年;伊莎贝尔·瓦娜韦尔贝克(Isabelle Wanaverbecq),《雷蒙·阿隆和阿尔及利亚战争》(*Raymond Aron et la guerre d'Algérie*),同上。

35 费拉加,阿拉伯语"拦路强盗"的音译,法国殖民主义者以此来诬称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反抗殖民统治的武装部队。——译者注。

36 上述文章分别发表于1955年1月13日和15日。

37 埃德加·莫兰,《自我批评》(*Autocritique*),朱里亚出版社,1959年,第3版,勒

瑟伊出版社,1975年,第187页。

38　让·罗斯唐(Jean Rostand),1894—1977,法国评论家、生物学家、科学读物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译者注。

39　雅克·马多尔(Jacques Madaule),1898—1993,法国评论家、历史学家。——译者注。

40　皮埃尔教士(l'Abbé Pierre),原名亨利·格鲁埃·皮埃尔(Henri Grouès Pierre),1912—　,法国人,天主教教士,因其帮助穷困者的行为而著名,是一个国际性互助运动的发起者。——译者注。

41　让-路易·巴罗(Jean-Louis Barrault),1910—1994,法国电影和戏剧演员,最重要的现代话剧导演之一。——译者注

42　《世界报》,1956年1月29—30日,第3版。

43　让-保尔·萨特,《境地》第5卷,伽利玛出版社,1964年,第42页(这份发言最早刊登在1956年3月和4月的《现代》杂志上)。

44　米歇尔·德勃雷(Michel Debré),1912—1996,法国政治家。"二战"期间是抵抗运动成员,戴高乐将军坚定的追随者。曾在第五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中起过重要作用。在担任政府总理期间,致力于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后历任经济与财政部长、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职。法兰西学院院士。——译者注。

45　安德烈·菲利普(André Philip),1902—1970,法国政治家。曾是第三国际法国分部和法国社会党成员。"二战"期间参加抵抗运动,领导地下报纸《解放报》的工作,后流亡伦敦。战后历任法国驻阿尔及利亚政府内政部专员、法国政府经济部长和金融部长等职。——译者注。

46　《阿尔及利亚悲剧》,第36、25和20页。

47　雅克·苏斯泰尔,《阿尔及利亚的悲剧和法国的衰落——答雷蒙·阿隆》(*Le Drame algérien et la décadence française. Réponse à Raymond Aron*),普隆出版社,1957年,第15页。雅克·苏斯泰尔还把辩论放到了一个他和他的对话者——他们两人都获得了哲学教师资格——都不得不展开争论的层面上。更何况,他知道如何把矛头直接指向关键的问题:"阿隆先生完全赞同他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所谴责的东西。这回轮到他在神圣的历史必然面前卑躬屈膝了。"(同上,第14页)

48　雷蒙·阿隆,《阿尔及利亚和共和国》(*L'Algérie et la République*),普隆出版社,1958年,第8页。

49　米歇尔·维诺克,《阿尔及利亚悲剧》,摘自《评论》杂志(*Commentaire*),第28—29期,1985年2月,第269—273页,引文见第270页。

50 雅克·苏斯泰尔,《阿尔及利亚的悲剧和法国的衰落——答雷蒙·阿隆》,第4页。

51 路易·泰尔诺瓦(Louis Terrenoire),法国政治家,曾先后担任泛欧联盟法国委员会主席和右派政党新共和联盟的总书记。——译者注。

52 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1883—1945,法国政治家,"二战"前历任总理、外交部长等职。1940年法国投降德国之后,先后任维希政府副总理和总理,积极推行同纳粹德国合作的政策。战后以叛国罪被处决。——译者注。

53 让·达尼埃尔,《阿尔及利亚假期》(*Des vacances algériennes*),摘自《快报》,1957年6月21日。

54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新的统治》(*Le nouveau règne*),同上。

55 《阿尔及利亚和共和国》,第107页。

56 同上,第65—66页。后来,阿隆承认这些关于加缪的文字"语气有点傲慢",他为自己曾经"令人不快"感到遗憾(见《回忆录》,出处见前文,第321页,及《参与政治的观众》,出处见前文,第179页)。关于加缪与阿隆的关系,读者可参阅阿丽安娜·谢贝尔·德·阿波罗尼亚博士论文的有关章节,其中的描述非常细致和恰当,博士论文出处见前文,第497—504页。

57 1984年8月对安妮·科昂-索拉尔所作的回忆,见《让-保尔·萨特和阿尔及利亚战争》(*Jean-Paul Sartre et la guerre d'Algérie*),出处见前书,第563页。

58 关于这一点,参阅卡里亚那·科的有关论述,出处见前文。

59 让-马利·勒·庞(Jean-Marie Le Pen),1928— ,法国政治家,曾作为伞兵参加过阿尔及利亚战争,自1972年起成为法国极右组织"国民阵线"的领导人,并多次参加法国总统竞选。——译者注。

60 布热德运动,即1954年由皮埃尔·布热德(Pierre Poujade,1920— ,原是一名文具商人)创立的所谓"保障小商人和手工业者联盟",后该联盟演变成一个右派政党,名为"法国团结与博爱",并在1956年的法国立法选举中获得11.54%的票数。——译者注。

61 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布热德运动》(*Le Mouvement Poujade*),科兰出版社,1956年,第184页;另参阅约瑟夫·洛里昂(Joseph Lorien)、卡尔·克里顿(Karl Kriton)、塞日·杜蒙(Serge Dumont),《勒·庞体系》(*Le Système Le Pen*),安特卫普,EPO出版社,1985年,第38页。

62 "行李工",是指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力量"民族解放阵线"的法国知识分子。——译者注。

63　"121人"运动,是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法国左派知识分子争取拒绝应征入伍的运动。——译者注。

64　《政治上的1960年》(*L' Année politique 1960*),法国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97页。在上述示威者中,有让－马利·勒·庞和巴黎市议会的一些议员。

65　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1889—1973,法国散文家、哲学家、剧作家、音乐和戏剧评论家。——译者注。

66　亨利·马西斯(Henri Massis),1886—1970,法国评论家,法兰西学院院士。——译者注。

67　圣－热内是萨特写于1952年的小说《圣－热内:喜剧演员和殉道者》(*Saint－Genet, comédien et martyr*)的主人公。——译者注。

68　卡西摩多(Quasimodo),维克多·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人物,教堂的敲钟人,长相丑陋畸形,但内心善良、感情丰富。——译者注。

69　居伊·莫莱(Guy Mollet),1905—1975,法国政治家,曾任第二国际法国分部总书记,多次任政府部长,并于1956年2月—1957年5月任政府总理。在任期间遭遇阿尔及利亚战争和苏伊士运河危机等重大事件,1958年极力赞同戴高乐将军的复出,并担任其政府的部长,后成为反对派。——译者注。

70　《世界报》,1953年11月3日。

71　罗贝尔·拉科斯特(Robert Lacoste),1898—1989,法国政治家,社会党人,曾被任命为阿尔及利亚驻外公使。——译者注。

72　《世界报》,1957年7月9日。

73　弗朗西斯·让松(Francis Jeanson),1922—　,法国评论家、文学批评家、小说家。他是萨特的合作者和信徒,是《现代》杂志的主要组织者之一。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他积极参加了所谓"121人"运动,并且组织了一个"让松网络",被称为"行李工"的知识分子们都是该网络的成员。——译者注。

74　安妮·科昂－索拉尔,《萨特》,出处见前文,第542—543页。

75　秘密军组织(Organisation de l'armée secrète,简称OAS),反对戴高乐将军阿尔及利亚政策的政治团体,成立于1961年4月的法国未遂政变之后,多次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本土制造恐怖事件,特别是在1962年3月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伊云协议签署之后。——译者注。

76　1961年11月15日,阿隆在巴黎大学一次反对秘密军组织的阴谋的罢课运动中,发表了一项声明,他在该声明中提到了这封恐吓信(打字资料,摘自雷蒙·阿隆的个人档案,引用者尼古拉·巴弗莱兹,《雷蒙·阿隆》,出处见前文,第366—367页)。

77 雷蒙·阿隆从未赞同过有利于民族解放阵线(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简称FLN,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联盟,成立于1954年,从事与法国的武装斗争。从阿尔及利亚独立到1989年2月,它一直是该国惟一执政的政党。——译者注)的直接参与行动,他的态度与此相距甚远。1960年10月,他在《论据》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背叛》的文章,当时关于《121人宣言》及让松案件的辩论正酣,这两起事件在几星期前吸引了人们的注意。阿隆在文章里公开谴责了亨利·让松的参与行动,并特别叹息说:"那些同民族解放阵线并肩战斗的法国人,就像是背叛了很大"一部分"舆论的叛徒"[《背叛》(*De la trahison*),摘自《论据》,第116期,1960年10月,第12页]。

78 此信落款为"秘密军组织",1962年4月16日在巴黎寄出,收信人为"记者雷蒙·阿隆先生",寄往他的私人住址(引用者伊莎贝尔·瓦娜韦尔贝克,《雷蒙·阿隆和阿尔及利亚战争》,出处见前文,第222—223页)。这不是第一封,我们知道,早在几个月前,雷蒙·阿隆就已经提到过其他的恐吓信。

79 上述声明曾被提及,作于1961年11月15日,巴黎大学。

80 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1925—1961,法国心理学家。——译者注。

81 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全世界受苦的人》(*Les Damnés de la terre*),马斯佩罗出版社,1961年,书中多处。

82 让-保尔·萨特,为弗朗兹·法农的《全世界受苦的人》所作的序,出处见前文,第20页。

83 同上,第23页。

84 同上。

85 同上,第13页。

86 1962年3月,第454—463页,和1962年4月,第634—645页。

87 夏尔-罗贝尔·阿热隆(Charles-Robert Ageron),《面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法国舆论》(*L'opinion française devant la guerre d'Algérie*),摘自《法国海外历史杂志》(*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outre-mer*),第63卷,1976年第二季度,第231期,第256—285页;再次刊登于《阿尔及利亚战争和法国人》(*La Guerre d'Algérie et les Français*),让-皮埃尔·里乌主编,法亚尔出版社,1990年,第25页及以后多处。

88 1961年,一些主张保留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统治权的法国将军们发动了一次未遂政变,企图推翻准备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戴高乐将军。——译者注。

89 1962年1—6月,秘密军组织在法国本土进行了一系列旨在反对戴高乐将军阿尔及利亚政策的恐怖主义活动。2月7日,该组织袭击了安德烈·马尔罗在巴黎近郊的寓所,误伤了后者住在底楼的邻居——一位年仅4岁的女孩德尔菲娜·勒

拿尔，使她惨遭毁容。事件发生后，立刻在全法国范围内爆发了谴责秘密军组织的示威游行。——译者注。

90 《忧郁的热带区》(*Tristes Tropiques*)，莱维－施特劳斯的代表作之一，1955年出版。——译者注。

91 弗朗索瓦·费莱，《法国左派进入了战后时期》，出处见前文，第21页。

92 参阅迪迪埃·埃里邦(Didier Eribon)，《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89年，第188—189页。

93 贝尔纳·潘戈(Bernard Pingaud)，1923— ，法国小说家、评论家。——译者注。

94 "从年轻一代对您的态度上，您是否得到什么普遍的启发？"[《让－保尔·萨特回答》(*Jean – Paul Sartre répond*)，摘自《弓》(*L'Arc*)，第30期，1966年]。

95 罗朗·施瓦兹(Laurent Schwartz)，1915— ，法国数学家。——译者注。

96 阿尔弗雷德·卡斯特莱(Alfred Kastler)，1902—1984，法国物理学家，196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译者注。

97 皮埃尔·维达尔－纳盖(Pierre Vidal – Naquet)，1930— ，法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98 克洛德·鲁瓦(Claude Roy)，1915—1997，法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译者注。

99 达尼埃尔·梅耶(Daniel Mayer)，1909— ，法国左派政治家，曾任人权协会主席。——译者注。

100 根据多米尼克－皮埃尔·拉尔杰(Dominique – Pierre Larger)，《第五共和国时期知名人士的宣言和声明(1958—1969)》[*Les Manifestes et déclarations de personalités sous la Cinquième République (1958 – 1969)*]，政治科学深入研究文凭学位论文，巴黎法学院，1971年。

101 《法兰西晚报》，1960年7月12日。

102 赫伯托·帕迪亚(Heberto Padilla)，1932— ，古巴诗人。——译者注。

103 《一部分法国和外国的知识分子同古巴的制度决裂》(*Des intellectuels français et étrangers rompent avec le régime cubain*)，《世界报》，1971年5月22日。

104 弗朗索瓦·布里科(François Bourricaud)，《意识形态的修修弄弄》(*Le Bricolage idéologique*)，法国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196页。

105 比如：尼古拉·巴弗莱兹，《雷蒙·阿隆》，出处见前文，第392—403页，以及安妮·科昂－索拉尔，《萨特》，出处见前文，第584—591页。

106 《世界报》,1968年5月10日,第9页。

107 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1907— ,法国散文作家、小说家。——译者注。

108 同注106。

109 达尼埃尔·科恩-本蒂(Daniel Cohn-Bendit),1945- ,德国人,在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中担任学生运动领袖,1968—1978年被禁止在法国居住。——译者注。

110 《执政的幻想——让-保尔·萨特和达尼埃尔·科恩-本蒂的谈话》(*L'imagination au pouvoir. Entretien de Jean-Paul Sartre avec Daniel Cohn-Bendit*),《新观察家》杂志,特别增刊,1968年5月20日[收入雅克·索瓦若(Jacques Sauvageot)、阿兰·热斯马(Alain Geismar)、达尼埃尔·科恩-本蒂(Daniel Cohn-Bendit)、让-皮埃尔·杜代伊(Jeran-Pierre Duteil),《学生革命:它的组织者们在说话》(*La Révolution étudiante: ses animateurs parlent*),勒瑟伊出版社,1968年,第68—97页]。

111 高纳柳斯·卡斯托里亚蒂(Cornelius Castoriadis),1922—1997,法国哲学家。——译者注。

112 5月12日在卢森堡广播电台发表的声明,收入《萨特文集》(*Les Écrits de Sartre*),第463页。

113 比如,《雷蒙·阿隆的巴士底狱》(*Les Bastilles de Raymond Aron*)被收入该书,第175—192页。

114 见塞日·拉福里(Serge Lafaurie)搜集的谈话,《新观察家》杂志,1968年6月19—25日,第26—29页。

115 雷蒙·阿隆,《无双的革命——关于五月事件的思考》(*La Révolution introuvable. Réflexions sur les événements de mai*),法亚尔出版社,1968年,第15页。

116 《境地》第8卷,第184页。

117 指1815—1816年期间的法国议会,由于保王党人在该议会中占压倒多数,以至于人们认为再难找到第二个相似的议会,所以称之为“无双议会”。由于1968年6月的立法选举结果与当时相似,故人们亦称该议会为“无双议会”。——译者注。

118 参阅米歇尔·勒格里(Michel Legris)的引言,这些引言被收在5月22日《世界报》刊登的有关这次见面会的报告中[《让-保尔·萨特先生在巴黎大学与社会主义和自由协会见面》(*M. Jean-Paul Sartre à la Sorbonne pour l'association du socialisme et de la liberté*)]。尤其参阅当时身为欧洲第一广播电台记者的朱利安·贝藏松(Julien

Besançon)所作的录音,该录音的内容20年后被发表在《新观察家》杂志第1229期上,1988年5月27日—6月2日,第154—125页上[《1968年5月萨特在巴黎大学》(*Sartre à la Sorbonne en Mai 68*)]。

119　根据埃尔维·阿蒙(Hervé Hamon)和帕特里克·罗特曼(Patrick Rotman),《一代》(*Génération*),第1卷,《梦想年代》(*Les Années de rêve*),勒瑟伊出版社,1987年,第523页。

120　朱利安·贝藏松,出处见前文,第125页。

121　参阅桑德里娜·布里耶纳(Sandrine Brienne),《通过北方地区报刊看发生于1968年6—7月危机期间的全国性事件》(*Les Événements nationaux de la crise de mai - juin 1968, au regard de la presse nordiste*),硕士学位论文,里尔第三大学,共2卷,1994年,第51页。

122　《关于20世纪的教科书》,波尔大出版社(Bordas),1965年,第593—604页。

123　鲍勃·迪伦(Bob Dylan),1941—　,美国乡村音乐及摇滚乐歌手兼词曲作者,以抒发不同政见的歌曲而著名。——译者注。

124　布特列罗夫工厂,位于沙皇俄国的圣彼德堡,是一家生产有轨电车的工厂。自1917年1月起,该厂工人因日益上涨的生活开支而要求增加工资,并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举行大罢工和示威游行。布特列罗夫工厂工人的抗议活动,和当时发生在俄国其他地区的工人运动一起,直接导致了俄国二月革命的爆发和流亡国外的列宁的归国。——译者注。

125　法国的非赢利性社会互助团体,其成员通过缴纳会费达到相互帮助的目的。——译者注。

126　安迪·瓦霍尔(Andy Warhol),1928—1987,美国流行艺术家,画家兼电影工作者。创作有美国影星玛丽莲·梦露的系列头像等著名作品。——译者注。

127　马歇尔·麦克鲁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加拿大社会学家。——译者注。

128　泰奥多尔·莫诺(Théodore Monod),1902—　,法国生物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译者注。

129　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 - Pierre Vernant),1914—　,法国研究古希腊的学者,古希腊宗教和神话的专家。——译者注。

130　莫尔万-勒贝斯克(Morvan - Lebesque),1911—1970,法国作家、记者、小说家。——译者注。

131　阿兰·雷奈(Alain Resnais),1922—　,法国著名电影导演,曾执导过《广岛

之恋》等影片。——译者注。

132　爱德华·皮尼翁(Edouard Pignon),1905—1993,法国表现主义画家。——译者注。

133　欧内斯特·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1895—1988,法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134　玛德莱娜·勒贝里欧(Madeleine Rebérioux),1920—　,法国共产党人,自1991年起担任人权协会主席。——译者注。

135　保尔·利克尔(Paul Ricoeur),1913—　,法国哲学家。——译者注。

136　参阅《境地》第8卷,出处见第100—124页。

137　同上,第93和124页。

138　弗朗索瓦·马斯佩罗(François Maspero),法国政治家、共产党人。——译者注。

139　《不屈服的权利("121人团体"资料)》的《编者按》,马斯佩罗出版社,1961年,第7页。

140　让-保尔·萨特,为弗朗兹·法农的《全世界受苦的人》所作的序,马斯佩罗出版社,1961年,第20页。

141　奥利维埃·托德,《残酷的4月——1975年,西贡的陷落》(*Cruel Avril 1975, la chute de Saigon*),拉封出版社,1987年,第15页。

142　古以色列国国王。据《圣经》记载,他统一了犹太各部落,建立王国,定都耶路撒冷。童年时打死腓力斯勇士歌利亚,在位时曾多次打败强邻,受到民众爱戴。——译者注。

143　《圣经》人物,他是腓力斯巨人,被大卫投掷的石块击中而死。——译者注。

144　民众的看法变化不定,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鬼神学的范畴内作一番深入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是冷战期间,美国飞机都被看做是自由的翅膀;可为什么在越南战争中,对它的妖魔化超出了它通常可以忍受的范围,即共产主义势力的范围呢?同样,为什么在20年后的海湾战争期间、在同一些作家的笔下,这些美国飞机又重新成了自由的翅膀呢?

145　达尼埃尔·科恩-本蒂,《我们曾经如此热爱革命》(*Nous l'avons tant aimée la révolution*),贝尔纳·巴罗出版社(éditions Bernard Barrault),1986年,第10页。

146　"切"(Che)是西班牙语中对朋友、熟人的称呼,这里指恩奈斯托·格瓦拉(Ernesto Guevara),1928—1967,生于阿根廷,后和卡斯特罗一起参加了反对古巴独裁

政权的游击战争。1951年古巴新政权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军区司令、古巴国家银行行长等职。1965年他辞去古巴官职，放弃古巴国籍，潜入玻利维亚建立游击根据地。1967年在战斗中被玻利维亚政府军俘获，后遭杀害。——译者注。

147　《境地》第8卷，出处见前文，第12—13页。

148　同上，第34页。

149　马丽-克里斯蒂娜·格朗戎，《萨特，波伏娃，阿隆：模糊的激情》，出处见前文，第154页。

150　雷蒙·阿隆，《帝国主义的共和国——当今世界的美国(1945—1972)》(*La République impériale. Les États-Unis dans le monde, 1945-1972*)，卡尔曼-莱维出版社，1973年，第13页。

151　《回忆录》，出处见前文，第619页。

152　同上，第621页。

153　乔治-亨利·苏图，《雷蒙·阿隆和古巴危机》(*Raymond Aron et la crise de Cuba*)，摘自莫里斯·瓦伊斯(主编)，《欧洲和古巴危机》(*L'Europe et la crise de Cuba*)，阿尔芒·科兰出版社，1993年，第187—210页。

154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普鲁士将军，著名军事理论家，《战争论》一书的作者。——译者注。

155　同注153，第210页。

156　仅在1965年4月这一个月，《世界报》就用了18期报纸的"头版"来谈论越南战争[奥利维埃·欧克查莱克(Olivier Owczarek)，《通过三份报纸——〈人道报〉、〈世界报〉、〈费加罗报〉——看法国报刊和越南战争(1961—1975)》(*La presse française et la guerre du Vietnam au travers de trois journaux, 《L'Hmanité》, 《Le Monde》, 《Le Figaro》, 1961-1975*)，里尔第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0年，第60页]。

157　《费加罗报》，1966年8月29日。

158　雷蒙·阿隆，《参考书目》(*Bibliographie*)第2卷，《事实分析》(*Analyses d'actualité*)，朱里亚出版社，1989年。

尾　　声

第七章 日落，印象

我们必须注意避免赋予那两张曾经周游世界的照片以它们本身所没有的意义。1979年6月20日，在一个名为“越南之船”的组织的倡议下，萨特和阿隆出现在吕岱西亚旅馆的同一个讲坛上，为越南“船民”辩护。六天以后，他们作为一个人数更多的代表团的成员——该代表团还包括安德烈·格吕克斯曼[1]和克罗迪·布洛瓦耶尔——就同一个问题会见了共和国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此后，两人一起出现在爱丽舍宫门前的台阶上。当时，人们对这些照片作了许多无聊的评论，这些评论后来甚至成了一种陈词滥调。两个相互为敌三十载的人突然讲和，并率先提出了人权这一中心主题。这两位著名人士的会晤，似乎还肯定了迄今为止知识界两大对立阵营相互间的重新认识。在这个1979年的初夏，萨特和阿隆完全可能都是正确的。

历史改变了航向

当然,人们在衡量第一种说法过于简单的一面和第二种说法诅咒漫骂的一面。大家所看到的,与其说是两个人观点的一致,不如说是他们地位的互换。因为,如果说在法国解放后的几十年里,萨特被认为是这思想活跃的30年中"思想大师"的化身,那么,阿隆则逐渐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伤口的"包扎大师",后来又成为这些伤口的医治者,而这些伤口都来自于这光荣而浮躁的30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阿隆一直呆在麻醉室里,仅仅扮演着《知识分子的鸦片》所设想的罪行的旁观者的角色,而现在,他实际上兼任起接骨医生、外科医生或护士的职责,在为一部分知识分子治疗骨折、创伤和瘙痒。早在70年代和80年代相交之时,即萨特被打入地狱、加缪的遗体被运回之前,这种地位的互换就开始了,我们有必要对此作一番研究。其实,这种现象只有被放到70年代临近黄昏的历史背景下,才会体现出它的全部意义。

这首先是萨特和阿隆的黄昏,他们两人已到了暮年。1979年6月当他们重逢的时候,失明的萨特只剩下了十个月的生命,而阿隆则刚刚从两年前所受到的攻击中恢复过来,他知道自己已无力主宰过去的光阴,所能把握的只是他的余生。这种虚弱的状态甚至反映在他们的外貌上。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了他同萨特和阿隆的会晤,他描写道:"一个人已经谢顶,他相貌疲惫,皮肤往下耷拉着;另一个人圆圆的脸上毫无血色,就好像隔着船的舷窗在看我。"奇怪的是,共和国总统似乎认为,他俩当时仍然"彼此厌恶"[2]着。但在当时许多有关的回忆中,没有一种能支持这种假设。相反,事实上,两位当事人并不像某些观察家所做的那样,对他们在1979年的这次会面

予以重视。四年后，阿隆在《回忆录》中说，这是一次“轰动一时却又非常虚假的重逢”，并且指出：“很明显，不管是在他还是在我看来，我们的握手并不意味着30年疏远的结束。”[3]而西蒙娜·德·波伏娃则在《永别仪式》一书中明确地说：“记者们对萨特和阿隆的这次会晤谈论了很久，而萨特本人对这件事却根本不重视。”[4]

不过有一点是确实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俩曾是一些重大辩论的主要角色，但现在，这些辩论的大多数却正在失去它们的一部分意义。从更广的角度来说，当时，甚至整个思想环境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事实上，比起他俩来，70年代末的黄昏色彩更为浓厚。正如法国经济分别于1973年和1979年遭到了石油危机的持续震撼一样，法国知识界大致在同一个时期遭到了两次思想打击：一次是1974年的“索尔仁尼琴效应”，另一次是70年代末对中国和印度支那的幻想的破灭。在那些决定性的年代里，历史改变了航向，知识分子历史的一页正在被翻过。我们必须用整整一本书，才能再现那一时期的重大事件。这里，我们要做的，仅是衡量一下这段历史对发生在萨特和阿隆之间的地位互换有什么影响。

1973年12月，《古拉格群岛》第1卷的俄语版在法国出版。接着，它的法译本也很快问世。这本书（1974年该书销售了几十万册）在公众中间引起的反响促使或者说加速了——这一点在历史上还有待辩论——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5]。同样是在这个十年的后半期，发生在印度支那半岛的事件——越南“船民”、柬埔寨悲剧——把那些左派知识分子抛入了“孤儿时代”[6]。事实上，不久以后，左派知识分子既失去了他们的榜样，又失去了他们的思想大师。后者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比如萨特、拉康、巴特[7]、阿尔杜塞），或者在更早一些的时候（比如福柯），就

纷纷在肉体上或思想上消失了。

仅仅几年时间,思想的天穹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苏联,马克思主义退却了,取代苏联的后备革命模范也遭到了腐蚀,这一切都是失败的范例——如果我们把"范例"一词解释为那些在语法中充当动词变位例子的典型词语的话。法国知识界的这些范例,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后十年的末期分崩离析之前,突然不再接受革命的变化。所以我们说这是失败的范例,或者说——如果我们赋予这个词以科学哲学的含义的话——是范例的改变,也就是说,是对基本原则的质疑。

熄灭的火山

我们应该把逐渐开始于萨特和阿隆两个人之间的形象互换放到上述背景中来看待。在70年代的后半阶段,尽管环境发生着变化,但萨特还是——或似乎——留在历史的前台。比如在1977年,他仍然十分频繁地从事着请愿活动。四年后,西蒙娜·德·波伏娃在《永别仪式》中指出:"和其他几年一样,那一年他在许多文章上签了名,那些文章全都被刊登在《世界报》上。1月9日,是一篇支传《政治周报》的呼吁,该报当时正处于困境之中;1月23日,是一篇反对发生在摩洛哥的镇压的号召;3月22日,是一封致拉瓦尔[8]法院院长的信,该信声援了因退回自己的军籍簿而受到指控的伊万·皮诺;3月26日,是一篇抗议尼日利亚逮捕一名歌手的文章;3月27日,是一篇支持阿根廷人民自由斗争的呼吁;6月29日,是一份致贝尔格莱德会议的请愿书,该请愿书谴责了发生在意大利的镇压事件;7月1日,是一篇抗议巴西政治形势日益恶化的文章。"[9]当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回忆或阐述不完全正确:比如1月9日、3月22日和26日的那几篇文章并未刊登在《世界报》上。然而,在仔细查阅该报之后,我们发

现，萨特在1977年第一季度的请愿活动其实要活跃得多。因为在那段时间里，他还在其他文章上签了名：2月2日，是一篇声援一位被关进精神病院的苏联人权斗士的号召；4月3—4日，是一篇致维德拉将军[10]的呼吁，该呼吁涉及的是一名失踪的阿根廷大学教师；5月8—9日，是一篇题为《反对一个德美资本主义的欧洲》的宣言；5月27日，是一篇揭露左派政党"完全改变"对核军备的态度的文章；6月1日，是一封由许多人共同起草的、致波兰驻巴黎大使的抗议信，反对发生在华沙的请捕行动；6月12—13日，是一篇谴责发生在欧洲议会普选过程中"舞弊"行为的号召；6月17日，是一封支持被捕人狱的泰国大学生的请愿信。

尽管如此，我们不应被上述活动所迷惑。当时，萨特似乎还统治着一大批知识分子，但这种统治仅仅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而已；那时候，这位哲学家就像是一座熄灭了的火山，屹立在知识界的地平线上。此外，萨特的地位也将很快受到动摇。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对萨特的贬低在他形象受损的过程中所起的致命作用。从传统上说，这样做使新一代知识分子在谴责前辈们候想的习惯做法的同时，显示了他们自己的身份和自主性；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样做使全体知识分子得以消除最近一大段历支的消极影响。在上述两种请况中，这种做法都很有效，更何况被用来赎罪的牺牲品是一位更加著名的知识分子。当然，与此同时，大家都很清楚这种分析的局限性。坚持这样的观点，与其说是知识界的一种严谨方法，不如说是毫无根据的臆想。因为，事实上，在萨特本人去世之前，他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开始遭到了动播，因此，我们必须把发生在他身上的这种现象放到"孤儿时代"的背景中来看。我们曾经指出，几十年来，萨特代表着对备种形式的科学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持。然而当时，

由于我们已经说过的原因,被埃德加·莫兰称为“神水的枯水季节”开始了。首先受到这种变化打击的,当然是那些丰水年代里的领袖人物。

“选举,笨蛋的诡计!”

何况,萨特除了经常炫耀他所参照的那些模范之外,还表现出对议会民主永久的敌视。这一点我们在冷战时期已经看到过,但此后,他的这种敌视并没有平息。在分析东欧国家形势的时候,他的确发自内心地呼吁这些国家进行改良,但这只是为了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里,我们也许触及了天平为何重新倾斜的主要原因。必须提醒大家的是,无论是萨特和加缪的辩论,还是萨特和阿隆的辩论,一直都超越了圣-日尔曼-德-普雷区由这三人组成的神圣三角,在东欧人民的生活中产生了反响,不管这种反响是好是坏。在这一点上,如果有人认为,“60年代,萨特在法国以外的国家所取得的种话地位”[11]无论如何总是积极的,那么他的想法就错了。比如,我们可以看一看萨特1966年的布拉格之行。应查里大学邀请,他又一次来到挤满学生的梯形教室,这些学生希望听他——哪怕是含糊其辞地——讲一讲自由之路,此时此刻,还有许多其他捷克人聚集在大学门前的广场上,可是,我们的哲学家却对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大肆赞颂了一番。当时在布拉格担任大学教师的伊里奥·雅纳卡基讲述了后来的情况:“听众们感到很窘迫,如同被来自另一个时代——一个如此悲剧性的时代——的话语打了一记耳光,他们把盲目的萨特丢在了讲台上。”两年后,当布拉格之春开始时,“大学生们的‘床头柜’上都放着《局外人》、《堕落》、《鼠疫》等小说”[12]。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整个东欧的情况都是如此,“人们对加缪和萨特的态度,非常生动地体现在这样一件事情当中:索尔

仁尼琴在诺贝尔奖授奖典礼的发言中引用了加缪的话，却拒绝和去苏联朝圣的萨特见面”[13]。

此外，当1968年8月“布拉格之春”遭到镇压时，萨特的谴责是建立在以下事实的基础上的。他们正在镇压“有利于社会主义文明的最高表现形式”；几个月后，他又明确指出，使这一次发生在捷克的流产尝试更加珍贵的，是它“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特点，以及不同于“其他自由主义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运动”[14]的事实。然而，十年后，当萨特曾经先后提倡过的典范不敌一些主要的综合性思想体系面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土崩瓦解——但在70年代末，这种情况并没有让人们预感到十年后将要发生的变革——的时候，议会民主的地位自然而然地得到了提升。但是，在此之前，在整个70年代，萨特仍然不屈不挠地对这一政治制度进行着抨击。

人们都知道萨特写于1973年1月的那篇著名文章《选举，笨蛋的诡计》。文章里有一句话足以捷传千古：“设在学校或市政厅里的选民秘密写票室，象征着一个人对他所属集体的全部背叛。人们不用花多大努力，就能把所有进入大厅的选民变成相互出卖的潜在叛徒。”[15]当然，这句话必须被放到“左派分子”群情激奋的背景下来看。此外，我们也不能把它同文章的其他部分割裂开来，因为这篇文章明确阐述了上述谴责的理由。尽管如此，我们有必要提醒大家，这篇谴责文章发表于1973年3月，也就是立法选举开始前的两个月，这是政府共同纲领签署之后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选举，因此，它对于左派势力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的确，在极左派眼里，左派势力和当时掌权的政治力量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当左派经历了第五共和国头十年的风雨、为了进行必要的现代化而像一艘需要检修的船那样停泊在船坞里的时候，萨特在船上开凿了一个漏水洞。而其他来自于

极左派或左派的知识分子则试图把这个洞堵上。2月初,让-保尔·萨特发出了抵制选举的号召,玛格丽特·杜拉斯、莫里斯·克拉韦尔、米歇尔·莱里和皮埃尔·维达尔-纳盖等人立刻在第一轮立法选举的前几天公开表示了对这一号召的反对,他们共同签署了一份声明,强调说:"为了铲除掠夺国家如此之久的黑社会,任何手段都是好的。"他们还提醒大家,这些手段同样包括选举,"不管它有多大的欺骗性"[16]。这最后一句话所反映出的谨慎,以及针对当时议会的多数派而采用的辛辣语气,都清楚地表明,那时要反对萨特还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不过,现在看来,给人留下强烈印象的,不仅是萨特撰写那篇文章时的选举背景,更多的是当时的历史背景。1973年,西方民主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就好像是欧洲西部的一个半岛,被夹在西班牙、希腊这两个独裁国家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之间。这种民主制度不但遭到削弱和威胁,而且在萨特等观察家的眼里已经过时。当许多地中海沿岸的独裁国家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把西方民主当做一种憧憬、当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在牢狱般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幻想着让自己的社会将来拥有西方式民主的时候,萨特却在丑化这种议会民主,并说它简直是过时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几年后对萨特的回击当然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单从萨特生平的角度,不足以解释他的地位迅速跌落的原因。这里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知识界的大气候。萨特是思想战线变化的牺牲品,几十年来,他总是站在斗争的前列,这使他在这样的变化面前显得尤为脆弱。他葬礼上的激动场面以及参加葬礼的众多人数都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除了他的亲朋好友,萨特的个人影响已经大为削弱。一个代表时代的知识分子总是要死两次,根据不同情况,他的肉体总是先于或后于他所处的时代而消失。就萨特而言,从宏观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上

述两种现象几乎是同时发生的。正如1968年5月28日那波澜壮阔的"共和"示威企图保卫一个已经寿终正寝的制度一样，1980年4月19日，随着萨特的遗体来到蒙巴那斯公墓的队伍不知不觉地——就像在其他类似的情况下一样——宣告了一个知识分子历史时代的结束。此外，对于萨特来说，这第二次死亡持续了好几年，因为当时，对他的回击开始了，这种回击实在太直接、太猛烈。

更何况，在80年代初，尽管思想地位的互换已经结束，但相反，历史的天平却远没有倾向西方民主制度的阵营。雷蒙·阿隆当时写了一篇令人触目惊心的文章，文章的标题十分明确：《苏联的霸权主义：第一年》。在他看来，形势极为险恶，面对苏联这个"思想政治被军事化"了的国家，"西方国家既没有一个共同的战略也没有一种坚定的意愿来对付它"[17]。因此，当议会民主被说成是一个遭到谴责或至少也是在历史上过时的制度的时候，雷蒙·阿隆却成了这一制度的化身和卫士，虽然这一制度在思想领域被抬得很高，但它仍然十分脆弱。另外，法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同样也帮助阿隆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因为，1981年5—6月左派在政治上获得胜利的时候，恰好是知识分子历史的一个转折时期。在知识界，左派进入了一个混乱和退却的阶段。所以，当时的局势和1936年完全相反，和人民阵线时代所不同的是，现在获得选举胜利的政治力量，和思想的时代潮流并不对应。这样，战斗就突然在一条完全相反的战线上展开了，右派在政治上遭到了失败，但右派知识分子却是进攻的一方。

自由主义老人的秋天

早在1981年左派获得胜利之前，阿隆就已经成了一个颇具影响的人物。1981年4月，《读书》杂志将他排在当时在世的知

识分子的第二位,这一结论的依据是此前几个月该杂志所作的一项调查。因此,应该说《读书》杂志所反映的现实在80年代历史发生转折之前就已存在了。1981年5月政治局势的更替,并没有扭转已经开始的变化,相反却促进了它的发展。的确,许多右派知识分子都暂时受到了失败的打击,他们对这次失败十分惊讶。毫无疑问,雷蒙·阿隆当时所作的沉痛而悲观的分析,就是一个证明。然而,确切地说,阿隆的情况清楚地表明,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思想领域所进行的斗争,并没有因为右派在政治上的失败而受到持久的影响。1981年,阿隆和多米尼克·沃尔东以及让-路易·米西卡的谈话在电视上播出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谈话出版后也大获成功。人们对《参与政治的观众》所给予的欢迎,为作者晚年带来了真正的荣誉,这种荣誉随着1983年9月《回忆录》的出版以及在作者10月17日突然去世后所获得的极大成功而达到了顶点。

事实上,右派知识分子当时所采取的,不是龟缩在碉堡里的防守政策,而是重新进攻的政策。正如1936年人民阵线取得选举胜利之后,右派声称要打一场"雇主的马恩河战役"一样,那时候,一部分右派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正在进行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知识分子的不列颠之战"。右派政治力量在地面战场上被打败了,从此,双方进行的是争夺制空权的斗争——也就是思想领域的斗争。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能更好地理解雷蒙·阿隆的影响不断扩大的原因。因为,他站到前台的时刻,正是两个时代交汇的时刻。在那个长期肩负着沉重思想倾向的时代,始于70年代后半期的左派知识分子的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重心的转移,只能够进一步巩固阿隆的地位,促使人们重新评价萨特的政治参与,后者被看成是一个正在结束的时代的代表人物。他们两人之间——或者更加确切地说,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和他们演

出并编写的剧目之间——的地位互换，反映出知识分子光荣的30年的结束。这些知识分子的一个历史时期结束了，甚至在萨特去世之前，“萨特时代”的大门也开始关闭。在这一点上，当时有一段时间的分析认为，“与其对得起阿隆，不如对不起萨特”，上述分析已经注意到了形势的变化，这句格言似乎蕴涵着要肃清萨特余毒的意味。

不过，雷蒙·阿隆站到前台，同样也得益于短暂的政治局势。我们重新面临着1981年以后的历史。当时，右派知识分子有许多反政的借口。当“反对极权”的斗争占据了所有派别知识分子思考的中心时，政府里出现了四名共产党部长，这使右派知识分子作好了战斗的准备。特别是里根的管理政策，在汲取了自由主义思想之后，反过来促使这种思想重新活跃起来，与此同时，法国的社会党人却很快遇到了经济问题的困扰，这使自由经济毋庸置疑地赢得了人们的好感。因此，在反对极权和自由主义这两方面的思考中，雷蒙·阿隆尝到了几十年思想斗争的胜利果实。尽管如此，这种明显的优势也许仅仅是一次得不偿失的胜利。因为那时，自由主义右派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极端自由主义者的过激言行，二是极右派在思想上的竞争。这两大挑战触及了所有自由主义思想家，而阿隆的去世，使他仅仅和这两大挑战擦肩而过。

极端自由主义是里根和撒切尔模式的产物，它产生于雷蒙·阿隆去世以后，也就是1986—1988年。因为，对于法国的自由主义思想而言，存在着一个表面上的荒谬之处。它之所以受到打击，并不是因为右派在1981—1986年退居反对派地位，而是因为在1986—1988年希拉克政府执政时期，右派出于夺回思想阵地的痛苦需要，将自由主义理论炒得沸沸扬扬，而这种理论和右派行使权力的实践之间发生了冲突。正是这种冲突的考验，

构成了对法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打击。对于一个"思想"体系来说,这种考验永远是微妙的,因为它总是把思想体系和事实作比较,而我们知道,事实并不一定总是服从于理论。对于那些过于僵化的理论体系而言,这种和现实的碰撞经常是致命的。自由主义思想也没有摆脱这种碰撞的不良影响,但是,雷蒙·阿隆当时已经不在人世,对他在这些事件面前可能会有的这样或那样的想法作假设,这属于"时间推理"的范畴,这种手法类似于科幻小说,它通过删除或添加发生在过去的某一事件,来推测历史进程可能会出现的转向。

不管怎样,更重要的是极右派知识分子的问题,因为他们进入昌盛阶段的时候,雷蒙·阿隆仍然在世。事实上,发生于70年代末的思想震撼,不仅使自由主义右派在回到起点之后东山再起,而且也使"新右派"——也就是迄今为止一直受到束缚的极右派知识分子——崭露头角。后者几乎是在地下存在了十多年之后,才从1979年起成功地加入了思想领域的斗争,并找到了好几份发行量很大的报刊载体比如《费加罗杂志》的一些版面。从那时起,面对这块出现在政治环境里的陨石,自由主义右派的反应如何?当然,上述两大右派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敌视新上台的政治势力。但是,这种敌视远远不能将他们联合起来。关于这点,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

"欧洲文明探索研究会"是"新右派"的摇篮,它于1981年11月29日举行了一次年会。年会的组织者认为,左派的胜利证明了他们的理论,即占领思想阵地是取得政治胜利的先决条件。于是,一周以后,"新右派"的主要思想家阿兰·德·贝诺阿[18]打算参加一次右派知识分子的报告会,该报告会的主题是寻找一个"可以替代社会主义的方法",希望以此"为不屈服于社会主义的法国人民提供他们所紧缺的思想道德弹药"。阿兰·德·贝诺阿

的到场一经宣布，雷蒙·阿隆立刻决定不出席报告会。其他几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弗罗兰·阿弗塔里翁、米歇尔·普里让、弗朗索瓦·布里科和皮埃尔·肖尼，也宣布自己将不参加报告会。看到这种情况以后，阿兰·德·贝诺阿谴责了“知识界的恐怖主义”，然后离开了会场。最后，在上面提到的人当中，还是有好几个参加了会议。

此外，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如日中天，但对于他们来说，极右派的问题在以后的几年里一直存在着。因为，虽然极右派在知识界很快丧失了地位，但他们却于1983年在政治上开始崛起。1983年9月德里厄市的议会部分选举就标志着这种崛起的开始。而雷蒙·阿隆在去世前一个月发表在《快报》上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关于这次选举的。这篇文章发表于9月16日，题为《乔治·当丹》，它引起了人们的惊讶。几天前，在市议会选举的第二轮中，反对派的联合候选人——其中包括国民阵线的代表——以55.44%的选票获得了胜利。雷蒙·阿隆在他的文章里抨击了那些谴责议会右派和让-马利·勒·庞结盟的人。毫无疑问，阿隆的这一举动令人感到困惑。由于它看上去不是轻率的举动，因此我们有必要探究它的意义。

在德里厄市竞选期间，左派所突出的纲领是反对种族主义，他们还重新提出了“反法西斯”的口号。[19]在这个背景下，阿隆在《快报》上的参与行动，也许可以有两种互补的解释，它们在必要的时候再次反映了斗争的思想和性格。这是一个念念不忘捍卫自由的自由主义者的思想，他觉得，左派主要的综合性思想体系已经瓦解，政治的天平从几年前就开始重新倾向右派，这再次凸显了他捍卫自由的特点。从长远来看，文章之所以流露出一种怖怒之情，是因为作者意识到，自由主义右派将有可能丧失其捍卫自由的特点，而这种特点至少也是它和左派所共有的；他还意

识到,为了打消那些在他看来改变自由主义右派思想方向的企图,自己必须重新上阵,再次和左派知识分子展开斗争。

针对这种观点,人们可以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有一种态度正好相反,它要求避免和国民阵线建立客观的联盟,这种态度使自由主义右派更加警惕自己会丧失捍卫自由的特点。我们正应该从这一点出发,来考虑文章所流露的恼怒之情的另一个原因,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把这种原因说成是顽强、执拗或者固执。我们看到,早在1934年,雷蒙·阿隆就没有加入"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惕委员会",因为他认为,法国国内的法西斯威胁不是一种现实,只是一种口号。同样,半个世纪后,《乔治·当丹》一文的生硬语气,也可以用作者对政客和媒体的简单夸大现象所感到的使怒来解释。与此同时——确切地说,是9月9日,在欧洲一台的广播节目中——伊夫·蒙当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不过说到底,我们也不要夸大其辞。我们不能因为这十几个激动过度、吵吵嚷嚷、兴风作浪的小笨蛋,就马上用'当心,当心,你被淹没了,当心,希特勒又卷土重来了'等等这样的话,来掩盖我们自己的弱点。"我们说过,人们可以称这种性格特点为固执,或者相反,称其为对顽强和严谨的追求。不管怎样,它对阿隆生前最后第二次所公开表明的立场作了解释,使我们清楚了这一可能会引起人们误解的举动。同样,阿隆的这种性格还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他在去世当天所表明的最后一个立场,因为这个立场可能又一次让人们感到了困惑。

1983年10月17日,雷蒙·阿隆在巴黎高等法院参加完一次法庭审判,出门的时候突然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这位曾在伦敦从事抵抗活动的老人,刚刚在贝尔特朗·德·儒弗奈尔和以色列历史学家泽夫·斯丹海尔的诉讼案件中,作了对前者有利的旁证。由于贝尔特朗·德·儒弗奈尔在法国沦陷时期曾采取过复杂

甚至是有争议的态度，因此雷蒙·阿隆似乎又一次扮演了一个反背的角色。不过，除了沦陷时期的问题之外，那天辩论的主题，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法西斯的影响和性质。我们知道，早在30年代，雷蒙·阿隆就认为法国国内的法西斯威胁被过高估计了。50年后，他没有改变这一观点，并且希望人们都能知道它，哪怕是冒着自己形象受损或者可能遭到误解的危险。

注：

1 安德烈·格吕克斯曼（André Gluckamann），1937— ，法国哲学家。——译者注。

2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权力与生活》（*Le Pouvoir et la vie*），第2卷，《冲突》（*L'Affrontement*），十二出版公司（Compagnie 12 éditeur），1991年，第237页。

3 《回忆录》，第711—712页。

4 《永别仪式》，第146页。

5 这种说法出自皮埃尔·格雷米雍之口。《巴黎—布拉格：在捷克斯洛伐克复兴和镇压面前的左派（1968—1978）》[*Paris-Prague. La gauche face au renouveau et à la répression tchécoslovaques (1968 - 1978)*]，朱里亚出版社，1985年，第327页。

6 笔者借用了一本书的名字，这本书后来成了历史性的著作，1978年由让·克洛德·吉耶博（Jean Chaude Guillebaud）通过勒瑟伊出版社出版。

7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法国评论家。——译者注。

8 拉瓦尔（Laval），法国马延省省会，位于巴黎西南约三百公里。——译者注。

9 《永别仪式》，第111页。

10 维德拉（Jorge Rafael Videla），1925— ，阿根廷军人、政治家，参与了1976年3月的军事政变，并担任阿根廷总统至1981年。1984年文人政府上台后，他被指控严重侵犯人权，被判处终生监禁，后被特赦。——译者注。

11 安妮·科昂-索拉尔，《萨特》，出处见前文，第534页。

12 伊里奥·雅纳卡基（Ilios Yannakakis），《加缪和捷克斯洛伐克》（*Camus et la Tchécoslovaquie*），摘自《加缪和政治》（*Camus et la politique*），主编让伊夫·盖兰，阿尔玛丹出版社（L'Harmattan），第58和59页。

13 莫里斯·韦扬伯格(Maurice Weyembergh),同上,第94页。

14 《迟到的过去》(*Paesa Sera*),1924年8月24日,《世界报》,1968年12月3日(引用者为安妮·科昂-索拉尔,《萨特》,出处见前文,第689页)。

15 让-保尔·萨特,《选举,笨蛋的诡计》(*Élections, piège à cons*),摘自《现代》杂志,第318期,1973年1月,第1100页(收入《境地》第10卷,1976年,第73—87页)。

16 《世界报》,1973年2月3日和3月2日。

17 《评论》(*Commentaire*),第11期,1980年秋。

18 阿兰·德·贝诺阿(Alain de Benoist),1943— ,法国评论作者。——译者注。

19 参阅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知识分子与法兰西激情——20世纪的声明和请愿书》,出处见前文,第310—317页。

结束语
本世纪没有知识分子吗

1946年11月，让－保尔·萨特在巴黎大学做讲座时声明："如果50年后，人们说我们：'他们目睹了世界上最大的灾难，可他们却一言不发。'那么对于我们这些作家来说，需要注意的，只是不要让我们的责任感变成负罪感。"[1]半个世纪过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无论是萨特还是阿隆都没有沉默。在此期间，他俩从来都不曾回避政治参与的责任，尽管他们对这个词的意义有不同的理解。同样，他们也没有想过反对以下的说法，即政治参与激发了知识分子对同胞、对历史的责任感。因此，这里我们不需要在负罪感的层面上进行我们最后的分析，因为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历史学家的责任不是

对某一事件进行辩护或谴责。

把历史学家和法官的职责混为一谈是有害的,更何况本书的前几章告诉我们:首先,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让-保尔·萨特一直是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其次,他是在80年代初去世的,而在这十年中,人们对这种类型的政治参与提出了质疑。在好几年的时间里,知识界即使没有成为一块荒地,那么至少也是一片闲置的农田。它"产出"得太多,所以要重新积蓄力量。而在那几十年当中,萨特曾是知识界最引人注目的耕耘者之一,因此,尽管他已去世,但他势必要成为人们批评的焦点。作为请愿记录的绝对保持者,他事实上就是那一时期知识分子大规模政治参与活动的化身。不过,对萨特的重新评价并不仅仅伤及他的象征意义,他本人的信誉同样也在80年代逐渐受到了损害。

因为,从本质上说,历史的风向是变幻莫测的。萨特的预言大部分都遭到了历史的否定,比如他预言苏联将在1964年赶上西方国家,第三世界将是革命的导火索,欧洲的极左派将成为西方民主发生政治变化的根源,等等。当然,我们必须把萨特的每一次政治参与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来研究,而不能让他一个人承担许多其他知识分子的参与行为。为了把过去的历史——从此,这段历史将遭到当时那些活动积极分子们的诋毁——妖魔化而贬低萨特的地位,这是巫师的行为,和历史研究毫不相关。但是,研究者们也不能因为自己的谨慎以及不愿随声附和那些伪善者的缘故,而将萨特凌驾于历史的审判之上。在这方面,还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团体能颁布对自己的赦免令。其中的原因很简单。除了有关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在理论上的辩论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任何身份的知识分子都无法回避的冲突,那就是知识分子和历史的冲突,前者希望通过政

治参与来把握后者。关于这一点，萨特在东欧国家极权制度大行其道的时候所发表的反对自由民主的言论，可能是很难得到善终的。

如果说"历史没有终点"[2]，那么毫无疑问，几年来，20世纪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自由民主重新被人们视做未来。但是，这种未来没有因此而得到展现。就各种社会的思想前景而言，再也没有哪一种社会比自由民主制度更加遥远，左派必须帮助这种制度的建立，而右派则必须为这种制度而斗争。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制度自己就能成为一种前景。通俗地说，未来再也没有得到展现，而历史的运动也不能再被视为政治物理学的首要原则。

此外，这种假想的历史运动确实对萨特产生了某种决定作用。在他生命中的某时某刻，历史抓住了他，从此，他和历史融为一体。历史有自己的方向和规则，因此，人们只能帮助和加快它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在20世纪下半叶已经成为一个偶像，而萨特则成了这一偶像的主要祭祀者，这一观点经常被提出。这——我们有必要再一次提到——使他走到了阿隆的对立面。此外，他们两人曾经有许多机会展开远距离——也就是在书刊上——的辩论。但在这方面，除了他们借以相互对抗的深奥文章和频繁论著之外，也许没有什么比他们在思想斗争的战火中写就的、关于当时某一事件的文章更能说明问题了。这里我们只谈论一篇文章，一切都在其中得到了言简意赅的表达。这篇文章刊登在冷战时期的《精神自由》杂志上，题为《历史的迷信》[3]。雷蒙·阿隆在文章里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灾难的时代，危机重重，深刻而复杂，以至于人们即使真正理解了正在发生的历史，也只能得到微不足道的教训。只有那些非常愚昧无知、非常自命不凡的人，才敢于称自己找到了全部的意义和历史的归

宿。"

与此同时,这种和历史的不一致关系,还使我们能够尝试着回答另一个更能引起法国人争论的问题:在法国的政治版图上,人们是否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萨特和阿隆分别归到左派和右派这两大阵营中去呢?我们都知道拉米兹[4]的名言:"本质是右派的,人是左派的。"这句话经常被用来证明一个带有双重含义的观点,这种观点一方面表达了人们对事物秩序的某种顺从,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人们改变这一秩序的能力,以及这种企图在思想上的必要性。我们在第一个方面的范围内,衡量了这种分析可能具有的模糊性及其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它意味着右派的本质是悲观的,而左派则生来是乐观的。在左右两大派别的历史上,右派悲观、左派乐观的观点,其实是一个不能称其为问题的问题。[5]说到底,对它的研究不可能有令人信服的发展。比如,雷蒙·阿隆本人就曾指出,左派也有悲观分子,其代表就是哲学家阿兰。[6]

此外,如果有人想完全摒弃这条已被深刻探究过的途径,那么他就错了,因为这条途径能使我们在思想前景和情感两方面看得更加清楚。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右派肯定有一系列成熟的分析和思想,它们都以对变化的拒绝为基础。比如,阿尔贝·奥·伊尔施曼在分析"反动的辩术"[7]时,提出了以下三个论点,即"倒错效应"——任何改善环境的努力都将是恶化环境的因素、"徒劳无益"——归根到底,上述努力都将是徒劳的和"带来损害"——改革预期的代价过于沉重,将可能损害已经获得的利益。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上述三个论点可以反映一些主要的保守和反动的思想体系,而阿隆并没有轻易被这三个论点所束缚。一方面,他的想法确实在呼吁人们警惕"倒错效应",但他认为,影响历史发展的努力并不一定会引起倒错的结果,这一点,我们

在他就阿尔及利亚战争表明立场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另一方面，他意识到了这种努力的困难，但这并不会使他产生行动是“徒劳无益”的看法。最后，他提出了社会的复杂性和脆弱性，但他不会因此成天担心本来就不牢固的平衡会被打破。

此外，对变化的担心和拒绝不单滋养了思想的体系和意识形态的构造。因为，这些体系和构造所涉及的，不只是同世界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的关系，还有一种可以体现在不言中的历史观。更广泛地说，这种历史观也触及到政治文化和政治感觉，而意识形态的构造只是这种文化和感觉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人和历史、和行动的关系被放到了过去以及对过去所代表的既得利益的捍卫之前；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又反映了未来以及未来所孕育的各种可能性。面对自己希望或担心的历史进程，左右两大派别和历史、和行动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不同的，而且还为政治感觉和政治文化提供了养料。根据这种分析方法，萨特似乎毫无疑问是一名左派。他的战马都面向着未来，追求着历史意义的实现。此外，他还把原本先后出现在左派观点之中的集体想法——如人民反对暴政、无产阶级是未来社会革命的导火索、第三世界将是可能波及全球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斗争的胜利者，等等——混淆为同一个历史观点。因此，萨特以自己的方式，和法国政治生活中的“阴险主义”曲线相吻合，不过，他每次都改变了这些曲线的形状。的确，在19世纪的大规模斗争结束之后，人民在共和国时代实现了自我，然而，由于这个共和国拒绝成为“社会”的共和国，因此人们很快就谴责它在向资产阶级靠拢。与此同时，在陈列左派斗争保护神画像的画廊中，无产阶级取代了人民。但是，虽然社会主义曾经通过激励社会民主和夺取政权而成为社会真正的、深刻的征服者，但它也将受到背叛的指责。1956年，社会党政府加大了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力度，

这扰乱了它正在进行的其他行动,比如给予劳动者第三个星期带薪休假的计划。此外,这种对同一性的冲击使第三世界开始崛起,后者的解放运动在当时被视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发动机和未来革命的导火索。

根据这种政治文化和感觉的衡量方法,萨特完全融入了左派的政治情感,此外,他加速穿越了这一情感区域,并且用他自己的方式对后者进行了转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阿隆是否应该被归入右派呢? 和思想前景问题一样,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复杂。在右派和历史的关系中,首先存在着一些从根本上说是反动的思想体系,由于某种回归永恒的向往,这些思想体系总是在怀念被废除的过去和失落的世界。此外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人们从反动转而变为保守。因此,这里所涉及的,不是人们对回归到过去时光的向往,而是对保留已逝时光的希望,必须抓住历史,至少也要迫使那些被认为是有害的或是危险的历史进程停下来。从表面上看,阿隆属于这样一种人,他希望小心谨慎地对待过于激烈的历史潮流和旋涡,因此,我们可以把他归入右派的行列。但是,如果我们观察得更仔细一点,情况就不尽相同了。我们都知道吉佐[8]的话:"社会为了信赖自己,希望自己不是产生于历史。"事实上,右派的历史根深蒂固,历史是他们扎根的沃土。但是,阿隆从来没有这种继承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右派中间因土地和死者而占据了上风,这恰恰和左派相反,后者常常把决裂和摒弃作为他们基本的观点。应该说,正是相对于这种决裂和摒弃的观点,我们才把阿隆归入右派的政治行列的——尽管这样做是为了反对这种观点。无论如何,这也许就是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雷蒙·阿隆的一个关键。他是在反对别人观点的过程中赢得尊重的,他的自我定义,更多的是通过驳斥在左派中占统治地位的主要思想体系——这是由于这些思想体系

的综合规模以及它们对所谓救世主的向往——而不是通过赞同右派的政治文化来完成的。

从此，阿隆和萨特的冲突在所难免，后者既是某些思想体系的弹药手，又是它们的象征。我们都知道朱利安·格拉克对罗马所作的美丽形容，他认为这座城市具有"利用废墟"[9]的天才。在战后的几十年里，让－保尔·萨特一直在努力为一部分极左派连续的政治参与活动提供经过思考的论据，而这些参与活动每次都抛弃了那些被认为是思想废墟的东西。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抛弃了社会民主党，1956年它谴责了苏联模式，它对第三世界的道路逐渐失望，它所主张的西欧左派观点也逐渐消失在沙漠之中。每一座新的思想大厦都与前一座彻底决裂，但它们都保留了浸透着马列主义的骨架。由于萨特不断地为历史事件恢复名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韦奥莱－勒－杜克[10]。

从此，要想反映萨特和阿隆之间的对立，就再也用不着去分析那些狭隘的矛盾了，比如理智与感情、冷静与冲动、淡漠与热情、梦幻与现实，等等。这并不是因为上述陈词滥调毫无可取之处。同样，我们既不用对诅咒者和审慎的分析者作比较，也不用把萨特说成是轮流受到每一种进步思想控制的偷窃癖，这些进步思想先后都遭到了阿隆的驳斥。这一切并非全都毫无道理。但是，更深刻地说，我们还要分析萨特和阿隆与历史的不同关系，这种不同关系本身所反映的，是他们两人在现实问题上的根本不同之处。在政治上，也就是在个人对现实的理解和加入国家大事辩论的方面，阿隆追求的是真。从本质上说，要达到这一目标永远是复杂的。因此，阿隆的思想摇摆不定，将信将疑，但它还是希望同现实的复杂性作斗争。在同样的政治领域里，萨特最初什么都不追求。接着，在这一领域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他

开始追求善。因此，萨特的思想充满激情，如同救世主一般，希望通过语言的魔力以及由此而生的行动使现实屈服。

在这两种对立的态度中，我们必须考虑萨特和阿隆的哲学基础，也就是说他俩的思想体系。然而，从表面上看，一切都似乎与此无关。我们甚至要问——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假设——他们面对生活和历史的态度，是否在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关于这个问题，研究萨特和阿隆著作的专家们也许还要争论很长时间。通俗地说，我们在本书中已经看到，雷蒙·阿隆很快意识到了历史的诱惑，不久他就开始用哲学家的眼光来思考历史，但与此同时，也作为一名普通公民，他被淹没在历史之中。相反，让-保尔·萨特直到30年代末还是那种带有两重性的知识分子，对历史的进程不闻不问。他是不是为了弥补自己早期的这种冷漠，才在后来全身心地投入了历史呢？这个问题同样也引起了争论。不管怎样，萨特从对历史漠不关心，转而到后来对它肃然起敬并为它效劳。因为历史不仅存在，而且还有自己的方向，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帮助历史前进，而历史的前进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一点上，萨特身上还存在着某种桂河大桥[11]综合症。

不管我们采用哪种假设，在战后几十年的历史风暴当中，在一种怀疑一切的思想和另一种拯救世界的思想之间，人们很难辨明方向。萨特和阿隆选择了拥抱他们这个世纪的历史，尽管这种选择是在不同时间作出的。这是一段多灾多难的历史，而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必然和历史一样动荡不安。当然，他们的决斗远不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惟一决斗，但无论如何，它清楚地反应了那些震撼法国知识界的巨大风暴。此外，阿人的影响随时代的不同而变化着，这也体现了先后主宰知识界的思想的主要阶段。

同样，我们必须把这场归根到底有着崇高意义的决斗，放到知识分子历史的一个特定时期来研究，这个时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法国解放后知识分子“光荣的30年”。此后就是“孤儿时代”。但是，这一时代并非仅是一个紧接在光芒四射的阶段之后的退却时代，由于当时波及知识界的思想震撼，“孤儿时代”结束了一种几乎延续了一个世纪的趋势，这种趋势始于德雷福斯案，在这一过程当中，知识分子曾是绝对的统治者。从某种意义上说，1980年4月萨特的葬礼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更何况在80年代，一场关于知识分子身份的危机德代了这场冲击如此之强的思想危机。一方面，法国知识分子被迫面对一种“文化不适”，这种不适是由何兰·范基耶尔克罗[12]在1987年《思想的失败》一书中得出的结论。他认为，文化概念本身的扩张，导致了某种文化的相对主义，这种相对主义辅助了那些新的思想领袖。另一方面，在这十年中，知识分子同样也承受了思想斗争中所出现的软弱的一致。不管怎样，这是贝尔纳-亨利·莱维[13]在他的《知识分子的赞歌》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该书同样也出版于1987年。为了使他所说的话更加形象，作者指出，反映了前几十年斗争的“萨特对阿隆现象”，已经为“萨特和阿隆现象”所代替，后者拭去了双方的不和，强调了彼此的共同点。知识分子一旦丧失他们的思想色彩，就无力像过去那样，在他们的斗争中找到有关国家大事的辩论机遇，只能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我们完全可以对上述结论提出异议。但是，事实上，知识分子大规模辩论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这并不是说知识界从此成了一条头脑单纯的变色龙，只会本能地使自己等同于时代的色彩。不过，从那时起，它对周围社会施加的影响越来越少，人们没有必要大唱怀旧的赞歌，也没有必要搬出一群已经去世的知识分子，因为一个时代已经结束。它既没有引起人们的崇敬，相

反也没有导致麦卡锡主义。但是,它在法国情感的历史上绝对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时期。对此,雷蒙·阿隆也间接地作了说明,他于1957年在《世纪的希望与恐惧——不带偏见的评论》中指出:“法国人之间的争吵是不可平息的,因为争吵使不同的思想派别相互对立,争吵从彼此的不满中汲取营养,还因为思想的狂热是对妥协的反叛。”[14]写这些话的时候,他也许同样也想到了十几年来把他和过去的“小朋友”无情地对立起来的这场辩论。

注: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讲座》,封丹那出版社(Fontaine),1947年,第57—73页。

2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历史的终点?》(*La fin de l' Histoire*?),摘自《评论》(*Commentaire*),第47期,1989年秋。

3 雷蒙·阿隆,《历史的迷信》(*Superstition de l' histoire*),摘自《精神自由》(*Liberté de l' esprit*),第38期,1953年,第35页。

4 夏尔·费迪南·拉米兹(Charles Ferdinand Ramuz),1878—1947,用法语写作的瑞士作家。——译者注。

5 我在这里再次运用了《法国右派历史》一书的结尾曾经提出的一些分析的内容,该书由伽利玛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3卷,第867页,及以后多处。

6 《回忆录》,出处见前文,第320页。

7 《两个世纪的反动辩术》(*Deux siècles de rhétorique réactionnaire*),法语译本,法亚尔出版社,1991年。

8 弗朗索瓦·吉佐(François Guizot),1787—1874,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从1830年起曾历任政府的内政部长、国民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和总理等职。他的保守政策引发了1848年的革命。——译者注。

9 朱利安·格拉克,《在七座山丘的周围》(*Autour des sept collines*),巴黎,若塞·克尔蒂出版社(José Corti),1988年,第57页。

10 欧仁·埃玛纽埃尔·韦奥莱-勒-杜克(Eugène Emmanuel Viollet-le-Duc),1814—1879,法国建筑学家。他是整修濒于毁坏的著名建筑的专家,也是这一活动的发起人。曾整修了许多法国著名的历史建筑。——译者注。

11 桂河大桥,“二战”期间日本侵略军强迫战俘在泰国修建的一座铁路桥,

1943年10月25日通车，该桥的建设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为此4万余名战俘被日寇虐待致死。——译者注。

12　阿兰·范基耶尔克罗（Alain Finkielkraut），1949—　，法国哲学家、评论作者。——译者注。

13　贝尔纳－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1948—　，法国评论作家。——译者注。

14　雷蒙·阿隆，《右派——工业社会里的保守主义》（*De la droite. Le conservatisme dans les sociétés industrielles*），摘自《世纪的希望与恐惧——不带偏见的评论》（*Espoir et peur du siècle. Essais non partisans*），卡尔曼－莱维出版社，1957年，第117页。